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SINGAPORE**

**Transnationalism and Hainanese in Singapore**  
**跨国主义与新加坡琼人**

**ZHOU WENPEI**  
周文培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20

# **Transnationalism and Hainanese in Singapore**

## **跨国主义与新加坡琼人**

**ZHOU WENPEI**

**周文培**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20**

##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all work submitted for this thesis is my original work. I declare that no other person's work has been used without due acknowledgement. Except wher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I have used some of this material elsewher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presented by me for assessment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or University. I certify tha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roject are authentic and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20/7/2020
Name of student:	ZHOU WENPEI
Signature of student:	ZHOU WENPEI

## Supervisor Declaration Statement

I have reviewed the content of this thesis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t does not contain plagiarised materials. The presentation sty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what is expected of the degree awarde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are those of the candidate except as acknowledged in the Author Attribution Statement. I confirm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20 July 2020
Name of Supervisor :	Ong Soon Keong
Signature of Supervisor :	

## Authorship Attribution Statement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delete as appropriate:

\*(A) This thesis **does not** contain any materials from papers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or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Date:	20/7/2020
Name of student:	ZHOU WENPEI
Signature of student:	ZHOU WENPEI

## 致谢

时光飞逝，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笔者从青葱追梦人，已成为一名母亲。这也许会是别人口中的“人生赢家”，学业家庭两丰收。但其中的心路历程跌宕起伏，有迷茫、有畏惧、有压力，也有很多的磨练与成长。能坚持完成博士学业，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纯强老师。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与写作上，他期许我养成广阔的思路，遵照自己的想法和兴趣，对自己的提问与论证多加深思。哪怕他身体不适，依然对我的论文反复审阅、指导，并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使拙作的质量有所提高。而当我在学业上产生畏难情绪时，他与我交谈，赋予我不断遇到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决心。读博期间，由于还要兼顾电视台主持人的工作，时常需要来回奔波，每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时，他都会及时给予我建议并协助解决。在此，感谢王老师多年的辛勤栽培之恩。

第二位要感谢我博士学位论文指导委员会中的游俊豪教授，游教授除了研究成果杰出外，还特别健谈。他告诉我，博士学习是要学会看问题的视角和层级，不仅对我论文研究帮助颇多，也对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解决问题受益良多。还要感谢游教授提供的极具参考价值的文献书单，都令我铭感于心。

第三位特别感谢我博士学位论文指导委员会中的陈重安教授。在我读硕士时，他就是我“公共管理”课程的老师，进入博士阶段，依旧给予我鼎力相助，在此深表谢忱。此外，还要感谢中文系每一位老师对我学业的鞭策和关心，尤其是衣若芬老师、崔峰老师、张松建老师、方小平老师，感谢他们为我指点迷津，打开研究的视野，给予我诸多关照。还感谢中文系的行政人员，为我们的研究、学习和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后勤服务，在此深表感谢。

从调研到完成论文，我曾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与协助，感谢与我分享自己和家人苦与乐的琼人，虽然没有在文中录用他们所有的生活故事，但实际上每一位对本文的撰写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次实地采访调研，得到了新加坡海南商会、新加坡海南协会、海南会馆，海南侨乡地区档案资料馆、侨联侨办工作人员的支持与帮助，为笔者提供数据、多方联系，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感谢我的至亲，是他们给予了我所有的爱，给我很大鼓励，帮承担家庭事务，才使我能全力学术志业。尤其是我的母亲，不仅在生活上给我最好的照料，还陪同我一起做调研、查资料。家人不仅是我坚强的后盾，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才让我在工作和学业上不断取得佳绩。

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我将会带着读博期间，师长们的教诲和期许，奋力拼搏，努力创造价值。也衷心祝愿关心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和亲人们，一切顺遂！

# 目 录

致谢.....	I
目 录.....	III
摘要.....	VIII
SUMMARY.....	IX
绪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研究目的与意义.....	3
三、 跨国主义研究的定义、内涵与意义.....	4
四、 研究现状和文献回顾.....	8
(一) 新加坡琼人研究现状概述.....	8
(二) 移民跨国主义研究的学术回顾.....	12
五、 研究理论与方法.....	14
(一) 研究方法.....	15
(二) 研究理论.....	16
六、 问题提出与章节安排.....	18
第一章 琼人出洋的原动力.....	21
第一节 出洋客观原因——中国内部推力.....	25
(一) 人口因素.....	26
(二) 经济因素.....	31

(三) 政治因素.....	33
(四) 自然灾害.....	35
第二节 出洋客观原因——海外外部引力.....	44
(一) 政治因素.....	45
(二) 经济因素.....	46
第三节 琼人出洋的主观原因.....	47
第二章 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与挑战.....	53
第一节 乘风破浪下南洋——从帆船到轮船.....	54
(一) 看风使舵——琼人先贤帆船移民.....	55
(二) 轮船时代——琼人移民浪潮.....	58
第二节 新加坡琼人移民类型.....	60
(一) 非自由移民.....	62
(二) 自由移民.....	65
第三节 琼人跨国移民家庭的挑战.....	68
(一) 琼女出洋挑战.....	69
(二) 挑战妻子角色——“留守新娘”.....	72
(三) 维系跨国家庭婚姻的挑战.....	75
第三章 琼人身份认同的嬗变 —— 跨国主义视角分析.....	79
第一节 琼人的族群认同.....	82
(一) 新加坡独立前（1965年前）.....	84
(1) 历史.....	87
(2) 排他性.....	88
(3) 其它方言群对琼人族群认同影响.....	90
(二) 新加坡独立后（1965年后）.....	92
第二节 琼人的地缘认同.....	94
(一) 新加坡独立前（1965年前）.....	95
(二) 独立后（1965年后）.....	102
(1) 重视文化教育.....	103
(2) 地缘认同的调适.....	105
第三节 琼人的国家认同.....	106
(一) 新加坡独立前（1965年以前）.....	107
(二) 独立后（1965年后）.....	111
第四章 跨国网络：琼人与海南侨乡社会.....	116
第一节 琼人跨国网络的经济互动.....	119

(一) 侨汇.....	121
(1) 道义“侨汇”改善生活.....	124
(2) 侨汇——修缮祖屋.....	129
(二) 互惠互利：侨资.....	132
(三) 侨资利用情况.....	140
第二节 以侨为桥：跨国文化互动与公益建设.....	144
(一) 跨国文化互动.....	145
(1) 继承传统宗族文化.....	146
(2) 其他文化的互动.....	148
(二) 增值效益：社会公益.....	152
(1) 投资兴学办医.....	153
(2) 救灾善举.....	158
第五章 结语.....	163
参考文献.....	169
一、 档案史料、文献.....	169
二、 方志、游记、报刊.....	169
三、 辞典.....	173
四、 中文专书.....	173
五、 中文期刊论文.....	182
六、 华侨会馆、社团刊物.....	187
七、 学位论文.....	188
八、 网站检索工具.....	189
九、 英文专书、论文、期刊.....	189
附录一：.....	193
清代土田税额一览表.....	193
附录二：.....	196

清代科则一览表.....	196
附录三： .....	204
海南各地杂税一览表.....	204
附录四： .....	209
海南人口密度对比表（1835 年和 1928） .....	209
附录五： .....	210
1887 年-1894 年琼州口岸进口货物主要品种统计表.....	210
附录六： .....	215
1895 年-1902 年琼州口岸进口货物主要品种统计表.....	215
附录七： .....	219
1903 年-1911 年琼州口岸进口货物主要品种统计表.....	219
附录八： .....	223
1886 年-1893 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223
附录九： .....	225
1894 年-1901 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225
附录十： .....	228
1902 年-1909 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228
附录十一： .....	230
1910 年-1912 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230
附录十二： .....	231
海南岛北部地区鼠疫流行统计表.....	231
附录十三： .....	232

《文氏族谱》 .....	232
1950—1995 年文昌、琼海侨汇收入一览表.....	232
附录十五: .....	234
文昌、琼海、儋县三县投资农矿业各时期统计表.....	234
附录十六: .....	234
文昌市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1978——2007 年捐赠款额统计表.....	234
附录十七.....	236
1979——2002 年底琼籍侨胞、港澳同胞捐赠情况一览表.....	236
附录十八: .....	237
文昌县乡（镇）海外乡亲、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统计表.....	237

## 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琼人为研究对象，运用“跨国主义”理论视角，对比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琼人的跨国行为特征，以及跨国实践活动所联结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从琼人迁移的背景、原动力、渠道，论证当初一批批琼人离开故土到新加坡闯荡，目的不是为了“分离”，而是更好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联系家人、家庭和家乡，改变其家庭生活状况和家乡经济发展。文中又通过变量之轴兼及不同时期，探索新加坡琼人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调适发展形成不同的生态特征和适应过程，呈现出新加坡琼人的双重文化生活和双重民族主义特点。琼人在新加坡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小生境—通道”，使之成为纽带的空间维度，构成特定的移民生态跨国模式，并通过社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成为在新加坡困难和矛盾的帮扶者，权益和诉求的维护者。本文从琼人的生根、发芽到茁壮演进史源，解读琼人跨国身份认同嬗变的原因，剖析琼人跨国网络建构的内在脉络。这些都对丰富海外华人研究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对开展人类学生存和发展的思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琼人，跨国主义，跨国网络，身份认同

## SUMMARY

This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Hainanese in Singapore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t employs a mobile perspective to analyse the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of Hainanese emigran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Singapore history, and the multiple social networks that spanned Singapore and Hainan that they created. By tracing the background, motivations, and migration channel of the Hainanese,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for these emigrants, leaving home was not about “separation” but finding new and better ways for “connection.” Only by doing so, could they better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ir hometowns.

In Singapore, the Hainanese adapted their survival strategies flexibly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island, and in the process demonstrated their comfort in living under the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Singapore and Hainan. They did it by creating a special “niche” in Singapore -- through their native-place bond, the Hainanese formed a tightly knitted emigrant community whereby they not only helped one another in times of need, but also banded together to fight for community rights and benefits.

This study on the Hainanese emigrants’ roots in the homeland, their adaptability in the place of settlement, their evolving identity, and their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ransnational network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emigrants.

**Keywords:** Hainanese, transnational doctrine, transnational network, identity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海外华人研究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愈发受到学者重视，而后随着时势变迁发展，西方学者不断突破既有观念和视野，重新思考移民跨国关系现象，在研究视角、方法、对象等，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其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借用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移民跨越国家边界，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跨国形态和社会活动场景，以及给移民自身、居住国和祖籍地带来的影响，出版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学者们对琼人群体（本文将移居新加坡的海南人统称为“琼人”）跨国形态的学理性探讨不足。我们不能忽视，海南是中国的三大侨乡之一，琼人也是新加坡的主要移居方言群之一，这一跨国行为的产生、发展和延续，可以说对两个国家在政治互动，文化重建和经济建设都有着多层次的联结关系。笔者研究的初衷，只为填补琼人跨国后的文化再造、跨国身份认同，以及联结海南侨乡关系网等，丰富海外华人的跨国行为研究，故此项研究颇具意义。

笔者走访发现，琼人说着海南话，也讲着流利的英语；他们居住在新加坡的“家”，也不忘海南祖籍“家”；他们汲取母文化的营养，也融汇西文化的精髓；琼人定期的跨国联系，既帮助早期移民初来乍到求生存，也助力琼籍后代更好的发展。琼人与家乡跨国网络的编织体现于宗教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网络、亲属网络、族群网络等方面的联系，并在其中形成一种游移的常态模式。当然，不同时期和历史阶段，琼人呈现的跨国文化建构、身份认同有所演变。他们不再是单一的落叶归根或衣锦还乡，也不是完全被融合，而是在文化认同和社会建构场景中表现出跨国形态，这些特征都与跨国主义理论的要旨相符。琼人跨越地理文化疆域，助力海南侨乡的形成与发展更显创造性，这也都体现于琼人的跨国实践行为中。综上，笔者将自己的研究题目定为跨国主义与新加坡琼人。

为了做好这一研究，笔者曾努力搜寻琼人南来新加坡的历史，以及琼人跨国实践纽带作用的文献，非常遗憾，相关研究非常薄弱，很多问题被历史学家们所忽视。新加坡著名文史学者韩山元早已对其中的缘由做过分析，主要有以

下几点：百多年来，由于在新加坡成功的琼籍富商不多，琼人在当地社会地位不高，很多历史学者较青睐于研究富商巨贾、达官显贵。所以，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琼人，便成为忽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出自琼人自身的历史学者太少，没有形成有能力的研究队伍。其他籍贯的历史学者，因为语言、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局限，对琼人群体的跨国实践、跨国社会场景、跨国社会空间研究兴趣也不太大，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有关琼人研究成果不显著的缘故。<sup>1</sup>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有关组织机构虽开始努力搜集与琼人相关的资料，与熟悉南来史的老前辈进行访谈，希望尽快填补琼人下南洋的历史空白。但是，笔者搜寻文献后遗憾于，相关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尚未有一部系统完整的琼人南来新加坡发展史以及琼人跨国实践行为的学术著作。现有新加坡琼籍族群研究成果，大多以通史记载，研究者更多从自身所在地视角出发，欠缺宏观结构和微观基础两个视角深入思考，研究内容与分析尚不够全面深入。所呈现的研究大多是片段性、不完整性和断裂性的，对琼人跨国社会生活实态的研究依旧薄弱。而海南人出洋旅居海外的历史源远流长，研究海外华人不能不包括这一群体，因此研究琼人的跨国行为势在必行。

笔者作为一个在新加坡读硕、博的学生，多年生活学习在狮城，参与体验琼人在新加坡的生活，颇有感触。这其中，有琼人立足扎根、艰辛困苦的跨国奋斗史，也有许多为新加坡发展助力的贡献史，这些史记应该被后人所铭记，能给予我们更多的生存发展启示。同时，笔者是一个在海南生活多年的新海南人，熟悉海南的风土人情，民风乡俗，听得懂少许海南方言。又作为在海南广播电视台工作十余年的主持人，笔者在电视节目制作工作中，时常接触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素材和当事人，获得详实的一手资料。当然，追本溯源探究有关琼人的跨国行为，还源于笔者很想知道，琼人当初为何愿意离开风光秀丽的度假天堂海南，为什么在新加坡有以“海南”命名的街道，琼人如何建立“小生境—通道”<sup>2</sup>使之源源不断迁移，他们的跨国实践行为给新加坡与海南侨乡间带来的影响，以上都是吸引笔者好奇想去探索的原因。

---

<sup>1</sup> 韩山元〈新加坡海南人的心态与社会地位的演变〉、〈琼州人南来沧桑史〉，见周伟民主编《海南学论丛·第一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页164-173。

<sup>2</sup>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页45。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百年多来，随着海南人迁移人数的日渐增多，海南侨乡与移居国间建立起密切的跨国关系，在海南侨乡的方方面面随处可见南洋的痕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侨乡风情。而在新加坡的琼人，由于地缘相近、血缘相亲，又建立起特定的“小生境”(niche)，成为族群间凝聚的源泉，搭建起了一条互通有无的“通道”，使之成为一条连接两地、双向对接、深入互动的桥梁。笔者借用跨国主义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琼人个体、琼人族群、琼人家庭，在跨国行为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剖析特定“小生境—通道”<sup>3</sup>与故土间互动模式的变化与结果，以及他们又给侨居国与祖籍地带来哪些双向影响。笔者认为，这一研究不仅具有时代意义，更有现实指导作用。

为什么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琼人的历史与现状呢？

第一，借用跨国主义理论反思琼人的跨国过程和经历，具有典型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价值。海南人大多受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他们爱家、恋家，选择下南洋大多是出于谋生、追求个人和家庭美好生活而跨国流动。但是，这一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完全被“同化”或“旅居”，不是单一的“衣锦还乡”、也不完全是“落地生根”。而是在文化建构、族群认同、社会场景中，表现出一种新的跨国形态，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受两国两地共同作用而反应。在新加坡谋生的琼人，与琼人社群有着“斩不断”的宗族人际关系，与海南经济社会有着“理还乱”的乡情情愫。他们的跨国主义实践行为，从馈赠、道义的模式到普惠、互利的跨国活动演变。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研究能给予我们更广阔的视角，能告诉我们真实的现象是什么，不只是简单叙述琼人艰辛奋斗的过程，或是跨国交流互动的概念演绎。而是通过挖掘琼人跨国社会场景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构成，探讨相对独立、完整的历史个体事件，全面考察有关琼人的诸问题，进而思考发人深省的现实问题。这项研究不仅是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更是研究移民经济、社会、身份认同的学理性问题，其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笔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伴随着琼人的跨国迁移，形成并长期维系着跨越国境的亲缘和乡缘网络，这一跨国网络的编织相交在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琼人虽离开海南移居新加坡，但建立起与侨乡海南

---

<sup>3</sup>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间持续劳动力分布网络，扩展着劳动者和家庭纽带的空间维度，对两国两地的社会文化、发展建设以及经济效益带来切实影响，发挥着纽带跨境互动作用。可以说，海南侨乡的产生与发展与琼人的跨国移民史紧密相连，反过来，琼人在新加坡的生活活动，也受海南政治经济的影响。当然，这一概括并非适用于所有时期和社会阶层。但笔者认为，运用跨国主义研究移民社会，从民族国家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以更广阔全面的视角，思考族群和文化跨国流动的现象，更注重移民的机动性和跨界性，强调跨国社会场景决定移民的生活风貌。

第三、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混居的国家，新加坡的文化结构呈现多种族杂糅的特质。在历史进程中，各种族、各民族对于身份意识的构造，族群和文化的认同，将他们放置于跨国社会空间中加以考察，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笔者认为，通过研究新加坡琼人的跨国主义，有利于比较分析不同族群间异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融的学术议题，更能全面窥视新加坡发展史的全貌，促进产生东西文化交汇，孕育多元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华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占百分之七十四，而琼人在新加坡华族人群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左右。<sup>4</sup>研究有关新加坡琼人的诸问题，对丰富新加坡华人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近年来，新加坡与中国的跨国经贸合作，政治文化交流日趋加强，其中，新加坡琼人所发挥的纽带作用不可忽视。笔者整合各方资源，从琼人行为和认同变化的轨迹中，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中，理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的联系，揭示琼人生存出路的发展特点，并探寻其中有无规律可循可借鉴。当下，海外华人越来越多，客观需求研究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状况，这一研究有利于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探索人类发展的特殊规律，有利于开拓历史学术的空间，这项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人心工程。

### 三、跨国主义研究的定义、内涵与意义

何为“跨国主义”？跨国主义是指移民跨越地理、文化、政治边界的社会场景的社会过程，并建立维系祖籍地与移居地间多重社会关系的进程。他们的

---

<sup>4</sup> 姚蔚生〈新加坡历届人口统计中之人口地位〉，见耿素丽、章鑫尧《南洋史料》（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08.11），页30。

行为、决策和关怀都离不开两国两地间的社会关系场域，并通过建立和维系跨界家庭、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组织和宗教，来调试和抗拒移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跨国移民在祖籍地和移居国间多重联系、多重参与是跨国主义的要旨。<sup>5</sup>最早研究此领域的代表学者有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 等，之后有牛津大学教授托维克(Steven Vertovec)，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等人，他们对跨国主义的涵义提出进一步看法，认为“人们或机构跨边界、跨国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互动模式”，并且跨国社会联系是具有一定规模性、规律性、延续性和深广度的跨国实践。<sup>6</sup>通常的研究中，大多是关注移民在跨国主义中的侨汇作用和家乡建设，笔者借用跨国主义进行研究，更想重点探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移出地、移入国特定的迁移历史和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琼人跨国社会现象的形成；二、琼人在居住国和祖籍地的跨国行动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带来哪些挑战；三、琼人编织的跨国网络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如何体现，又如何影响移民身份认同的嬗变；四、跨国社会场景的展开对琼人、琼籍社群、两国两地都带来了何种影响。

这一备受关注的跨国主义西方理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存在着不少争议。因为，它既显示出对海外移民研究的贡献所在，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问题。贡献在于：它摒弃一些学者，仅以中国为中心，或以移居国为中心，将研究对象孤立固定于某一民族国家里进行探讨。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里讨论跨国移民现象，使华人边缘化，失去了研究的主体性，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而移民的活动场景本身是跨国的，移民是依靠在移出国和移入国间建立关系网络进行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所以，运用跨国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跨国网络”研究所建构的跨国空间维度，便摆脱地理制约和物质分离，进而更好演绎和影响人们的行为策略，以及对事物认同的缘由。”<sup>7</sup>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就发现琼人作用于两地两国，不能完全将他们从哪一边隔离出来，他们既属于

---

<sup>5</sup> Nina G Schiller, Linda G Basch, and Cristina S Blanc,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igration: Race, Class,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2).

<sup>6</sup> Steven Vertovec,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no. 2 (1999): 447-462. doi:10.1080/014198799329558.

<sup>7</sup> Thomas Faist,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祖籍国也属于移居国，在跨国网络的互动中的影响既有正向，也有不可忽略反面，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理解移民社会场景化和历史化现象。

反观，跨国主义理论研究中易存在的问题：一、正如 Thomas Faist 所言，将跨国移民从国家体系的场景中分离出来，但民族国家的作用并非消失，相反，移居国和祖籍国的政策对跨国移民起决定作用。二、以往跨国主义的研究中，着重探讨那些非常规移民，对常规移民的内部差异关注缺失。大多文献聚焦以移民个体为分析单位，虽然 Alejandro Portes 等人也提出，以社会网络和移民个体作为研究主体。<sup>8</sup>但是，不能忽略移民在跨国社会关系中的内聚性，以及以跨国组织形式进行的跨国活动。关注紧密联系的跨国网络、组织和人员，其影响更具深远意义。三、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突出移民在跨国关系中的维系和作用，却忽视跨国关系中的解体过程，以及移民在跨国关系中出现的现象。譬如，侨资的流入为侨乡带来积极一面，但也有破坏性影响；两头家现象，男性在异国他乡另组家庭，留守新娘变成留守阿婆的悲凉生活等等现象。因此，跨国现象并非都是和谐的、有利的，移民在跨国关系中也存在在抵抗和充满矛盾的过程，只有全面考察才能更具客观性。四、现有的研究文献大多研究不同区域移民跨国主义的差异性和模式，但对同一移民不同时期的跨国主义比较分析较为欠缺。笔者认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社会变迁因素，都是塑造出不同移民社会形态。只有将跨国社会场景的空间延伸，跨国空间中的人文、经济等因素相互交织作用，才能更好探寻跨国联系的过程，以及移民游走于祖籍国和侨居国间的过程，才能更好把握时空脉络和移民发展，这也是政治科学家费斯特(Thomas Faist)等人所强调的。<sup>9</sup>

在上述论述中还值得注意的是，跨国社会场景和社会网络是研究跨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在研究琼人的移民活动和作用时，必须在跨国场景和社会网络中进行，因其不同的迁移渠道、迁移原因、生活状况和主观意识，使跨国实践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使移民的的三大核心问题，跨国网络的范围，跨国社会场

---

<sup>8</sup>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no. 2 (1999): 220. doi:10.1080/014198799329468.220.

<sup>9</sup> Thomas Faist,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and Cultu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 no. 2 (2000). doi:10.1080/014198700329024.

域的构造，跨国认同的选择具有差异性。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琼人通过跨国社会空间，与故土保持着联系，这种精神情感支撑着他们适应新生存环境中遇到的种种状况。同时，跨国网络作为独有资本，支持和维护他们在侨居国的利益，反过来，他们也更加维护和认同这种跨国网络，逐渐表现出摆脱地域限制和生活限定的跨国认同现象。

跨国实践是跨国主义的重要概念，顾名思义就是移民的跨国行动和活动。跨国行为是可测量观察的外显表现，跨国能力则体现着移民的技能、资源和所具备移民的机会。<sup>10</sup>根据跨国主义实践的类型，又可把跨国主义行为分为若干类型，应激型、依赖型、线性跨国主义。跨国类型的多变与不稳定性，为移民跨国主义出现的原因，以及居住国和祖籍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状况，跨国参与程度的强烈，都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笔者的研究将着重关注琼人个体和社群组织的跨国活动，这也是波斯特强调跨国主义最重要和最值得研究的部分。<sup>11</sup>但笔者会在比较分析中，根据不同时期琼人跨国行为的不同，关注他们跨国活动的参与度、强度和动机，尽量做到实证研究的精细化。

也就是说，运用跨国主义中的核心概念——跨国社会空间、跨国社会场域、跨国实践行为、跨国网络社会为着眼点和逻辑方法进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以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移民在移出国和移入国间互动的过程，在文化、认同、适应、融合中再造、渗透、转换、混合、杂交的进程。通过跨国社会场域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把移民从一个独特的空间改为不同国家间的流动，更具客观性和丰富性，也能揭示无法洞悉的跨国现象，具有深刻意义。

在跨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本文就突破传统海外华人研究的视野，跳出民族国家框架模式的束缚，通过实证研究重点关注移民的机动性和跨界性，强调移民的生活取决于跨国社会场景。其中，本文就提到了海南移民群体作为新加坡相对底层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此产生与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竞争，这些包括新加坡移民社会的竞争，也有因抢夺资源分配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又因

---

<sup>10</sup> 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见《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12年第3期。

<sup>11</sup> 潮龙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见《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7年第3期。

与其他族群、方言群间的相处关系，形成了琼人的族群形象和族群认同，这些都很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近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动态，从本文的研究能发现跨国主义是一个极有张力的理论框架。文中还提到琼人女性移民因受贞节要求的约束、受社会网络的监视，恰有效维护了琼籍家庭分居模式的存在。在新加坡，方言成为华人间认同的重要手段，海南人进入咖啡店业，对职业取向上形成族群垄断等特点，可以说族群认同是社会运作的重要动力。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一抹亮点，既展现了一个具有内部聚集性的跨国琼人社会，又表明海南移民的出洋、所遇挑战，以及跨国网络与广、粤、客家等移民群体相比的特别之处，可算这项学术研究的一丝贡献。

## 四、研究现状和文献回顾

### （一）新加坡琼人研究现状概述

笔者选择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关键词，对国内外材料检索发现：关于新加坡琼人的历史和社会活动的著作，与其他方言群相比非常欠缺；对于新加坡琼人百年演进的发展过程，我们知之甚少；对琼人的“跨国主义”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下是笔者悉心寻找后查到的有限文献。

关于琼人研究著述较多的研究者，首推新马历史学者吴华先生。作为琼籍历史研究工作者，他先后出版了几本有关新马琼人的史料著作。吴华先生的《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sup>12</sup>一书，提供了四百余名杰出琼人先贤的简介资料，汇集了五湖四海、不同时期的琼人精英。这是项艰辛、有意义的工作，为其他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数据，以此达到了抛砖引玉的效果。遗憾的是，此书就侨居地新加坡的琼人只有少量概述。而吴华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新加坡海南人物录》<sup>13</sup>较详细记载了新加坡琼人，书中整理参加过海南会馆工作的各界领导和组织人物的资料，收集记录了政、经、文、教、医等各界琼人人才的介绍，共有五百多人，人数之众，令人惊讶，对于想要深入研究了解新加坡海南族群现

---

<sup>12</sup> 吴华《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1999）。

<sup>13</sup> 吴华《新加坡海南人物录》（新加坡：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出版室，2004）。

状的学者提供了完善的资料。吴华先生的另一本《新加坡海南族群组织》<sup>14</sup>一书中，也收集了不少海南籍各团体的珍贵资料。作者将多年收集的史料，编著成册，颇有用心，这些资料也对笔者的研究起到了实证案例之用。阅读完吴华先生的几本著作，能感受到一位琼籍历史学者对家乡的眷恋，对有关琼人资料搜集的热爱，所著之书资料性更强。作者还编有《世界海南组织资料汇编》，《狮城掌故》，《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册）等，书中所展示的大量个案，一再被研究琼人的学者所引用，吴华先生的这些著作是了解琼籍的重要参考资料。

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的《琼侨沧桑》<sup>15</sup>是一本早期有关琼人出洋原因、过程、发展、贡献等琼侨历史概貌的叙述，为琼侨相关史料问题的研究起到相互印证作用，但遗憾的是此书精短页薄，编写过程中对新加坡琼人只做个别专题研究。并且，作者也因历史原因致使搜集史料有限，编写不够全面感到遗憾。而云愉民 1931 年出版的《新加坡琼侨概况》<sup>16</sup>，也是一部关于新加坡琼人生活的早期记载，论述新加坡琼人的社会职业概况，书中用新闻报道般的笔触，详细叙述了为什么闽粤籍妇女大量移民新马时，琼籍妇女仍被严禁出洋的原因，以及近代琼女出洋的遭遇。笔者认为，这一论述基本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时期，琼人的文化认同和乡俗乡规，哪怕已离开故土，生活在受西方思想洗礼的新加坡，琼人依然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琼人的行为准则依旧按照陈旧观念执行。书中概述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譬如，在《琼侨之教育》一章，介绍“琼侨之夜学”，附有夜学一览表。呈现琼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正是笔者研究琼人身份认同嬗变的突出的论据，琼人通过苦读熬出一个春天，闯独木桥的方式在新加坡扬眉吐气，立足当地，这是与闽粤籍在新加坡拼搏的不同之处。总之，此书中的论述将与笔者的研究，以及历史档案史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弥足珍贵。

---

<sup>14</sup> 吴华《新加坡海南族群组织》（新加坡：新加坡武吉智马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2009）。

<sup>15</sup> 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琼侨沧桑》（以下简称《琼侨》），（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1）。

<sup>16</sup> 云愉民《新加坡琼侨概况》（以下简称《琼侨概况》），（海口：海南书局，1931）。

冯子平作为归侨，曾担任海南侨务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书记，主持创办了很多与侨情、侨务、侨乡建设相关的工作。在他长期研究琼籍华侨的历史中，曾著有《海外侨乡行》<sup>17</sup>、《海南侨乡》<sup>18</sup>，这些书记录了海南侨乡在侨资、侨力、侨智的帮扶产生的变化，其中新加坡琼人参与建设了海南侨乡的水电站、公路、学校、医院等，在经贸合作与社会文化方面都有深入交流以及融合发展，书中还详实报告了各时期海南侨乡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这些材料对笔者研究琼人跨国实践行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书中呈现出海南侨乡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笔者认为，这两本书结合不同时期海南的经济社会环境，基本反映出侨汇对海南侨乡的经济作用，侨资与海南产业互动上的发展，琼人在跨国文化的互动中所建构的文化认同，以及跨国联结给海南带来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公益效益的增值效果。冯子平还著有《走向世界的海南人》<sup>19</sup>，叙述了琼人出洋谋生的艰苦奋斗史，以及与海南侨乡的故乡情，读来让人感慨。冯子平的《海外琼人风云录》<sup>20</sup>，宣扬了琼人的业绩，记录了新加坡琼人精英的传略。书中作者也把琼人对故土的依恋，比喻为出嫁的女儿对“娘家”的感情，因此，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论述能合情合理解释为什么琼人与家乡的跨国联结如此频繁，并编织出纵横交错的跨国网络，因为他们本是同根生。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侨刊《琼州乡音》和《琼侨春秋》，作者借书传递海南侨情，让琼人后代了解家乡，认识海南，读完作者的每一本书都能为笔者的研究带来启迪。

王振春的《根的系列——话说海南人》<sup>21</sup>记录了有关海南人的事件，这些事件与族群、社会、国家都发生了密切关系，也促进和推动了新加坡的发展和进步。书中共有四十篇与海南族群有关的文章，如海南人的咖啡店，海南人的公司楼，海南籍的国会议员等，这对关心和研究海南族群的学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参考作用。而唐若玲的《东南亚琼属华侨华人》<sup>22</sup>一书，以对海南侨乡的社会观察，探索考察琼人下南洋的历史，以及他们与祖籍地的关系。作者本身

---

<sup>17</sup> 冯子平《海外侨乡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sup>18</sup> 冯子平《海南侨乡》（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sup>19</sup> 冯子平《走向世界的海南人》（以下简称《走向世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19）。

<sup>20</sup> 冯子平《海外琼人风云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sup>21</sup> 王振春《根的系列——话说海南人》（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

<sup>22</sup> 唐若玲《东南亚琼属华侨华人》，（以下简称《东南亚琼属》），（广州：暨南大学出版，2012）。

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学者，耳濡目染侨乡的人文风情和发展变迁。她的田野调查或深入海南侨乡，或挖掘乡土资料，此书论述更多从侨乡海南视角出发，并就相关因素进行详细探讨，与以上书籍相比属规范的学术论文著述。全书共分六章，作者意在东南亚琼属华人作一历史考察，即琼人移民的驱动因素和历史过程；琼人对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侨乡风情乡俗受东南亚文化的影响；琼人社会的职业与社团组织等等，这是一本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对琼人移民史研究的意义重大。

由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海南移民论文集》<sup>23</sup>收集了 21 篇有关海南移民史学者的专论，以浅显易懂的文字论述海南移民的来龙去脉。其中周伟民、唐玲玲写的论文〈清代海南移民的新趋势〉运用史料记载，呈现了琼人清代出洋的原因和状况，文中还运用了大量琼州口岸出入境统计数据，透过海南家谱看海南的移民情况，为清代琼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张朔人的论文〈海南女性出洋问题研究〉，解释了为什么琼籍女性出洋最晚的原因，通过数据分析，女性出洋给新加坡琼人社会和侨乡海南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安焕然的论文〈新马海南人历史精神探索〉，文中展现了琼人社会底层的海南激情，琼人参与抗战的革命精神，以及琼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此书当中不乏用心之作，但笔者认为涉及新加坡琼人的文章只有寥寥几篇，且研究不够全面，无法令人满意。

有关新加坡海南社会团体和琼人个案的研究，笔者还阅读到：王翔的《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sup>24</sup>、《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sup>25</sup>及新加坡华人社团出版物上有关海南社群、社团的研究著述。如韩元山对海南人的移民史及海南社群历史的回顾，王佐有关海南会馆文教活动情况的记述，王振春等人有关社群历史和文化的介绍，王兆炳对海南乡团的归类和海南社群经济

---

<sup>23</sup> 海南大学、南方学院大学、海南文化研究中心《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

<sup>24</sup> 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见《海南大学学报》，第 19 卷，第 3 期（2001.3），页 27-38。

<sup>25</sup> 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见《海南大学学报》，第 20 卷，第 1 期（2002.3），页 13-22。

的记述等。这些著述分别记载了百年来，琼人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活动，但缺点是予以人一种琐碎感，缺乏系统化。特别是对于杰出琼人的研究，仅仅只是个案专访介绍。同样，在《世界因你而精彩》<sup>26</sup>一书中，就仅以专访九位新加坡杰出琼人的故事，记录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整本书叙述为多，没有研究分析。

因此，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跨国琼人有更清晰地认识，从实证研究中展开跨国主义理论的提炼。

## （二）移民跨国主义研究的学术回顾

跨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比较系统提出的理论定义。主要用于研究移民跨越国境边界，相互联结维系祖籍地与侨居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场景的活动过程。当今世界，移民的跨国性越来越突出，世界已进入“国际移民时代”。所以，有关移民的跨国主义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孜孜不倦探讨的热点问题。

徐元音的《梦金山、梦家乡》<sup>27</sup>从跨国主义理论视角，对美国台山的移民进行了探究。文中指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移民美国的台山人不受地理空间的局限，通过金融、物资、信息、人员等方面，与中国本土台山人间的运转与维系过程。为了探讨与论述流动在美国与中国间的台山人的活动进程，作者用跨国社会场景、跨国社会空间来展开论述，显示了跨国主义理论对研究移民的潜在贡献以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将尽量克服缺点，在本研究中将琼人跨国主义视为一种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而不仅是简单的瓦解或中断跨国主义现象。笔者的研究，还将融入不同时期新加坡和海南两国两地的人文、经济、体制之间，让跨国场景不断地延伸化。向徐元音学习，通过移民的实证案例使该理论充分历史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框架上。书中作者用“纸生仔”的移民方式描述中国台山人为规避《排华法案》进入美国的可行之道，凸显了华人

---

<sup>26</sup> 韩昕余编著《世界因你而精彩》（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9）。

<sup>27</sup> Zhu Liping, review of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by Madeline Yuan-yin Hsu,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3, no. 1 (2002): 71. doi:10.2307/4144728.

移民的内聚性，以及在美国更加依赖华人关系网络而生存。还描述台山人在美国的艰辛打拼奋斗过程，通过源源不断的侨汇改善家人生活的责任，也通过拥有足够的资源改变台山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这些案例都论证了移民跨国主义的资源依赖性，这和笔者的研究有相同之处。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地理间虽割千万里，美国台山移民通过侨刊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维系方式，一方面横向连接地理隔离的华人社会，另一方面纵向维持跨国华人社会历史的接点，论证了台山移民跨国行为，以及对跨国华人家庭新材料研究的发掘。

李明欢教授是研究海外华人华侨与国际移民的知名学者，他的著作《跨国化视野：华人移民的圆梦之旅》<sup>28</sup>收集了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分三个部分，共十五篇论文。第一部分以欧洲闽浙籍新移民、以色列华工为研究对象，在《将意外变为意义：华南地区一个真正形成的侨乡》，《到欧洲赚快钱：对温州跨国移民动机的思考》，《重防温州侨乡：解析全球化时代的乡土认同》，《打擦边球：中国的跨国移民中介》四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移民产生的动机和跨国移民的发展过程，对移民目的地的选择，侨汇流入，炫耀性消费等现象，以及解析移民的侨乡认同建构，揭示侨乡的发展轨迹等。第二部分《21世纪初欧洲华人的人口、经济及其侨乡联系》，《全欧华人社团的跨国网络》两篇文章中，作者论述了欧洲华人与侨乡的联结，以社团为跨国联系纽带作用，五缘关系建立起特殊的“小生境-通道”，来保护自己族群在当地的利益和发展，以及经济网络的拓展。作者通过深度的调查访谈，以史料文献为依据，丰富了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作者就是根据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文献做论证研究。作者采用跨国主义视角，多维跨国社会图景，透彻个案分析，有理有据，值得笔者学习借鉴。

以往关于跨国主义的研究更多是注重跨国资本侨汇、侨资流动的宏观经济因素，而微观理论视角更多强调移民个体、移民家庭的能动性。然而，对移民组织和结构所产生的合力，促进跨国合作发展的效应，跨国移民给家庭带来与主流社会不一样的挑战等，考虑不够全面。在阿列汉德罗·波斯特和周敏书写的《国际移民的跨国主义与移民祖籍国的发展：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中，通过对两大种族社团与移民祖籍国间密切互动所带来发展的比较研究，

---

<sup>28</sup> 李明欢《跨国化视野：华人移民的圆梦之旅》（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剖析移民通过社团参与跨国活动，呈现移民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跨地域施展。这一研究成果通过跨国主义的理论架构，有助于呈现移民对侨乡发展因果进程的系统剖析。

直接以“跨国实践行为”、“海南”为主题的论文文章有黎相宜的《道义、交换与移民跨国实践——基于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的个案研究》。作者以海南文昌为例，探讨了海南移民的跨国实践行为不仅仅是积极正面的，也有对文昌侨乡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作者并对移民的跨国实践行为，从传统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转换为务实盈利的跨国实践活动，并探析形成逐渐衰落跨国性现象的原因。作者将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文献资料加以结合，能看出进行了扎实的田野调查。但值得注意，文昌只是海南其中一个市县，并不能概括海南侨乡所有的跨国性。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海南自由贸易区港的建设，近年来，笔者发现琼人与海南的跨国互动关系更加紧密。所以，当下研究琼人的跨国主义实践行为，有助于重新思考和看待移民的跨国形态，以及跨国社会网络关系等问题，有非常实用的价值意义。

总之，关于移民跨国主义的研究在学术界获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从微观层面看，跨国实践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影响被学者们重视；从中观层面，移民跨国参与对祖籍地和侨居国社会发展带来推动作用，使研究者深入思考；从宏观层面，全球局势、政治政策、经济形势等对移民跨国空间的形成和拓展，成为学者圈孜孜不倦关注的领域。所以，笔者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有利于笔者立足学科前沿，填补缺失，进行新探索，为学者了解认识琼人跨国行为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 五、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论文主要从新加坡琼人的跨国主义现象切入，首先从历史文献中分析琼人离开海南的动因；二是从档案数据中深入观察琼人的出洋方式，以及呈现出有别于与其他方言群的琼人出洋特征；三是从有关琼人的新闻报道和实地走访调查中，解读琼人不同时期的跨国认同问题；最后，结合海南侨乡的材料和案例，探讨琼人与海南的关系特点，体现跨国关系网路发挥的作用。总的来讲，本文将理论和叙述相结合，在时间、感情、自然空间和生活空间上建立一种“跨

入”的行动框架。并跳出固有的学科框架界限，以一种综合性或者跨学科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

## （一）研究方法

1、笔者在历史记载中搜集有关琼人的研究事实，从起源与演进考察琼人在侨居国和祖籍地间形成的互动网络，明白这一群体跨国行为的性质。笔者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作为本文统计分析之依据，主要包括三类：（1）海南出版物，海南档案馆资料，海南省侨联内部通讯刊物等；（2）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海南协会，新加坡海南商会出版物、内部会议纪要和内部通讯刊物；（3）有关琼人的政府文件，政府宪报。本文除了基于丰富的一手材料分析外，还借用了有价值的二手资料多方论证。如《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sup>29</sup>是本文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献依据，通过家谱可看到一幅幅琼人移民的社会生活图景，而这些图景联系起来，又可以见出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本质。而从族谱中能了解到海南历代移民的特点，知悉琼人出洋的关键时间点，真实记录海南移民家庭的移民动机，具有重要的文化与史料价值。除了谱牒、侨刊、侨批、琼州海关当年的报告，也为笔者提供了琼人的流动数据，流动原因及方向，对于笔者的研究都是难得的文献史料。再有，《叻报》、《环球时报》等新加坡的报刊杂志，还原琼人在新加坡的生存状况以及与他籍、他族的相处情况；琼人在新加坡的人口结构、职业分布便呈现出琼人社会的移民特色。为了求真求实，笔者将以个案的定性分析，结合各具不同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关联与比较，从而较全面获取相关事实。从历史、道德、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进行探讨，通过类型比较是个体接近社会整体，考据挖掘有价值的记载。

2、本研究不只是文献研究，还结合了人类学中的观察方法，从旁观者的位置深入新加坡琼人生活区，积极参与各个社团的活动，通过亲身体验观察，得出了琼人在新加坡真实的生活方式。经过视觉与感觉，加以分析与综合，再通过引证与借景，比较分析琼人与其他方言群生存状态、社会活动、文化现象、社群组织的差异性和关联性。在观察调查中，不仅成功解答了琼人对侨居国在

---

<sup>29</sup>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以下简称《海南家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1）。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起的作用；也对移居至新加坡后琼人给海南基层社会带来的影响，有了更深切地感悟；还对华侨资本和琼人现代性观念给海南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推动，都有直观的人证、物证、理证。通过一个一个案例，以小见大，让历史人物事件有血有泪的呈现，不仅关注历史演进中产生变化的原因，也关注当下琼人的发展趋向和生存状态。

3、笔者搜罗考察新加坡和海南两地与琼人关联的线索，实地调研百年来琼人与祖籍地间跨国互动过程的蛛丝马迹。从局部研究入手，以获得代表性的真相，既有多元性又有流动性，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图景。运用田野调查法，如实描述海南侨乡和新加坡琼人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经过系统的调查与缜密研究，进而探讨琼人跨国主义的现实问题。

在论文的脉络上，笔者从历史时间为经度观察事物演进，从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政策、观念等因素为维度，观察琼人跨国实践行为的不断变化。文中运用辩证法，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进行梳理与判断，最重要的是链接相关性，找出差异性，分析琼人的共时结构与横向联系，探析琼人的跨国认同趋向，以及跨国网络的建立特点。

## （二）研究理论

### “通道——小生境”

孔飞力在中国移民的历史研究中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即为“通道—小生境”（corridor-niche）模式，以亲缘血缘地缘的网络关系“通道”，通过资金、人员、信息等流通往来，也透过精神文化、情感信仰等彼此互动。<sup>30</sup>笔者通过对琼人移民史数百年历程的研究发现，琼人在海南与新加坡间，建立延续着一条条“通道”，通过它不仅改善侨眷的生活状况，带动了侨乡方方面面的发展，也为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建立起渠道。所以在通道两端，“一边嵌入接受社会，另一边则在发送社会，形成一个双边有机体，用‘通道’连接起来。”<sup>31</sup>琼人通过血缘与地缘在新加坡建立起了海南各社团组织，形成海南籍乡亲的文化特色生态圈和社团学校，也通过亲缘神缘建立起庙堂宗祠提供精神家园和情感归

<sup>30</sup>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sup>31</sup>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页 445。

属，通过海南商会集中旅居新加坡琼商的商贸行业圈。经过跨国“通道”影响，在侨乡海南也形成独具特色的侨乡文化和风貌。譬如，琼人在外拼搏的动力和重要依靠主要来源于与生俱来的亲情和乡情，他们肩负着异域谋生改善亲人生活状况的职责，并使其家庭得以继续保存下去。琼人通过侨汇赡养家人，建房购地，经济条件稍好的琼人更是向侨乡捐赠善款，资助侨乡的发展。孔飞力还指出这样的“‘通道-小生境’模式，具有透过内在动力实现重生与自我完善的特性。”<sup>32</sup>因此，在“小生境”中，琼人不仅通过维系与亲人的关系，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还从地缘族群的同胞间吸引更多新的人力和资源，在生意上、社会上连同搭建起更多有益之处，借此不断适应并融入新加坡社会的“大环境”。

### “根”的含义

从“根”的不同层面含义，考究琼人生命的起源和维持，跨国认同形式的演变等。如人类学家席勒等人关注移民族群和跨国文化流动现象时所认为，移民与祖籍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不是离开后就“一去不返”或“连根拔起”。而随着琼人“生命延续”的奋斗历程，琼人社会由弱变强，社会地位的转变也决定着琼人身份认同的变化。琼人从最初在新加坡以寄居者心态“落叶归根”的情节，慢慢发展为在新加坡开枝茂业“落地生根”的心态调节，但是他们在文化和生活上，并没有与故土“斩草除根”。在归属感极强的海南族群中，“根”对琼人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还具有导向作用，这些特征也契合于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学者王灵智教授对“根”的剖析。譬如，琼人在跨国行为中对海南侨乡的认同，琼人在“问祖寻根”上的文化认同需求。所以，正如王教授所言，“根”不仅是身份延续，也是文化上认同。对于跨国主义行为下的琼人，“根”的意识在时间的推移，社会的演进以及政策的更迭中，建立起“盘根错节”的跨国网络，琼人的心态、地位和观念业在不断流变。

总之，笔者的研究以历史文献解读加之分析手段，呈现有关琼人的历史缘起，发展演变过程。实地走访还原琼人跨国实践行为的特征，深入走入海南侨乡和新加坡海南社群，探访熟悉了解这段历史的知情者。既有系统完备的田野

---

<sup>32</sup>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页447。

调查资料，又有重要理论概念，还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作为佐证。由此，浮现琼人的跨国轨迹，并探索琼人的跨国主义特征。

## 六、问题提出与章节安排

第一章笔者探寻琼人跨国行为开启的原动力，从历史性的视野调查剖析海南移民出洋的原因、历程、活动地域、生存空间、移民的本质并把握其脉络。其中，围绕动力形成的三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跨国社会场景的展开由推力作用引发。因为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稠密，社会政治动荡。加之，海南的区位因素，天灾人祸不断，雨量分配不均，台风暴雨侵袭，导致农业生产不易。而耕作方法落后，洋货又不断涌入，当地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由于客观因素的推力，海南人只能另寻生路。

第二、为什么新加坡成为琼人移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呢？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河口，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亟需填补大量的劳动力，刻苦耐劳的海南劳工成为招募对象。除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吸引力外，新加坡作为周转其他国家的港口，与海南一样水路交通便利，遂成为海南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第三、除了以上两点客观原因形成的内外作用力，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人之本性。发财致富、追寻金钱、期盼改善生活成为琼人出洋的主观动力，也是琼人源源不断的智慧选择。以往的学术研究，总将早期移民的迁移塑造为“被迫”、“无奈”。本章，笔者除了呈现琼人的产生除了客观因素外，更源于对利益追求的理性行为，跨国社会网络的展开属琼人主动而为之。

第二章探讨琼人如何在持续不断的迁移浪潮中，进而完成他们的跨国途径进程。琼人为什么可以离开海南？历年出洋及返乡人口是多少？交通工具的演进给琼人移民之数量和过程带来哪些变化？琼人在闽粤民众大规模下南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跨国移民的产生给琼人家庭带来哪些挑战？呈现出哪些与一般家庭不一样的跨国特征？本章笔者以海南海关的统计数据，官方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年增一年的出洋人数中，在来来往往的迁移者中，呈现琼人如何经历艰险困苦远赴南洋。

琼人出洋闯荡类型分为自由移民与非自由移民，非自由又分为苦力贸易和猪仔贩运，他们在出洋的性质、契约、成本、工资等如何区别体现，笔者将在此章节详细探讨并给出答案。琼人的跨国迁移行为，有不少属亲属帮带，前者引路后者追随，形成一条跨国移民“通道”。但因受孔孟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琼女出洋受“乡规”的制约。本章笔者提供作为媒体人采访留守侨乡妇女的珍贵资料。值得注意的是，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横向联结地理分离的社会环境，纵向维持历史社会联结点，探讨维系跨国华人家庭的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而经济实体的理论也为分居两地的模式提供了合理的跨国主义实践阐释。

有关海南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因为早期，琼籍不像闽、粤籍那样有代表性的成功人物，譬如，陈嘉庚等。处于新加坡社会中下层的琼人，大多是两手空空，赤手空拳讨生活的状态，这使人们对琼籍社群了解甚少。

第三章笔者从琼人跨国身份认同出发，考察琼人的族群认同、地缘认同、以及国家认同。从新加坡独立前后进行考察，这是新加坡政治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点。横向从琼人移民内部进行考察，呈现这一群体未因地理位置的疏远达到隔离效果，反而使之更加依赖于琼人社会关系网络在异域的生存，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移民共同体。另一方面，考察其他方言群和种族对琼人族群的认同情况，在族群间联系、差异、互动和冲突中，进一步思考琼人认同建构的绝佳角度。

在历史进程中，对新加坡琼人族群跨国实践生活进行考察，探讨琼人人口结构及其呈现之移民特色何在？从琼人的社会职业与生存情况，得知他们在新加坡社会扮演什么角色？“其中琼人突破历史力量和社会结构进而改变弱小方言群形象，这一过程致使我们认同“琼人身份认同”的路径，而非来自于身份认同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观点中，多角度考察了琼人社会跨国网路发展形成的社会背景。本章，跳出既有观念“重新建构”琼籍身份，证明身份认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以及与行为结构之间的联系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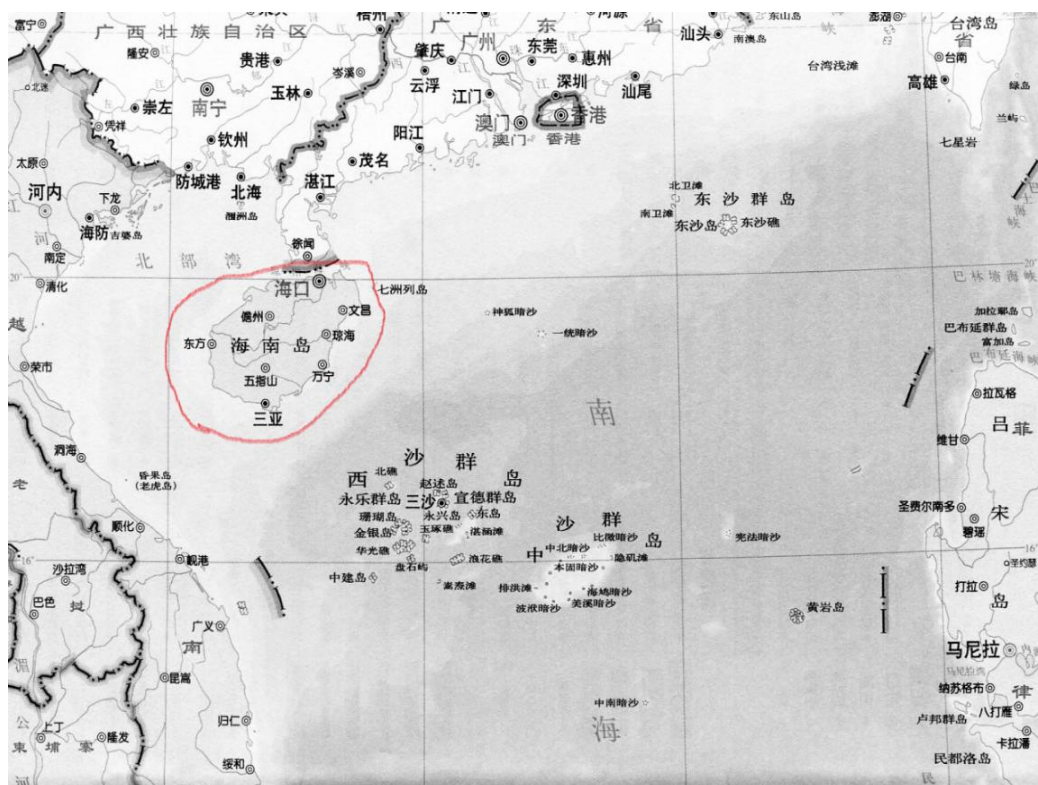
第四章笔者探寻跨国网络的形成发展，对海南侨乡的形成、发展、文化、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侨批、侨汇对琼人跨国社会的形成和维

系起重要作用，血缘亲情在物质层面进行传递，成为琼人跨国维系亲情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乡缘族情层面，琼人保持与海南侨乡间的经济互动，现实的经济实利，成为促进海南侨乡本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今，海南侨乡随处可见由华侨出资修建的学校、图书馆、医院等。琼人捐资助学，投资公益，不受地理空间的局限，通过金融、物资、信息、人员等为海南家乡带来改变，在经济、文化、农业、政治、公益事业、社会等方方面面影响着海南侨乡的发展，且在海南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本章还以实际案例来说明，海南侨乡的发展是与琼人长期跨国互动的结果，琼人通过和家乡建立起特定的通道和桥梁，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为侨乡带来巨大的变化，也为新加坡开发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本章笔者将用实际案例来说明跨国主义移民给侨乡海南带来的利益，详细阐述琼人为侨乡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有助于丰富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的例证。同时，论证琼人社会对新加坡做出的积极影响，更好地理解近代琼人对于时代所需，故乡所需的认知过程。

第五章总结琼人跨国的因素，跨国网络形成发展的过程，跨国实践行为对祖籍地和侨居地带来的影响，以及在这一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琼人跨国行为、身份认同、心理、处境发生的演变。分析琼人跨国家庭关系，社团组织的跨国互动行为，琼人跨国商业合作交流所形成的跨国实践社会场域。总之，对本文中研究琼人的过程、现象、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对琼人移民跨国行为的联系、整体、动态的描述进行总结，逻辑推理得出琼人社会的历史演进的总判断，以及对琼人发展趋向的总评。

## 第一章 琼人出洋的原动力

海南岛海域面积约两百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约三万五千四百平方公里。曾有人形容台湾和海南就像中国的两只眼睛，台湾盯着太平洋，海南岛盯着南海，区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sup>33</sup>从下图中，可看到海南的区位特点：



（海南地区的范围及区位图，资料来源：《海南省地图册》<sup>34</sup>）

海南岛位于中国南端，四面环海，处于南海交通主要航道和航海者必经之地，“凡番贡，多经琼州”。<sup>35</sup>这一区位优势为琼人得以出洋提供了条件，飘洋过海，乘舟划楫，通蕃迁徙得以实现。有关华人出洋的史料记载“亦必有冒险性之琼人，趁通船舶之机会，而往来南洋。”<sup>36</sup>水道交通的形成，为琼人提供了认识移入空

<sup>33</sup> 苏云峰《东南亚琼侨移民史》，见《海南历史论文集》（以下简称《海南历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sup>34</sup> 国家测绘局海南基地地理信息中心编制《海南省地图册》（以下简称《海南地图》），（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7）。

<sup>35</sup> 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64）。

<sup>36</sup>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以下简称《华工出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

间的机会，也为海南人跨国往返东南亚，提供了运输通道。

从唐代起，由于海南当地“土石俱白如玉而润”，便被称为琼山，此后又有“琼州”或“琼崖”之称。<sup>37</sup>那“琼人”是从何时开始移居新加坡的呢？“根据史籍记载，最早有关琼人出洋移居东南亚的文字资料，见于西汉时期。唐及五代时期，海南海上贸易开始兴起，增加了琼人在南洋各地的流动。到了明清时期，琼人出洋步伐大大加快。”<sup>38</sup>有记载物证的南来史，如下：

“考我琼同乡南来侨居，当在新加坡开埠前 1819 年（注：根据地契文件记载）。其时当地乃一未僻之渔村，人烟稀少，同乡居此者亦不多，且散居乡村隅角，而无组织。”<sup>39</sup>

从地契文件看，海南人移居新加坡的时间是 1819 年。华侨史学家韩槐准先生还考据得出，道光元年（1821 年），就有帆船从海口运载货物到星洲出售。到 1841 年，中国司法部官员林崇仁到达新加坡任职，他也被视为是第一位有名有姓来新加坡的海南人。<sup>40</sup>而 1850 年后，琼人移民开始比以前更多，陆陆续续移居到新加坡。

除需具备迁移条件外，移民自身也要有迁移的动力和诉求。西方学者曾对移民的跨国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理论框架。笔者所阅资料显示，通常源于内因和外因的驱动，造成了持续性的移民动力，从以下三个因素分析：一、原本的生活地区，生存压力巨大；二、必须存在可以吸收和接纳的新生存空间；三、寻求较好生存空间的谋生意愿。其中，第一、二条属客观因素，是导致跨国移民产生的内外因，也就是推拉力的形成。第三条属移民的主观因素，是移民对经济动机的主观诉求。陈达先生在《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实证调查中，也分析了迁民抵到南洋的主要因素，如下：

#### 南洋迁民离国的主因

---

1984），页 322。

<sup>37</sup> 唐胄《正德琼台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03）。

<sup>38</sup> 唐若玲《东南亚琼属》。

<sup>39</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琼州会馆，1898），页 101。

<sup>40</sup> 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见《琼州会馆联合会报》，第 1 卷，第 1 期（1948.1）。

类别	家数	百分比
经济压迫	633	69.95%
南洋的关系	176	19.45%
天灾	31	3.43%
企图事业的发展	26	2.87%
行为不检	17	1.88%
地面的不靖	7	0.77%
家庭不睦	7	0.77%
其他	8	0.88%
总计	905	100.00%

（资料来源：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见李文海、夏明芳、黄兴涛《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184）

上表展示了移民迁移至南洋的各种社会因素，因地理、社会环境、心理等主因，分别统计各因素给移民带来的推动作用大小。不可否认，对经济的改善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迁移主因；又由于与南洋建立了可移入通道，如沿海的便利，南洋有亲人接济，使迁移得以形成；天灾的流行、土地的贫瘠、政治环境的恶劣等因素，也是造成移民调适新生存空间，远走他乡的动因。如年鉴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总结：“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生态现实”、“经济结构”都成为塑造人的历史因素，也是对人类活动和行为的限制条件，并且，只有在长时段中观察才能清楚解释这一历史现象。<sup>41</sup>因此，本章将从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灾害等因素观察，揭示琼人出洋的历史现象和推力作用。寻找这些影响作用的量与质，又如何持续性的迁移中表现出来。从历史长河中，思考致使琼人一波波远赴新加坡，运作延伸而成的外部拉力和心理诉求，反观琼人跨越屏障，拓展生存网络空间的历史现象，并对它的形成原因，进行历史性和整体性地思考。

总的说，百年多来，琼人跨国行动主要赖以以下因素的结合：

<sup>41</sup>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是法国历史学家，他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也是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见布罗代尔《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1958）。

第一、琼人大多因受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经济社会，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所驱动，相关文证如下：

道光《琼州府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申严洋禁，商船不允许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外国之人，督抚大吏行知外国，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载回原籍。”<sup>42</sup>

道光《琼州府志》：“道光四年（1824年）四月，星入月宫，郡属旱、虫、大饥。自三年（1823年）九月至道光四年（1824年）八月，郡属久遭旱灾，蝗虫漫天遍野，所过禾麦一空，饿殍载道，鬻男女渡海者以万计。”<sup>43</sup>

光绪《临高县志》：“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两年连遭大旱，高低田禾并无一粒可收，南方多文、龙波、和舍诸市地方稻堪度活，最可怜者，由城厢出东西北方各四五十里之乡村，饥谨荐臻，饔飧靡托，卖妻鬻子，离乡谋食。或往别县，或过番邦，寥落村场，尽是荒烟蔓草，抚境莫不击目伤心”<sup>44</sup>

从以上引文中的“渡海者以万计”，可看出清代琼籍移民的特点是大批海南人迁移海外。实际上，海南人出洋谋生，远非从清代开始或终止，从引文中的“旱、虫、饥”等字眼看，可观百姓生活的无奈和艰难。由于海南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几乎每年6至11月都有台风登陆，如若遇到等级较高的台风，以早年海南薄弱的房屋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遭遇损失破坏时有发生。受海南独特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冲击，也是琼人出洋与其他方言群移居因素不同的驱动动力。早年，海南人的生存方式，仅依靠出洋捕捞、自家农田或小手工作坊支撑，遇上天灾人祸或舶来品销售冲击时，根本无法应对。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苛捐杂税、社会不安、战乱不停、国共两党掀起十年内战，随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政治局势下，为逃避各种战祸，都迫使琼人漂流异国，另找生计。

第二、与中国处于连续不断的灾难风波中对比，从1819年始，新加坡迎来了大开发、大建设时期，与中国海南的经济社会形成对比。此时开荒拓土的新加坡正急需大量苦干劳工，这给琼人创造了出洋谋生的机会，吸引海南人前往。而

<sup>42</sup>（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卷四十二》（以下简称《道光》），（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页1897。

<sup>43</sup>（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页1904。

<sup>44</sup>（清）聂辑庆、张延主修《光绪临高县志·卷三》（以下简称《临高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页82。

后，在咸丰八年（1858年）期间，清政府和英、德帝国主义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南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海南岛门户洞开，这给躲避灾难风波的琼人提供了前往新加坡的历史机遇。

第三、琼人出洋不仅求生存还谋发展。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是出洋者的初心，当前者琼人回乡时，有意无意间所展现出的“成功”、“富有”，都给生活在贫困中的故乡人以美好憧憬。来自新加坡方方面面的诱因，使大批琼人领亲携友，互相牵引，远离故土寻求发展机会，谋求更好的生存空间。

因此，琼人出洋的原动力并没有走出“第二条路”，和其他国际移民一样，都是为了谋生手段和生存空间的迁徙，故造成持续性“移民链”得以在跨国空间中运作，进而演化成为一种生存发展方式。当然，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跨国流动，琼人的跨国实践行为也在两地间展开。

## 第一节 出洋客观原因——中国内部推力

海南和广东、福建并称为“中国三大侨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广东，海南彼时也隶属于广东。在十八世纪后期以前，移居海外的福建人多于广东。<sup>45</sup>若详细比对海南人出洋东南亚的人口情况和结构，是要晚于闽粤籍移民的，人数也较少，这是由于移民素质、移居地的社会环境等因素造成。<sup>46</sup>如鸦片战争前，中国与海外的移民活动，主要以华商贸易互动为主，善于经商的闽籍华侨，更胜一筹。琼人大多又受儒家传统“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较重，故出洋相对晚。笔者认为，要冲破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远走他乡，必须具备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历代王朝更迭，政局动荡，战乱又不安；天灾肆掠，经济赋役又重，百姓难以负担，都推动琼人出洋谋生的动力。从海南民间广泛传唱的歌谣中，就表现出琼人萍飘异乡求生存的动因：

---

<sup>45</sup>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页116。

<sup>46</sup> （日）小叶田淳著、张迅齐译《海南岛史》（以下简称《海南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页253。

“农家命与田相连，卖田抵债气难伸；灶头多日断炊烟，儿啼女哭多可怜，无奈卖身当猪仔。”<sup>47</sup>

歌谣虽是一种民间传唱，但也可辅助观察海南的社会面貌，可见当时海南百姓的生存境况与心理难捱。而农田的收成取决于天时地利，面对各种天灾不断，作为海南百姓当时生存的单一来源，只能无奈离开。明清苛捐杂税繁多，巧取豪夺，百姓更是负债累累，不堪负重的琼人只能出洋讨生活（众多税收名录，可参照附录 1-3）。加之，海南东北部市县人口压力大（人口比例，参照附录 4），农田不足，百姓生活窘迫。社会的不安定，罹祸不断，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的困境中，为了安全和生计，琼人也只能逃荒出洋。总之，这股推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时期推力大小不同，故影响着移民数量的增减不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来之变局”。鸦片战争前，移民与东南亚的互动，大多以华商贸易往来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则是中国政治环境、经济人口压力、东南亚殖民者对劳工需求的结果。所以，本章琼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分为以下关键几个阶段：鸦片战争前，琼籍移民开始出现；鸦片战争后，琼籍移民大量出洋，因为 1858 年海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50 年海南解放；第三阶段，1950 年至今，这是琼人从侨居华侨到定居华人时期。

## （一）人口因素

清代，海南岛人口稀少又荒凉，清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和减少官员开支，海南仅作为广东省的一个大岛。至清代中叶，海南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 38 人，仍是广东省各府之末。<sup>48</sup>但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土地的矛盾日趋尖锐，粤人和客家人不断迁移至海南岛，海南人口随后明显递增，民国时期海南人口数量的增幅比清代后期上升很多。观察 1928 年南区善后公署编办的海南户口的清查情况，如下：

---

<sup>47</sup> 民间歌谣指广大群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经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见王春煜〈相见只在夜眠中〉，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 123。

<sup>48</sup> 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 278。

地区	1835 年		1928 年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全岛	125.2	37	219.5	65
琼山	20.7	69	38.6	129
定安	8.7	32	19.3	71
会同	8.2	84	9.7	100
临高	10.1	58	16.6	96
昌化	5.6	30	4.6	25
陵水	5.7	22	6.4	24
感恩	4.3	18	3.5	15
澄迈	14.7	24	17.8	89
文昌	13.8	47	44	148
乐会	5.4	21	11.9	20.8
儋州	11.1	33	20.8	62
万州	11.4	40	16.6	58
崖州	5.5	12	9.7	21

（资料来源：《海南省志·人口志》第三卷，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页20）

上表两个年份的对比得出，1835年，海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37人，1928年，每平方公里则65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业社会，土地的人口负载量必须与一定的生产水平相适应，人口大量增长，耕地也必须相应增长，否则将会引发大量社会生活矛盾。据罗尔纲认为“每人要有三亩耕地才可以维持生活。”<sup>49</sup>海南当时的境遇比罗氏所研究统计的数字远低，无法正常维持家庭生计标准。故海南人口生存压力的不断增加，也导致原居民和新移民间的矛盾冲突也进而迸发。因此，海南岛上的黎族人开始向岛中部地区迁移，汉族人成为移民主体。<sup>50</sup>以下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区善后公署统计的海南人口数据：

#### 民国十七年海南东北部四县户口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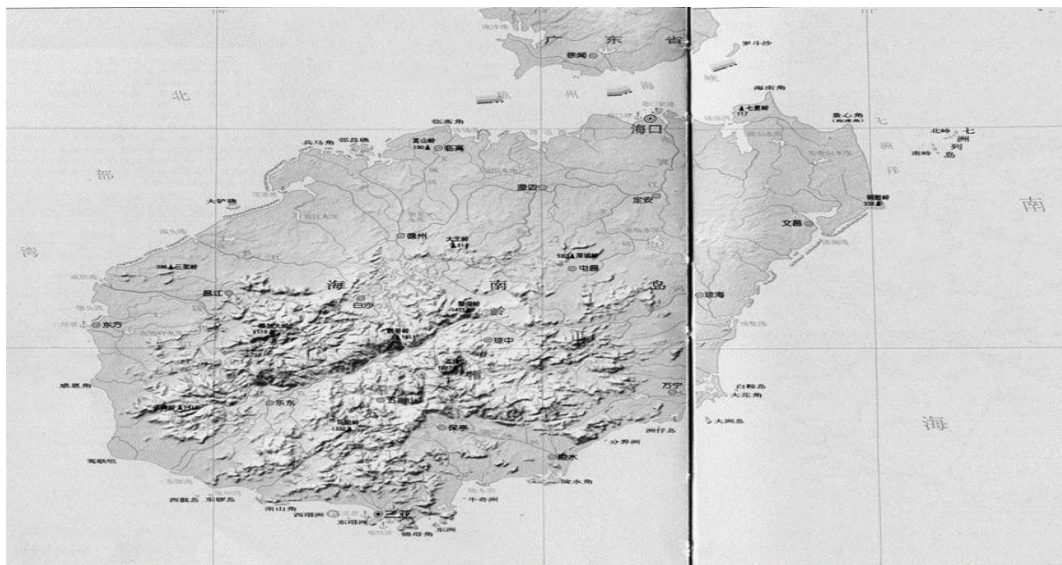
<sup>49</sup> 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力〉，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37）。

<sup>50</sup> 詹长智、张朔人〈中国古代海南人口迁移路径与地区开发〉，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县市别	户数	男丁	女口	总口数
琼山县	58328	182539	158340	340879
文昌县	67302	234470	205719	440189
乐会县	18603	62113	57163	119276
琼东县	12678	50054	47360	97414
总计	156938	529176	468582	997758

（资料来源：陈铭枢《民国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页74）

从以上表格数据发现，海南琼山、文昌、乐会、琼东仅四县人口数是 997758 人，除黎苗族人数外，占海南人口总数近一半，而这一情况自清代开始，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除了民族间的矛盾外，海南岛的人口分布不均还与地理环境有关。海南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其中海南山地分布在海南岛中部偏南地区，丘陵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山地和丘陵的面积占海南岛面积的 38.7%；台地分布较广，占海南岛面积的 49.5%；平原多为环岛的滨海地区，占海南岛面积 11.2%，其他地形占海南岛面积的 0.6%，如下图所示：



（海南地势图，资料来源：《海南省地图册》<sup>51</sup>）

从上图中，清晰可见海南地理环境呈穹隆山地形的特点，中间高四周低。由于海南内地多崇山峻岭，大量的山地丘陵根本不适宜耕作，导致海南岛的生产力和文化从四周向中间递减。而北部地区地势虽平坦，可供开垦农地，但又聚集了大量人口，占海南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九。<sup>52</sup>仅东北部的琼山、文昌、琼东、万

<sup>51</sup> 国家测绘局海南基地地理信息中心编制《海南地图》。

<sup>52</sup>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页 48。

宁与乐会的人口合计，就已占全岛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sup>53</sup>这样的地理区位和人口分布，直接影响着移民余地太小，所以只能出洋，或迁移到更僻远的地区。所以，我们从以下是民国十七年海南北部四县耕、荒地面积统计表中，也可观这一现象：

民国十七年海南东北部四县耕、荒地面积统计表（单位：亩）

县市别	耕地面积	荒地面积	总数
琼山县	1086000	3739640	4825640
文昌县	850200	3466020	1196220
乐会县	19400	3923960	3943360
琼东县	200500	1379840	1580340
总计	2156100	12509460	14665560

（资料来源：陈植《海南岛新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24-25）

从民国时期的调查结果得知，东北部四县承载着海南岛一半的人口，但可耕地不到百分之三十，乡民的生存状况难以想象。再加上海南东北部的地理环境虽属平坦，但土地硗瘠，人口众多。而土地又属咸碱地，耕种面积短缺，时常风涝害虫，农民基本辛劳无功，广种薄收。海南农户又多为自耕农，沿海地区资源匮乏，可开发利用资源稀少，生活非常困难，引发不少矛盾，故出洋者不断增多。其中，1930年，约有55万人移植东南亚，1948年超过65万人，<sup>54</sup>以东北部出洋人数居多，文昌之最，陈铭枢在《海南岛志》中就进行了阐述：

“文昌土地硗瘠，地狭人稠，到了清代，已无黎族居住其间，生活比较安全。所以，自古以来南下迁琼之官绅商人及平民，多携眷定居于此。其县地面积仅2383平方公里，为全琼面积的百分之七。而1928年人口多达4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为全琼之冠。”<sup>5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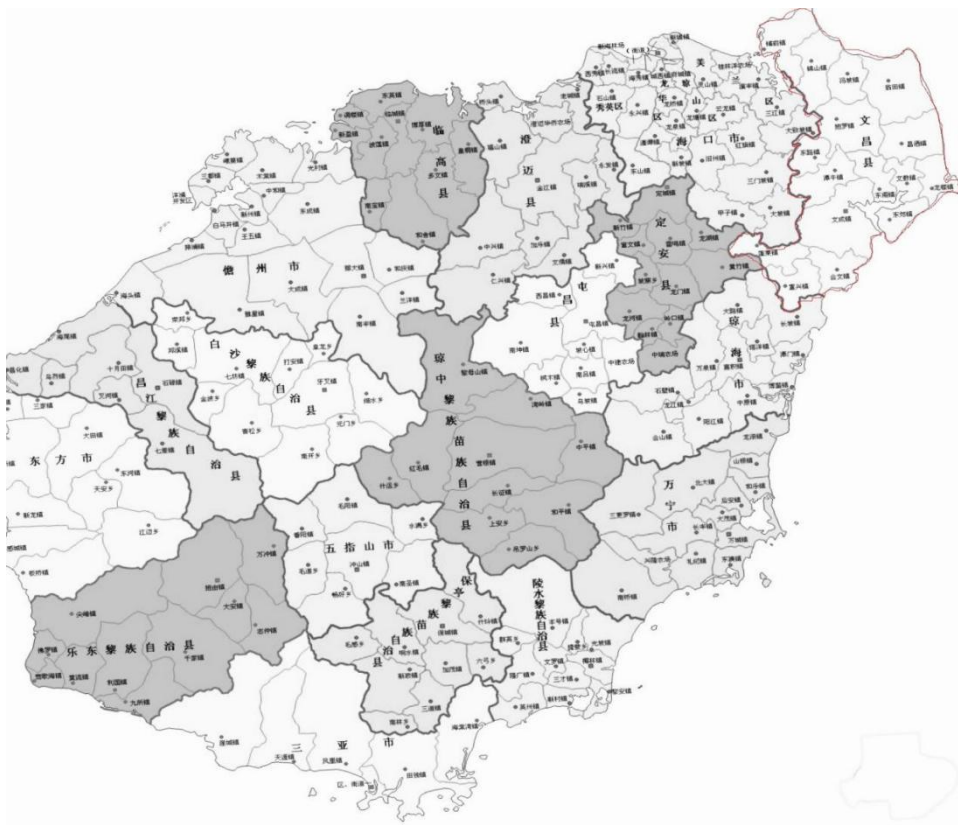
由于从清代起，文昌就未曾发生“黎乱”，生活相对安全，所以大量人口选择聚集于此，但这也给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在张之洞的《洞致陵水冯督办琼

<sup>53</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页193。

<sup>54</sup> 林明亚著、陈序传摘译《新加坡的海南人》（以下简称《新加坡海南人》），见《新加坡共和国琼人工商业志》，1926年第2辑，页47。

<sup>55</sup> 陈铭枢《海南岛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页73—75。

州谦护道>电文中就指出：“文昌地狭人稠，每年出洋趁工着甚多”<sup>56</sup>。文昌因其土地和人口比例不均，故造成当地百姓大量出洋。同样在<致琼州朱道徐守>电文中，也指出出洋缘由：“文昌田少，出洋者众多，若果官为劝谕不出乡而得恒产，民何惮而不为”。<sup>57</sup>



（海南文昌地区的范围及区位图，资料来源：《海南省地图册》<sup>58</sup>）

以上我们仅以海南文昌为参照，清晰看出海南岛当时的资源分布和人口压力状况。其实，在海南东部市县也存在相同问题，人口压力引发的矛盾不断推动琼人出洋。在《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中，就记录了琼人下南洋历史：

据《文氏族谱》述：

文氏潮港派 36 世文大行之子文振声，生于 1822 年，往番；

文大英长子文振荣，生于 1825 年，往番卒；

文大德子文振义，生于 1831 年，往番卒；

文大英三子文振华，生于 1832 年，客番卒；

<sup>56</sup> 张之洞<致陵水冯督办琼州谦护道>，见《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国书店，1990）。

<sup>57</sup> 张之洞<致琼州朱道徐守>，见《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国书店，1990）。

<sup>58</sup> 国家测绘局海南基地地理信息中心编制《海南地图》。

文大选四子文振浩，生于 1837 年，往番卒；

四方六合派三十五世文宗族之子文大杰，生于 1823 年，往番卒。<sup>59</sup>

族谱中虽没记载文姓人士出洋具体时间，但大约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海南第一批出洋高潮的时期，从人数上看估计也有二十左右。由于早期统计数据不完整，故只能通过家谱或史料文献资料，观察琼人的出洋概貌。民国时期，有了更多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得以了解琼人移民的真实现象和问题。概言之，人口压力大是导致琼人出洋的其中因素：

一、由于海南当地生活安全因素的影响，人口大多集中在北部，人多地少是海南人自发移民的推动因素；

二、海南地形地貌分布不均，北部平原地貌，导致人口密集，可耕地相对缺乏，海南失业者随之增加；

三、人口不断增加，分布又极不平均，最终导致日用品的供求失调，基本物资短缺，给海南经济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从上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南岛人口冲突压力不断持续，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人口空间密度过高，为争取生存空间和资源，争斗在所难免，故下南洋成为琼人的不二选择。加之，海南良港多，百姓具备航海的技术，琼人只能舍近求远，为了生计便萌生了远航的憧憬。当然，琼人先贤出洋成功的鼓励，也使后人不断跟进，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冒险出洋。而这一时期，刚好是新加坡的开发进程阶段，对劳工的大量需求，也为移民出洋创造了条件。（第二节将详细论述新加坡的引力作用）

## （二）经济因素

迫使琼人不怕艰险，一波波迁移的背后，必定还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其中就包括经济因素。由于历代统治阶级以赋役形式巧取豪夺，如清朝赋税就非常沉重，各类苛捐杂税摊到百姓头上的多如牛毛，令民众不堪负重。地方官史中饱私囊，农户生活困苦怨声载道，百姓根本难以承受负担，助长海南人被迫离乡背井

---

<sup>59</sup> 王俞春《海南移民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页 190。

出洋谋生路的意念。<sup>60</sup>“清朝税种税目繁多，有商税、车税、牛税、船税、薪税、酒税、槟榔税、税契、门摊商税、渡海牛税、花藤税等等，更有许多税目是属独创”。<sup>61</sup>当年详细税目，可参考附录 1-3 中所载的清代“榷税”。“榷税”是商税，或指通过税，从附录列表可见“税目繁多”。而真正的负担来自于赋役，也为正税，从《赋役全书》相表里可观。海南的赋税也是按照《赋役全书》执行，在《琼州府志》、《古今图书集成·琼州府部汇考》中都有记载。琼山县郡伯于霏曾写下两篇奏折揭露当时海南赋税的弊政：

“琼南十三州县，向有额编杂税，载在《赋役全书》，与正供一体征输，此亦率土皆然，无足异者。乃杂税内有牛税、薪税、渔课、船税、门摊、商税等项，按其原额，各州县有三四百两、一二百两至十数两之不同。尤其实征之货而无货可征，问其输纳之人而无名可指。每届奏销，虽按款奏报，而征收之际，则百弊丛生。数十年来，各州县因其缺额无征，遂尔摊派抵补，有均入地丁米石者，有派入排门烟户者，有在榔棵税内加征者，有按养牛之家照牛只征收者，有在车户、酒店、歇店、铺户、排门零星抽派者，种种派累不一，亦不知始自何年。其间地方官办理不善，则绅衿有借优免包占之弊，胥役有借催输需索之弊，保甲有得钱欺隐之弊，以少报多，将无作有。嗟此莫告之穷民，输纳正供而外，又有无着之项，层层披剥，良可悯矣。”<sup>62</sup>

不可否认的是，清廷赋税制度混乱，各级官府以田赋、杂税为名，对百姓进行残酷剥削，且造成百姓的负担，而在征税过程中，不少腐败贪官竟为所欲为，敲诈勒索，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种横征暴敛的政策，势必失去民心，换个环境生存是唯一的选择。又因海南岛是通往新加坡贸易的通商要道，海陆来往相对方便，再加上经济贸易上的需要，进而产生人口的自然流动。在 1876 年至 1898 年间，前往东南亚求生的琼人为 344698 人。<sup>63</sup>光绪二年（1876 年），海南劳工不及三千人，八年（1852 年）增至一万一千人，十一年（1885 年）两万四

<sup>60</sup>（日）小叶田淳著、张迅齐译《海南岛史》，页 254。

<sup>61</sup> 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琼侨》，页 17。

<sup>62</sup>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编《经政志·为备陈海南派累积弊事》，见《民国琼山县志·卷八》（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页 418。

<sup>63</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

千人，十四年（1888年）海南出洋人数竟突破三万。<sup>64</sup>海南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往来，使得移民随之而往。

洋货输入海南，冲击海南单一产业，导致破产失业人口增加，这些因素都导致琼人只能另寻出路（海南商品进入名目，参考附录 5-7）。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相继与英、德签订诸项不平等条约，海南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英国商人以印度棉布大量倾销，逐渐代替了海南原有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延承，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中，琼人对副业（如家庭手工纺织业）的依存性非常大，打乱了中国传统“男耕女织”社会的生产机制，使得海南农户贫者愈贫。此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更是纷纷接踵而至，各国进口商品急剧增加，海南遂成为推销商品的市场，这使得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海南省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性影响。农业和手工业都日趋凋敝，走投无路的琼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

琼人决定出洋，除了受世界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大多还对经济追求有强烈夙愿。笔者曾前往海南文昌侨乡做调查时，遇到年逾古稀的归侨道出当年出洋的缘由：“就是因为当时太穷了，穷得实在没办法，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总不能等死吧，总得出洋去找条活路”。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因素是推动他们做出改变，迁移他乡的重要推动条件。

### （三）政治因素

除了经济原因外，海南岛因“孤悬海外”政局动荡，政权更替，战争不安，治理缺乏连贯性，为逃避血雨腥风，政治避难遂成为琼人出洋的客观原因之一。笔者按历史顺序梳理，其政治因素导致琼人离别故土的脉络：

清代有两个时期，琼人成批成批出洋。十九世纪中叶，《道光琼州府志》，康熙“五十六（1717年），申严洋禁商船不许私往南洋贸易；有偷往潜留之人，督抚大吏行知外国，令解回正法。”<sup>65</sup>推行海禁，华民不准移居海外，但不排除少许生计艰苦的琼人，冒杀身之祸外逃外洋。直到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海禁解除后，门户大开。特别是《天津条约》后，海南成为对外通商口岸

---

<sup>64</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

<sup>65</sup> （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卷四十二，页1897。

之一，增加了与东南亚各国的船只贸易往来。琼人借机前往新加坡，故出洋人数越来越多。1875至1898的23年间，仅通过海南海关出洋人数就达244700人，这一时期也就出现清代第二次出洋高潮。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向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sup>66</sup>清政府允许华侨自由进出国经商，故海南出洋人数大大增加。

民国时期，海南出洋的高潮时间如下：一、民国初期，北洋军阀各派系混战，随之而来的战乱，倒霉的便是穷苦的百姓，必然导致琼人流亡海外，谋安定生活。1918~1927年间，从海口一埠出南洋的也多达30万之众。<sup>67</sup>从文昌清澜等港出洋者更不计其数；二、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志士，造成社会剧烈动荡，当年侨居海外的琼人就达到48744人，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1927年至1932年间，由于蒋介石发动政变，国共双方打仗十年，内乱蔓延到了海南岛，导致当地百姓生活不安定，甚至不少人因参加革命遭到追捕，故导致海南人出洋潮；三、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中国，惨遭日本侵略者的欺凌与屠杀。华南各省沦陷，海南情况亦然。<sup>68</sup>抗战时期，战争及日军的残杀，百姓惶恐不安，形成这一时期海南出洋之风，长盛不衰的状况；四、解放战争时期，因逃避抓壮丁，又不少琼人为避免当兵，只好逃往南洋。

为了逃命和生存，海南沿海各市县的居民不得不漂洋过海，从海口一埠出南洋的人数，1911年增加到10504人，到了1931年时为19896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华南各省及海南岛相继沦陷，人民生活艰苦，有亲戚在南洋者大都下南洋谋生。1937年44238人，1939年50000人。1947年琼人有52000多人，1958年琼人总数有79000多人。<sup>69</sup>政局不安，战乱不停，民生困苦，乃出洋人数有增无减。以下是1947年5月统计的数据，调查如下：

#### 海南出洋人口数对比（1945年前和1946）

<sup>66</sup> 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清代卷》（以下简称《通史清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sup>67</sup> 云愉民《琼侨概况》，页23—25；陈铭枢《民国海南岛》，页83—84。

<sup>68</sup> 周伟民、唐玲玲《通史清代》。

<sup>69</sup> 云愉民《琼侨概况》。

县别	1945年前 出洋人数	1946年 出洋人数	县别	1945年前 出洋人数	1946年 出洋人数
琼山	376294	387848	陵水	50580	50583
文昌	415650	415653	昌江	45659	40170
定安	191415	171181	崖县	93383	93465
澄迈	152680	152680	琼东	88836	88836
儋县	167585	167585	乐会	118297	105760
临高	180000	135376	白沙	153479	56770
万宁	165510	101211	保亭	65320	66855
感恩	42928	42928	乐东	47840	53072

（资料来源：陈植编著、陈献荣编《海南岛新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82）

从以上出洋高潮时间段和人数数据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战争与动乱，使得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硝烟烈焰之中，政局形势不安定，充满火药味。又因海南作为重要的革命发生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广东省的一部分，被深深地卷入政治斗争中，成为民国时期政治动荡地区之一。如此政治背景下，海南基层社会治理程度可想而知，导致百姓无法安居乐业。

综上，各代王朝发生任何重大政治冲突和矛盾，必然影响海南岛，每当重大事变发生时，百姓处于充满火药味和不平稳的社会中，必导致琼人流亡海外。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治缺乏稳定性，地方实行有效治理无从谈起，每年每月都有琼人往返于南洋和海南间，只为逃避战乱为害。所以不同时期的政治因素，都是导致海南人出洋的一种具体反应，也是一种历史社会特有现象，就会形成一波出洋侨居的热潮。

#### （四）自然灾害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于早期无更多生产技术支撑的海南人，生产资料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如遇天灾，农民歉收或颗粒无收；如遇台风暴雨，捕捞的渔民，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如遇鼠疫等灾害（参照附录十二），百姓困苦难捱。

所以，作为生产力低下、落后的海南岛，只能听天由命，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依据《琼侨出国史料调查汇编》对侨乡的调查，海南琼海潭门的墨乡村是一个半鱼半农的村庄，当地耕地沙质贫瘠，粮食亩产不过一百多斤，只能过着“靠洋吃洋”的日子，全村 34 户人家，仅靠小舟出海捕鱼，遇狂风暴雨季，渔民忧心，致使全村百分之八十多户人家，选择出洋。<sup>70</sup> 又如文昌县乐城村，至二十世纪，全村 46 户人家，出洋 36 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七十八；文昌新村园村，20 户中有 13 户选择出洋，占总户数百分之六十五；文昌新合乡的 26 个自然村，因灾害不断，几乎家家都有数目不等的人出洋。<sup>71</sup> 据统计，越靠近海边的村庄，出洋人数越多。因灾人民难以维生，社会岁无宁日，人民无处栖身，琼人选择离乡背井。

## 风灾

海南岛属于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所处地理位置特殊，经常受台风灾害的影响，遇上特大风灾百姓更是损失惨重，叫苦不迭。笔者依据《海南省千年灾害史料集》及《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海南卷》记录了 1912 年至 1948 年间海南发生的特大风灾，如下：

年份	地名	灾情
1912	琼中	发生“铁风”，大台风、暴雨、山洪相继爆发，部分乡镇大部分草茅被吹走，死伤人数众多。
1914	万宁	发生台风、洪水，新沟坡崩溃，不少农田受灾严重，部分乡镇人畜伤亡。
1915	文昌	飓风大作，稻田秧苗枯尽，导致米价上涨昂贵，有贫民饥饿而死。
1919	文昌	出现数十年一见的风灾，巨大风力足以摧毁溪边民房、石桥、树木，暴雨倾盆。
1920	陵水	台风大作，大树连根拔起，农作物受损严重，人畜伤亡。
	澄迈	7 月，澄迈更是达到 12 级大风，民房倒折，满田洋水。
	昌江	农田被洪水冲毁，房屋被吹倒，牛瘟病导致昌江耕牛死亡率百分

<sup>70</sup> (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页 25、32、43。

<sup>71</sup> 唐若玲、王佳《文昌华侨之乡》（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页 3。

		之九十五，逃荒者数量众多。
1921	陵水	农历六月初二，强台风登陆，导致房屋倒塌百余间。
	儋县	6月21日，飓风大作，崩塌盐场村房屋甚多。
1925	海口	8月21日，暴风风速，达22-26.8米/秒。
	陵水	台风大作，农作物受损惨重，屋倒人伤。
1926	海口	8月21日，暴风风速，达22-26.8米/秒。
	澄迈	8月21日，海南被暴风袭击，风速达18-22米/秒。
	文昌	11月1日，狂风袭击铺前一带，船只沉没。其中海潮中没万明潮村，房屋全倒塌，100多人的村庄，仅幸存3人。
1927	乐东	8月，台风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崩山成浆，不少小学被淹，农田民房冲毁，牲畜淹死无数。
	儋县	8月24日，台风暴雨成灾，庄稼禾稼损坏。
	崖县	9月23日，台风暴雨大作，不少房屋冲倒，牲畜被洪水淹死无数，是崖县历史上洪水最大一年。
	万宁	9月，连将于3天，米价高涨。
1928	海口	5月28日，暴风风速，达22-26.8米/秒。
	定安	6月大水，南渡江洪水爆发。
	文昌	10月21日，受灾尤为严重，台风暴雨，洪水淹没村庄，农田失收，数千间房屋倒塌，伤亡人数众多，12个村庄、上百家农户被迫迁移村庄落户定居。
	琼山	潮灾，灾位2.21米。
	澄迈	7月15日，风速22-26.8米/秒。
1929	崖县	12月17日，台风登陆。
1930	临高	6月19日，遭受空前未有的巨灾，房屋瓦片被风撤去殆尽，不少房屋全座倒塌，民房幸免者十之一二，死尸不计其数。
	澄迈	7月14日，损失九十多艘渔船，黑石村全村人被淹没。
	琼山	7月，多台风暴雨，农田遭淹没。
1931	文昌	11月10日，台风登陆。

	琼海	11月10日，台风登陆。
1933	海口	6月19日，琼州海峡，暴雨，日雨量393毫米。8月13日，发生飓风巨灾。
	昌江	8月12日，风雨交作，房屋吹毁无数，灾情严重，数十年未所见。
	崖县	8月12日，连续20多小时的飓风大雨，厂房倒塌，果园农庄吹倒殆尽，全县损失100万元以上。
	临高	8月13日，飓风导致几十艘船户失踪，人命达千余人，财务损失不下40万元。8月16日，台风导致90艘渔船失踪，损失惨重。
	琼海	秋，飓风袭击，农作物、房屋倒塌摧毁。
	琼山	9月18日，飓风为灾。
1934	万宁	农历九月十四至十八日，大雨滂沱，交通断绝，水深不断加高，数天未退，牲畜冲亡。
	海口	8月23日，货船抵到海口流沙港，沉默，损失数万元。
	琼山	农历九月十八，飓风为灾。
1935	海口	农历九月初十至十三日，飓风，溺毙百余人，房屋、舟楫、农田毁损惨重。
1937	文昌	3月15-16日，西北狂风，渔船打沉，溺亡两人。
1938	屯昌	8月，台风致，卜文数十间房屋损毁。
1940	南沙群岛	4月28日-29日，台风，阵风12级。
1942	海口	农历六月，风势不断增强，市面骤成泽国，天线吹落，大风狂袭。
1944	万宁	8至9月，遭三次强台风袭击，农田淹没，全县晚稻失收，饿死成千上万人。
1946	海南岛	农历八月，大于滂沱，全年失收，数十年未有的大水。
1946	定安	农历九月，连遭风灾。
	昌江	农历九月，连遭台风袭击，十几座桥墩被冲垮。
	东方	电站被冲毁，机组被淹没。

	乐东	路桥被冲垮，乐东不少村庄被淹没，山洪爆发，旱灾涝灾接踵而至，仅黄流、冲坡一带就饿死 3900 人，逃荒 4900，出卖妻女 36 人。
	崖县	秋，台风暴雨，家禽农作物被吹入海中。
1948	昌江	8 月 20 日，大暴雨，疍场村冲死 40 多人，电站、厂房、机械设备损坏严重。

（资料来源：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民国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页 319-324）

海南风灾不断，几乎连年都有台风登陆，百姓人身财产安全时常受灾害威胁。又据《广东地质》记载，1884 年至 1947 年间，台风最多年达 22 次，十年间可查的总次数就约 244 次。<sup>72</sup>笔者调查中也发现，海南岛几乎年年受风灾影响，故百姓的农田、房屋、设施设备及家畜等受毁时有发生，琼人出洋躲避也是环境所迫。

## 水灾

地处滨海的海南，经常发生水患，海水倒灌还导致淹没家园。早年海南文昌发生水灾记载如“秋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间岁一发；或起东北而转西南，或起西北而转东南，皆必南转而后息。其将作也，飞鸟群投黎山，海吼如雷，有晕气如断虹，俗呼为‘破蓬’，此飓之先驱也。飓作，暴雨随之，拔木拆屋，海水飘溢，数十里外，田禾立枯，咸积田中，有连年失耕者。邑之东、南、北皆近海，故地瘠民贫，视他邑为甚云”。<sup>73</sup>可见，水灾导致当地百姓处水生火热中。笔者也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海南卷》、《海南省千年灾害史料集》中，统计 1915 年至 1949 年间海南岛水灾情况，如下：

年份	地名	灾情
----	----	----

<sup>72</sup> 陈正祥《广东地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8），页 226。

<sup>73</sup> 马日炳《康熙文昌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页 23 页。

1915	万宁	7月15日,暴雨连日,山洪爆发,一片汪洋。10月17日,洪水淹没该县把各村庄。
1919	文昌	出现数十年仅见的灾情,水涨丈余,一片汪洋,房屋、石桥遭冲破。
1924	临高	农历六月十九日,大风发水,海边村庄积水一米多高。
1927	万宁	九月,连降雨3天,米价高昂。
	陵水	大水,街道受淹。
	乐东	8月,山洪暴发,农田、房屋重回甚多,牲畜淹死无数。
	定安	大水,三滩水文站水位达31.25米。
1928	定安	6月,大水,南渡江水位达17.92米。
	文昌	9月,大水淹没村庄,山宝村100多户人家被迫迁移。
1929	陵水	2月9日,大水,街道受淹,村民无法值班年货。
1930	琼山	7月,全县雨量达754毫米。
	海口	雨量达754毫米。
1933	海口	琼州海峡暴雨每日三百九十毫米。
	崖县	全县损失百万元以上,暴雨滂沱,房屋倒塌,发生空前巨灾。
	昌江	发生十余年仅见水灾。
	万宁	交通断绝,农作物受灾达百分之七十,经济损失惨重。
1934	澄迈	10月17日,小雪,稻谷毁尽。
1937	琼海	8月,连日暴雨,房舍浸没,人畜伤亡甚多。
1938	万宁	秋,暴雨3天,农作物几近失收。
	昌江	8月,昌化江因暴雨,水位上涨27.78米,流量2.32万立方米/秒。
1943	琼山	下半年大水,其中东山乡、灵山、大林饿死尽千人,自杀、卖儿女数百人,逃荒者众。
1944	文昌	10月,山洪暴发,下市村受淹两米深。

1946	陵水	大雨爆作，洪水吹走数人，被淹面积较广。
	屯昌	8月，连降雨8天，南吕镇一带，田稻及杂粮受浸。
	海南岛	9月，酿成数十年未见得大雨，全年无收。
	定安	10月，洪水泛滥成灾，不少乡镇被淹。
	乐东	9月，大暴雨，损失惨重，山洪暴发，道路桥梁吹倒。
	崖州	秋，河水泛滥，家禽、农作物被吹入大海。
1947	海南岛	5月，9个县受灾，受灾人口23.5万人，受灾耕地34万亩。
	澄迈	受灾人口5000万人，受灾耕地2.5万亩，毁屋113间，决堤55处。
	临高	受灾人口33510万人，受灾耕地6371万亩，毁屋1171间，决堤135米。
	文昌	受灾人口15万人，受灾耕地11万亩。
	琼海	受灾耕地15000亩，万泉河沿岸人畜死亡无数。
	万宁	受灾人口15869万人，受灾耕地7万亩。
	儋县	受灾人口54520万人，毁屋783间。
	昌江	受灾人口9730万人，受灾耕地4000万亩，毁屋36间。
	东方	受灾人口2480万人，受灾耕地4581万亩，毁屋93间。
	崖县	受灾人口18622万人，受灾耕地54250万亩，毁屋783间。
1948	琼山	发生六十年一遇大水，受灾程度可想而知。
	海南岛	8月，暴雨、洪峰，水位不断上涨，和田淹没，交通决断，秋收无望。
	琼海	8月，洪水致农田被淹，温泉莲龙村全村被淹没。
	昌江	8月20日，大暴雨，洪峰流量2.7万立方米/秒。
	屯昌	8月12日，水灾，冲塌房屋、村庄、农田，百姓流离失所。
	文昌	9月27日，铺前、罗豆、锦山泛滥成灾，遭洪水围困。

	定安	10月，洪水吹踏百间房屋。
	澄迈	8月，暴雨洪水，田禾淹没，低洼处成泽国。据老者言，水势为近几年甚少见。
	琼山	9月，风、洪、潮灾一并而来，房屋毁尽无数。
	海口	8月，学校、医院、堤岸、宿舍、船只等受灾袭击，损失殆尽，溺死300多人。
1949	琼中	秋，暴雨，洪水冲走和平镇20余人。不少住所被水吞没。
	琼山	9月27日，海水连涨八天，为数十年少见。

（资料来源：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民国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325-330）

海南水灾的发生，风雨交加，洪水淹没，泛滥成灾，不少村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在，1946至1948海南十几个市县接连受灾，受灾人口数以万计，受灾耕地上万亩，禾田失收，海水涌溢，江河泛滥成灾，洪水淹没，房屋崩倒，不少农民无家可归。

## 旱灾

海南岛旱灾情况也常有发生，极大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安全，惨状横生，饿殍遍野。那些无力抵御天灾，也无法避免人祸的难民，只好选择逃荒。在《琼州府志》中就记载：

“道光四年（1824年）四月，星入月宫，郡属旱、虫、大饥。自三年（1823年）九月至四年（1824年）八月，郡属久遭旱灾，饿殍载道，鬻男女，渡海者以万计。”<sup>74</sup>

由于连年灾荒不断，造成水资源短缺，无法满足人们对农牧业的生产 and 日常生活的淡水所需，粮食歉收，大量人口面临饥荒，故只能出洋另谋生存之路。在海南临高的旱灾情况记录中也可看，《光绪临高县志》的灾情记载：

“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两年遭大旱，高低田禾并无一粒可收，南方多文、龙波、和舍诸市地方稻堪度活。最可怜者，由城厢出东西北方各四五

<sup>74</sup>（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页1904。

十里之乡村，饥谨荐臻，卖妻鬻子，离乡谋食。或往别县，或过番邦，寥落村场，尽是荒烟蔓草，抚境莫不击目伤心。”<sup>75</sup>

干旱还直接导致牲畜饮水困难，作物大面积受旱，物价飞涨，岛民陷于困境，有的选择卖妻儿，有的只能离开家乡，另外寻求生机。在《海口海关志》中也有这样的记录：“1902年至1911年间，由于本岛连年粮食缺乏等原因，迫使许多人往国外寻求生计。这十年间，自本岛前往新加坡的出境旅客达171004人。”<sup>76</sup>而海南全岛各市县受旱灾的影响持续不减。1927年至1944年间，万宁和琼山接连大旱，遍地荒芜，田地干涸，粮价飞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能到处乞求。1946年，临高农作物枯死，农业歉收，米价更是卖到一块光洋一市斤米。因而旱灾导致百姓颗粒无收或歉收，对于早年生活物资来源单一的农民家庭，不出洋谋生计，一家人又如何能续存下去。

据笔者查阅资料在，海南受特殊的地理板块和气候因素的影响，除了上述灾害外，还遭龙卷风、冰雹灾、潮灾、地震的侵袭，如下：

### 龙卷风

1916年，文昌遭龙卷风的袭击，其所过之处造成了树木倒塌，甚至还有不少村民的房屋受损。1930年，临高新盈因龙卷风，死亡百人，渔船沉没三十艘。1943年，定安新竹周秀村，全村民房被卷掉，百姓无奈只能另迁新居。

### 冰雹灾

1917年，昌江、东方遭受冰雹，全县损失甚大。1920年，文昌发生雹灾，冰雹大小从两三寸到方尺大，致使不少房屋砸坏，水沟堆积不通。1929年、1933年澄迈降大冰雹，至百姓正常劳作生活受此影响。

### 潮灾

1928年，文昌近海帆船沉没，明朝村被海潮冲击，全村房屋倒塌，仅存活三人。1930年，临高新仍港滨海一带，船只沉没，死伤者不计其数。1933年，临高因潮灾，经济损失不下八十余万，人命达千余名，渔船失踪几十余艘。1948

<sup>75</sup>（清）聂辑庆、张延主修《临高县志》，页82

<sup>76</sup>海口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海关志》（以下简称《海口海关》）（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年，海口、文昌海潮骤涨，溺死几百人，损坏渔船几百艘，农田两年不可耕种。

## 地震

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夏五月八日，海南琼州发生7.5级地震，受灾情况相当严重，官民房舍倒塌殆尽，死者数千人。又有记载：‘倾陷倒凹，里分至二十有四。田地苗粮已石计者一万八千，随没入海失额粮二千四百有奇’。<sup>77</sup>万历末年琼山县秋粮夏税的总额为8179石余，据说其中有2400余石，在地震的时候沉入在海里。”1913年、1935年、1936年，儋县、琼海、万宁、定安、澄迈相继发生地震。地震、旱涝、风灾等灾害年年不断，自然灾害不仅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制约。此外，海南的气温环境给鼠类的繁殖生长创造了条件，鼠疫的流行，霍乱的爆发，也是移出激增的原因。

综上，多方面因素的叠加，人口压力巨大，经济环境促动，社会安定堪忧，生态环境恶劣，这些灾害海南岛造成很大的损失和破坏，百姓只好另觅生机。海南当地至今仍流传着琼人出洋的血泪诗：“儿啼女哭由自可，官钱私债急如火；灶头几日没炊烟，田家命与田相连”<sup>78</sup>，真实写照了海南百姓当时的生活窘迫。推动琼人敢于出洋的局面，归结起来就以下几点：社会动荡黑暗，琼人遭受地主、高利贷者和胥吏的剥削；天灾频仍，自然灾害和战争趋于恶化，人民深受其害；海南农村社会，生产水平落后单一，社会又缺乏良好的信贷设施，使许多独立的小农户破产，大部分土地又归地主所有，百姓生存非常艰难。在生活重压下，推动“海南人冒险而鬻新”<sup>79</sup>，离别故土到异国他乡另谋生路。

## 第二节 出洋客观原因——海外外部引力

有关琼人出洋的客观推动因素论述，并不能完全说明琼人为什么抵达的是新加坡，但新加坡之引力作用可充分阐释这一情况。新加坡是一个岛屿国家，被称为“星岛”或“星洲”，虽地小人稠，缺乏天然资源，但地理位置却非常优越。它是马六甲海峡、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成为国际船舶的停靠点、维

<sup>77</sup>（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页25。

<sup>78</sup>王春煜《海南歌谣》（海南出版社，2017）。

<sup>79</sup>陈铭枢《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页125。

修点，也是“货运中转站和物产集散地”。1819年，莱佛士占领新加坡后，建立自由港，外国商船、货物进出新加坡港口一律免税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各国纷纷前往，进行贸易交易。这一政策的实施，令新加坡经济越来越发达，商业社会日趋繁荣，此时开发便亟需大量劳动力，为移民进入提供了空间。而海南也处于南海交通要道，水路之便将两地相连接，从海南岛“渡海到新加坡的人日益增多，随着移民而来的物质交易大为盛行”<sup>80</sup>。

琼人出洋新加坡的引力作用，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新加坡社会大兴土木，大搞开发和建设，亟需大量劳工和家政人员，琼籍移民纷纷前往；二、鸦片战争后，华人移民大规模移入。华人投资开辟农园，种植甘密、胡椒、豆蔻、橡胶、黄梨等经济作物，也亟需吃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的劳工；三、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加坡政府需挖土填海兴建吉宝海港，受殖民政府欢迎的中国劳工又大量移入。直至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人已突破十万；四、二十世纪，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的影响，更是掀起了华人移民的浪潮。以上这些因素的叠加，成为琼人前往新加坡的引力。这其中也呈现新加坡发展，离不开华籍劳工，呈互动共生之势。这种互动网络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容纳了新移民的进入，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也直接推动了新加坡的开发与贸易发展，使之更加多元化。

### （一）政治因素

据英人巴拉德尔统计，“1819年，新加坡开埠时仅有种植甘密的华侨，到开埠后的四个月，增加5000人口中基本来自中国，而且基本每天都在增长。”<sup>81</sup>琼人也有规模的移入新加坡，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扩张建设，开发对劳动力的缺乏，亟需填补大量劳工，琼人成为引入对象，大量的琼人移民涌入这一地区，由此拉开苦力贸易的序幕。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与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

“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乘工，俱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法）

<sup>80</sup>（日）小叶田淳著、张迅齐译《海南岛史》，页176。

<sup>81</sup>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页41。

船只，毫无禁阻。”<sup>82</sup>

《北京条约》的订立，华工出国成为合法举措，大大刺激了琼人出洋浪潮。加之，自光绪十三年（1887），南洋设置的领事馆保护华侨，使华人的生存环境和财产，都有了较好保障，琼人出洋也增加。据琼州口岸出境资料统计，1887年至1900年，前往新加坡的琼人每年都有数千人不等，1895年和1899年更是高达万人。可见，政治因素包含了新加坡的就业机会，成为了吸引琼人前往新加坡的拉力之一。

## （二）经济因素

据南洋著名考古学家韩槐准先生考证，在道光元年（1821），就有帆船自海南运载陶瓷器、铺地之砖、雨伞、鞋、纸、神香、干果及药材等到新加坡销售。<sup>83</sup>又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入侵，改变了中国沿海的社会经济生态。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也有琼人由海口赴香港，再转乘于新加坡，但这种移民性质与之前的帆船贸易经商不同。当海南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对海南社会结构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人、货出入的据点，商品贸易有了相当的发展，海南人的流动肯定也随之增加。成千上万的琼籍契约劳工和自由劳工被吸引到新加坡，为殖民经济的发展服务。对于琼人来说，使他们可以迅速获得经济上的发展。从新加坡看，琼人社会的形成与该地区英国殖民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文昌县志》载：

“1858年5月，清廷与英、法分别签署‘天津条约’，海口辟为通商口岸。其时东南亚英、荷、法殖民地正在垦荒、筑路、开矿、掘河、建城市、设工厂，都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商业也随之发达，去南洋者不愁无工做、无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贫苦的文昌人到南洋谋生，大都青壮年劳动力，人数逐年增加。”<sup>84</sup>

对英国人来说，华工是一种有用的廉价劳动力的资源，华商作为中介人，在殖民经济中，既帮助征集原料，又有销售英国工业品之作用。琼州成了各帝国

<sup>82</sup> 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9）。

<sup>83</sup> 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见《琼州会馆联合会报》，第1卷，第1期（年份不详）。

<sup>84</sup> 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外文昌人〉，见《文昌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页491。

主义国家商品的推销市场，致使西方各国与海南间贸易额不断增加。由于各国商品的进口急剧增加，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琼州经济遭到极大地破坏，自给自足的经济日趋凋敝，农业和手工业奄奄待毙。广大琼崖人民走投无路，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各国谋生。加上，后来欧人带来更舒适安全的航海运输工具，增加了琼人出洋的意向。这些，在上述历年统计数据中，也能清晰看到出洋人数在这一时期的大幅增加。

琼人有规模出洋的时期，也正是新加坡大力发展的时期。而推动琼人外出的客观推力来自海南内部的人口压力，政治动荡，经济负重，天灾不断；再加上新加坡开发对劳工需求的大增，产生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和市场商机，都是困难实现改变琼人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地，则成为吸引琼人的客观拉力。在整个 19-20 世纪，琼人不断在新加坡和海南间往返，两地的人文、经济、社会不断互动，不仅开创了新加坡的琼人空间，也奠定了一波波琼人有规模出洋，侨居异国他乡的机会。

综上所述，琼人出洋是中国内部和新加坡外部共同作用力的客观动力。出洋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有来自海南内部，明朝中叶以后，海洋社会经济的兴起和社会动荡，农村经济的残破，海南人口净增，耕地不足，苛捐杂税，天灾肆虐，民生疾苦，使得琼人出洋谋生。而后琼州被迫开辟通商口岸，海南门户大开，各口岸遂成为人、货出入的据点，洋货大量涌入（货物出入名目，参照附录 5-7），农民、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这些都形成琼人海外移民的内部推力。选择移居新加坡为出洋目的地，又源于外力的吸引作用。十九至二十世纪，由于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势力的扩张，英殖民地官员锐意开发新加坡，使其成为一个繁荣的商港。新加坡从开埠后，经济迅速发展，新加坡亟需大量的劳动力，对原本生活的不如意的琼人产生经济诉求。这些因素的叠加，都导致琼籍出洋者不断跟进。

### 第三节 琼人出洋的主观原因

琼人的主观意愿、对财富的诉求、自身的价值取向，也是对出洋迁移的源动力因素。这些主观因素推动琼人对迁移的期待值，从早年琼人的打拼经历中得以体现：

事例一，朱国儒，祖籍琼海，因家贫出洋新加坡。

朱国儒因家贫寒，在海南仅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其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立志要改变贫穷命运。年少就到新加坡当电工学徒，刻苦学艺强度大，朱国儒仍默默钻研。接着在亲戚的介绍下到英国人经营的海陆空俱乐部当电工，后又到英国建筑公司管理建筑工程。这位贫穷出身的学徒，认为“人生就是奋斗出来的！”，经过艰苦拼搏，在新加坡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认准时机，筹集资金，拓展业务，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王国。<sup>85</sup>

少年时的艰苦磨难，家人生存的需要，炼出朱国儒发奋成长的意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实现利益的诉求，也为他创造了异域奋斗动力。

事例二，史立谐，祖籍文昌，12岁谋生新加坡。

史立谐12岁那年，跟随父亲到新加坡谋生。一家人生活苦不堪言，不久，父亲离世。他只好到西餐馆做童工，靠13元新币糊口度日，还有三个妹妹由他照顾，生活非常困难。但史立谐人小志气大，决心要掌握西餐制作的高操技艺，日日虚心请教，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38岁那年，他开设了第一间西餐馆。日后，他的西餐馆遍布新加坡大街小巷，生意颇具规模。<sup>86</sup>

由上述事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由于琼人年少家贫，对金钱的渴望，才会使他们独自出洋打拼。抛家离子，也是出于一个儿子、丈夫、父亲必须扛起家庭生存的责任，才有勇气和能量独闯异乡。这期间，无论遇到多少苦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永远是外出南洋的动力。也正是对财富的极度渴求，才会伺机而行。事实证明，日后的发达，使他们不忘亲人，牵挂故里，时常往返新加坡、海南两地。这正是一股主观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异国拼搏，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不仅改变了家人窘迫的生活境遇，也为海南侨乡的发展建设不断出力。在海南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想钱去趟番》中，也证实了琼人出洋就为寻求财富的心理：

“想钱去趟番，想穷蹲灶坑，  
离不开父母，发不了洋财，  
南洋客，南洋客，  
穿条短裤闯天下，没有一千也八百。  
蛇虽无脚也会爬，人间四角闯四方，

<sup>85</sup>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编《海外琼人精英·第一卷》（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sup>86</sup> 冯子平《海外琼人风云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人闯四方虽有苦，先苦后甜合情理。”<sup>87</sup>

从词中反复出现的“钱”、“财”等字眼，可见琼人对经济利益、致富的追求，谋生发财对他们充满了莫大诱惑力。他们认为要想赚钱发洋财，只要下南洋打拼一番便能实现，这也是推拉力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观因素。可以说，新加坡的地理距离和发展机遇，对琼人来说都是不二选择，加之，前人引路，有渠道，故琼人纷纷赶之。所以，在笔者搜寻的文献中，琼人对财富追求的意愿和胆气绝不是个例，而是出洋的普遍现象。我们从琼人出洋的年份，以及从事的职业来看：

1900-1945 部分出洋琼人列表

姓名	出生年	出国年	备注
黄闻光	1901	1915	曾任文化部代部长，国防部政务部长
云蓬宝	1905	1917	曾任云氏工会主席
黄循蛟	1909	1917	从事工商业
林树琤	1902	1919	从事工商业
吴乾南	1913	1922	其父清末赴新经商
潘宾臣	1900	20 年代初	经商和文化事业
詹行鉴	1914	1926	从商
陈如合	1910	1926	从商
陈昌才	1906	1927	从商
吴御之	1904	1928	从商
苏庆位	1918	1933	从商
林猷鑫	1929	1934	从商
周怀腾	1935	1939	经商
史立谐	1926	1940	打工后经商
韩山元	1942	1945	编辑、记者

（资料来源：王俞春《海南移民史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8月，页216-222）

从出洋时间和职业方向，可映射出琼人不少从商，他们希望在经商中，拓展收入来源，改善家人生活状况。琼人主观原因所导致的迁移方式和社会结构，与闽粤籍的移民活动有所不同。早期，琼人迁移至新加坡大多是侨居，他们的移民活动并非携家带口，而是只准备简单换洗衣物，因为他们并没有定居异国和落地

<sup>87</sup> 王春煜《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24。

生根的想法。所以，只身前往，希望节约成本，发财后返乡与家人团聚。我们从历年出口入口人数统计中，也可观早年琼人出洋的目的不是扎根异乡，如此往复，就是打工挣钱。以下是 1902 年——1928 年的统计数据：

历年赴新加坡和返乡的琼人统计，1902-1928 年

年 份	赴新加坡	新加坡返	实际出样人数
1902	16252	5030	11222
1903	15385	6029	9356
1904	14633	6279	8354
1905	10622	6725	3897
1906	11878	2947	8931
1907	26229	3473	22756
1908	11948	2543	9405
1909	14438	2071	12367
1910	27990	5155	22835
1911	32432	9053	23379
1912	24085	9021	15064
1913	16858	-	-
1914	11297	-	-
1915	6536	-	-
1916	8166	-	-
1917	-	-	-
1918	-	-	-
1919	2462	-	-
1920	3278	-	-
1921	2420	-	-
1922	7069	-	-
1923	8894	-	-
1924	17400	-	-
1925	28678	-	-

1926	20411	-	-
1927	10329	21085	-10756
1928	537	18821	-18284

（资料来源：上海总税务司《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上海图书馆，1922年，838页）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观 1902 至 1928 的 26 年间，往返海口与新加坡间的人数，再观察 1902 年前，琼人赴各国出入境总数的净额发现，琼人出洋的行动轨迹呈明显双向流动，每年平均返乡人数约 22700 余人。由于资料欠缺，或有人没从海口港出入境，再或统计数据不完整，难做正确统计，数据有所偏差。又由于在 1902 年以前，海关只做海口赴各国出入境的旅客总数的统计，没有各埠数据，故作者的表格从 1902 年开始记录。但从上表格亦可提供下列讯息：（一）返乡人数 1911 和 1912 年返乡人数较多，因为欧战亦发生，海南丰收；1927 和 1928 年返乡人数最多，这是北伐到统一的三年间，实际出洋净额发生入超，也许是经过多年的打拼，此时琼人稍有积蓄和能力返乡，亦或因战争担忧家人而返乡。（二）1913-1926 年入海口港人数资料欠缺，但可想象返乡人数更多，因为此时新加坡商业萧条和欧战影响。（三）每年实际出洋人数不多，仅有三年超过两万人，平均不到一万人。总之，琼人出洋有较强的双向性，与闽粤籍不一样。<sup>88</sup>以致早年在新加坡落地生根者较少，其原因在琼人出洋人口结构中可得知缘由。（第二章将详细论述）

值得注意，琼人出洋不等于移民，出洋目的就为赚钱谋生，获取更多财富改善家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地位。除了在推拉力的作用外，琼人自身的主观因素决定了跨国往返或流动。他们在两地两国间来来往往，与他籍在新加坡落地生根者不同。而这样的跨国流动模式，既缓解了侨乡人口压力，也使大量侨汇流入，且还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自耕农残破状况也得以改善，为海南侨乡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章所述，琼人移民出洋的原因包含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以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客观原因包含：一、移出地，政治变动，战乱经济残破，土地超负荷，人口压力巨大，生活资料匮乏，生存空间窘迫，灾害迫害频频发生；二、新的生存空

<sup>88</sup> 1904 年，厦门出入口华工 525000 人，船上拥挤不堪，与海口出洋情形不同。见《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国史馆史料处，1904），页 74。

间移入地,有能力并需求新移民到来,为琼人实现迁移创造运输手段和空间认识。这些地理、经济、政治、自然、人文因素的结合,都是琼人得以迁移的基本内因和外因,属客观动机合力。除了客观因素,琼人的主观动机和逐利的想法,支撑着他们的走险精神,合力使琼人有动力和勇气闯海出洋。早期出洋的琼人由于家贫,大多是单身男性,把父母、配偶留在家乡。他们通过在新加坡辛勤劳动,实现出洋的最初愿望,寄钱回家解决亲人的困难生活,以及积攒钱财回乡建屋盖楼,休息好后再返回新加坡继续奋斗,直到丧失劳动力。基于种种原因,琼人扬帆渡海到南洋去谋求生机理所当然。鸦片战争前,出洋人数多为海南岛东北部文昌、琼山;鸦片战争后,琼人移民延伸至海南岛西部、南部地区。据新加坡人口普查,1901年琼人有9451人,占新加坡华人人口5.8%,1931年琼人有20040人,占新加坡华人人口4.8%。琼人因为各种内外部作用前往新加坡,但琼人的主观因素,决定出洋晚于其他方言群,加之琼人更多是短暂迁移,目的更多是出洋打工挣钱后返乡,故琼人跨国流动频繁,在新加坡居于小方言群之地位。

本章笔者通过追踪琼人移民的原动力,理解了琼人出洋背景的关键因素,更好地探寻琼人跨国社会场景建立的兴起之源以及变化之因,明白了新加坡琼人社会的历史传统、移民素质和人口结构。了解到海南侨乡的形成、琼人跨国网络的建立,是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居住国与祖籍地的推拉力作用,以及移民对金钱财富向往的主观因素,故琼人一批批从海南向新加坡出洋的缘故。

## 第二章 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与挑战

海南岛四面靠海，港湾甚多，水路航道繁荣。它历来是航海者通往南海诸岛的补给地，也是国际贸易商船的必经地，与南洋各国往来交流频繁。《海南岛古代简史》中曾记述：

“清代各殖民国家加强了对外商品输出，海南岛除了对国内仍保持贸易外，同时成为南洋通商基地和来到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停泊所；一方面又因盛产热带物产，因而对外贸易达到空前规模”。<sup>89</sup>

海南地理区位优势，为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提供了渠道。海南与南洋间贸易往来，使接触机会增加，为琼人“下南洋”谋生带来契机。而“下南洋”用海南话表达为“去番”，“番”是海南人指外国的意思。不少琼人抱着谋生计、改变生活的憧憬去番，这一美好诉求的主观意识得以实现，源于海南具备跨洋迁徙的途径和运输手段。所以，前人出洋，后人跟进，慢慢展开琼人跨国移民的不断延续。而当家中如有“番客”在外打拼是让乡人羡慕的事，但跨国行动的开启也给跨国家庭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总的来说，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以及带来的挑战是源于：

一、海南与新加坡间的船只往来，为琼人“下南洋”提供了条件。海上交通的发展，从乘风破浪的帆船时代，为琼人早先出行提供了机会；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受益于水上交通工具的演变，舒适安全的轮船为琼人跨国流动者增加，掀起一波又一波跨国移民浪潮。故交通条件的创造，为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提供了远行的可能，否则也只有想法也很难实施。

二、漂洋过海的琼人，进入新加坡还需要有渠道，它的形式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非自由移民，另一类是自由移民。海口辟为通商口岸后，成为工头掠夺、诱骗劳工的贩运地，大量琼籍苦力劳工被贩卖前往殖民地。他们充当苦力契约劳工，更贴切地说，他们不少是被“卖猪仔”输入到新加坡，所以人身自由被限制；而自由移民，完全出于自身和家庭的意愿，自主涌入，行动自由，以亲属帮带关系为基础。

---

<sup>89</sup> 杨德春《海南岛古代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三、跨国移民的产生必然给家庭带来不少挑战。可以说，琼籍男性从离开家乡开始，无论是家庭结构、夫妻忠贞观、跨国婚姻中双方的角色等诸方面，都产生一系列影响。其中，就出现“留守新娘”、“一国两家”、“一夫多妻”等现象。受孔孟传统观念和乡规的制约，琼女出洋新加坡晚于其他方言群，这给新加坡的琼籍家庭和侨乡家庭也都带来挑战，呈现与主流家庭形式不一样的生活风貌。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琼女开始出洋走出家门，从传统束缚的乡规中走出来，从中也呈现出不断吐故纳新的婚姻观。

从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我们看到移民的跨国方式和途径不是唯一的，所以移民流通互动的模式是多样化的，跨国渠道和途径也是多元化。并且，在跨国移民链的互动交流中，方方面面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挑战，使人口和资本在跨国流动中不断发展。有的琼人在跨国移民中自由行动，有的被当作劳工商品进行买卖交换，在被迫和主动间完成了跨国流动的意向。又因个体观念理念的不同，琼籍家庭为了家庭生计，形成不同的跨国生活模式和跨国婚姻策略。而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出相同的特点：移民跨国途径和渠道的连通性；跨国模式和形式的灵活性；对移出国与移入国间的互惠性，这些又都契合跨国主义的特征。本章，梳理琼人跨国的产生途径与形式，以及给跨国家庭带来的诸多挑战，呈现在跨国链条两端的双向互动中，琼人独特的跨国生活风貌。

### 第一节 乘风破浪下南洋——从帆船到轮船

琼人跨越彼岸寻找机遇，无论海上行程多么惊险，风浪多么险阻，依旧登船奔腾于浩瀚大海。笔者认为以早期的航海技术和航行工具，琼人必须具备一定胆识，以及对寻找机遇的强烈渴望，才会冒命博资财。首先，来看早期的航海工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琼人先贤大多乘坐帆船出洋，风帆汇集风力，运用桅杆带动船只飘行，但此装置只能乘风推进前行，最大的缺点是不能逆风行驶，所以琼人出洋必须是顺风季节，在合适的风向和海况时绕岛而下。但海上风浪风波变幻莫测，翻船沉海事故时有发生，意味着这是一趟多么凶险与艰难的旅途。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相对安全、迅捷、容量大的轮船逐渐取代帆船。航海和轮船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量琼人下南洋的意向，自轮船成为往来海南和新加坡间

的交通工具后，来往者比比皆是，且视以为常，顾虑减轻。<sup>90</sup>据相关史料记载，仅清末最后十年，每年从海南海关出洋者万人以上，1910年2.8万人，1911年3.24万人。<sup>91</sup>他们分别从琼海的潭门港、博鳌港，文昌的铺前港、清澜港等地搭船下南洋。可以说，看似简单的交通工具，却决定着琼人跨国移民产生的运行状态和数量结构。

没有跨国迁移交通工具的建立、优化和演进，琼人跨国网络的展开很难形成较大规模，也许早期只会是零星分散的出洋，很难让琼人的跨国空间进一步延续和扩展，进而促进移民源源不断的迁移动力，建立一个稳定的跨国频繁流动途径。本节，我们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为时间分界线，看到琼人借用不同的迁移工具跨国流动，为了求生存做出的各种应变与选择，以及在此岸和彼岸间的纠结与较量。而琼人移民作为跨国网络中的主体，通过乘船迁移的方式与移入国、移出国外各结点建立联系，实现信息、资源、资金的传递与融汇。这一包含多重内容的跨国网络结构，也建构和塑造了移民网络、宗教网络、亲属网络与族群网络等。总而言之，通过琼人跨国移民途径的产生，塑造了一个跨越社会空间又紧密联系的整体。

### （一）看风使舵——琼人先贤帆船移民

海南岛与新加坡都是海上贸易通商的要道，据《南洋记》记载：“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sup>92</sup>海南属于七洲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加上水路往来相对方便，帆船已成为联结海南与新加坡间的桥梁和通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帆船成为琼人出洋的主要交通工具。而海南帆船与其他前往东南亚的中国船只相比，有许多独有特征，由于南岛近海域礁石遍布，出入不易，海南造船匠为适应环境，其打造载重量在50吨或100吨左右的船只。并且，小型船只躲避海盗和危险方面，要比大型船只更灵活。所以从造型上，海南船只只是体型小的双桅帆船，与船头为“红头船”的粤帮船只，以及闽帮的“青头船”，

<sup>90</sup> 作者不详〈论华人出洋宜加审虑〉，见《叻报》（新加坡），1888年4月2日。

<sup>91</sup> 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县志》（以下简称《文昌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页491。

<sup>92</sup> （清）陈伦炯〈南洋记〉，见《海南历史论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不一样。从中我们也发现，海南船只的工匠技术，不仅为琼人出洋提供了可能，更使之成为马六甲海峡的船老大，这背后也源于当地海南人的助力。因此，在新加坡从事造船、修船、驾驶者大多也为琼人。换言之，船只的建造工艺和使用，与琼人的跨国移民产生密切相关，不仅提供了出洋工具，也为琼人适应异域环境，谋生职业提供了机会。

到了明代中叶后，海南船只发展为可承重千吨的越洋帆船。从当时帆船所载货物重量，约在两千吨到两千五百吨计算，将货物除外，我们可得出每船平均可附载乘客二十余人至百人。而早期，赴新加坡的船只仅十余艘，盛时四十余艘，在繁盛季节，附客也不超 4000 人而已。<sup>93</sup>所以，就算没有当年通过帆船赴往新加坡的琼人具体数据可查，我们仍可以得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乘帆船出洋的琼人偏少。早期从海南驶来的帆船清一色为男性，大多为贫民，船费每人仅 1 至 2.5 银元间。<sup>94</sup>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海上风云变幻莫测，航海未知风险颇多，帆船乘坐环境艰苦，让不少有意向的出洋者忌惮。在柯木林的《新加坡华人通史》中也记述了早期出洋经过，自 1715 年起，移民基本乘坐帆船出洋，在 65 度角以内的风能促使船行驶。<sup>95</sup>所以，每年于阴历冬至前后乘东北季风南下，至翌年夏间南风时返航。如果遇上顺风时，十二日可抵新加坡。<sup>96</sup>如逢逆风，天气恶劣，所乘坐的帆船需要一个多月。帆船在狂风巨浪中横过七洲洋，若遇不幸，沉没深海也是常有的事。在冯子平《琼侨春秋》中，也有记述当年琼人的出洋史实：

“当时，滨海、三江、大致坡一带的农民，背着简单的行李，背井离乡，乘上排水量 300 担的帆船出洋谋生，每年出洋的乡民近千人。北港村的饶新孝发财后，造了 18 艘帆船组成帆船队。每年冬至前后，这支帆船队开往越南、新加坡、暹罗等国，至次年农历四五月，才由各埠返回原港停泊。到 1735 年，帆船队发展到 72 艘，每年到滨海乘船去南洋谋生的乡民又 3000 多人。但天又不测风云，1802 年 7 月，帆船队在向南洋进发的途中，遇上强台风，其中 32 艘船被狂风巨浪打沉，数百人无一生还。剩下的帆船，有的改为渔船，有的改成近海运输船。

---

<sup>93</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

<sup>94</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

<sup>95</sup>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页 65。

<sup>96</sup> 寒冬《海南华侨华人史》（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页 73。

但还是有敢于冒险的船主每年九十月份，把不畏艰险的乡亲，送往南洋谋生。”

97

从中可看，琼人出洋的惊险从登船启程开始，可以说是一场生死之旅。乘风破浪下南洋，一旦出洋，这趟旅程就意味着漂泊不定、漂洋、冒险、流民。如突遇大风大浪，不幸者将遭沉船，人亡葬身大海之祸。所以，在实际航行过程中，船员大多会遵循一定的线路规则。航海文献《航海水路簿》<sup>98</sup>（亦称《更路簿》《针路簿》）中，就详细记载了琼人从海南岛航行至新加坡的路线。在风帆时代，海南与新加坡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海口、文昌铺前港乘船，取道海峡往西，再南下走西贡、曼谷与星洲等处。这条航路时有海盗（以九头山为根据地），较不安全，遭船沉人亡之祸的不幸者也时有发生；二是，从清澜、博鳌、藤桥、三亚、海头等港出发，绕道顺风而下，横过东京湾，沿着印度支那海岸，然后到达新加坡。此外，顺风顺水是船客和船主最大的祈愿。有人这样描述琼人下南洋的心酸：“三人去南洋，二人死海上。一人成番客，不死是命长。”<sup>99</sup>因旅途艰险，每艘帆船上都设有水尾圣娘之神位，依照惯例每名乘客须缴纳船务代理商香火钱五角，以供奉水尾圣娘之用。<sup>100</sup>琼人以祷告航途平安和日后发展顺利，也一并将祭拜习俗带到了东南亚一带，如今在新加坡依旧能见信仰公神。从空间分布上看，海神信仰文化的传播，明显呈现出从海南岛——西南沙群岛——东南亚的网络形态。故琼人跨国海域途径的产生，也为宗教、文化、习俗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如刘宏教授的“跨界亚洲”理论，辽阔的南中国海像一条繁忙的高速路，将人口和货物不停流动，是一个富有灵活性的地理空间。<sup>101</sup>同时也将人力、资本、文化等流动实态，借助这条通道互动，并发挥作用。所以跨国移民的产生，从形式上看，既有交通网络，又有宗教网络，又交叉着文化网络和贸易网络的形成。

<sup>97</sup> 冯子平《琼侨春秋》（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1），页3-5。

<sup>98</sup> 南海更路簿编委会《更路簿》（海口：海南出版社，2016）。

<sup>99</sup> 王春煜〈相见只在夜眠中〉，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

<sup>100</sup> 法萨维纳《海南岛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页218；林明亚著、陈序传摘译《新加坡海南人》，页48；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志》，页77-79。

<sup>101</sup> 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十九世纪初，海南帆船和广州、潮州、汕头、厦门等口岸的帆船一样，于新加坡开埠后，每年赴新从事贸易活动，这也加剧了琼人出洋的意向。1821年至1826年，海南帆船已往返新加坡通商，其中输入商品有东方腊、瓦、鞋、雨伞、纸张、干果及中国药材等。海南人出洋驶回时，也将海南稀缺物资从南洋一并带回。（进出口货物名录，参照附录 5-11）跨国往来使两地居民在消费文化和饮食文化上，频繁互动。久而久之，在帆船贸易中，因交易的需要和出售获利，使琼人的产生有了更多机会。譬如，当海南人的货品在返回前没有销售完，琼人会选择多停留几日，或安排一两人料理剩下的货品，这些人中很多选择继续留在新加坡讨生活，因此出现了不断涌现移居新加坡的琼人。

概言之，海上交通帆船和贸易的往来，将生产、宗教、族群等结构要素编织，为琼人的下南洋谋生提供了条件。帆船、季风、贸易、宗教等推动了跨国网络的关联，进而自然建立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在形式上形成紧密联系的移民网络。看风使舵的帆船时代，利用季风的吹送航行，行程充满惊险，但较小船只载客量有限，漫长的航程供水不足，晕船如同天地转，安全设备欠佳。但无论如何，帆船对琼籍移民的产生重要性不言而喻。

## （二）轮船时代——琼人移民浪潮

自从轮船及南洋轮运的开辟，海南岛的帆船航运逐渐被替代。由于轮船更安全、舒适、快捷、装载量大，便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琼人选择出洋的主要交通工具。海上交通工具的改善，更加便捷，大大促进琼人流动。《海口海关志》曾有以下纪录：“1882年，在海口设立两个外国商行，经营本港与新加坡、曼谷的客运业务。1883年，本港与新加坡通航，此后来往与新加坡的旅客不断增多。”

<sup>102</sup> 下面是 1887—1911 年琼州口岸进出境旅客统计表：

1887—1911 年琼州口岸进出境旅客统计表

项目年度	出境（新加坡）	入境（新加坡）
1887	3940	
1888	3684	7
1889	8638	6900
1890	9123	5486

<sup>102</sup> 海口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海关志》。

1891		
1892	5712	3193
1893		
1894		
1895	10154	2072
1896	6782	5003
1897	4517	1811
1898	6954	2699
1899	10467	1949
1900	7612	1142
1901	9280	2165
1902	16252	5030
1903	15385	6029
1904	14633	6279
1905	10622	6725
1906	11878	2947
1907	26229	3473
1908	11948	2543
1909	14438	2071
1910	27990	5155
1911	32432	9053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编《海口海关志》，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1992年）

从历年琼侨出洋人数统计中可观：一，琼人出洋人数基本逐年增加；二、又或，琼人往返于新加坡和海南两地，呈双向不断流通状态。当然，不排除还有一部分海南人出洋，不经过海口海关，故未列入上表的统计数据中。无论如何，从以上数据中，都可看出琼人当时乘轮船出洋的概貌。琼人出洋与交通轮船的变化，紧密相关，在“琼州海关”1904年的报告中也有所记录。文中，追述1876至1902年间，载运旅客由海口赴南洋等埠的盛况：

计自光绪二年（1876年）开关以来，所有旅客出入，年盛一年。查开埠之第一年九个月中，华人之由洋船出入，不满三千名。迨至光绪八年（1882年），则增加其数，将近一万一千名。嗣后则愈增愈旺，及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已愈24000名之数，十四年（1888年）时，则增至31000名上下。自此十年之后，竟至35000名有奇。迨至二十八年（1902年），则增过45000名有奇，洵

称最旺。其故盖因载客之轮船，舱位固已洁净简便，水脚又极相宜，加以外出各工人，在船均有下役伺候，起居饮食，较之家居尤为舒服，是人皆乐于搭船远游也。<sup>103</sup>

轮船的舒适安全，使海南人出洋不再畏惧，出洋者年增一年。又由于轮船容量大，可容二千至二千五百吨，遂成为琼人能大批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的海南人出洋数与上表中的处境数据有所出入。这也说明，海南人除了乘轮船前往新加坡外，还有去往南洋的其他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但新加坡是重要的集散地和目的地。所以 1902-1911 期间，前往新加坡的轮船，春夏每月，对开二、三次不等，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千余人。因为乘轮船前来者不断增多，英殖民政府为了保证当地居民的健康，设置棋樟山检疫站对入境移民进行检查。移民被困岛上收容所，生活环境恶劣，饮食难以下咽，甚至男女赤裸接受检查，以致怨声载道。但这些也并不阻碍众多琼人乘轮出洋，在琼人去往新加坡的轮船上，人数基本满额。

概而言之，随着海南与新加坡间通航的频繁，交通工具的改善，琼人抵达新加坡人数的不断增加。帆船时代琼人先贤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纷纷开启南来新加坡的航程，越洋打拼。又随着西北季风的吹起，琼籍帆船踏上归途，驶回故里，船上水客将安家现银、有用货物携带回乡。鸦片战争后，安全快捷，载重量大，航程时间缩短的轮船逐渐代替帆船，也因其安全方便、容量大，掀起了琼人南下的移民浪潮。本节我们看到了早期琼人移民是怎样南来的，从唯一的交通工具帆船，再到安全便捷的轮船。这些船只穿梭于海南与新加坡海域上，不仅将琼人、货物、资金等进行运输，也促进更多的中西文化、生活习俗、商品经济的交流，成为两地间早期的通道纽带，开启了琼人跨国移民产生的通道。

## 第二节 新加坡琼人移民类型

有关移民类型和性质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如吴凤斌的《契约华工史》，就对不同地区的契约劳工的产生、发展等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契约华工属强制移民，有别于近代一般的自由移民。<sup>104</sup>在颜清煌的《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中，

<sup>103</sup> 《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台北：国史馆史料处，1904），页 103。

<sup>104</sup>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将移民分为契约劳工和自由移民，论述契约劳工属贫苦的“苦力”华人，他们也属被拐或贩卖到新世界的一批“猪仔”，履受剥削。<sup>105</sup>港大历史学者冼玉仪则更多从心理视角探讨移民的出洋性质，将移民出洋时自身的意愿作为界定标准，认为自由与否和移民没有能力支付船费，以及出洋后的工作状况等因素无关。<sup>106</sup>以上学者的见解有很多可取之处，但笔者为了更加直观、明晰的界定，本章会从移民出洋后的人身自由区分移民类型，又从移民的招工方式和劳动管理制度细分非自由移民，是属契约苦力还是终身为奴的“猪仔”，以致更为细化和完善。笔者将近代琼人到新加坡的移民类型分为：非自由移民，按他们抵达目的地后其人身自由的部分，以及是否必须按照雇主指示工作和生活，分为契约工“苦力贸易”和债奴卖“猪仔”。前者在完成合约后将有人身自由，后者终身为奴，直至死亡。另一类是自由移民，出洋的琼籍人士通过血缘、宗亲、乡谊等众多连带关系，自由活动与移居国。这类琼人更“侧重家族主义与乡土主义社会习俗，以族援族，以戚引戚，以乡引乡的自然帮带结果。”<sup>107</sup>据《文昌县志》载：

“清朝末年，大批贫苦的文昌人到南洋谋生，并借同乡宗亲的通道携带出洋，其人数年年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876至1898年，就达24.47万人左右的琼人通过客运出洋，平均每年有一万余人，最多的年份竟达两万余人。”<sup>108</sup>

可见，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照顾下，成为琼人出洋移民链的途径之一（请参照附录十三）。加之，亲戚朋友互相传递信息和门路，出洋前者的成功案例等，都诱使琼人不断效仿，纷纷前往南洋谋生。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移民与非自由移民的区别，前者一般由自己负担交通、住宿等旅途费用；后者由客头先行垫付相关费用，与雇主签订务工契约后，再通过贩卖的形式转让。当然，两种移民形式都为琼人“下南洋”提供了途径。本节我们将看到，琼人出洋的原因和形式呈多样性，有的充满辛酸和恐惧，有的带着致富的美好愿望启程。

---

<sup>105</sup> 颜清煌著、栗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晴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sup>106</sup> Elizabeth Sinn, “The Gold Rush Passenger Trade and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Richard Harding, Adrian Jarvis and Alston Kennerley, eds. *British Ships in China Seas: 1700 to the Present Day* (Liverpool: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and Society for Nautical Research, 2004).129-153.

<sup>107</sup> 何启拔〈琼崖华侨与琼崖社会〉，见《边政公论》，第5卷，第1期（1946.7）。

<sup>108</sup> 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志》，页490-491。

## （一）非自由移民

非自由移民，由于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大开发时期，需要大量劳工。被掳掠的华工，日夜为雇主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与奴隶无异。值得注意的是，非自由移民又有契约“苦力贸易”和“猪仔贩运”的本质区别。契约苦力贸易是由外国公司招工，琼人“应募”，大部分“苦力贸易”表面上是自愿原则，但实则上很多是被强迫签约，在契约期内无自由。掠贩子一般为西方人口贩子、投机商或代理人。而“猪仔贩运”则是被强行拐骗招募，其手段更加暴力和残酷，终身不得自由。因为当“猪仔”合约快满时，雇主又使其染上鸦片或赌博，让“猪仔”无法偿还高额债务，终身为期打工，直至死亡。<sup>109</sup>

### 契约“苦力贸易”

1843年以前，由于新加坡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很多客头和帆船船长认准了这一市场需求，又由于许多出洋的琼人劳工穷困，无力支付出国的船票价格，他们便出资垫付船资，带领琼人出国，并从售卖“苦力”中谋取可观利润。而抵达新加坡后，被转卖到雇主手中的赊单制琼籍劳工，以为其雇主劳动来偿还船资垫付的债务。通常，一个劳工的成本为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售卖价四百至五百元。又以口头或书面合同的形式，约定工作性质为“契约工”，契约年限一般是5至8年，工资数额每月4元，并写明工作地点等。<sup>110</sup>苦力劳工满约后，赊单琼人便可从其债务中解脱，再自由选择雇主。1845—1875年间是苦力贸易的鼎盛时期。新加坡成为苦力劳工集散地，大量劳工涌入新加坡后再被遣送到其他地方。这种移民制度在十九世纪极为普遍，也成为琼人去往新加坡的形式之一。

### 被卖往星洲的“猪仔”

随着轮船通航和海口的开埠，海口港遂成为近代贩运“猪仔”贩运的主要口岸之一。载“自条约许洋人互市，海口为通商口岸，轮船之往来为南洋必经之要津，领事有署，洋商有行，商家有火轮运载，籍保不虞。惟海寇之出没不时，沿

---

<sup>109</sup> 唐若玲〈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考察〉，见《南海学刊》（以下简称《海南人下南洋》），2015年9月28日。

<sup>110</sup> 唐若玲《海南人下南洋》。

海村墟仍多劫人。勒赎之害，水师未能防守”。<sup>111</sup>反应出掠劫琼人的现象不仅存在，还很猖獗。其中，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正月11日，一艘贩运“猪仔”的“昌利号”船只，载有幼孩十余名，幼女六名，总载两百五十余名“猪仔”，从文昌县缝头村偷运到海口，再由海口贩运到南洋各地。据船上的被贩运小孩曾叙说：在贩运的船行中，有两人不听“猪仔”头的指示，二人便被砍碎，一片片投入水滨。<sup>112</sup>其“猪仔”受到的迫害、屠杀、暴行，以及极端残酷行为令人不堪。直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清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给外务部的报告中仍提及，每年从香港、澳门、汕头、海口等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十余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猪仔。<sup>113</sup>大批琼人被贩买到新加坡成为“猪仔”充当劳工，猪仔贸易盛行。琼人只要踏上贩运“猪仔”的船只，便是一段令人发指瞠目的出洋过程，面对水土、虐杀、疾病的危险，处境及其悲惨。以下是琼人出洋时在船舱内的现况描述：

“……至船舱之内，人数既多，水量不足，每人每朝不准用水洗面，仅用水半盂漱口而已。食饭之际，强者抢先或可果腹，儒者退后只能半饱。如遇顺风或可无事，苟遇风头不顺，饮食不济，便溺亦救渴之灵丹也。又如晕船呕吐，狼藉满仓，屎溺纵横，奇臭逼人。加以南洋酷热，上下蒸郁，全船数百人中岂无一人带有病菌能传染者乎。故病风一播，往往十人之中常死三四。日尚并肩倚背而谈，夕已僵挺。夜尤强自挣扎，旦即奄奄。故此种情形，凡贩运猪仔之船均如是也。”<sup>114</sup>

输出的“猪仔”不仅人数众多，且境况都不甚理想。船舱里闷热不堪，奇臭逼人，卫生环境极差，饮食恶劣，晕船不适、生病者比比皆是。加之，疾病传染速度极高，一旦船舱内有人感染，就会迅速蔓延，造成死亡率不断地增加。而整个航行不仅有生命危险，还有劫财要命的风险，“没钱当猪仔，不死是命大；海上多强盗，劫钱又要命。”<sup>115</sup>出洋琼人在海上漂泊的恶运，或被强盗掠劫，或恶浪吞没，葬身深海。在海上漂泊数十天，好不容易历尽千难险阻，熬过漫漫长夜，抵到新加坡后，琼人的苦难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开始。出洋的琼籍“猪仔”，“有

<sup>111</sup> 朱为潮《琼山县志·卷十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页1。

<sup>112</sup>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页365。

<sup>113</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

<sup>114</sup>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页32。

<sup>115</sup> 王春煜《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

的30%在到达目的地后，被折磨客死他乡”。<sup>116</sup> 债奴“猪仔”过着囚人般的生活，既无人身自由，又无法律保障，在艰苦劳力中煎熬，一切人权被剥夺。

从以上材料我们还可以发现，被卖出国的琼人，毫不例外都经历了极为屈辱的过程，在“猪仔头”的监视下等待雇主挑选购买，身不由己。被雇主派往种植园、各采掘工地劳役，每天经历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劳累不堪，长年累月从事这样繁重艰巨的劳动，身心俱疲。琼人“猪仔”的遭遇可以说是沉重的劳役和野蛮的剥削。苦力们虽按契约签订时间结束后，可以恢复自由身，但有“猪仔”再次掉入陷阱，沉溺于黄赌毒，背负一身债务继续为雇主卖命还债。不少“猪仔”在凶暴地虐待下因伤致死，或不堪虐待或凌辱自尽自杀。

险恶、狡诈的“猪仔头”一般都先假装同情乡民的穷困境遇，又加以渲染新加坡生活富裕，工资高，编造谎言诱使琼人被卖为奴。海口猪仔馆的幕后老板其实是德、法洋行，但负责招揽的客头多为雷州人，被拐骗的琼籍“猪仔”，也有不少是雷州人。民国初年，一位海南人士致函孙中山，述及此事：“……中国沿海一带，所谓出洋营生者实无处不有，然所谓受人卖猪仔绝少，而琼州则除自行经营者外，每船所载，为人卖猪仔者实属多数。于船上受人禁锢，到彼岸受人鞭挞，死于此者不知凡几。乃前者死，后者继，不以为苦反以为安者，曷固因内地谋食艰难”。<sup>117</sup> 而为了防止债奴逃逸，“猪仔”被囚禁在上了铁条的密室中，如果有企图逃逸者，轻则痛打，重则，毒打致死，受尽百般煎熬。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饬令保护出洋华侨，外交部禁绝贩卖猪仔，如下记述：

“兹据英荷侨民曹运郎等，呈请禁止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名节。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仔，陷人涂炭。曩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同胞，穷而无告。今民国既立，亟应拯救，以尊人权，保全国体。又侨民散居各岛，工商自给者，实凡有徒，屡被外人欺凌，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

<sup>116</sup> 林日举、李琼〈外国资本主义侵琼及岛内人民的抗争〉，见《琼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页95-99。

<sup>117</sup> 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琼籍学生叶英峰致孙中山函〉，见孙中山档案资料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页510。

忍侨民向隅，不为援手？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合亟行令仰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之议，实行推行。”<sup>118</sup>

舆论的强烈反对抗议，“猪仔”才逐渐终止。也如密亨利（Macnair）教授所言：“猪仔贸易为中西关系史上最为可耻、最不幸之一幕”。<sup>119</sup>民国二年（1913）琼崖镇守使邓铿到位，“派员将船行（即贩卖猪仔之船）封闭，严惩船主，释出被卖者若干人，琼人称快。”<sup>120</sup>猪仔头被严惩或枪决，海口的猪仔馆便消失，琼籍台湾学者苏云峰的研究中也结论，海南的“猪仔”贸易至1913年结束。<sup>121</sup>

综上，非自由移民通过签苦力贸易契约，或以完全没有尊严“猪仔”形式出洋，但都以债奴打工偿债，艰辛工作，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债奴“猪仔”的境遇更加悲惨，像猪一样被贩卖出洋，超出常人忍受范围的，任人宰割。再使染上黄赌毒，囊空如洗，威逼他们永远做“猪仔”，直至生命结束。这一时期，非自由移民所占跨国迁移的比重不少，以契约债奴或“猪仔”方式出洋从没有停止过，不断前往新加坡。

## （二）自由移民

自由移民大多指自身有能力支付南来新加坡的旅费，这些外出旅费可能是自己家庭拥有的，也可能是向亲朋好友筹借的。故这类自由移民抵达新加坡后，不需要与任何债主有契约限制，他们没有任何义务，可自如行动，按自己的心愿寻找合适的工作和生活。早期移民新加坡的琼人，讲述父辈祖辈的出洋过程，基本都是依靠家中已有亲人在新加坡打拼，再接济其他的亲友而来。

案例一 云昌深，祖籍海南文昌，1934年出生于新加坡。

云昌深回忆父辈在海南家乡农村的生活非常贫穷，父亲家中有四男四女八兄妹，女的用扁担当枕头挤着睡，男的睡祠堂。当时，海南连年混战，生活异常艰

---

<sup>118</sup> 张燮宇、周荣解〈镇守使 邓铿严惩狗腿子阿六〉，见海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海口文史资料》（海口：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97）。

<sup>119</sup>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Paragon Book, 1967);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257。

<sup>120</sup> 王家槐《海南近至》（台北：台湾日报出版，1993），页22—25。

<sup>121</sup> 苏云峰《海南历史》，页199。

难。1920年，依靠裙带关系，三个叔叔、三个姑妈和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乘船抵达新加坡。父亲靠打洋工维持家人生计。<sup>122</sup>

那时的海南侨乡除了务农，也别无更好的工作机会。而那时的新加坡有很多工作机会，他们常常一家人在同一家餐厅做工，或在洋人家里做帮佣，只是分工不同。所以只要有机会，一般传统海南家庭会把几兄妹的责任分配开来，以确保一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来源。

案例二：笔者访问的百岁高龄符文耀的出洋经历，就是由于自己的亲大哥早年已到新加坡打拼，自己追随南下。

为了生计只有16岁的符文耀也出洋投靠大哥。当时，大哥在洋人家里做厨师，通过直系亲属介绍的机会，符文耀也到了洋人家里学做司机。直到新加坡英殖民统治结束，英国人的离开，符文耀和大哥拿出东拼西凑的启动资金开起了咖啡馆。

符文耀说：“琼人经营的餐饮业里，也有一个特殊的雇佣现象，一般雇主和雇佣者不是亲属就是同乡，他们认为这样的雇佣关系既能完成亲属帮带的责任和义务，又让他们的经营更有安全感。他们在一起工作无论是老板和员工，都一起相互协作，形成内部和外部的联系。”<sup>123</sup>

通过符老口述自己过往的出洋经历，可以看到，“自由移民”既让新客有了出洋的渠道，又让新客通过地缘和血缘的观念意识，在异乡更能确认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通常“自由移民”者在国内由自己付费或已有人垫付旅费，然后乘船到达目的地。这些人一般在目的地都有自己的亲戚、同乡、朋友等较亲近的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照顾和帮助。如在他们经营的店铺里当学徒、店员，或经由他们的介绍找到一份工作，由此克服初来乍到之不适。若干年后，他们适应了环境，有了稳定的工作，或自己成了店主后，他们又会把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人接来新加坡，有时还会替他们先垫付旅费，留在自家里慢慢找份工作，等攒够钱再还。如此反复，形成一条“移民链”。从以下这些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琼籍“自由移民”出洋的其中规律：

---

<sup>122</sup> 吴华《新加坡海南人物录》（新加坡：武吉智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出版室，2004）。

<sup>123</sup> 2018年9月20日，符文耀文受访于新加坡。

案例三：琼海县归侨李琼在采访中曾道出：早年，他的父辈祖辈出洋打工，奋力拼搏，终于稍有积蓄站稳了脚跟，就回乡将家属亲戚接带出去，家中的四五十亲属都是靠这样带出洋的。<sup>124</sup>

案例四：祖籍海南文昌文林乡西林村的琼人林豪英、林天涛父子，曾经营名盛一时大商行“泰兴”号，经艰辛打拼留下一番产业，经营着二十多间分店，其中一个联络点在新加坡。林氏不忘乡情，将村中的28户村民中的18户，先后带领出洋。<sup>125</sup>

这些案例，不是亲戚，就是同乡的祖籍关系而帮带出洋，又源源不断形成一条“移民链”。在海南侨乡的家谱中也有记述，如《孟里王氏族谱》中记载，一个家族中的同一辈人，连续出洋移民新加坡的案例：

“廷伟公支南枕村和龙滚区南中二十一世

家尧，侨居新加坡，子二：国兴、国伟

家南，居泰国。

家盛，居泰国。

家锦，居新加坡。子国宾。

家伦，居新加坡。子国文。

家明，居新加坡。

家福，居新加坡。

家发，居新加坡。

家合，居新加坡。

家汉，居新加坡。

家和，居新加坡，子国祥。

家兴，居新加坡。

家民，居泰国。”<sup>126</sup>

<sup>124</sup>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用一口流利的海南话，道出他的海南情缘〉，见《直播海南》，2018年10月27日）。

<sup>125</sup> 陈翰笙《琼侨出国史料调查汇编·第十辑》（海口：海南出版社，1985）。

<sup>126</sup> 王书麒 王振栋《孟里王氏族谱》（出版地不详，1987）。

运用族谱所记载的家族出洋文献史料,我们可发现琼人出洋大多基于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帮带作用,前者先站稳脚跟,不忘亲情乡谊,先后多次通过众多连带关系将亲友带出去,慢慢形成整个家庭都基本出洋的现象。如此反复,“自由移民”也成为琼人出洋的主要形式之一。

总而言之,伴随着新加坡经济活动开发的劳工需求,琼人通过多种出洋形式抵达新加坡。早期琼人不可避免的打上契约“苦力贸易”、“猪仔”债奴的烙印,整个出洋过程令人心酸,苦重劳役遭遇令劳工受尽折磨。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生存机会,有的琼人通过“自由移民”的出洋形式,移民到新加坡。而“自由”移民相比“非自由”移民形式更加具有人性化,更能体现琼人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都具有身份认同和地缘认同,先者琼人给予新客生活上的照顾,工作上的帮助,劳资关系和亲属关系难分难解,从而职业关系形成地缘、血缘性集团。

### 第三节 琼人跨国移民家庭的挑战

“家庭”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依照家玛丽·道格拉斯的定义“将特定的一群人似为微观共同体,他们通过劳动、权力、职责的分工,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同餐共食、共享某些资源等潜规则,凝聚在一起。”<sup>127</sup>但跨国移民家庭中的琼人,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家”,带着为提升家庭美好生活的夙愿,远离故土。又随着琼人跨国移民现象的产生,将传统家庭的分工和职责进行了解构。但跨国移民家庭无论是在侨居国还是祖籍地,都往往无法迎合当地社会秩序,挑战着本应恒定不变的家庭结构,表现出与主流家庭不一样的特征与挑战。对于侨乡家庭而言,因男性缺失,导致非正常家庭存在的实体,家成为家庭成员的一种记忆和精神归宿;对于移入地的“家”,不仅挑战着跨国婚姻的忠贞观,还挑战着维系家庭角色的感知度等。本节以琼人跨国移民作为主线,将其置于“跨国主义”的语境中,从跨国社会空间中,阐释和界定跨国家庭成员中各自的身份,以及所编织的跨国社会网络。

---

<sup>127</sup> 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英文: Dame Mary Douglas, 1921年3月25日——2007年5月16日)。英国人类学家,因其对于人类文化与象征主义的作品而闻名于世。这段引文见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陈达在研究华侨婚姻和侨眷生活的状态时描述，南洋华侨往往是“两头家”制度，纳妾不经妻同意，妻往往只能接受，藉此可防其在外嫖娼伤身丧财之由，发妻留守故土常被疏远，所有家庭事务都依托于她。<sup>128</sup>沈慧芬通过对侨批资料的分析与研究，体现海外迁移对留守女性的生活的深刻影响和挑战，揭示她们在海外迁移过程中的角色地位、跨国婚姻作用、重要地位等。<sup>129</sup>此外，新闻媒体对侨乡留守女性也有颇多关注，以新闻报道的形式描述留守妻子的心理状况、生活情况等资料，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对跨国婚姻的家庭形态进行剖析，从跨国婚姻的特点，能看到跨国婚姻家庭的维系，依赖各种内外因素，这其中就重要包括妻子的牺牲与忍耐。而妻子作为跨国迁移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被受关注，进而建构“跨国家庭”是跨国主义的重要一环。

本节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研究琼人的“家”在新加坡与中国间不断延伸的跨国社会空间，展示移民跨国家庭对主流家庭形式的挑战。同时，跨国移民的行动上具备一种生存和发展策略。琼人跨越疆域行动，却把根留在故土，需要贤妻照顾长辈，维持婚姻功能的策略。又再通过侨汇反哺家用，传播西方文明的先进观念，影响传统落后的侨乡习俗等，构筑跨国网络系统。其中，琼女和琼籍侨眷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走出来，形成独具魅力的个体。其中，琼籍女性无论是留守侨乡照料家庭琐事，还是出洋陪同丈夫打拼，亦或是跨越两地建立多个婚姻家庭，都折射出跨国迁移活动和跨国社会网络产生的真实状况，而这种跨国实践行动和“跨国家庭”已然成为跨国主义的重要环节。本节，运用跨国主义视角，对琼人及其家庭进行微观考察，关注在跨国空间中践行的移民家庭结构、婚姻状况、人口结构等诸方面带来的挑战。从宏观角度剖析，大量琼籍男性出洋打拼，对他们所在家庭的维系、重建、建构的一系列过程。

### （一）琼女出洋挑战

---

<sup>128</sup>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调查丛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页154—163。

<sup>129</sup> 沈慧芬〈构建东南沿海侨乡女性生活史：侨批资料的价值与利用〉，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琼女是跨国移民迁移史的重要参与者，是跨国家庭的重要一部分。但很遗憾的是，十九世纪，新加坡女性移民占很小比例，有的是移民的家属，有的被拐骗卖到青楼，被迫当娼。传统保守的琼籍人士受伦理规范的制约，认为出洋女性都是被迫沦为娼妓，与家族体面攸关。所以，早期琼女禁止出洋，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在陈序经的《珠崖篇》中也讲到：“少年时，曾看到有海南人从家乡把妻女带入新加坡，但一上岸就遭到一些新加坡的海南青年殴打，最后他们不得不乘原船返回。”<sup>130</sup>历史学者兼当时的目击者威汉也曾表示，他从未见过任何有名望的女性同他的丈夫一同来到新加坡。<sup>131</sup>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大量琼籍男性移入新加坡，琼籍女性移民禁入，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显现。譬如，有的琼籍男子，虽在故土已有家室，但出国后仍另组家庭；又或，出国后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回故土娶妻，留下侨眷独自生活。我们也看到，在新加坡人口统计数据中，琼籍移民的人口数量低于闽粤籍。一是因为结婚后的琼人，为了养家糊口出洋打工，但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结构，需要往来于两地、两家间。二是，没有结婚的琼人，在新加坡拼命打工，节衣缩食，积攒了一些积蓄后，便回乡成亲。结婚后，有的男人留在家乡，等钱财挥霍至尽又再次重返新加坡，从头再来，继续打工，周而复始。琼女不能出洋，家庭结构维系的不稳定，都会导致琼籍移民呈双向环流状，这也成为琼人在新加坡属少数方言群的因素之一。

究其琼籍女性为何不能同行出洋，主要出于：一、社会原因。孔孟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琼人严守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必须在家孝敬父母尽之妇道。二、经济原因。当时来新加坡的新客，大部分是迫于生活压力，飘洋过海从事体力劳动工作（俗称“劳工”），他们所赚取的收入又有限，无力携眷同行。琼籍男性出洋的目就是挣钱，养家糊口，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早期并没有在新加坡定居长久生活的打算。三、习俗原因。由于海南当地社会，受男重礼俗、女守闺阁的影响比较重。认为在外抛头露面的女性都是不良女性，从而影响了琼籍女性不能随男性一同出洋谋生。四、心理原因。“不准女人出洋”，成为出洋琼

---

<sup>130</sup> 陈序经《珠崖篇》（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sup>131</sup> J. D. Vaugha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79).

人间不成文的口头约定。因为一群单身汉中，难于容忍个别人携眷同行，就算心里有这想法的琼人，亦不敢犯众怒。由于海南处于较为封闭的社会，受封建伦理和族规民约的影响，所以琼籍女性移民新加坡相对曲折，也更晚于闽粤籍女性。

132

当面对这一禁令时，有没有琼女敢于挑战呢？1904年前后，文昌人陈某之妻吴氏为了和丈夫团聚，是第一个有胆识挑战出洋的女性。她首先到香港，学会一点粤语，就装扮为广东妇女，由香港辗转到新加坡。为避免出现问题，先秘密居藏在星洲山村，后又在小坡大马路一楼房的楼顶，与粤籍妇女混住。不久，由于两妇女口角之争，又恰逢彼时琼州会馆开会，粤籍妇女跑到开会现场将吴氏来新加坡的情形暴露告知大众，以此报复。此事一经爆发，在琼人中引起一场风波，将吴氏捆绑于石柱旁，拳足、唾骂齐来，吴氏奄奄一息。最后，华民政务司出面干涉，解救了吴氏，此事才平息。<sup>133</sup>

此后，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开始关注和呼吁这一问题，情况慢慢有所改观，女性出洋取得广泛支持与拥护。随后，移居出洋的琼籍女性开始增多，不断有人效仿南下，与亲人团聚或嫁到新加坡。随着琼女这群移居人数的增加，琼籍男性也更有心扎根当地。我们看到新加坡的琼籍人数不断增长，据统计，在1881年8319人，1911年增至10504人，1931年发展到19896人，1947年上升为52000人。<sup>134</sup>可见，自解除妇女出洋禁约，琼人在新加坡人数增多。笔者从海南族谱中发现，《王氏族谱》记述配偶追随丈夫前往南洋，直至生命结束：

“德隆次子家焱，字光日，往南洋卒。娶符氏，往南洋卒，两招葬岭仔山夫妻同穴。

隆坤四子家源，字成海，往南洋卒。娶符氏，往南洋卒，男三：邦国（殤）、汉国、勇国。”<sup>135</sup>

女性移民虽有所改观，但比重依旧偏少。观其1931年，新加坡琼籍人口男女两性的比例为1000:151；到1947年，新加坡人口统计结果，琼人男女比例增

<sup>132</sup> 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琼侨》。

<sup>133</sup> 张朔人〈海南女性出洋问题研究〉，见海南文化研究中心编辑《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页226。

<sup>134</sup> 张朔人《海南女性出洋》，页226。

<sup>135</sup>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

加到 1000:554,<sup>136</sup>琼籍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依旧呈现不平衡的状态。不可避免,对夫妻的忠贞观、家庭的建构都无疑带来挑战。总之,琼人因受所谓“乡规”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等宗法思想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琼女禁止出洋。而出洋琼籍的男性因禁忌受限,迫使返乡,往返于新加坡和海南侨乡之间,往来频繁,形成移民的双向频繁对流的关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经过西方文明先进思想的洗礼,琼女开始从传统社会的阴影中走出,从不许出洋到出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给琼人社群产生极大影响。

## (二) 挑战妻子角色——“留守新娘”

早年,在海南侨乡,丈夫出洋谋生计的家庭不胜枚举,“留守新娘”也成为侨乡家庭普遍存在的现象。据 1953 年文昌县华侨婚姻的调查,在文昌,已有丈夫在国外的侨眷约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譬如,文昌山桥村,全村有 13 户已结婚的侨眷,其中丈夫出洋的有 10 户,在家的只有 3 户。<sup>137</sup>海南文昌,几乎有出洋人群的村庄,都有数目不等的“留守新娘”。妻子留在家乡,赡养长辈,抚育孩子,操持家务,“男人去番讨钱银,女人在家伺爹娘。”<sup>138</sup>留守侨眷在家操持家务,练就了里里外外一把手,以及遇事独当一面的生活能力,但其心酸、无助、压抑可想而知。在《海南文氏族谱》中记载:

“世学次子檀士,生咸丰壬子十一月十九日寅时,往番,娶林氏,生癸丑十月初六卯时。夫出洋,守节食苦,至老不渝,以胞兄桂士三男为嗣。”<sup>139</sup>

含辛茹苦养大子女,独自撑起夫家,形单影只,守节不移。当丈夫长期不在身边的情况下,“留守新娘”的行为通常会受乡土各方的约束,易守住底线。但由于夫妻长期分离,丈夫在侨居国有“第三者”,或另组家庭的情况却不少。也有琼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再回故乡,留下妻子独守空房。“去时容易回时

---

<sup>136</sup> 陈序传〈星加坡琼州人〉,见《新加坡琼州会馆琼州天后宫大厦落成纪念特刊》,1963年,页85。

<sup>137</sup> 林明仁《文昌华侨文化》(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

<sup>138</sup> 王春煜〈文昌好〉,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23。

<sup>139</sup>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

难；南洋多有琼人鬼，留下妻子独守房。”<sup>140</sup>在琼剧《下南洋》中，也演绎了“留守新娘”苦等出洋丈夫归来，左盼右盼地等待却一直等不到丈夫归来的场景，最后“琼娘”只好只身前往南洋寻夫。最后“琼娘”只好只身前往南洋寻夫。面对长期远距离的跨国地理空间，以致于夫妻感情破碎，“留守新娘”以及家中老人小孩，都将承受巨大的生活和心理挑战。笔者在海南侨乡，采访过不少跨国家庭的悲凉故事，以下将以个案进行剖析“留守新娘”所面临的挑战。

案例：何春梅现年 97 岁，生育了三个子女，丈夫出洋新加坡。以下是何春梅和子女回忆家庭史。

1948 年春天，为了生计，何春梅的丈夫只身一人到新加坡打拼，自己则一人照顾一家人。家庭虽家徒四壁，并没有埋怨，辛勤持家，操持一生，只为照顾好家庭让远在新加坡打拼的丈夫放心。可是，丈夫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回忆起当年独自拉扯一大家子的艰辛过程，何春梅忍不住几次擦拭眼角泪水。

何春梅的女儿林香春回忆道：母亲既做母亲又做父亲。那时候，很羡慕别人的家庭，有爸爸照顾，别人的爸爸都去捕鱼，我母亲又不懂抓，那时候酱油都没有，我们就只能吃虾酱。一碗饭分成三份，我和弟弟各一份，另外三分之一做成饭团给奶奶吃。为了让我和弟弟读书，母亲卖个鸡，养头猪卖，就够我们三个人一年的学费。

何春梅儿子回忆母亲独自拉扯三兄妹长大的日子，则泣不成声。感叹母亲含辛茹苦，独自一人照顾一家人太不容易了。虽没有父爱，但母亲填补代替了原本应来自父亲的陪伴和缺失，母亲凭一人之力撑起了整个家。<sup>141</sup>

何春梅从“留守新娘”变成“留守阿婆”。这期间，她不得不扮演多种角色，既要担起母亲和父亲的双重责任，又要尽到儿媳和儿子的照养义务。但这本应是夫妻的共同分担，却成独自承担，没有依靠和解忧的对象，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然而，留守妻子并不会因家庭角色的增加，而提高家庭地位，她们通常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每当家中有大事，决策权还是由国外的丈夫来决定。譬如，家中盖房或投资事宜都需事先经过国外丈夫的同意决定，由于女性在经济上缺

---

<sup>140</sup> 王春煜〈去时容易回时难〉，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 130。

<sup>141</sup>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母子相依为伴 70 年，如今五世同堂感恩母爱如歌〉，见《直播海南》，2018 年 10 月 26 日。

乏主导地位，使之“留守新娘”属于从属的角色。

为了谋生琼籍男性漂泊异乡，海南民间流传的歌调里，也烙下了送郎去番难舍难分的情景：

“侬送郎送到后山，夫妻离别泪连连；  
欲问侬流泪多少，眼汁滴路滑难行。  
送郎送到青草坡，收捻草尾记心上；  
草如无心草也死，人若反良命不长。  
送郎送到码头分，眼看船去心更闷；  
郎你去番欠忆侬，常回书信问冷暖。”<sup>142</sup>

歌谣里唱出了夫妻间不舍离别之情，有的琼籍家庭，甚至新婚刚过，丈夫就离家出洋。在海南侨乡流传了不少描述丈夫下南洋夫妻分居的民谣：

“送郎送到码头分，郎你去番侬心闷。眼汁滴到土落窟，日头看路夜看船。送夫送到万泉河，河水倒映影双双；夫妻都如鱼和水，鱼水分离几凄凉……鸡啼一阵又一阵，夫妻二人将离分；卧在床上不舍起，双双枕头添泪痕。”<sup>143</sup>

从海南侨乡当地，大量流传的民谣中我们都能看见，跨国家庭和“留守新娘”并非个例，成为海南侨乡社会的一大现象。海南歌谣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写的是“留守家庭”的经历，描述了跨国侨乡家庭的普遍现象，句句戳心：

“八月十五月光光，抬头望月赤心乱。  
当初郎君去番日，十八相送泪垂垂；  
临行种椰相订约，椰树结果郎酒归。  
月缺月圆今又光，树大携子倚树望；  
望穿秋水心愈乱，不见郎君回家门。  
去年椰熟迎新妇，今年孙儿吃椰水；  
年年盼郎心切切，盼到何时郎才归？”<sup>144</sup>

可见，当一般家庭团聚时，“留守新娘”只能独自望月，心中的烦闷，当然就容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与一般家庭相比，“留守新娘”会常有无助、焦虑的

<sup>142</sup> 王春煜〈送郎去番〉，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27。

<sup>143</sup> 唐若玲《东南亚琼属》，页286-290。

<sup>144</sup> 王春煜〈盼郎归〉，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32。

情绪，缺乏安全感。譬如，“夫郎离家南洋去，一去十年无回音。坐在石头望夫回，泪流成河侵石浮。”<sup>145</sup>可见，哭泣、无助成了她们的常态，空虚感和孤独体现明显，常年处于压抑的情绪之中，不免令人扼腕长叹。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留守侨眷对陌生人的防范心理十分强，这与丈夫、男性的长期缺失，没有安全感有很大影响。一位“留守阿婆”说，男人出洋过海谋生后，三五年能回乡是幸运者，一别数十年不见在侨乡家庭中屡见不鲜，导致很多留守家中妇女的悲剧。不得不承认，“留守妻子”在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后，独自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挑战，无疑给他们带来很多无人知晓的辛酸。

琼人跨国移民出于整体家庭的利益，牺牲一般家庭的正常结构，出洋奋斗。但跨国空间隔离的家庭形式，在妻子的角色，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都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本节，笔者提供作为媒体人曾经采访报道留守侨乡妇女的珍贵资料。从中看到，有些年近百岁的“留守阿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未能与丈夫团聚。很多海南侨乡女性成为“留守新娘”独自担负照顾家庭，承担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责任。加之，透过侨乡流传的民谣，切实感受到“留守妻子”独守空房的煎熬，以及她们心中的那份眷恋和难忍，这些挑战都是跨国移民家庭独有的生活风貌。

### （三）维系跨国家庭婚姻的挑战

从上，我们看到因海南男外女内、男尊女卑伦理思想的浸透，海南社会又受所谓“乡规”的制约，琼女下南洋是地方宗族反对的行为。再因经济因素的制约，男性大多独自在新加坡打拼，减少开支。但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不能时常返回家乡，对婚姻忠贞度的挑战不得不引起重视。这些跨国婚姻中，婚姻基础不牢，长期分离，很容易耐不住寂寞，出现“第三者”。事实证明，随着环境的变迁，经济状况的改善，或生活需要，不少琼籍男性确实变心，有另组家庭的情况；

“家书遥寄星洲港，陈秀金是你糟糠。

自小槟榔定良缘，良辰吉日拜过堂。

风雨同舟共甘苦，夫唱妻随甜心间。

---

<sup>145</sup> 王春煜〈泪流成河望夫回〉，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33。

夫你自小家清贫，欠人欠债逃去番。  
安说返里还清债，谁料一去不复返。  
夫喂夫，做人都要有本良，十指都要按襟胸。  
夫喂夫，忆得当初入洞房，玉言嘱别桩到桩，  
嘱我在家守鸾房，勤劳耕作莫生端。  
夫喂夫，我与三岁仔孤寒，时时恹气在心间。  
愁满怀，倚门叹，早看东排出日红，晚望日头落西方。  
到时顿，捧起饭碗心味寒，眼汗滚滚出眼眶。  
到夜间，翻来覆去睡不甜，只听谯楼更鼓响，  
更深夜静更凄凉。你欠知，鸳鸯床上落孤单，有谁问我冷和寒？  
夫喂夫，屈你七尺男子汉，几十年来在世间，  
忆起夫你的形影，度日如年难上难。  
夫喂夫，安说红杏出墙把春闹，怕只怕，名声不好千古传。  
夫喂夫，是嫌我人丑和笨，还是你已有新欢？  
夫喂夫，万物逢春情相同，蜂恋花来花恋蜂，  
妻子孤单守空房，田里稻熟欲过冬。  
蓝田不把玉米种，日后香炉谁人捧，  
不要三纲和五常，何必做人在世间？  
夫喂夫，你也看到南洋人，相伴相随如鸳鸯。  
可你却把糟糠弃，不愿回乡心反良。”<sup>146</sup>

这是一位留守娘从结婚，到丈夫去番变心后的平时叙说。深沉的情思，望夫回心转意，能返乡团聚。可见，跨国婚姻中感情关系十分脆弱，给糟糠妻带来无尽的失落感。笔者还发现，在海南文昌南村，存在大量两地跨国家庭。2007年，全村118户，占全村半数左右的家庭存在祖籍地与侨居国各有妻子的情况。这一现象在族谱中，也有相应引证，如《孟里王氏族谱》中所述：

“国荣长子诗灿，字巨昌，为人志大量宽，热心公益事业，曾多次捐款帮助家乡教育事业，现侨居新加坡，娶符氏，又娶黄氏。“泰兼次子书辉，字善聊，

<sup>146</sup> 王春煜〈家书遥寄星洲港〉，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34。

侨居南洋。娶李芙蓉，娶何艳英，娶叶启英，生男振超（李氏生），振麟，振兴（俱伍氏生）、振旺、振煜（俱伍氏生）、振贤（叶氏生）。”<sup>147</sup>

在上述引文中，从“娶”、“又娶”字眼中，琼人随着财富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了正室，又再娶侧室。展现出那一时期，多妻婚姻制度的自身客观规律，并具有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看到不少琼人都出现在故土组织一个家庭，在侨居国组织另一个家庭。在笔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在清明时节，正室和侧室会一起出现在祭祖活动的现场。在弗里德曼的《新加坡华人家庭与婚姻》中讨论了“两头家”的家庭组织形式，他指出，华人家庭显著特征是一妻多妾，或族际通婚。这种现象在琼籍尤甚于其他方言群，不少琼籍男性游走于海南与新加坡两个家庭间的婚姻关系。<sup>148</sup>足见，展现出了两种婚姻制度本质的冲突与撞机，由此引发其社会现象问题。

对于出现以上观念和婚姻关系结构的变化，笔者进行分析总结，产生这样现象的根源主要是：在琼人传统观念中，故乡娶妻生子，香火才能得以延续，琼人有“叶落归根”的心理，在故乡建立家庭把根留住；二是由于侨乡“孝”为先理念的儒家文化，需要故乡有贤妻照顾长辈父母；三是，琼人在侨居国面临诸多生活和工作需要，在当地成家有助于促进家庭和事业的发展；四是，居住国环境决定，早期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需要积累一定的钱财才能娶妻生子。然而，随着琼人慢慢扎根于当地生活，境况有所改善，思想文化也有所浸透，长期分隔两地的婚姻已无法满足现实生活所需。因此，有条件、有需求的琼籍人士在跨国两地各组建家庭，两地家庭的婚姻关系，各尽其职。

海南四周环海，是中国本部与南洋诸国间的中途站，沿海港口多，加之不少海南人拥有造船和航海技术，这一功能也加速了海南人的流动，都为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成有利因素。再到带来了更舒适安全的航海技术，轮船代替帆船，海上交通工具的改善，更增加华工出洋的意向。而先移民的海南人在新加坡站稳脚跟后，给家乡汇回的侨汇，使其处于危机或贫穷中的海南人受到极大鼓舞，对南洋充满机会与诱惑。海南人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不畏艰险。从乘坐帆船，再到轮船，远涉重洋，离乡背井，闯天下、谋生计。由此，琼人的跨国移民不断产生。

---

<sup>147</sup>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

<sup>148</sup> 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新加坡华人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985)。

琼人大量移植新加坡，除了自我诉求外，还基于新加坡殖民主义者开发建设的劳工需要。所以，琼人先贤的出洋方式，早期很多受“招工馆”（猪仔馆）客头之哄骗出洋，而沦为“猪仔”，其境遇令人唏嘘。可以说，这类琼籍移民，在离开故土前他们受尽歧视和阻挠，出洋时又历尽风波和坎坷。另一类琼籍移民，受亲戚朋友之推介照顾，通过血缘、宗亲等各种连带关系，跟随亲戚、乡里出洋谋生。但无论是选择哪一种出洋形式，琼人凭借着克俭克勤的传统精神，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先移民成就的引诱与鼓励，前人开路，后人跟进，亲戚与同乡互相牵引照顾，故新加坡往者复多，形成一条移民链。

由琼人跨国移民打造出联结两国、两地、两家间的联系，是跨国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家庭为主体研究单位，探讨面对外部环境，跨国家庭角色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做出的应对和互动。其中，妻子是受到影响和挑战较明显的群体，她们的压力和挑战主要来自于，家庭分割迫使他们需承担的各种担当。而维系跨国家庭最重要的资源是经济。所以，琼人游走于跨国两地间，也是为了挣钱应对生活和经济问题的生存策略。许多琼人出洋宁愿把自己在新加坡的奋斗岁月当作一种旅居，而不是定居，更希望赚足钱很快回到故里。所以，在跨国婚姻关系，更多是琼籍男性独自在外打拼，“留守新娘”在家独当一面。但随着打拼发迹，不少已有元配发妻的琼人，又在新加坡与它籍女性另组家庭，便娶第二个或更多妻妾。由于这种跨国婚姻的特殊结构模式，使琼人在新加坡和海南侨乡的家庭中，呈现与一般家庭不太一样的风貌。琼人游走于两地和两个家庭，偶尔回乡短暂停留，尽资金赡养义务。而侨眷作为家庭成员，被卷入跨国社会空间中，为了维系家庭独自应对不少挑战，并帮助跨国空间的建立。从中看到，家庭各成员在跨国空间中各自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应对挑战家庭跨越疆域而存在。由此总结，跨国家庭不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有关社会认知和共识的空间概念。琼人跨国移民的产生，虽然地理上家人分离，但家并没有完全解体。这其中存在着家的权衡与共识，在共识中使家继续存留在一个社会空间里。

### 第三章 琼人身份认同的嬗变 —— 跨国主义视角分析

本章借用跨国主义视角观察、分析有关琼人身份认同的诸问题，因移民身份认同源于对历史记忆的接触、认知和学习，受原身文化的影响，同与生俱来的一些故土因素紧密联系，又在动态的跨国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重塑、嬗变的动态互动过程。“跨国主义”正是突出强调，移民跨越地理边界，与祖籍地有关事物的一种复杂有机关联。我们看到，当琼人在居住国遭遇压制、社会地位缺失时，对于现居地便难以建立起在原祖籍地一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存在价值感；当遭遇它籍、它族的排斥和歧视时，便缺失社会竞争的机会，继而在居住国导向边缘的地位。而通过跨境域的族群联系，能给予移民一种虽不在家乡，但并没有离开同胞，因此在居住地同获地位价值，心理上也得到相对的满足。不可否认，这一过程潜移默化增强了移民对“根”、“祖先”的族群认同，巩固了与宗亲族群的紧密联系。所以，移民大多在居住国成立社团组织，整合同乡资源，帮新客工作引荐，支持乡友改善经济状况，族群整体共同抵御它族排斥等。<sup>149</sup>显然，移民又通过“乡谊”、“乡情”为纽带，跨境域增强同乡网络联结度，降低了移民成本，又提升了对宗乡文化和地缘的认同。其中，“宗乡文化”一方面包括方言、宗族观念、节庆礼俗、祖先信仰等传统乡土文化内容，移民跨区域传承、活动与宗乡有关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宗乡文化”是移民可利用的海外资源，在居住国构建属于自己的乡土文化形态，组成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这些都属跨国网络（跨国场域）带来的效应范畴，而跨国网络（社会场域）正是分析移民跨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

在以往跨国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众多学者将关注焦点于跨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跨国活动和连结的表面现象，对移民深层次的身份认同关注度远远不足。其实，阐释政治环境变化中，移民跨国社会情境下的身份认同，可进一步厘清族群认同、地缘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早期迁移的琼籍移民，因面临语言不通，封闭的生活环境，加之长期根植于传统祖籍地族群认同中，大多琼人有“叶落归根”的心态，他们认为在侨居国只是暂时性居

---

<sup>149</sup> David Fitzgerald, "Locating the National and Local in 'Transnationalism'," *UCLA Second Annu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Race, Ethnicity and Immigration*, 2002.

住，而主要目的是在外打工挣钱。但新加坡的经济生活环境远比海南岛优越，移民慢慢转为“择良木而栖之”的务实心态，琼人也变为“落地生根”，便消解原祖籍的身份认同，转为对华人或新加坡人身份的认同。从这一动态的身份认同过程的嬗变，还有助于观察来自新加坡社会的族群，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建构、经济互动和社会各组织间的关系；又如何通过跨国联系反作用居住国和祖籍地的社会发展，并重新定位移民在其中的角色地位。还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祖籍地政府通过情感的“呼唤”，或经济优惠政策、政治动员等各种手段，争夺本地移民的认同偏向，似乎有夸大认同之嫌。而通过跨国主义视角研究移民的身份问题，可去中心化，关注其中的建构性、流动性和多重性。总之，以跨国主义视角审查琼人身份认同嬗变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客观的认识这一跨国群体。

身份具有客观因素，而认同源于主观。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知行为和心理反应，是一种主观客观化的过程。如果没有他人的存在，也很难真正客观认识“自我”。所以，“自我认识，终归也是一种建构的结果”。<sup>150</sup>从而，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重的，有时外部世界的态度，会影响自我认同；有时源于文化与文化的碰撞，左右身份认同的选择；又或，所处境遇的当地政策，祖籍地和居住国的占位，都有可能影响身份认同的嬗变。所以，王赓武教授便强调，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摇摆，认同与否，或双向认同，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需分别看待。<sup>151</sup>正因为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其所处的境遇密切相关，以一种心理和情感联系作为根基，并依据经济、社会地位层级进行划分，社会化制度过程将影响琼人的身份认同。这使我们看到，有的华人趋于所在方言群和祖籍地的认同，也有的是对华人族群或所在国政治的认同，甚至是互为关联或冲突的，这都是经历了一定历史和社会制度导致的过程。新加坡学者崔贵强就指出“个体或群体等（行为主体）与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体，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物等）之间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结果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对象（客体）的一部分而行动，呈现出对内求同，对外识别的族群认同特点。”<sup>152</sup>所以，可见，移民离开自己归

<sup>150</sup> 此话来源于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对“认同”的阐释，他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指出，“认同”由人们的意义与经验来源而建构。

<sup>151</sup> 刘权〈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综观〉，见《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16辑。

<sup>152</sup>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若干考察〉，见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

属的文化语境，抵达一个新的陌生环境，会习惯性地构建熟悉的社会空间，并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而物质环境和文化对这种熟悉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心理感知和事物认知，都是建构自身身份归属，对所属文化、习俗等认同与否的重要情感因素。概言之，移民的族群认同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族群认同的形成和变迁，是受移民本族情结、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历史记忆、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自身利益需求等因素决定。

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族群内形成的共同文化传统塑造着共同的个性、心理追求、精神结构和行为模式。而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价值和历史”等元素，也加深彼此更具有认同心理，凝聚起族群间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如芝加哥学派萧振鹏(Paul C.P. Siu)的论文用‘旅居者’阐释，华人往往坚持自己族裔文化的一类人，倾向于孤立居住，拒绝同居住地社会同化。他们仅对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事物有兴趣，不认为自己是所在国居民，不全身心参与侨居地的社区生活。<sup>153</sup>所以，早期抵达新加坡的琼人，聚族而居，聚集在同一个区域海南街一带，依照故土习俗习惯生活。加之，早期琼人多数抱着打工挣钱回乡养家的心态，对家乡有强烈依恋，使得积极维持与同乡的联系，这也成为族群认同的基础。移民通过对故土的历史认知，在侨居地建立起以方言群为单位的、工作领域、社团组织等，继续保持对故土的想象，对历史传统的强烈记忆，使他们在新加坡生存更具力量，这又是琼人对祖籍地地缘认同的变现。但在新居住环境，移民与当地文化发生一定关系后，原有的文化体系与他者文化必然产生碰撞，二者间的冲突引发移民寻求一种新地理认同。庄国土在研究二战以后东南亚华人的认同趋向时表述，华人从认同故土转为认同于居住地，从认同方言族群到认同华人族群，融合于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sup>154</sup>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在历史的重构、选择或遗忘中，导致族群认同不断变迁，族群认同的边缘随时空记忆的变化不断移动<sup>155</sup>。王明珂、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也有相似的观点。我们也看到，新加坡独立后，新政府对

---

<sup>153</sup> Paul C.P. Siu "The Sojourn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1): 34-44. doi:10.1086/221070.

<sup>154</sup> 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以下简称《略论东南亚华族认同》)，见《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sup>155</sup> 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206。

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维系，使移民参政意识强化，以此促进华人对新加坡国家认同感的重要维度。

值得注意，与其他方言群相比，有关琼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因此笔者重新审视这一被忽视的群体和领域。本章，从新加坡政治独立前后时期划分，纵向考察影响琼人身份发生变化的因素，横向探讨琼人族群的内部关系，以及与其他方言群、种族间的互动与交往。从中还原新加坡帮群间密切联系、相互博弈的生活图景，又从琼人跨国移民的历程，解释其身份认同的变迁。笔者认为，这对重新评估琼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新加坡社会发展形成因素，都至关重要。本章挖掘文献资料，通过早期报刊、口述录音、访谈等，还原人们了解甚少的琼籍社群。探讨内、外部有关琼籍的各种观点和历史事件，剖析早期琼籍社团组织对移民发挥的作用，梳理和检视琼人社群形成的特有“小生境”，并以“通道”连接输入的过程，从中看到琼人在新加坡生存和适应境况，从而对跨国网络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本章得出，身份认同与其琼人的生存境遇密切关联，身份认同的嬗变是历史事件和社会作用的结果，身份认同具有复杂、立体、层级性。

## 第一节 琼人的族群认同

对于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有工具论、原生论、民族想象论、族群边界论、符号论等等理论。在这些层出不穷的理论中，族群的记忆和利益，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以及社会化，都是影响族群认同形成与嬗变的关键因素。新加坡独立前，琼人被冠以“琼”的身份和群体特征。回看早期新加坡社会，很多重要行业领域被闽粤籍抢先占领，晚来者琼人备受排斥和压制，主流社会普遍认为琼人没技能、没财富、没文化，他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这在第一代琼人移民中尤为突显。这也是为什么在东南亚早期就形成了“种族分工”<sup>156</sup>，西方殖民者与当地人大多是政治权利者，移民大多是创业者，后来又成为官僚企业家。

---

<sup>156</sup> 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1954 年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教、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教授，1965 年起任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90 年起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aipei: SMC Publishing, 1995).

在移民社会，还形成以方言群为单位的一职业门类，以及“帮群经济”区分。然而，特定的职业领域加强了方言群间的差异性，形成族群标签，也巩固了本族群的身份认同，为帮群经济赢得更多机会。譬如，琼人通过在欧洲人家里做佣人，学会了煮咖啡和烹饪西餐，拥有技术后的琼人，在新加坡独立后，在当地开设了百分之九十的西餐厅。他们的店铺大多只雇佣乡友工人，因为同乡雇员不仅能在经营上带来安全感，他们也承担了引入乡友出洋改善生活的帮带责任。以此打破了地域限制，建立起跨国资源经济的联系，以一种多维度的新模式来解决生存生活问题。如上，当方言群处于社会边际、边缘地位时，族群的心理出现失落，促使他们在情感上皈依到原族群的大家庭中。为了改变弱小方言群的命运，整合族群内部的旧交往体系，形成本方言群特定的职业领域，不仅赢得生存之机，还加深巩固了族群认同的力度。

同时，文化也决定着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也影响文化实践与表述。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身份理论中就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意识受原生文化的影响，过去的历史是行为意识的源头。譬如‘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为何说着相同的方言’等。不可否认，在文化作用下形成的身份认同，能够给旅居异域的人们带来一定的归属感和同盟感。又在与“他者”间建立的所缺、所非、所异的关系中，具有连续性的认同。”<sup>157</sup>所以琼人在新加坡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小生境”，共同居住于“海南街”，成立本籍社团组织，从事相似的行业领域，保持着对方言族群的认同。并在构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被纳入或排除在外的群体，合力维护族群利益，共同抵御其他方言群的对抗。至此，不可否认相同的原生文化认同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人都是—种无意识、本能的内在需求。努力确认身份获得安全感，更设法维护、巩固和加强身份，后者对于满足心理上的安全感至关重要。”<sup>158</sup>概言之，跨国移民者联结原籍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同盟关系，对在异域的生存者起到了保护作用，也是移民被生存环境倒逼形成的一种现象。当然，认同“决不是永恒固定在某一

---

<sup>157</sup>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16, no. 2(1996): 4.

<sup>158</sup> 威廉·布鲁姆的观点，转引自乐黛云《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本质化的过去，而是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sup>159</sup>。所以新加坡独立后，琼人的族群认同，开始转向对华人族群整体的认同，或超越华人族群嬗变为对新加坡人的认同。这一嬗变是出于“华人在外国的民族性往往源自文化认同，而且是主观决定的。除了根据接纳国的法律定义和要求公布的官方人口统计外，个人认同唯一可靠的检验是某人自我认同为华人，而且他人承认他是华人。前者集中在心理方面，而后者基本上侧重于生理特征。”<sup>160</sup>从这一认同本源看，也是跨国主义行为所导致的认同归属制度性。

### （一）新加坡独立前（1965年前）

明代海南先人王弘海、政治家丘濬虽深知向海外发展的道理，但海南人对移民却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1824年第一次新加坡人口普查中，新加坡人口10683人，华人3317人。1881年正式统计各方言群人数，华人86766人，琼人为319人，跟闽粤籍移居者相比，琼人属于迟来的“少数方言群”<sup>161</sup>。并且，这一低比例在过去上百年保持相对稳定。从1947年至1957年十年间的新加坡方言群分布情况也可观，如下图：

新加坡华人主要方言群人口增长率（1947-1957）

省 份	方言群	1947（人数）	1957（人数）	增长率
福建	闽南	289109	442707	53.1
	福州	9461	16828	77.9
	兴化	7445	8757	17.6
	福清	6323	7614	20.4
广东	潮州	157186	245190	56.0
	广府	157598	205773	30.6
	客家	39988	73072	82.7
海南	海南	52117	78081	49.8
	其他	9565	1248	28.4

<sup>159</sup>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见罗钢《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sup>160</sup> 王赓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58）。

<sup>161</sup> Claire Chiang, "The Haina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Academic Exercis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7), 16.

(资料来源: Report of Singapore Population Census 1957, cited from Cheah Kam Kooi,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ingapore, Research Pap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vember 1965.)

从上表的十年间看,各方言群的人口比例变化不大,琼人占华人人口的7.2%。因他们来自中国的海南岛(也叫琼州、琼崖),所以他们被归属于琼籍方言区。依据所说方言的不同,华人内部有区分于对各属方言群的认同。麦留芳(Mak Lau Fong)<sup>162</sup>曾考察中国人的语言结构,提出以地缘关系的“方言群认同”。认为移民对一种语言、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依恋,使人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与自己确认的群体相结合,使之联系在一起。人类的天性也驱使人们在异国他乡,寻找与自己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的人进行交往,方言是族群认同的关键。<sup>163</sup>方言社群也可称作帮,大多由地缘性构成,他们依赖地缘网络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关系,因而也可称作“帮群经济”。我们看到,在新加坡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各帮群间为了谋取更好的生存,投入到新加坡的各行各业,建立起属于本方言群擅长的行业领域,并呈现出方言群行业专门化和集中性特征。其中,闽方言群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工业等;粤方言群主要从事制造业、餐饮业等;客家人和广府人多为工匠。详细方言群行业分布,如下图:

各方言社群的行业

省份	州府	方言/籍贯	行业	帮派
中国东、北、中部		普通话	家具业、洗衣业、裁缝业、出版业、皮质业、古董业、戏院	三江
福建	福州	福州	咖啡业、理发业	福建
		福清	交通业	
	兴化	兴化		
	永春	闽南	橡胶业、种植加工	

<sup>162</sup> 麦留芳(Mak Lau Fong)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社会学),一生从事新马华人社群的研究,又勤于著述,对星马华人秘密社会,星马华人社会组织有深入研究,已出版的专著有三十多种。

<sup>163</sup> Mak Lau-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187.

	龙岩		业、进出口业、航运业、银行业、金融业、五金业、茶业、建筑业、地产业、中药业		
	泉州				
	漳州				
	汀州				
广东	嘉应州	客家	鞋业（嘉应人）、当业、中药业、布业、珠宝业	梅县	
				惠州	土埔
				潮州	潮州
	潮州	农业（米、胡椒）、布业、批发与零售（蔬果、鱼肉）			
	广州	广府	家具业、酱油业、钟表业、中药业、洗衣业、裁缝业、珠宝业、餐馆业	广东	
	肇庆				
海南	琼州	海南	咖啡店业	海南	

(资料来源: 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从上表中可见,在新加坡,闽、粤方言群的从业范围更加多元化。除了与上述分析关于抵达新加坡先后顺序和人数影响外,也由于行业固定于某一方言群,就出现被垄断和排斥它籍的特征。譬如闽人有生意头脑,擅长经商,所以从事行业领域广泛,控制着当地的金融、橡胶和进出口等行业。从1929年新加坡统计的琼人职业情况可看:

1929年星洲琼侨工人职业分布概况

职业别	店伙工	海员工	洋务工	树胶、黄梨厂工	机器工	小贩工	住户工	艇业工	割胶工	裁缝工	理发及其他工
百分比	42	14	12	9	5	4.5	2.8	2.5	2.2	1.2	4.8

(资料来源:云愉民《新加坡琼侨概况》(以下简称《琼侨概况》),海口:海南书局,1931年)

从上表的数据来看，琼人早期大多从事劳工，加上以方言群为单位的经济团体，进而巩固并强化了自身和外界对该的族群认同。可见方言和籍贯除了是华人区分的标志外，所属籍贯也影响着移民的职业取向与认同。归根于此，在早期的帮权生存结构中，琼人长期处于当地边缘性。

## (1) 历史

十九世纪初期，在英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琼人作为苦力劳工移居当地。许多远离故土的琼人，孑然一身、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初来乍到，衣食住行、立足谋生都没有途径。所以，最初琼人根本无力对职业、居住环境抱有太多的期望。唯希望能在异域生存下去，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从《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史略》中可观：

“考我琼同乡南来侨居本埠，从一八一九年（根据地契文件记载——原注），距今一百七十年前。其时当地乃一未僻之渔村，人烟稀少，同乡居此者亦不多，且散居乡村隅角，而无组织。至一八五七年间，我乡先贤韩亚二（旺彝）、王志德等，邀集当地同乡，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小坡马拉街六号相连之屋宇，一连三间（当时系用葡币购买），其中一间为政府征用辟为后巷，以其所存两间为同乡聚会及寄宿之所。”<sup>164</sup>

琼人居住在一起既可以相互照料，又可以节约租房成本，甚至可以积攒更多的工钱以便寄回家乡。加之，南来新加坡的琼人大多是单身汉，所以同乡会（前身为“公司楼”）便成为了琼人的栖身之所，亦称为“楼仔”，据粗略统计大约有一百多间房间。而族群认同的决定因素形成于社会化过程，居所就是社会化经历的重要场所，很大程度上对认同机制产生影响。琼人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聚族而居，并将社群居住地段称之为“海南街”。史学作者吴华的著作中记述：

“海南人士在开埠以后才来，一看大坡已为闽粤潮三帮所占，已无插足之地，只好在小坡打天下，他们因为是为英人工作，于是便在美芝律附近居住下来，他

---

<sup>164</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以下简称《琼州会馆一百三十五纪念》），（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页101-103。

们最先的居住地为密驼律，因此俗称海南街，后来海南人愈来愈多，向旁扩展，于是又有海南二街海南三街出来。”<sup>165</sup>

因此琼人虽已离开了故土，但生活圈子依旧在本族群。族群内部间的互助，不仅减轻新客对陌生环境、无援的恐惧感，以及彼此间的密切结合，也能增加安全感和归属感，使同乡、同宗族间的认同得以延续和保证。譬如，1940年前后，海南重兴镇就有百名乡友抵达新加坡，随着人数不断的增多，他们在巴米诗街 Purvis Street（海南二街）开设“道生栈”，一方面帮助新来同乡投宿，另一方面也成为探听故乡消息的联络站。<sup>166</sup>故此，琼人的“小生境”，不仅能传递来自家乡的讯息，也能依靠集体力量，抵御异域艰难生存境况。这些都使琼人在异国他乡更依赖于琼籍族群，并拥护它、忠于它、认同它。

## （2）排他性

从上述看，移民无论是从节约生活成本的角度出发，还是出于对“自己人”的心理归属需求，都选择认同原族群。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方言群帮间更具有排他性，使它籍不易闯入。譬如，十九世纪初期，受过良好英文教育的闽南人，他们控制着新加坡的主要贸易。莱佛士为了认可闽人在新加坡商业发展中的作用，亲自划分一块较好的地段给厦门贸易商人作居所，其他方言群不得居于此。<sup>167</sup>特殊的关照，使闽籍在新加坡占尽先机，族群经济实力相对厚实，也为后续族群发展固定了商业基础。再如，在粤人的杂货铺生意中，货源一定是从来自广东的乡民那里获取，外人根本无法进入。这也被称作“选择性的亲近(affinity)”，出于相同文化价值观约束，由近亲关系牵引、攀沿、依附带动新客加入，能使行业门类集成在自己人中，并形成关系网络得以延续发展，这也为“帮群经济”的发展和延续奠定了先决因素。<sup>168</sup>所以，共同的符号和族群文化，形成族群成员间

---

<sup>165</sup> 吴华〈星洲琼籍人士之今与昔〉，见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页266。

<sup>166</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琼州会馆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页101-103。

<sup>167</sup> 伍美芬《新加坡福建人社群研究(1945-1965)》，见《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2007年2月22日。

<sup>168</sup> 李勇〈新加坡“福建人”研究(1819-1942)〉，见《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2012年3月1日。

的认同，更愿意偏好和吸纳与自己地缘、血缘有关系的人。在帮群生产生活中，使移民群体的主次角色划分越来越清晰，经济贫富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以方言群为单位的族群特征渐渐形成，族群认同也得到不断地巩固。

不可忽视的是，认同得以表现，本身通过排斥异己，得以彰显。在移民社会的帮群经济中，琼人与其他方言群也一样，在职业门类上也具排他性。所以，呈现出从老板到雇员，不是亲戚就是同乡。如琼人经营的店面，店里所雇佣的员工基本都是“自己人”。琼人认为这不仅完成了出洋的帮带责任，相同的原身文化和价值观，能带来信任感和安全感。所以，当形成亲缘性、地缘性行业领域，就将出现方言群职业垄断现象。又如一个琼人先辈在欧洲人家里做佣人，他的子女到新加坡的第一份工作，大多也会从帮佣做起，这或许也是他的亲人能为他争取到的唯一工作机会。久而久之，便出现新加坡欧人的佣人，且基本被琼人垄断的现象。但不可忽视，族群认同的排他性，虽然能给予同籍工作机会，但从工作性质来看，琼人也基本就只能从事社会中下层的工作，都是一些劳多利少的“边缘性”职业，徘徊在厨师，服务员、佣人之中。在《新加坡市民及宅屋社会调查报告》中：琼人在1953年—1954年间，在新加坡均属工人薪金阶层，平均每月收入不超两百元，与其他华人方言群相比极少部分享受高薪金，平均收入不超四百元。<sup>169</sup>所以，有琼人就道出自己初到新加坡的艰辛：

“父亲早年来到新加坡很艰难，找一份工作很困难，很多人因为无法适应艰苦环境都死了。如果能得到一碗饭，那就是非常幸运的。我后来也随父亲来到新加坡，拼命打工，再苦也要混出个样儿。我那时就希望和别的同乡一样，攒足钱回乡，盖老房子，或者买些土地。”

“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要起身，准备茶具、面包、煮水，每晚九、十点收工。然后又要洗地、擦桌椅、洗杯……直到快凌晨才能安睡，日复一日”。“咖啡店不仅营业时间长，工作重，收入低，利润微薄，还得不到他人的尊重。自己又不懂英语，只能在咖啡店做杂工。”<sup>170</sup>

为了生存，只能忍气吐声，只希望打工能赶紧挣足银两，回乡生活。其实，“落叶归根”的心态，也是导致琼人对原族群认同的根源。第一代琼人大多都有

---

<sup>169</sup> 林明亚著、陈序传摘译《新加坡的海南人》，页180。

<sup>170</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琼州会馆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页295-299。

“落叶归根”的心态，脑海中更多浮现的是有关家乡的景物，挣足积蓄荣归故里是他们的毕生追求。他们认为自己留在居住国只是暂时的，终归要回到自己原生的土地和文化中去。所以，当琼人在自己人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不希望其他方言群干预族群内部事务，将以自己人的行为准则来协调解决。这些都说明，琼人排除它籍，希望在自己族群范围内生活，文化和行为准则上也按自己原有的习惯，保持着对本族群认同。

新加坡移民社会的竞争与抢夺资源分配，使得社会冲突、矛盾非常普遍。一方面，通过强化异质性和排他性，划分边缘区分彼此；另一方面，移民遇到困难或遭到排斥时，族群意识不断地强化，不仅表现出竞争与区隔的关系，也具有着强烈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华人中，方言、乡土籍贯、风俗习惯是区别各方言群间的辨认标志，也是同乡聚合在一起的基本纽带和联结符号，更是形成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社会层级的结构中，方言和乡土籍贯主要是对移民的生活习俗和职业类别产生影响，以及是区别、联合、认同的渠道。

### (3) 其它方言群对琼人族群认同影响

在早期的新加坡社会空间中，族群间形成了差异性，存在着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加上总会有一部分群体所制定的社会规则其实是为了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异质特征。而由于人们的族群不同，社会关系不同，便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在异质空间中，又形成社会中的社会。异质空间的形成，呈现出两种状态：一、使族群更具忠诚感，族内关系也更加牢固；二、当琼人处于主流社会边际的尴尬地位时，外部对该族群的偏见和认同危机，使自我认同与外部发生冲突，琼人表现出心里失落，否定自身身份。

“在文化迥异的国度里，对待“异质性”上，通过禁绝策略或者吞噬策略来应对。”<sup>171</sup>事实，它籍方言群就有通过对琼人的取笑和负面形象的描述，以此来提升自身身份思维，或使本族群在华人中更具影响力。如闽人说出“海南猪没有尾巴”来嘲笑海南人，并在吉隆坡的高速公路上设置海报图片。而真相是，海南人出于卫生安全顾虑，农民切断猪的尾巴，以免喂食或在清洗的过程中不慎被猪

---

<sup>171</sup> 齐格蒙特·鲍曼、欧阳景根译《犹豫的热带》，见《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

摇摆尾巴时的粪便弄脏自己；二是便于供应商辨认猪的产地来自海南，为日后生意源做准备。<sup>172</sup> 闽人对琼人的嘲笑，有侮辱之意，存在着夸大或贬低琼人形象，也有认同偏见的现象。1952年的一部剧中的女主角雪芳，由于对琼籍女演员不满，角色扮演时用说道：

“你穿的皮鞋光滑发亮，是‘红毛人’吃风，借来穿的。”

“红毛人吃肉，海南人吃骨；红毛人大便，海南人来扫。”<sup>173</sup>

显然，侮辱琼人穷，穷到吃人剩下的，穿借来的衣服，只能给人扫大便！原本是两个演员间的竞争，却被归属为“海南人”的族群特征。所以，无论琼人个人在居住地的行为，是给本群增光添彩，亦或是丢人败兴，都涉及到整个方言群的颜面与尊严，他们被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又譬如，广东人称海南人为“海南丁”，这个“丁”是“叮”的象声词。由于当初琼人广泛涉及咖啡店生意，咖啡店老板用勺子敲击杯子发出的铃声“叮”，提醒冲泡咖啡的服务员接单，能省时省力。<sup>174</sup>但粤人把新颖工作方式，扣于对族群称呼的帽子，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看不起琼人之意，强调了琼人从业卑微。所以，当得不到他人尊重时，有琼人感到自卑、羞愧，而后还出现有琼人习得其他方言后，不敢承认自己是海南的，对族群认同呈否定状。

不可否认，在抵制族群间势力的侵犯时，也成为塑造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随着生存环境的影响，抢夺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方言群间，矛盾冲突，排斥抵制，也时常上演。同一行业领域爆发冲突，以方言群区为单位的打斗事件，大多出于经济利益竞争。如1899年4月14日《叻报》报道，新加坡武吉智马某藤场中，两洗藤工匠久生仇怨，慢慢演变为工场内两方言群间的矛盾，由于双方人数不相上下，谁也不让谁，最后粤籍厨师在琼籍工匠的食物中下毒。<sup>175</sup>矛盾由个人口角争执引发，慢慢激发所属方言群的认同、附和，相互报复，加入族群争

<sup>172</sup> Bai Yan, “Do Hainanese Pigs have tails?” in *Graceful Bearings of the Hainanese Society*, ed. Mo He (Singapore: Singapore Bukit Timah Heng-Jai Friendly Association, 2018), 292.

<sup>173</sup> Ren, “Adding Another Chapter to History: From Loo Ting and Xue Fang's Role in Lei Yu” in *Hainanese Society: Its Social Customs and Features*, ed. Mo He (Singapore: Singapore Bukit Timah Heng-Jai Friendly Association, 2005), 120.

<sup>174</sup> Bai Yan, “‘丁’是什么意思”，页301。

<sup>175</sup> 作者不详〈工匠斗殴〉，见《叻报》（新加坡），1899年4月14日。

斗。这一过程中，族群认同在特定环境中被不断刺激产生和持续放大，使方言群间的敌视、对立、成见越来越显现。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各方言群间的矛盾和对峙局面才慢慢缓和，不再像过去那样激化和尖锐，虽然相处关系有所缓和，但也并不意味着矛盾就此消失。<sup>176</sup> 综上，新加坡独立前，华人族群内部区分和认同，成为辨认属族的重要条件。而通过群策群力，和共同面对困境，也能增加族群紧密联结，使族群认同更为强烈。

## （二）新加坡独立后（1965年后）

1965年新加坡独立，在独立当天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并非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国家，或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在新加坡，每个人都会有平等的地位。”希望各种族、各民族和平相处，彼此不再欺压且制止待遇不公的现象，使公民之间不再是从属地位，呈现出不同种族和宗教互敬互爱，不仅拥有着公平的机会，还拥有着共同的公民身份。当然，在当地社会迈向发展前进的历程中，也经历许多艰难，如人口迅速增长，失业率激增，工作机会供不应求等等。为了减少失业和推动发展，新加坡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经济的新阶段。当地政府意识到，只有建立广泛的共识观，凝聚国民力量，培养国民的团结、自强精神，对各宗教的平等对待，以及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才能促进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资本发展所带来社会关系的转变影响，如下：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也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彼此的关系。”<sup>177</sup>

---

<sup>176</sup>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57。

<sup>177</sup>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诚然，建立人们赖以生存的共同环境，是推动理性思考的一种途径，并跨越时空距离重组社会关系。其中，新加坡政府就建立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用日常生活的常规化和例行化，取代传统对血缘的原始依托，使之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本体安全。如新政府通过“祖屋政策”让各族混居，使其超越族群意识，摒弃认知偏见和狭隘，增进各族的往来沟通和了解接触，增强对新加坡自己人的认同感。这其中，既保留族群原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又建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吉登斯就曾言“与和自己同命运的人一起生活、劳作、祭拜、繁衍生息，并从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将逐渐体会到，跨越时空和地理的脱离限制，使社会走向繁荣兴旺成为可能。”<sup>178</sup>显然，跨越时空重组社会关系，通过当地政府政策的作用力，使各方言群跨越地域空间，成为新加坡公民共同为国家的繁荣而努力，这有利于建立新加坡人自己的认同感。

当新加坡独立后，那是否意味着族群认同对偏见和隔阂已完全消除了呢？笔者调查发现，并不然！譬如，2000年8月，新传媒的一部怀旧电视剧《琼园咖啡香》事件，电视剧以海南街琼州咖啡店为背景，戏里一句不该有的台词：“洋人大便，琼州人来扫”，这句话，震动海南族群，引起了琼人的愤怒，新加坡海南会馆为了这件事情，连夜开紧急会议，第二天登报大力抗议，在其他国家的海南会馆和海南社团，也隔岸炮轰新传媒。事情越闹越大，新传媒虽出面解释“素材是几个海南前辈所提供，绝对没有侮辱海南人的意思。”但这次事件深深伤害了琼人群体的尊严，闹得沸沸扬扬，直到新传媒登报道歉，经过不少人调和矛盾，慢慢才得以平息。从中我们可观，虽然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机制，改善各族间的相处和偏见，但族群成见依旧没完全消失。好在，通过政治机制重组社会关系，其他方言群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道歉，所以才没有像独立前一样，矛盾不断激化恶劣，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打斗伤害事件。但从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琼人对原有族群尊严的不可侵犯，故琼人依旧有强弱不同的族群认同意识。本节需要注意的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二者和谐共在。

---

<sup>178</sup>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男爵（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生于1938年1月18日）英国社会学家。他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路”（Third 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见安东尼·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南京出版社，2000）。

如前所述，在新加坡独立前，由于生存需求上的竞争，各方言群（帮）间的相处和交往并非是友好的，为了族群的利益，暴力与冲突时常上演。而新加坡独立后，在超越空间疆域的跨国新空间里，居住国的多元文化和政治特点与新的跨国活动相结合，从而导致方言群间的平衡相处需重新界定要求。琼人对权力与认同、身份与政治、认知与文化发生变化，跨国移民开始成为国家共同体主体，各方言群防止狭隘偏见，他们被统称为“新加坡华人”。本节，笔者首先考察了在跨国社会生活空间中，琼人族群认同随生存环境变化发生嬗变，其表现形式是历史和国家性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时间为轴，对新加坡独立前后进行了对比观察。这一时间点的划分，是琼人族群身份被“重新建构”的关键点，也是琼籍跨国移民从旅居者到新加坡人的身份转变，更是新加坡国家社会形态呈现差别的节点。进而看到，经过 200 多年的融合，各方言群从认同偏见到团结共生，形成了新加坡华人自己的身份认同。

## 第二节 琼人的地缘认同

地缘认同就是移民的一种地域感知，移民通过自身的生存经历、社会网络、机会等找寻亲近感，使之对土地关系的确认，并对某地人文景观的归属意识。在新加坡移民社会中，各方言群社团组织的建立就是很好的地缘认同依据。地缘社团组织作为本籍乡友互动联系的纽带，以地缘关系维系和扩展本籍网络关系，并把家乡的香火带到侨居地，作为精神寄托和聚会议事的场所。譬如，琼籍地缘社团组织，在跨境迁移上给予同乡牵引远渡的支持、在生活上给予乡友恤贫济急、在当地社会以“琼”为代表抵制他人歧视；在本籍内部以自己人的准则解决纷争等等。这些实践方式加强了移民的地缘认同，不仅在心理上对祖籍地产生更多的情感，也更利于适应异文化的文化社会。当然，移民建构地缘认同的过程，有整合作用，也有分裂效应；有对侨乡的情感归属，也有对居住地的利益诉求。足见，认同对偏好受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差异的影响，这便是因为认知差异和冲突来自于社会分层、经济行为和效益回报的左右，以及利益诉求反作用导致了地缘认同取向的调整和变化。我们观察新加坡华人社会，其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间，乡土认同表现非常突出。又随新加坡政治性质的变化，跨境移民者与迁入地主流社会，在融合中慢慢产生了一种认同感，琼人转为在地认同，开始认同于新加坡当

地。这其中可归纳为三点：迁入地在制度上给予华人各方言群更多的政治性保障，在经济、文化上包容和容纳移民；移民开始更多参与到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寻找发展机遇，也赢得更多展现机会，使其他方言群对琼人的认知也大大改观；迁入地在文化上形成特有的复合文化特征，并多元共存。可见，在移民建构地缘认同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移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层次性，还呈现出移民身份认同变量是受迁入地各种体系力量的影响。而随着中国祖籍地经济发展的增强，华人身份认同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 （一）新加坡独立前（1965年前）

我们通过地缘社团组织为载体，来观察琼人的地缘认同。从中我们看到，琼人在新加坡不仅没有分散，反而族群更集中在一起，以地缘相近、血缘相通、业缘相靠组成社团群体，建立起了二十余家宗亲会、海南会馆、新加坡海南商会等，纵横交错的社团组织在琼人社会中起着纽带作用。二十世纪中期，又出现一些社交团体和俱乐部，彼此互相互助，共同发展，以此形成极具强烈的亲切感和依赖性，同时也更加强固亲情意识和伙伴意识。

社团组织是琼人地缘认同的支柱和基石。譬如，1854年，韩旺彝、王志德就倡议组织的“琼州会馆”（海南会馆），也是最早新加坡华人社团之一。琼州会馆与琼州天后宫共用屋宇，选址于小坡马拉峇街六号，其作为地缘联络站，不仅为同乡提供基本福利、信息咨询，也为乡友寻求工作、解决生老病死等提供保障。如建立了“乐山居医院”，为琼籍老弱贫穷、无依无靠的同乡提供寄宿疗养，而用于医院管理的经费来自天后宫董事部。不仅如此，琼州天后宫还设立互助部，为琼籍会员谋福利；琼州会馆下属的敬老委员会，每年还为年老同乡分发敬老度岁金；地缘社团还组织琼籍律师团队，为琼人在新加坡提供法律援助，协调处理纠纷等。不可否认，当人处于危难和艰难中时，及时的帮助会给予移民一种心理支持，为琼人地缘认同提供了心理情感。在琼籍社团组织的制度章程中，也不难发现这一宗旨：

“联络乡谊，发挥互助合作之精神，团结图存乃先贤创立本馆之宗旨”，“本馆同仁常感到互助之重要，盖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本馆应未雨绸

缪,以谋互助之方,藉以预防患难之痛苦,使生有所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卒有所终,不致流为穷困而无靠”。<sup>179</sup>

琼籍社团组织的目的是以血脉亲情、地缘纽带感召琼人,集聚力量和资金,为同乡提供福利保障,救助本籍患病、失业、年迈、孤老等困难群体。随着抵新琼人越来越多,这种联络乡友情感,团结互助的社团组织相继成立,催生更多地缘组织、血缘宗亲会、业缘商业行会等社团产生。某种意义上,属于族系认同,也亦属于地缘认同。在新加坡重塑建立起自己的故乡,导致一个新“移植”海南社群网络的形成。就地缘性社团组织而言,如下表:

名称	注册时间
沙港同乡会	1936
泰家南旅同乡会	1937
孟里南旅同乡会	1939
南璧同乡会	1939
重兴同乡会	1940
琼崖溪北同乡会	1941
琼崖存信同乡会	1941
琼崖南梅同乡会	1948
琼乐同乡会	1948
琼崖南湖同乡会	1948
军港琼侨同乡会	1955
樟宜琼侨同乡会	1956
新合盛同乡会	1957
仙林同乡会	1958
后港琼崖同乡会	1958
森巴旺琼崖同乡会	1958
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	1960
东陵琼崖同乡会	1960
杨厝港琼崖同乡会	1963

<sup>179</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琼州会馆一百三十五纪念》。

（资料来源：吴华〈星洲琼籍人士之今与昔〉，见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以下简称《星洲琼籍今昔》），新加坡：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年）

从上表中组建数量繁多的同乡会名称观察，他们因同而聚，为了方便联系和聚集，根据生活片区再细分街域同乡会，以此强化地缘势力。所以，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在新加坡仅成立的同乡会，就有二十家左右。实地走访发现，在熟悉的地缘组织环境中，乡友间彼此给予的安全感，能使他们更加自在和温暖。不用担心自己因语言不通在交流上与主流环境感到不适，也不用刻意使用刀叉进食，又或担心来自他族的嘲笑。他们在同乡会中，能亲切地说方言、使用筷子、家长里短等。不仅能帮助琼籍新客快速熟悉当地环境，获得生活上的帮助，还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甚至在彼此对学业和事业上给予支持，拓展资源发展。所以来自安全的需求，心理的慰藉，都是移民对自己原身身份、同胞和文化的天然认同感，能给予他们身处家乡的错觉，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就血缘、地缘组织而言，具有代表性的和有姓氏公会、宗祠等。这类组织，以地域关系为基础，血缘为纽带，姓氏为单位，各血缘组织也联合起来。通过血缘性宗亲会，以亲戚援引，守望相助。其中，注册成立的血缘组织，如下：

名称	注册时间
曹家馆	1819
四邑陈氏会馆	1848
符氏社	1887
林氏九龙堂	1857
周宗祠	1860
凤廓汾阳公司	1865
广惠肇李氏书室	1874
司徒氏教伦堂	1874
古城会馆	1874
陈氏宗祠	1878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吴华《星洲琼籍今昔》）

血缘组织对琼人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譬如，他们修祠堂、建族谱、宗教活动等来实践和维护他们在居住国的血缘认同。其实，琼人的宗族意识都比较强，因为琼人希望将原身意识形态向居住地社会渗透和扩展。所以，符氏大宗祠在海

南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新加坡的符氏社也是最早的海外海南宗亲会。他们设立符氏奖金基金，造就符氏英才，编修族谱共符氏后代寻根问祖，定期举办符氏恳亲大会，延续至今。宗族联谊除了推动宗族之间的情感以外，还帮助同姓氏族人在外的发展繁衍，这使得族人后代的认同意识不断地延续加深。新加坡琼籍宗亲会成立的还有，如下：

名称	注册时间
龙氏公会	1903
琼崖黄氏公会	1910
琼州梁氏公会	1924
琼崖朱氏社	1926
琼崖王氏祠	1926
琼崖周氏公会	1933
云氏公会	1935
琼崖陈氏公会	1935
云氏公会	1935
琼崖许氏公会	1936
琼崖吴氏公会	1936
琼崖郑氏公会	1936
琼崖林氏公会	1937
琼崖翁氏公会	1937
琼侨邢氏公会	1939
琼崖谢氏公会	1939
琼崖李氏公会	1940
琼崖杨氏公会	1941
詹氏公会	1947
卢氏公会	1948
琼崖何氏公会	1948
琼崖潘氏社	1956
庄严宗亲会	1963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吴华《星洲琼籍今昔》）

来自同一地方、同一姓氏，往往在某些层面上，不仅对地缘特定社会群体文

化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也是地缘归属的强韧纽带。对祖先和神明的崇拜是海外所有宗族的主要职能，在宗族的族规和章程中都着重强调这一点。当人们认同自己拥有某一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如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便将把自己编入这一社群，并对这一群体产生偏好，增强内聚力的集体价值观念认同，从而维系宗族的团结和培养传统价值思想。笔者在新加坡的琼人社团就发现，琼州天后宫出资购置坟地——义山，作为琼人百年安葬之需。每逢春秋两祭，由于这些庆典的重要性，各宗亲代表前往拜祭，并会设宴招待各宗亲会员，以此联络感情，以便增强族人的归属意识。

从文化行为结构看，神庙里供奉的“神明”对琼人有很大的精神支撑和心理安慰。在海南侨乡，几乎每家都供奉着“神明”，希望借助“神明”的力量祈求健康顺意，寻求心理安慰。以至于琼人在抵到新加坡上岸后，第一件事情也是设神坛，膜拜天后圣母，把这份在故土时的信仰，长期保留在新加坡一同生活。可见，信仰地缘化将地缘认同渗透到侨居生活的方方面面。琼人在琼州会馆馆内就设有“婆祖”，供奉着昭烈一零八兄弟公和天后圣母等诸公神。对其的重视程度，从会馆内的碑文中可观，序文曰：

“琼南与新州相界，吾乡懋迁此地者，货物辐辏，商旅云集，旧有会馆，祀天后圣母，因年久倾圮，宇向不合，金议重建。……以今冬落成，不远千里乞序于余，余以吾乡质朴，颇为近古，风俗茂美，不侈繁华，所愿服贾于兹者，岁时荐香，敦崇乡谊，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每当会集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桑梓故事，以为拊掌之资，至足乐也。”<sup>180</sup>

这里表现出了琼人建构地域认同的丰富实践方式，虽然远在万里，只身一人，生活艰辛，但是琼人共同的信仰，联络同乡间的感情，这些都有利于移民适应陌生社会及异文化，促使快速融入当地社会。而琼人对故土神灵的景仰，对传统价值观的崇敬，能反映出琼人对故国故乡故土的认同和依恋。以姓氏、宗族为基础，发展宗亲组织的力量和社会功能，既表现出血缘性社团组织也是可资利用的文化纽带，也有助于满足族群对祖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维系本族传统习俗。

同一行业也倾向于建立密切关系，交流行业消息、市场前景和信息，故成立

---

<sup>180</sup> 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琼州会馆一百三十五纪念》，页101-103。

业缘性组织，不仅促成贸易合作伙伴，还有利于保护同行业琼人利益的作用。但琼人商业势力远不如其他方言群，所以，成立的业缘组织相对偏少，如下表：

名称	注册时间
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	1934 年
琼侨汇兑公会	1939 年
琼南客栈行	二战战前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吴华《星洲琼籍今昔》）

早期，琼人在新加坡商业活动范围比较狭窄，主要是经营餐饮、咖啡行业而闻名，故早期琼籍同乡商业团体偏少，从中也可看出琼人在新加坡的经营生存状况较薄弱。当然，业缘性组织确实能帮助琼人在同行业中进行联络、交流信息、共议行情、同业互助、合作发展，使得行业垄断于特定对方言群，其往往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本章中有详细探晰）。

随着琼人经济能力的改善，文化娱乐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娱乐社团组织大大增加，呈多元化。琼人通过娱乐团体组织互助和联谊，以聚会、演出等为活动形式，成为琼人间的交流活动中心。二十世纪成立的娱乐社团组织如下：

名称	注册时间
镇南俱乐部	1920
知行俱乐部	1947
琼南音乐剧社	1957
琼联声剧社	1958
银河音乐会	1961
琼联友剧社	1962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吴华《星洲琼籍今昔》）

除了以上分类的娱乐公社之外，其他社团组织定期举办联谊，这便是为了提高琼人的生活丰富性和认同感。譬如，笔者走访新加坡海南社团组织之一的“新加坡海南协会”，它成立于 1956 年 9 月 3 日，自成立以来，为琼籍同乡举办了许多活动，琼剧演出更是不曾间断。琼籍商人也纷纷赞助演出，通过观赏家乡剧，倾听乡音，回忆故土的记忆景观和情感。通过共同的信仰和喜好聚集在一起，增强了琼人祖籍地的认同。其他组织还有：

名称	注册时间	性质

星华培进公会	1938	属打洋工琼籍同乡组织
琼州青年会	1956	琼籍青年组织
德侨互助社	1957	互助社属福利团体
华友会	1962	从事英文教育工作者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吴华《星洲琼籍今昔》）

琼人抱有的乡里意识，使其产生了强烈归属意识。而身份认同则是通过自身在异域进一步的需求，细分出相互帮助的各类社团组织，不断强化身份认同的再生。从历史上来看，随着地缘网络移民的带动，各类社团组织成立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慢慢形成琼帮经济边界，开始在一些行业固定下来。在生存和发展上，琼帮族群内部也表现出极高的行业集中性以及对本族依赖和信赖，这印证了新加坡华人经济行业专门化的现象特征。

我们发现，地缘认同使移民纷纷进行社群整合，建立社团组织，相互扶持。琼人初期面对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不同种族的陌生社会。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琼人依照故土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信仰，抱成一团，营造一种亲密关系，加强了琼人对祖籍地地缘的认同感。所以早期成立的社团组织，主要目的是乡侨聚会之所对琼人间的团结和生存发展，均起到积极的领导推动作用。二十世纪初期到中期，琼籍社团组织迅速发展，社团成员激增，种类也不断增多。加上，组织上不断地扩大，以及活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展，使得社团组织活动更加丰富活跃。而通过乡友聚会交流，对某些共同记忆、传统生活方式、故土地域的依恋，构成了群体的集体意识，强调了地缘认同意识上的作用。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也构成本身与他人对其族群特征的主观感受。透过地缘、血缘、业缘，使得彼此间有着强烈的依靠连接性作用，这样的纽带作用也成为琼人在新加坡共谋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机会增加的渠道。历经百年迁移与拼搏，在异国他乡依靠琼人社团组织、宗族关系，共同血脉、共同神缘的出现，也说明琼人关系网络的扩大和延伸，并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同样，社团也成为琼人与故乡的纽带，发挥着组织性和影响力，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琼人沿着地缘编织的一条条“通道”移入新加坡，也通过双向流通在情感上和信息上相互交织。随着琼人社群的逐渐形成，特定的“小生境”的建立，无论是扎堆居住在海南街，还是选择同类职业，都保持着具有本族群的生态文化圈，凸显了琼人在新加坡更加依赖故土地域的生存方式。综上，

地缘社团组织成为移居地琼籍同乡的联系中心，在各种联结活动中既增强了同乡意识，也提升了琼人的地缘认同和族群认同。因此，我们看到在乡情观念的作用下，创建了一系列地缘组织社团，形成早期的新加坡琼人社会，它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 （二）独立后（1965年后）

居住国的经济生存环境，将影响移民的地缘认同，移民的认同也将反作用于居住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换言之，认同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同时，经济行为也反作用于认同，从而影响认同取向的调整嬗变。我们发现，当人们在生活中产生认同契合后，将会拓展移民的个人潜能，从而优化经济效益或产出。新加坡独立后，随着侨居国国家性质发生变化，琼人择良木而息的在地化心态开始发生转变，他们开始转为认同居住国，他们的心态转变为“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对比琼人在新加坡 1929 年和 1975 年的琼商分类和数量，也可看出琼人认同和处境的嬗变，如下：

1929 年星洲琼商分类表

商业别	杂货店	九八（贸易行）	咖啡店	中西餐兼咖啡店	旅店	沽酒店、饭店	汇兑民信局	面包、水果、杂食店	汽水、制冰店	五金、木工厂	中西药材店	裁缝店	鞋店	理发店	其他	合计
家数	29	51	174	21	20	46	63	43	11	4	6	16	7	11	11	513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云愉民《琼侨概况》，页 55-70, 166.）

1975 年星洲琼商分类统计约数

商业别	建筑、家私（新）	五金、机器、玻璃（新）	船厂、海上机械（新）	电器工程（新）	冷气工程、雪柜业（新）	广告印刷业（新）	出入口贸易（新）	食品制造厂（旧）	金庄、钟表、鞋店（旧）	裁缝（旧）	摄影（新）	旅馆业（旧）	酒楼夜总会等餐饮（新）	西果店（旧）	理发业（旧）	汽车销售、修理、汽油业（新）	咖啡茶业（旧）
家数	七	六	数十	百余	数十	一二	数十	百余	七	数十	百余	数十	百余	百余	几十	数十	三五百

（资料来源：参见前引云愉民《琼侨概况》）

从以上两个表格可知，新加坡独立前后的琼人在经营领域上开始更加多元化，数量从几家几十家发展为成百家的数目变化，这些都是琼人努力寻求身份的变化。他们通过提升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使得从业领域拓宽，改变族群身份特征，重建琼人文化认同，更好融入扎根当地。而随着祖籍国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地增强，移民在祖籍地和侨居国间的跨国互动增多，呈现出双重认同的特点。

### （1）重视文化教育

在族群危机意识的刺激下，琼人极力争取生存空间。琼人从只能干一些“多劳少得”、“劳多薄收”的行业，到 20 世纪中期，琼人所从事的职业“无行不有，无业不在”。而重要的作用力，就是琼人先把自己看做新加坡的一员，后重视于提升自身文化的水平。笔者梳理琼人对发展教育事业极力而为之的因素是：

一、心理原因，因为海南人长期处在社会底层，老辈的琼人不甘心子孙后代只能复制其生活方式，不希望子女继续从事粗活业务，必须要改变；

二、认同需求，琼人认为唯有重视“教育”才可改变生活的处境和经济地位。正如新加坡资深报人韩山元曾阐述琼人当时的观点，“我在钱方面输给了其他方

言群，那在人才方面就要赢过他们。”故只能重视琼籍子女的文化教育，拼出一个春天。<sup>181</sup>

三、实际需要，独立后的新加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践行精英教育主义，奉行“任人唯才”的理念。

因此，很多琼人砸锅卖铁也要给予子女最佳的教育环境，激励子嗣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硕士、博士，不断接受高等教育。事实证明，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改变了琼籍后代的经济社会地位，琼人日后在新加坡可谓是人才济济，不少好学奋进的学子成为学者、医生、律师、商业界的佼佼者。如文化界有：曾任新加坡文化部代理部长的琼人黄循文，新加坡南洋大学三任校长都是琼籍，有吴德耀、李昭铭等，还有南洋理工学院詹道存院长、南洋商学院王春泉院长；政府部门高级政要有：前政府移民厅冯世保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黎经富、交通及新闻兼工贸部马宝山政务部长、国家文物局林长鑫局长等；商业精英又有：船务地产大王符锡运，殷商巨富王绍经，玻璃大王陈家和等等，其祖籍都是海南。<sup>182</sup>琼人对教育的重视，勤奋苦读，造就不少专业人才，例如成就了公务员首长、报业总编辑、商人等，甚至通过努力奋斗改变了层级低下的族群身份形象。因此，通过凝聚方言族群的命运，努力提升自身文化水平，只为更好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主流环境相适应，转变了外部对琼人族裔落后身份形象的认同。

除重视琼籍子女教育培养，琼人还在新加坡积极给当地教育事业而为之，极力支持当地兴办学校。其中，琼人筹款建校，组织建校委员会，创立了育英中学（1910），充实教学设备。而后，发起倡办和主持的学校还有：培群学校（1934）、醒华学校（1935）、化蒙学校（1937）、培达学校（1946）等。为了培育英才，接济有志同乡学子完成大学学业或资助赴欧美留学，想方设法为琼人学子筹集奖助贷学金，帮助同乡子女接受教育深造。譬如，1958年，五个琼剧团协助琼州会馆筹集到两万九千多元；1963年，联各各同乡社团在琼州会馆大厦落成大典之际，筹得十一万元。为了鼓励琼籍学子，各同乡会、宗亲会、琼州会馆均设立奖学金，以供琼籍会员子女继续深造学习。处于下层阶级的琼人学子为了争取读书的机会，求取好成绩拿奖学金便成了一条生存的途径。除了政府奖学金，海南乡

<sup>181</sup> 韩山元《新加坡海南人的心态与社会地位的演变》（海口：海口出版社，1993），页165。

<sup>182</sup> 符国华〈海南人在新加坡的历史与现状〉，见《海南档案》，2001年第3期。

团组织也设置了奖学金鼓励优秀学子。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子女来说，是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机会。除了为族群内部琼籍子女谋利益外，对新加坡的社会教育事业的也热心捐助。譬如，南洋大学创立时，琼籍沙港同乡会积极加入为会员。吴德耀<sup>183</sup>就曾指说，海南人在新加坡虽然只占百分之七，约二十万人，但关于对中华文化教育问题的参与度相当高，比率可达百分之二十。琼人在新加坡文化教育的突出表现，得到新加坡社会的纷纷赞扬。同时，琼人鼎力支持当地教育的发展也亦属于地缘认同的表现。

琼人从漂洋过海到扎根本土，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琼人的定居模式、社会构成、族群形象等都发生了嬗变。这归结于琼人对教育的重视，积极重塑族群身份，奋力改变低声下气的态度，转而扬眉吐气。因此使琼人日后在新加坡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都获得极大提高，成就了各领域的领导骨干和社会精英。而思想政治的突破，常常在当地社会变革中扮演先锋角色，对本地华文传承和华教事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系列便是通过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不仅提高了琼籍族群在新加坡的社会地位，也得到当地政府和族群外部的敬重和认可度。可见，这在建构琼人对新加坡的地缘认同上起到关键作用。

## （2） 地缘认同的调适

从祖籍地方面来看，随着中国海南经济的发展，琼人开始恢复对祖籍地的信心，产生了新的自信，拥抱与祖籍地的各种合作联系。其中，也成为侨居国与祖籍地联系的重要桥梁，发挥“联络人”的独特作用。通过与祖籍地同乡们的联谊，既成为了侨乡海南发展的新引擎，又让琼人寻找到新的投资领域，开拓新产业链。祖籍地新的发展机遇，不仅加强了琼人的侨乡情感认同，也为两地之间的资金、人流、物流、信息流开启了双向“通道”。（下章将具体讨论跨国合作案例）他们一方面祖籍地的各种联系，不仅掌握了更多的跨国资源，还有利于在居住国上的立足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掌握、参与居住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资源和网络，作用于祖籍地。这其中，随着祖籍地经济地位的提升，琼人在经济和文化上呈现双认同观点，并使两地间的资源产生更好的有机整合。

---

<sup>183</sup> 吴德耀，祖籍海南文昌人，迁居马来亚。1946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1966年，汉弥等学院颁予名誉人文学科学博士，1975年南大研究院院长，氏系国际知名学者、教育家。

新加坡独立前，大部分琼人文化水平低下，有的甚至是半文盲或文盲，故从事劳动者偏多。19 世至 20 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出自新加坡琼人的政商精英，富豪殷商凤毛麟角。在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琼人尽力改变族群薄弱的经济实力和人才缺乏问题。其中，社团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让一盘散沙且漂泊异乡的琼人既有着权益依附，也有栖身的住所，并建立族群福利，使琼人间彼此互助互为、互依互赖凝聚在一起。社团组织不仅在新加坡扩宽琼人间交流的內部空间，也通过各种形式宽广海外活动舞台，使其建立和发展琼人跨国网络的交流活动平台，促进了琼人在各领域的跨国合作和交流。琼人在居住国新加坡重建海南社群，越洋再建地缘认同，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祖籍地的发展。总之，跨洋求生、异域安家、他国创业，琼人聚族而居。由于对地缘、业缘的依赖性和认同感，在陌生环境中更执著于亲情意识和伙伴意识，对群体的生存发展有义务和责任去维护。在新加坡建立起特定的“小生境”，在危难时刻庇护和援助同乡，在接应“新客”上形成劳动就业和亲属帮扶的移民链，为跨国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有机通道，使琼人移民的联系网络得以扩大。琼人在新加坡形成一个混合体，相对于外界隔离，哪怕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忘记自己曾有的生活方式，并极力保留着那份“海南味”、“海南情”、“海南缘”。以便体现了琼人对既有生活方式的依恋，琼人群体建立起的“小生境”为琼人漂泊的心聊以慰藉，这样的聚集也让琼人的故土情节越发强烈执著。总之，琼人就算身在新加坡，也和在海南时一样，使得琼人在异国有归属感，甚至更强有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特定的方言群关系网络，维护和构筑起同乡、同业、同族间的社群力量，以此来凝聚琼人群体之间。综上所述，影响琼人地缘认同的因素包括：侨居国的政策和族群外部的态度，祖籍国与侨居国发展的差异，以及移民有关祖籍地的历史记忆。

### 第三节 琼人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公民对自己归属国籍的认知，依赖国籍关系客观维系，以及在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等构成要素的参与意识和情感评价。<sup>184</sup> 东南亚华人问

---

<sup>184</sup> 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题专家庄国土认为，“政治认同在国家认同中起支配作用。”<sup>185</sup>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新加坡历经英国殖民、日据时期、加入马来西亚等几个时期。因长期受到殖民文化统治和制度植入，公民意识淡薄。譬如，十九世纪中叶，新加坡属于英殖民地统治社会，对华人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的状态。所以，在新加坡独立前，琼人的国家认同更多倾向于祖籍国。

新加坡地理面积虽狭小，但经济繁荣，人群流动频繁，五方杂厝。新加坡有来自华人的儒家文化，也有以英殖民者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马来土族为代表的南洋文化、印度人的哈拉帕文化等，华人社会又分为闽、粤、潮、客、琼等籍的组成。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在各民族杂居的密集空间里，不分语言、宗教、文化上的差异，在这里团结一致”。新加坡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已明确，面对错综复杂的人种问题，需整合民族认同，增强国民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感，不同籍贯的方言群应通过对话、融合、共同行动形成共同体，从“祖籍认同”转为“居住国认同”。

### （一）新加坡独立前（1965 年以前）

英殖民时期，英殖民者属于新加坡统治阶级，在政治和军事上其他种族均处于英国人的统治下。所以，在政治生活方面，琼人并不占据任何显要位置，也没有过多参与热情。琼人与英者的相处多表现为尊敬、服务的特征。但在中西文化习俗的碰撞中，两者间的冲突也较为突出，尤其是对于那些刚来的“新客”。譬如，1896年6月，龙某刚到新加坡不久，居住在小坡加申街，由于哥哥暴病身亡，西医绵力珍到家中验尸。而按照海南惯例，医师到家必要感谢，于是龙某给绵力珍一元洋银以表谢意。但绵力珍认为此举为行贿，生怒报警，至龙某被罚15元。<sup>186</sup>在西方人眼里，认为琼人宗教不如西方宗教，民俗文化和丧葬习俗等都是一 种巫术迷信，而正是琼人的“愚昧”、“无知”，酷信鬼神，以致多被巫师欺骗。针对这种指责，琼人认为欧人“不知各循土俗，自安其习，彼此皆不能免”<sup>187</sup>，而欧洲人虽认为生病是触犯信仰，违背了宗教条例，不看病吃药，反采用

<sup>185</sup> 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认同》。

<sup>186</sup> 作者不详〈无知被罚〉，见《叻报》（新加坡），1896年6月2日。

<sup>187</sup> 作者不详〈有闻必录〉，见《叻报》（新加坡），1895年7月1日。

祷告形式忏悔祈康复，但欧洲人也有因治病被巫术所欺骗的情况<sup>188</sup>。甚至有一些欧洲人，也常嘲笑琼人文化素质低、不懂英文等等。但此时的琼人则认为“华人不谙中华华语是诚可耻，若不习外国之语言文字庸有何奇”实属偏见。所以，在异文化相处中冲突多有发生，而它所带来的文化碰撞和震撼感极其强烈。

新加坡独立前，在西方人眼中琼人是自己聘用的“厨子”或“佣人”，亦或是在英者的军港、商贸中从事餐饮服务的人选。因为他们对英者基本处于服从态度，曾任新加坡海南会馆第三副会长的陈泽平也如实叙述这一事实。欧人为了维护自己在亚洲人眼中的威望，雇佣一些帮佣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哪怕在生活上的费用不断地上涨或自己工资下降的情况，他们依旧选择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雇佣仆人。以一位英籍公务员的薪酬为例，1903年至1906年，年薪薪酬在480英镑至520英镑，但他的海峡美元收入从473美元至357美元，仍保留7名佣人。<sup>189</sup>可见，欧人认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是必须的，雇佣家庭帮佣是必要的，否则将给英国社会带来耻辱或蔑视。正如心理学家亨利·塔菲尔和约翰·特纳等人所认为的一样。他们对外群体产生偏见，并通过与相关外群体进行有力比较，来提高自身社会认同的自尊。这也正是社会认同的三个阶段类化、认同和比较。<sup>190</sup>所以，欧人认为琼人是服务于他们的家庭奴役，俗称“cooky”，需要依靠他们生存。在一些英籍媒体的文章中也可以发现，在1901年《新加坡自由报》上就指琼人，垄断了这一行业，无法从其他方言群雇佣仆人，他们为了谋生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诚实。<sup>191</sup>文中指出琼人购买食材后给主人报高价格，私吞钱；还有的为了牟利，偷主人的食物供自己食用等。在1912年8月，在两篇有关琼人偷窃欧人家东西后消失的报道中，用到“又是琼籍佣人”的字眼。<sup>192</sup>尽管如此，但还有不少欧人认为雇佣忠诚的琼人家佣是可靠的。不过，也有雇主通过报道文章赞美琼人的职业道德，例如在1915年印度兵变期间，许多欧人潜逃躲避，大多数琼人家丁

---

<sup>188</sup> 作者不详〈法巫蛊惑〉，见《叻报》（新加坡），1894年9月8日。

<sup>189</sup> *Malay Mail*, 14th May 1928.

<sup>190</sup> 周晓红《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见《社会科学（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2008年第4期。

<sup>191</sup>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rd May 1901, 3.

<sup>192</sup> *Straite Telegraph and Daily Advertiser*, 7th August 1912, 7.

在主人远走情况下，依旧将贵重物品和房屋照看完好无损。<sup>193</sup>可见，当琼人被看作为欧人服务的家庭佣人时，欧人也会加以保护他们，特别是当琼人遭到其他方言群严重迫害时，因为欧人认为琼人有时也是“他们的人”。至此可知，身份认同有时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一种被看作自己人的集体，另一种将文化视为“他者”；自我身份认同则以自身的身体为核心，强调自身的感受和体验；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属性。

马来族群世代繁衍居住于南洋地区，属新加坡土著人。在文化上，马来人和琼人间，彼此间呈相互吸收以及借鉴移植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应对殖民苛刻的管理，琼人和马来人也相互共生，以达成双方的利益。在社会政治领域上，两者所处的位置差异，存在不少摩擦矛盾。因马来人多任职于新加坡警察、差役等职务，与处在华人中下层的琼人交往频繁，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也是常事。马来族群认为自身更具土著优越性，琼人新客视为非我族类。而勤劳肯干的琼人，给马来族群产生一种抢夺生产资源的压力。特别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已失去政治、经济优势支撑的族群观念，构建起难以立足的矛盾心理和生存焦虑。当然，马来人对琼人的双重评价看似相互冲突，实则共存无碍。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混居的国家，除了上述叙述的族群，还有印度人、齐智人、吉宁人、爪哇人、暹罗人、孟加里人等。他们精明富有，正如以放债为生的齐智人，与大多是平民、商贩的琼人，更多是商业借贷关系。与琼人一样，同样重视宗教活动吉宁人，两者处于理解和竞争的关系中，因为他们大多都从事船夫、雇工等职业，与琼人一样属中下层。

新加坡独立前，受侨居国、西方文化和其他种族的认同因素影响，琼人并没有对新加坡产生国家认同的概念，在国籍上从属中国。近代哲学领域，黑格尔《精神现象学》<sup>194</sup>认为，自我意识的发展需要依赖他者的意识，只有在互动中才能确认主体自身。海德格尔和萨特二人则认为，“他者”的存在相反摧毁了个人主体性。<sup>195</sup>因此，各籍对琼人的认同过程，既是印证了认同是受权力机构的影响，也

---

<sup>193</sup> *Straits Times*, 10th March 1915, 10.

<sup>194</sup> 黑格尔、贺麟等译《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127。

<sup>195</sup> 马丁·海德格尔、陈映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页140；萨特著、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页308。

决定着个体是积极或消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而社会实践活动和政治参与，对移民的国家认同起着关键影响。从上我们看到，正如当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身份认知不能离开“他者”而认识自身或产生行动。总的来说，当群体间面对利益和冲突矛盾时，身份认同感的本能可将琼人群体凝聚成一个团体，共同应对各类事件和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悬殊、歧视、偏见也将方言群间区分分层、差别认同的体系。

那在新加坡独立前，琼人的身份认同是否一成不变呢？笔者发现在 1947 年——1957 年间是关键转折点，琼人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共同争取新加坡公民权运动。这项历经了十年的博弈经历，使华人的对国家政治的认同从中国转为更倾向于新加坡；对国人身份的认同也从中国人转换为新加坡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57 年 10 月 16 日新加坡华人公民权法令的确权，促进了华人参政的平等意愿。那么，琼人在这一时期获得国籍后，发生了什么？他们对于中国的关系持什么立场呢？以下是笔者对新加坡海南商会陈学汉会长的访问：

问：“1957 年，新加坡华人获得国籍后，琼人发生了什么？”

答：1957 年后，新加坡琼人拿到公民权后不能到中国访问。因为此时的新加坡公民必须遵守当时自治帮政策，禁止与中国的往来访问。

问：从 1950 年开始，新加坡的琼籍领导人，对海南侨乡持什么立场？

答：这一时期新加坡的琼籍领导人有：首位琼籍的立法议院和国会议员黄循文，他也曾担任劳工及律政政务次长、内政及国防部政务部长；1968 年踏入政坛的李昭铭教育部长；钱翰琮国会议员等。他们当时时常参加海南会馆举办的活动，和琼人乡亲互动。但他们也遵守新加坡相关政策规定，不回中国探访，在态度上与政府保持一致。

问：这一时期，琼人与海南的往来如何？

答：虽说这一时期，不可以到中国去，但琼人还是可以通过新加坡琼人开办的钱庄，把侨汇和侨批寄往海南。特别是在中国粮食紧张的那段时间，也通过海运把粮食和油寄回家乡。

问：您认为，琼人在获得公民权后的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什么立场？

答：1957 年，在新加坡或是英殖民地之间，琼人的立场更加认同和效忠于新加坡，而非认同英殖民地的总宗主国。

问：那禁止往来的禁令，何时被打破呢？

答：直到197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加之，中国改革开放后，华人与中国的往来开始改变。刚开始，新加坡政府只允许60岁以上的华人访问中国，后又慢慢放开。可以说，是从新加坡和中国建交后，华人开始自由来往两国。”<sup>196</sup>

从上述的访问材料中可见，琼人与其他华人一样，1957年在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后，遵守相关政府禁令要求，不在频繁跨越于新、中两国间。也从琼人参与争取公民权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琼人与大部分华人一样，已确认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在地认同，不再是“过客”或“叶落归根”的情愫。还值得注意的是，琼人出于对家乡侨眷的责任和义务，依然保持对家庭的经济支助，但这种经济上的扶持，并不代表着在身份认同倾向于故土。总的来说，琼人对参与争取公民权权益的行为来看，是为了更好地扎根于新加坡，以“新加坡人”的姿态融入当地，并且以公民的身份安居乐业，加深了国民感与认同感。当然，这也为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的开始奠定了基础。

## （二）独立后（1965年后）

新加坡独立后，成为一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了求生存，以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新政府开始有意识培养公民的共同价值观。1965年，新加坡独立当天，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就说：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1965年8月9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誓将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sup>197</sup>

此后，新政府促进各种族混居融合，缩小民族间教育水民差距，提倡宗教平等。随着新加坡复合民族国家机制的完善，琼人融入主流社会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困难。他们更好地适应居住地的社会环境，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文化生活，加入居

---

<sup>196</sup> 2018年10月9日，新加坡海南商会陈学汉会长于新加坡受访。

<sup>197</sup> 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

住地的国籍，政治上效忠于当地政府，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和公平待遇，国家认同取向转为新加坡。

国家认同也有内在的民族文化联系，凝聚共同的族属认同和民族感情。当然，联系还促进了种族与种族间、方言群与方言群间、家庭与家庭间良好有序的关系。所以，独立后的新加坡，各族间不再是从属关系，偏见、对抗、压制的现象有所改善，以一种公民身份相处。刘宏教授在考察战后新加坡社会变迁的著作中就指出，“摆脱殖民地影响后，方言群间的合作带来了网络功能，华人社会内部结构的嬗变，把握新加坡的历史发展，助力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成功。”<sup>198</sup>独立后的新加坡，粤、闽、琼等都统被成为“华人”，作为新加坡的主要群体，彼此在认同感上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以共同的“家”为价值观，实现民族社会整合。笔者走进新加坡社群就发现，琼人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是祖籍在海南。另一方面，与其他方言群共属于新加坡公民，他们之间是朋友、合作伙伴、同事或夫妻等关系。因此，通过整合华人族群的国家认同联系，能消弭之前对族群认同的偏见，增强各族的凝聚力、民族认同感，并在保持传统民俗文化信仰之上，形成多民族共存以及异文化并存和谐的局面。同时也可见，个人身份认同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社区凝聚力的产生，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新加坡独立后，新政府建立共同价值观，对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起到关键作用。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共同的公共意识、生存政策、公民教育、居住政策等，感召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新加坡人，凝结他们的国家利益认同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指出，“一个特殊阶段，依靠利益群体，为了普遍利益产生‘公共意见’，不同人群才会形成公众。彼此间形成凝聚力，排除从前对立空间的历史，从对话、合作、融合和行动中成为城市共同体，为了共同的利益作为群体来行动。”<sup>199</sup>确实不同种族和方言群生活在一个领域，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

---

<sup>198</sup>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页45-53。

<sup>199</sup>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被公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尔根·哈贝马斯、汪晖译《公共领域》，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126。

行动和表达意见，不仅有助于影响对国家认同感的情绪，也对认同和效忠新加坡得以实现。从此，“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社会需要为首；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最基本的家庭稳定了，社会才会安宁；关怀扶持，同舟共济，给予弱者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求同异存，协商共识，做决定时要彼此协商，为共同的利益；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各种族间要避免矛盾，各宗教信仰要彼此包容。”<sup>200</sup>这是李光耀提出的“八德”共同体思想和行为准则，深深影响着新加坡的每一位公民，也成为新加坡国家繁荣稳定的“法宝”。2019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国庆演说中，就印证了“几个世纪以来，五湖四海来到新加坡的人们，不仅带来了身份认同、文化和信仰，也把希望和梦想、激情和志向一起带来。慢慢凝结成为新加坡人，也造就了今天的新加坡。”<sup>201</sup>可以说，国家共同价值观有助于促进公民国家认同感，在助力国家社会繁荣发展上，也成效显著。

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多数琼人在新加坡成为“定居者”，但随着新加坡和中国发展形势的演变，以及华人自身发展的变动，也不排除多重认同的可能。庄国土在研究华侨华人的实证案例时指出，当中国侨胞在居住国受到迫害和排华事件时，中国的接纳和安置难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华侨的国家认同态度。<sup>202</sup>因此，认同上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他们不并不是固守一地。王赓武教授也认为，国家间关系和势力的变化，也将影响华人国家认同的变化，也可存在多重认同的形式。<sup>203</sup>可以说，影响海外华人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可分为三：受居住国对移民政策和态度，居住国与移民原籍国的关系，以及居住国与移民原籍国的发展站位差异。

本章我们看到，在新加坡独立前，方言成为华人间认同的重要手段，对职业取向上形成族群垄断等特点，族群认同是社会运作的重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族群内部只有通过更好的集结力量，加强内向之心才可应对外界的孤立或排斥，重建自我认同。可以说，紧密联结对处于社会边缘化的移民是一种力量之源和宝

---

<sup>200</sup> 1991年，新加坡政府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见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页106。

<sup>201</sup> 新加坡李显龙总理2019年新加坡国庆献词，可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cKXSGH94>（2019年8月20日）。

<sup>202</sup>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页247-253。

<sup>203</sup>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见《南洋资料译丛》，1986年第4期。

贵资源，有助于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反对族群压迫。笔者认为，移民到居住国出现了被排挤、歧视或无法融入的处境时，都迫切希望维护并建立起身份认同，以获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所以，移民通过地缘、血缘为纽带，建立和维系地缘乡友网络人际关系，依照原乡的生活和相处模式往来。而外部世界的作用力，也是刺激着族群的向心力，凝聚力越强，使其群体意识更强。随着新加坡国家性质发生变化，国家独立后，种族和方言群的对峙关系开始改善，社会进入调节状态，琼人身份认同有别于从前。他们超越血缘和乡籍纽带，开始联合合作或婚姻联姻。相连的紧密、互助互靠、共求图存的国家价值观，使族群对原自身产生认同，重构、选择、或遗忘。在新的空间中，文化的融合、以及政治的参与，都推动琼人趋向认同新加坡主流社会。从中我们还看到，虽然他们成为了新加坡公民，转向了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但并不妨碍，多元文化、多种族、多信仰的生活习俗存留。因此，国家认同并不能用文化特征来衡量，应区分开来。而文化却会影响族群认同的建构，故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不矛盾，可和谐共处。从中体现出，影响身份认同嬗变的变量，是复杂性、多层次、立体性的。

此外，本章还原琼人在新加坡的生活图景，挖掘跨国琼人在新加坡“落叶归根”，再到“落地生根”的生存实况，以及他们身份认同的嬗变过程。看到琼人与其他方言群和种族的互动，既有融合、模仿、交融，也有排斥、利用、冲突。族群认同成为海外华人的资源，借以“地缘相近、血缘相亲”，琼人在新加坡重塑故乡；借用“五缘”关系，凝聚身份认同，在地缘社团组织、伦理文化、教育、信仰、宗族结构的凝聚效应下，建立其特定的“小生境”（niche）。从中我们看到了华人族群内部的关系，新加坡各种族社会结构，以及影响族群认同产生的机制。至此，本章得出的结论是借用跨国主义视角来研究内外部社会对琼人的身份认同，是较为符合客观事实和实际情况的。因为，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其多元和复杂性是社会共识。如果将所有的华人看成相同文化纽带和血统统一的同一群体，那早期新加坡华人内部的分裂、差异和特殊无法解释，也无法区分不同地区和背景下各自族群的交往圈子和社会组织，更无法分解其中存在的主次族群的划分。而身份认同就是在寻找，我到底是谁？究竟来自哪里？又要到哪里去？是一个旧身份不断断裂，新身份不断形成且去中心的过程。其中就包括了，移民的心理、意识形态、权力、阶级、主体和语言等，都与身份认知

关联。当然，身份认同有时也是在强势或弱势的环境中对集体身份的一种选择。总之，跨国主义视角是较为符合在全球化时代下研究身份认同问题，避免了从居住国视角的狭隘和片面，也阻止全球视角下的极端化。这一史实也论证了，任何事物的发展进程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决定的，是在事物发展中呈螺旋上升到过程，跨国网络的发展亦是如此，移民身份嬗变的过程也是如此。

## 第四章 跨国网络：琼人与海南侨乡社会

何为侨乡？中国最早研究有关华侨问题的研究者之一陈达，在他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研究中，并没有直接称其为“侨乡”，而指“迁民”的“华侨社区”，这一社区具有迁民较多，他们对家乡有明显影响，且移民历史悠久。<sup>204</sup>方雄普在《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sup>205</sup>则简明扼要，“侨乡”就是华侨的家乡。<sup>206</sup>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定义，李国梁教授从侨乡的人口结构，海内外乡亲的联系网络，海外经济、文化等，影响移出地的元素来界定侨乡。<sup>207</sup>笔者的研究更倾向于周南京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的定义：这是一个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众多人数的地区；在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与海外亲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侨汇、侨资促使移出地的商品经济发达；又通过移民的捐助，影响迁移地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特殊地区。<sup>208</sup>所以对侨乡地域的界定，不只是单单的静态人口输出概念，也不仅仅是“迁民”的家乡，而是迁民具备定期或一定频率的动态跨国实践行为，经过互动又影响着迁地经济、文化、生活等发展和变迁的特征。故本章研究的海南侨乡，随着一定数量移民产生，且具有连续性、长时间的海外移民史，海南的村、镇、市的社会结构都受其影响，各区域间又承载着相邻市县人口、信息、资源和物质的流动，形成交互重叠的社会关系，并出现海南“侨乡社会”。而侨乡社会的形成与当地的移民规模、移民目的、人文特点，以及当地的侨务政策和地理环境有关，是海外移民的一种产物。就正如费孝通所指“生于斯，把一个人与地的因缘关系固定。而其中的生，就是血，又决定了他的地。‘地’又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sup>209</sup>在这一社会关系中，具有服

<sup>204</sup>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以下简称《南洋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sup>205</sup> 方雄普《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见庄国土主编《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sup>206</sup> 周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专家。见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sup>207</sup> 李国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著有《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东南亚华侨通史》、《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sup>208</sup> 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sup>209</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从、竞争、联合、分工、交换等各种形式，他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体，在文化社会和宗教社会等关系中密切相关。而琼人就是哪怕地理上远隔千万里，但依然与海南侨乡保持着地缘（出生地）、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跨国关系，在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等交界面互动作用，其形态保持着客观的连续性，呈现出多重社会关系网络节点，以及交融会通的跨国网络。

在历史时间段和情境下考察海南侨乡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段：从早期琼人大批量的出洋，侨乡框架形成；随着侨汇、侨资的流入，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初现；受当地侨务政策的影响，不少琼人回乡兴办实业，为海南侨乡社会的发展铺设道路；由于战乱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出现过破坏和停滞时期，阻碍海南侨乡发展进程；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海南侨乡重新进入新发展历史时期，当地经济、生活、社会生产等，在琼人力量的参与下进一步得到发展。但遗憾的是，琼人虽建立跨国网络参与侨乡建设，但与中国其他沿海侨乡侨资利用率相比偏弱，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当然，这不仅与海南各时期的政治、政策相关，还与琼人自身的经济实力、主观意识相联，故呈现琼人跨国实践行为的差异性。但也不可否认，在海南侨乡社会的发展轨迹中，琼人既有基于“五缘”<sup>210</sup>情感纽带，也有出于客观互惠的跨国实践行为；既是推动者，又是参与者。李明欢教授在解释移民跨国实践中的“侨乡社会资本”时就指出：“跨国民间网络作为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跨国劳动力市场的链接是侨乡社会资本不断增值效益的特性，跨国迁移的互惠原则是侨乡群体间的运作机制。侨乡将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的能力转化为文化、经济、政治资本，从而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侨乡社会资本能力。”<sup>211</sup>李教授所言在海南侨乡同样实用，琼人作为跨国网络中的行为主体之一，发挥海外资源资本的优势和功能，促使侨乡有序形成，使海南侨乡的社会效益增值，影响着海南侨乡的人文景观和乡民的观念心性，逐渐形成海南侨乡社会生活特性。

那“跨国网络”究竟是如何建立的？首先来看网络需要具备哪些关键点，有人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通的节点，形成于曲线的自我交叉。它是开放的结构，

---

<sup>210</sup> “五缘”即地缘、血缘、神缘、业缘、物缘。

<sup>211</sup> 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页334。

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并且可以整合新的节点。只要它们可以在网络内部沟通，可以共享相同的交流信息。基于网络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极其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不危及其结构平衡的时候它会积极推动创新”<sup>212</sup> 格力维尔 (Grewal) 对“网络”的观点则有一些差异，他认为“彼此联结的人群以一种能够使它们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方式所组成的互通结构，可以通过包括商品和理念交换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以及网络成员可以彼此接近，便于相互合作的共享规范和惯例，网络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可操作标准的重要性。”<sup>213</sup> 总结不同学者的观点共识，对应琼人的跨国网络建立，如下：

一、跨国性。琼人在新加坡和海南两地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在两地建立家园，说着两种以上的语言，通过连续性、经常性的跨国互动联系而发展。

二、双向连通性。在中国，琼人的经济赞助大多投向祖籍地侨乡海南。在新加坡，琼人构建属于自己人的组织圈子，维系属于自己人的关系网络。他们通过个人、家庭、社团组织与侨乡间将架起跨国联动桥梁，只为增强彼此间的地缘认同和乡友认同感，形成共同发展的推动，这一双向作用力互为连通性。

三、跨国互惠性。跨国网络中信息与资金的流动，使海南侨乡对移民资源有效利用和增值。当然，在每一次跨国实践行为中，琼人也以互惠期望为依归，希望相互间形成更多有效的社会资本。

因此，跨国网络建构首先以关系性而存在，各种侨资资源互联互通为节点与侨乡横向水平联结，再从纵向层级交错，实现立体空间结构。在跨国界、多层次的有机结合中，琼人的跨国实践行为巩固加强了跨国网络结构，增强了跨国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源。并利用网络作用提高了彼此信息传递，增加了资本运用，传授了经验技能，帮助了同乡发展与照顾等等。故跨国网络不是静态的，是灵活流动的，是跨越时空的持续互动，网络给移民输出地和移民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立体网络中，互动模式是多样性的，在多层面的交相作用下，影响者海南侨乡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和现代社会发展，这些都是本章强调的重点。

本章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官方统计报告和实地调查考据，从琼人跨国网络建立对海南侨乡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出发，纵向分析不同时期琼人跨国实践行为特

---

<sup>212</sup>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501-502.

<sup>213</sup> David Singh Grewal, *Network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

征，横向对比中国沿海其他侨乡的跨国作用力，折射出琼人的跨国实践行为和海南侨乡形象的差异性。本章研究有助于丰富海南侨乡考察，进一步阐释跨国社会实体之间的联结，以及依靠移民建立起来的跨国网络模式和含义。而跨国实践和跨国网络都是跨国主义的核心概念，这正是本章研究的意义。

## 第一节 琼人跨国网络的经济互动

海南、广东、福建并称为“中国三大侨乡”，据统计，海南省有海外华侨华人三百多万人，分布于六十多个国家、地区，有 159 万多的归侨和侨眷，其人数占海南省人口的六分之一。<sup>214</sup> 以下是来自《海南百科全书》1993 年海南侨乡琼籍华侨华人的调查数据和分布情况，如下：

海南华侨分布国家、人数及占比情况

侨乡名称	华侨人数	分布多少个国家	归侨侨眷人数	占当地人口的%
海口市	52 万	22 个	30.2 万	20
文昌市	120 万	50 多个	38 万	68.1
琼海市	80 多万	28 个	22.2 万	45.3
万宁市	30 万	26 个	22 万	38.3
海南省	306 万	59 个	159 万	19.6

(以上数据根据 1993 年 10 月 23 日，海南省政府侨务办公室调查研究的数据，并参阅了 1999 年出版的《海南百科全书》等有关资料编制)

以上表格中的统计数据显示琼籍华侨华人分布广阔，人数占比突出，这是琼籍移民长期迁徙延续的结果，也是导致产生海南侨乡社会的历史产物。随着琼籍移民跨国网络的展开，与海南侨乡的跨国经济互动不断发挥作用，通过侨汇侨资，带动海南侨乡资金流动。在跨国经济互动中，侨汇是移民对侨眷的经济支援，侨汇的流入，改善当地生活水平，维护侨乡社会治安稳定。侨资成为移民跨国迁移后，一种特有投资和回报侨家乡的经济行为，增强侨乡海外资源的利用，带动了侨乡商业、工业、农业、交通业、医疗教育等发展。需要注意侨资和侨汇的区别，

<sup>214</sup> 林红生、樊云芳《海南著名侨乡》(以下简称《海南侨乡》)，(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页 1。

侨汇包括贴补家用，改善家庭住所的款项，数额较小；侨资是投资兴办各类公益事业和价值增值的经济资本，主要体现在地方投资建设，但当侨眷的闲散侨汇积攒一定数额，也会被用于进行投资。在跨国经济互动中，无论侨资还是侨汇，改善了侨眷的生活，改变了侨乡的发展面貌，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譬如，侨眷依赖性风气，炫耀性消费攀比，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戴一峰教授在谈到厦门城市生活依赖于侨汇、侨资时指出，在中国建国初期，大量来自移民的资金汇入厦门，使侨眷家庭比一般市民消费水平高，形成华侨消费市场，贫富差距明显。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侨资大量流入带动三大公用（点灯、电话、自来水）事业的建立，并促进厦门的工业产业发展，对厦门的人口职业结构影响明显，成为南洋经济发展的附庸。<sup>215</sup>戴教授从社会网络依赖层面解释侨乡现象，对比厦门的情况，海南侨乡一样深受琼人多重经济网络互动的作用。从网络架构观察琼人跨国网络经济互动中的关系，最小、最基本的网络组织——家庭，琼人从馈赠、道义出发，给予侨眷补偿，以实现家庭生活向上流动；另一层面——“海南侨乡社会”，跨国经济互动体现于促进当地经济、投资、建设、文化的发展。值得注意，在多重网络的跨国经济互动中，不同的关系与作用，使得琼人与侨乡间跨国关系持久并紧密，也使网络结构持续存在并活跃。无论如何，琼人跨国经济互动的影响，对侨乡社会农业生产结构和侨眷生活居住都带来变化。

在跨国经济网络的互动中，我们看到网络的三层关系：一、网络与侨眷家庭生活方面的关系；二、网络应用于侨乡经济建设的关系；三、网络受当地政治环境影响的关系。在上一段的论述中已体现一、二两点网络关系，第三层网络关系如下：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大批青壮年男性出洋，海南侨乡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遭到破坏，老弱妇孺如嗷嗷待哺，又由于清政府对出国移民基本呈否定态度，亲人与海外联系视为非法，故侨汇递转不易；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移民禁令被解除，华侨地位得以确认，这对于改善落后的侨乡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侨汇受到保护，移民回乡建造房屋、投资办业、捐学助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初期琼人回乡参与经济建设有较多热情，但后来中国政治政策波荡，海南侨乡的经济处于低速势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移民与侨眷关

---

<sup>215</sup> 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见《华侨与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系受到歧视和迫害，故海南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侨汇也大幅跌降；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海南侨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出台侨务新政，以此保护华侨正当合法权益，改善同海外移民的联系和合作，这对利用侨资资源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海南建省后，在政府和华侨共同作用下，更是将地缘优势和海外人缘优势相结合，为海南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从上梳理可见，侨乡的政治政策、经济环境、投资权益保护等，对移民回乡参与经济互动起着重要作用。政策生态环境的欠佳，使得琼人的跨国实践互动明显减少，海南侨乡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侨乡优良的发展环境，良好的政策前景，能充分发挥和调动移民回乡参与经济互动的积极性，巩固跨国网络的良性互动。

在跨国经济互动中，琼人除了参与改善海南岛落后的社会状况，促进侨乡兴建与发展外，还因熟悉侨乡的环境和人脉，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投资市场，故积极参与跨国实践。马斯洛就认为，“人们尽力获取更多资源的行为动机，受实现需求最大化的引导，跨国网络的建立正好满足琼人获取社会资源和付诸的行动。”<sup>216</sup>毕竟资本只有参与到市场投资中才有机会盈利，琼人在侨居国努力拼搏积攒资本，通过资金回流，回乡投资的渠道和行为，以期获得互惠互利的利益增值。事实上，跨国经济互动建构的背后，确实有琼人寻求自身资本效益的扩大化需求动机。所以琼人将资金投入在家乡的公路的建设，经济作物的根植，运输产业的开发等等。这些投资领域都是琼人经过理性判断后，通过跨国运作将侨资在与侨乡多元互动中寻觅最佳投资机会。特别是随着在中国改革开放，投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后，跨国经济互动行为不断增多。海南侨乡通过与琼人移入国劳动市场有机链接，在劳动力市场中实现价值效益转换，从而使琼人资本实现增值，在一次次跨国运作中海南侨乡社会也不断获益。利用琼人侨资资源，更好地推动了海南的现代化建设，公益事业发展，文化教育提高，达到跨国互惠期望，链接增值的特性，双赢互惠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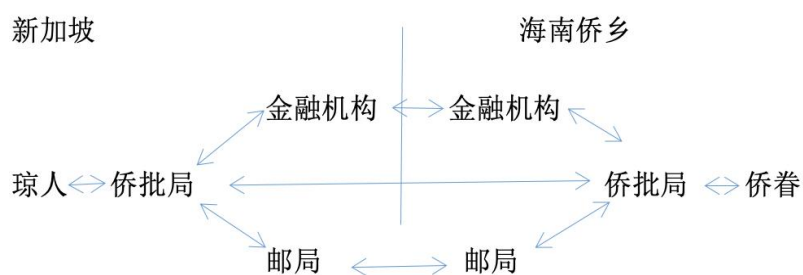
## （一）侨汇

所谓“侨汇”是指海外移民从事劳动所得，并从海外汇回侨乡赡养家属的款

---

<sup>216</sup> 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 4. 1—1970. 6. 8)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亚伯拉罕·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项。关于它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侨务政策文件中已明确说明，它是侨眷生活的重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外汇资金的重要来源，它是移民用于联结家人的纽带，也对侨乡的经济助力有积极作用。<sup>217</sup>从移民汇款的形式来看，最初侨汇可自己带回，或亲友回乡时帮带。在银行、邮政汇兑业务未建立前，还有专门转送侨汇业务的“水客”。譬如，清光绪年间，琼人张运吉等就以此为业，他们操着海南口音，让琼人感受到乡音乡情的亲切感和安全感。琼人便请“水客”，将侨汇携带回乡转交给侨眷。“水客”则通过获取手续费，汇款佣金按每单业务的百分之十收取，又或顺带做转口商业，借用汇款金在新加坡购买海南缺少物资，等物品销售完后，再将款项解如数付给侨眷。而驶回新加坡时，又从海南购买土特产运回贩卖，在往来中谋取利差，赚取利润。<sup>218</sup>通过水客汇带侨汇，并没有担保、也没有收据，主要依靠信用收揽业务。为了适应信用汇款和不断增长移民的需要，专门负责侨乡民间私人金融汇兑业务的侨批局、汇兑馆等侨批业应运而生。在海南，就通过这样的旧式金融信用机构，将海外侨汇汇入侨乡，进行赡养汇款和传递家书。一般地，侨汇网络的路径表现为：琼人——侨汇机构——侨眷的运行模式，整个侨汇网络是在政府机关、海外亲属、宗亲组织、侨眷等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下形成的。侨批网络的制度化则是通过侨批网络的构成单位制定规范、建立机构、确立共同价值观，遵循行业程序的运作过程。笔者绘制侨批业的经营网络，如下：



以上侨批网络的运作机制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本原则，在展开各种跨国实践行为时“根”的意义不容忽视，这是基于自身的对家庭的道义责任，使得琼人这一侨批网络得以运转。“民国以后，海南侨汇最高时光洋 2000 余万元，

<sup>217</sup> 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侨务政策正确处理归侨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广州：广东省档案馆藏，1961），第 4 页；张小欣《波动与稳定：1957—1977 年的中国侨汇政策》，见《东南亚研究》，2012 年第 4 期，页 86。

<sup>218</sup> 唐若玲《东南亚琼属》。

经济不景气时，500—600万元，一般情况1000万元左右。”<sup>219</sup>直到“1966年—1971年，侨汇徘徊在350万—400万美元之间；1978年—1983年，海南侨汇收入总额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2.1倍；1983年达到1532万美元。”<sup>220</sup>侨汇是琼人反哺侨乡的重要经济手段之一，除了运用于赡养家小，大部分还用于置地造屋。总的来说，早期侨汇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侨眷不仅依靠海外亲属的侨汇生存，也成为移民与侨乡建设间的重要媒介和“催化剂”，不少侨眷家庭甚至呈现出对侨汇的强烈依赖性。侨汇数量的增减必定影响侨眷的生活质量，在侨眷较集中的海南侨乡，也对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受此波动，侨汇网络维持着琼人与侨眷间的联系。

从琼人与侨乡间跨国网络的内在联系，移民汇款——侨批业出现——侨批机构产生，而侨汇数额大小对金融业的发展更是直接关联。据统计，海南侨批业在1900年—1910年增开2家；1917年—1927年相继开业12家；1928年—1932年，海口有23家，文昌、琼海有40余家，琼山、那大等城镇也都设有。1935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侨批局纷纷倒闭。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侨批局几乎歇业。此时，水客又活跃接受侨汇业务。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1948年，海口增设和恢复的侨批局有31家，1950年，通过海口批局进行登记的共有34家，资产总额在3740万元人民币。<sup>221</sup>从上述数据，侨批业的不断扩展和网络化，进一步解释琼人跨国经济互动的方式、机制和程度。维持上述这一跨国网络正常运作，一方面，有来自于琼人在侨居国的经济处境，关系到是否有能力侨汇汇入；另一方侨汇网络的民间性质受政治环境影响，成为制约琼人侨汇数量的重要因素。如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发动国内战争，通货膨胀，琼人为了减少侨汇兑汇后的巨大差价，选择请亲朋好友带回转交，或从香港经转，海南的侨汇业务生意也每况愈下。在海南沦陷时期和海南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受其政治因素、交通因素等方面影响，侨汇数量严重减少。新中国成立后，海南侨乡对侨汇业的管理和引导开始更加注重，鼓励海外琼籍移民向家乡汇款，侨乡政府对侨批

---

<sup>219</sup> 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琼侨》，页84。

<sup>220</sup> 郭照康、韩易〈四十年海南金融业发展概况〉（以下简称《海南金融业发展》），见《海南金融》，1990年第6期，页12-13。

<sup>221</sup> 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琼侨》，页85。

业处于接管或半接管的网络机制转变。当侨乡的供给相对充足时，侨汇是当地的主要交易工具，当物资欠缺或饥荒时，侨汇则成为救济物资。中国建国初期，当地政府采取争取侨汇的措施，侨汇数量逐年增加。在中国建国后至 70 年中期，琼人的跨国网络主要以琼人对侨眷的侨汇供给为主。但是，这期间随着“文革”的开展，侨眷和海外关系成为敌我关系，侨眷通过侨汇网络获得经济帮助更加谨慎，侨汇数量有所影响。<sup>222</sup>当然，这期间侨汇网络的发展也将受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如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琼人在侨居国的经济发展受大经济环境影响，汇入海南的侨汇金额肯定也有所限定。故跨国网络的建构受到跨国空间两端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制约影响。

侨眷作为海南侨乡民间社会网络主体的重要关节点，运用侨汇的参与、促进、活跃着当地的经济，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到，在《闽南华侨与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研究侨汇作用的论述中，戴一峰教授就指出，近代闽籍侨眷的收入百分之八十都来自闽南华侨的侨汇，厦门平均每年的侨汇数额 2000 余万元，侨汇是近代刺激和塑造厦门经济的主要因素。<sup>223</sup>戴教授还借用厦门主要商业之一的棉布业，以及销售情况受侨汇指数升降影响的案例，清晰呈现侨汇与当地经济发展与共的关系。足见，侨汇成为促进、刺激、塑造当地经济的重要因素，侨眷这一消费市场影响当地经济生活。同样在海南侨乡，随着琼人跨国网络的经济作用，运用侨汇流入反哺的经济方式，缓解了人口压力，维持了侨眷的生活，维护侨乡基层社会稳定的功效，对海南侨乡的社会生活、楼房建设、公用事业等注入新的活力，以多种形式发挥其作用，成为助推海南经济的动力之一。侨汇成为琼人与海南侨乡间联结的主要纽带，使之与海南侨乡保持着更为密切关系。

### (1) 道义“侨汇”改善生活

“道义”顾名思义道德义理，义理来源于亲属、朋友间的感情。道义经济何以形成？斯科特(Scott)的“道义经济”(morale conomy)从“经济学领域”出发，以集体认同感“维持生存经济”，在“风险回避”和“安全第一原则”的庇护关

---

<sup>222</sup> 郭照康、韩易《海南金融业发展》。

<sup>223</sup> 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页 68。

系和互惠原则中所体现。<sup>224</sup>具体来讲，一旦发生无法应付正常生活的风险，或难以提供正常生存生计所需时，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交换关系来进行道义帮扶和应对。譬如海南侨乡家庭中，由于男性劳动力出洋打拼，打破原有保障交换中的互惠和庇护机制，使侨乡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大幅度下降，侨乡家庭大多只剩下老人、小孩、妇女，严重短缺青壮年劳动力，迫不得已，侨眷只能雇农顾田。在学者林瓚春先生的调查中就表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如下：

“文昌昌锦村、云楼村是出洋人数较多的两个村庄，两村分别有十分之七和十分之五的男性出洋。雇工经营农田的有昌锦村 36 户，云楼村 20 户，加起来 57 户，仅这两村就差不多占文昌农户 2153 户的百分之三十七。雇农价格每年在 30—50 元间。”<sup>225</sup>

为了弥补家庭互补关系和劳动力的缺失，此时琼人只能通过侨汇形式，帮助留守亲属摆脱贫困。特别是自身经济情况稍优越的琼人，将支助亲属、宗族乃至侨乡，视为自己应尽的道义，也被看作一种馈赠似的“还债”，在海南家谱中就有记载：

“安云，早年青年时代远渡重洋到新加坡谋生，其先开设旅业交通，后改行创办百轮商行自任懂事经理……乡情浓厚，重修旧宇，建祠联修谱……专程反里主持建祠升梁仪典，深受族众赞誉。”<sup>226</sup>

琼人外出谋得钱银后帮助故里旧屋建设，改善居住。当这份道义馈赠得到族人赞许和认可时，也将激发琼人更多的道义跨国支助，再如：

“安球，青年时代出洋谋生，经办饮食餐厅，善于经营……乐善好施，乡情浓厚，捐款全族之冠，父子慷慨捐助，接济亲友，深受族众赞誉。”<sup>227</sup>

当侨乡亲友从琼人的道义中获利时，琼人的个人财富和社会威望便得到认可。在情感纽带的基础上，以及道德评判的刺激下，当琼人感到自己被重视、被尊重时，会激发他们与侨乡亲属间的紧密联系，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帮其改善生活，使侨汇网络的发展在“道义”经济的刺激下也不断深入展开。所以“道义

<sup>224</sup>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昱、刘健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页 12。

<sup>225</sup> 林瓚春《琼崖农村》（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1935），页 14。

<sup>226</sup>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

<sup>227</sup> 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页 1107。

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一、在跨国经济往来中，琼人的身份认同、道德责任感、集体记忆等态度，是道德资本与社会资本得以运作的重要推动力；二、取决于琼人自身的努力，以及在侨居地的社会资金资本积累情况。当然“道义经济”的馈赠形式多样，有定期侨汇、公益善举、技术支持等，本节主要以“侨汇”的跨国实践作用为研究对象。

“道义”侨汇寄回的最主要作用，是改善侨眷生活的衣食住行，在陈达研究的闽地华侨与非华侨社区的对比中，以农作物和少量副业收入为主，华侨社区除了拥有广大田地外，还依赖侨汇的汇入。呈现出华侨社区比非华侨社区在饮食方面更加丰富和营养。而同样的产业价格，华侨社区也远比非华侨社区高出数倍，故侨汇给华侨社区家庭的衣行方式带来了改善，影响侨乡当地的物价价格和经济活跃度。<sup>228</sup>我们从对民国时期对一百家华侨家庭的衣食住行进行的拣样调查中，从“食”进行观察：

#### 100 家华侨家庭的主要食品

##### 1、民国二十四年 1 月

谷类	用户	蔬菜	用户	鱼肉	用户
本地米	67	白菜	99	猪肉	68
小绞米(A)	39	格兰菜	87	大头鱼	57
福建米	35	飞龙菜	84	红口鱼	50
大绞米(B)	31	蒜	82	江鱼	37
		豆芽	56	鲨鱼	37
		豆干	27	草鱼	29
				茆只鱼	26

##### 2、民国二十四年 7 月

谷类	用户	蔬菜	用户	鱼肉	用户
本地米	65	应菜	95	猪肉	73
安南米	35	格兰菜	85	申鱼	57
福建米	25	白菜	65	壳肉	44

<sup>228</sup> 陈达《南洋与闽粤社会》。

		粉豆	59	虾仔	43
		竹笋	57	鲈鱼	42
		韭菜花	53	草鱼	39
		豆芽	51	沙虾	37
				江鱼	31
				熟肉	28

(资料来源:李文海、夏明芳、黄兴涛《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sup>229</sup>)

侨眷通过侨汇的帮助,在食品选择上更加丰富,而海南侨乡的社会经济生活深受侨汇影响。如民国十年时,海南东北部,琼山、文昌、乐会、琼东共有人口 997758 人,占当时海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四,户数又 156938 户,每户人口均数为 6.36 人。<sup>230</sup>每人每年约获得侨汇 10 元,每户约得 60 多元侨汇,依据当时的文献调查,这些侨汇资金,足以赡养八个人。<sup>231</sup>对比当时海南物价,如下:

“市面所售牛肉,以琼山文昌两县最贵,每斤常在二角至二角五仙;次则琼东、乐会、定安、万宁每斤常在一角七仙至两角一仙;鸡鸭,琼山文昌每斤贵至四五角;海鲜、豆、薯、糖、油、柴、炭、竹木、果实等,平于内地,烟草和蔬菜,则贵于内地倍蓰矣……琼山、文昌田价归至百元至两百元间”。<sup>232</sup>

对以上物价数值观察,在海南岛东、北部出洋者打拼较集中的侨乡市县,他们的消费比其余市县明显偏高,助推当地物价上涨。侨汇的流入,使海南四县(琼山、文昌、乐会、琼东)的生活水平远高于海南岛其他地区,使家眷的生活开支更具保障,也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一、侨汇对侨眷的生活带来了改善,对其消费方式带来了变化;二、侨乡不少家庭成为消费型群体,购买力增强;三、资金流入的增加,刺激了海南侨乡的商品经济发展;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使用侨汇雇工耕田的出现,也给海南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转变。

<sup>229</sup> 李文海、夏明芳、黄兴涛《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页 212。

<sup>230</sup> 陈铭枢《民国海南岛》(神州国光社,1933),页 74。

<sup>231</sup>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推广部《琼崖各县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琼崖各县农业调查》), (台北: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

<sup>232</sup>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推广部《琼崖各县农业调查》,页 27-28。

除了侨汇的用途，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侨汇的数量，详细观察 1951——1990 近海南四十年的汇寄款项数据，如下：

1951——1990 年海口市侨汇收入

单位：美元

时间（年）	金额	时间（年）	金额
1951	974351	1976	383673
1952	819136	1977	500932
1953	589660	1978	752452
1954	419056	1979	826633
1955	308253	1980	975610
1956	216645	1981	795533
1957	207538	1982	1342458
1958	184196	1983	1359675
1959	175011	1984	631636
1960	247321	1985	359564
1961	293220	1986	327181
1972	770398	1987	165611
1973	595778	1988	89025
1974	558014	1989	2053
1975	424293	1990	1355

（上述表格数据引自：海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市志》<sup>233</sup>，注：由于海南建省后通过侨汇部门汇款逐渐减少）

以上是海口市 1951——1990 年侨汇收入表，由于转汇途径多条，故笔者很难详细全面地估量每一时期具体汇入的侨汇数额。但是，从上述数据中能确定的是，无论处于什么年代，侨汇网络在琼人与侨眷几十年间，从无停止过。（侨

<sup>233</sup> 海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市志》（以下简称《海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汇数目，还可参照附录十五）他们的道义资助在这些侨汇数据中一并呈现，既是琼人回馈亲属的重要见证之一，也是琼人跨国界互动中，影响海南侨乡的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物证，直观体现琼人道义实况的跨国主义面貌。

## （2） 侨汇——修缮祖屋

侨汇除了用于维持侨眷的日常生活，还有修缮、重建老宅的用途，特别是早期出洋琼人，他们并无在侨居地永久居住之意，大多有“叶落归根”的恋乡情节。侨汇是当初外出拼搏奋斗的动力之所在，故乡的“家”是根基之所在，故侨汇不仅用于住宅方面的开支，且占比较大，甚至还以修建家业为荣。既有帮亲属改善居住环境的责任，也有地域认同的价值表现，还有“光宗耀祖”之意，琼人希望借此通过“人人看得见”的房屋，展示自己的成功，荣耀于乡里。所以，侨乡祖屋的豪华是移民在外奋斗成果和家庭显赫的一大标志，琼人乐于寄回侨汇，修缮气派祖屋，既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家业兴旺，也能使直系亲属在乡友中得到更多尊重和羡慕。以新加坡 12 位名商人之一的王绍经为例：

王绍经（1860—1939）祖籍海南省琼海温泉镇石角边村人，因年少家贫，24 岁仅带四块光洋便只身漂泊新加坡。起初抵达时，他从收入微薄的苦工干起，省吃俭用，拼命干工，将银两积蓄汇回给妻儿老小家用。为了通过自身的努力以此来改善家庭的贫困，王绍经曾历经千难万苦和磨难，不断尝试和挑战新产业。最后凭借能吃苦、有智谋、负重任，使得他的生意屡屡成功。十九世纪初，他成为了琼籍侨领，红顶商人，曾任新加坡琼崖王氏祠堂首任总理、新加坡四海通银行董事等职务，如今的新加坡依然有“绍经街”的街名。<sup>234</sup>

王氏带着改善家人境遇的责任和信念出洋打拼，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一点点财富的积累，在二十世纪初，王绍经让长子王先树携款回乡，把这份富贵荣耀一并带回，在旧祖屋旁再新修建气派祖屋，王氏祖居如下图：

---

<sup>234</sup> 张朔人、于苏光著《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以下简称《华侨与海南社会》），（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



（资料来源：摄于王氏老宅照片留存）

虽然，年代已久，但从王氏祖宅的每一片瓦，每一段墙，每一扇窗，都向大家展示着他过去的成绩与荣耀，无疑最直观的显现就是修建了豪华祖屋。这不仅令整个海南琼海乡邻羡慕不已，看着显赫的屋舍，又有谁能忘记王绍经的名字，以及他在南洋闯出了名堂和荣光呢！王宅大院细节如下：

王绍经祖宅，占地五亩、三间青砖大瓦房、两行横廊、四面围墙环抱而成，建筑内的工艺不仅精雕细琢，也构筑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和乡土情怀。宅子的总体布局依照海南民居中“同字吊球”的建筑风格，按海南老辈人的说法，“同”字形的主屋和横屋格局，寓意着吉星高照。“吊球”式，高高竖起的阁楼，寓意着事业高升。屋内陈设着用好木精雕细琢，内容丰富的窗棂、壁橱、家具等，古色古香。正门悬挂着红底耀金“资政策”匾牌，墙上筑有枪眼，正门设有牌的王。

235

王绍经发迹后把这份荣耀和辉煌一并带回海南侨乡，虽无时间回老宅居住，但王氏后代每年基本回乡祭祖看望。王氏从最初建房为家人居住得更好，到让子孙继续回乡修建气派祖屋，不仅是赤子之心，富贵不忘“根”，也是希望后辈传承学习，代代不断接济兴旺。不仅如此，王绍经还在海南琼海出资捐建有“王绍经图书馆”、“王绍经水泥桥”、捐助资金建医院等等。

笔者走访海南侨乡各城镇，随处可见南洋建筑痕迹，庭院中还有从南洋带回的热带植物。譬如在新加坡经商发迹的符氏三兄弟，他们海南文昌的符家宅，一

<sup>235</sup> 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

共三栋，兄弟三人各一栋。大屋的大门、廊道、门窗、墙体都是南洋骑楼的建筑风格，墙体、栏杆、门窗的雕花则采用南洋欧式泥塑雕花图案。房屋的建造和装饰都是三兄弟的侨汇所建，深切感受到琼人奋斗的“南洋梦”，而这个梦以侨汇为媒介和显现。这些用侨汇修建的旧时建筑物，从中也体现了琼人的乡土情怀。再譬如海南琼海曾经的三大巨商之一——黄实甫的府邸。黄氏早年在新加坡开设多家商业机构，奠定了雄厚经济能力后，不惜花重金从南洋运水泥、钢筋、坤甸木，建造了 82 间房间，116 扇窗户的豪门府邸。整个宅院造型骑楼式，院内植物萦绕，是一座三进两层中西合璧的豪宅。我们发现，琼人只要条件允许，大多会回乡新建或修缮房屋，祖屋不仅琼人的家之所在、乡根所系，也能证明自身的兴衰荣辱。另据统计，1949 年以前，在侨乡凡是漂亮坚固的房屋基本是侨户建设，以 1949 年以前海南侨乡文昌乡镇的侨房建设情况为例，如下：

乡 镇 村	侨房建设情况
绘文镇胡村	侨房 18 行，壮观漂亮。
迈号镇下山陈村	琼人陈行佩为村内兄弟建 16 座房，高大美观，闻名全县。
会文镇后昌村	琼人史立谐，八十年建有庭院、客厅、餐厅、厨房、浴室等舒适阔气的正屋，陈设庄重高雅的家私；九十年代又建环境优美的椰庄别墅，资助兄弟几人盖几座新屋。
重兴镇凤岐山村	乡侨林熙书，斥巨资建中西合璧的园林宅院，十分幽雅。
昌洒镇陈家村	陈泽荣，建 3 座传统家屋和两层高住宅楼，还建楼高三层，占地十亩的园林别墅，院内游泳池、鱼塘、汉白玉雕像等，十分美丽。

（资料来源：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昌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琼人重建的宅院，不仅将南洋风情，西洋文化，建筑雕刻艺术带回到了海南侨乡，房屋整体建筑要比普通民众家好很多。当初为家庭生计所需而奔走出洋的琼人，后能在故土置地建屋，毫无疑问，必定也是勤奋、节俭的积累。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只要出洋琼人发财致富或攒有余钱，都会在侨乡买地建房。重建房屋对于琼人来说，不仅仅希望家人能遮风挡雨，乡情寄托的地方，也有“显宗耀祖”

之动因。

总的来看，琼人寄回侨汇是自身行为道德的原则，更是对侨眷的赡养责任和主要生活来源。基于此，琼人往往利用侨汇进行资助，促进了移民与家乡间无偿性跨国实践行为关系。不仅凸显了琼人对侨乡“根”的无私慷慨情感，自身“光耀门庭”的愿望也得以满足。从生活消费看，侨眷家庭与非侨眷家庭相比，生活更为优越，消费水平能力较高，对侨乡商业发展有刺激作用。从琼人所建之屋的建筑来看，侨眷家庭的房屋胜于非侨眷家庭，陈设、装饰整齐精美。其中呈现出，琼人与侨眷作为跨国网络的行为体建构，“侨汇”作为媒介关系连线，在这条连线中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点”，琼人和侨眷互享网络资源和赞誉。如故男人出洋女当家，运用侨汇道义交换补偿，再如侨乡受惠者为表达感激，给予琼人声誉认可，时期内心得以满足等等。通过这一跨国网络运转机制，清晰看到琼人与侨乡间互动的内在逻辑，侨汇与当地生活消费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道德资本与社会资本则是道义经济得以运作的重要推动力。

## （二）互惠互利：侨资

受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琼人与侨乡跨国网络中的经济行为，纯粹因声誉而馈赠家乡的吸引力随时间慢慢下降，转变为可盈利的新跨国实践行为关系，其展现的形式就是——“侨资”，它是侨民用于投入回国的资本。值得注意，我们前面说的侨汇是移民责任道义的体现，但侨资更多是资本投资，其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琼人将侨资参与家乡的经济发展，更多以互惠期望为依归，期待自身的资本价值得以增值。王赓武教授就指出，华人基于爱国和慈善汇款回乡的时代并未流传下来，如陈嘉庚之前按期汇大笔款项资助家族，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并未传承，而是演变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注重投资的时代。<sup>236</sup>所以，移民跨国网络的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逐渐衍生、层次增多、覆盖面更广的互利性跨国网络经济形态。

琼人的侨资汇入对海南侨乡城市建设、民间社会结构、公用事业等无不得到推动。以民国时期进行观察，琼人侨资投资海口房地产市场，侨资投资额占整个

---

<sup>236</sup>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见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等联合出版，1995），页19~32。

市场的百分之七十五，总额约 1500 万元（银元）。1935 年，海口有 22 家旅馆，20 家来源于侨资开办。<sup>237</sup>海口的标志性建筑得胜沙路的德利影院（今海口大厦），也是琼人侨资修建而成。琼人参与建设的城市建筑景观，不仅呈现出商业化趋势，无疑也对海南侨乡的城市美化和产业结构带来变化。再看金融业，1945—1949 年，琼人投资兴办的金融业 39 家，62 万银元，侨批局 27 家。“从二十世纪初到 1950 年，琼人投资办实业总数达 1800 多户，总金额近 3000 万银元，占这一时期广东省华侨投资第四位。”<sup>238</sup>侨资项目更是涉及运输产业、热带农作物、房地产业等等，为海南发展现代经济奠定了经济基础。下面琼人投资海南侨乡各行业的详细统计情况，如下：

琼人投资海南侨乡各行业统计表<sup>239</sup>

单位（人民币：元）

	合计		-1919 年		1919-1927		1927-1937		1937-1945		1945-1949	
	户	投资数	户	投资数	户	投资数	户	投资数	户	投资数	户	投资数
合计	1813	28990401	85	3410590	857	12632188	583	9994169	22	111160	296	2842294
工业	8	140500			3	65000	1	15000			4	60500
商业	96	223476	4	286000	6	647000	18	701325			68	590436

<sup>237</sup> 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

<sup>238</sup> 张朔人、于苏光《华侨资本与海南产业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sup>239</sup> 林金枝、庄为玟《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以下简称《近代华侨投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页 113。

农 矿 业	10 8	41 09 37 2	16	239 220 0	9	314 698	4 4	121 359 4	2 2	111 160	1 7	777 20
交 通 业	42	90 85 00			15	615 000	1	120 000			2 6	173 500
服 务 业	38	27 08 54 8	9	248 390	5	108 989 0	8	132 545 0			1 6	448 18
金 融 业	51	68 80 20	26	474 000	19	198 000	1	200 0			5	140 20
房 地 产 业	14 70	18 20 07 00			80 0	970 260 00	5 1 0	661 680 0			1 6 0	188 130 0

（备注：（1）农矿合在一起源于儋县一带许多公司既植胶又开矿；（2）此次调查主要涉及海口、文昌、琼海、儋县等）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知，琼人参与侨乡基础产业发展涵盖面广，一方面，金额的流入与琼人地缘认同的社会背景相关；另一方面，琼人希望自身资产资本能稳健增值。而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在侨乡投资得到了不错的收益。譬如，1935年，香港《工商日报》曾记载：

“数十家侨资企业参与投资海南那大锡矿开采，其中成立于1933年的万发公司，自1933年至1938年上半年，投资200000元，除不动产外，其盈利约有20万元。该公司开办两三年后，便由一个矿区发展为九个，获利颇丰。”<sup>240</sup>

投资利益得以回报，驱动后人也不断跟进。自1950年6月海南解放后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琼人在海南侨乡的投资行为有更大数额的投入。

#### 改革开放后琼侨企业分布情况

<sup>240</sup>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页292。

分布市县	海口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省直企事业	省华侨农场	五指山市	儋州市	综合技术服务	三亚市	陵水县
家数	522	22	37	6	27	2	2	2	22	3	3
投资额 (万美元)	108654	14179	13275	337	19085	1655	572	69.7	2	5970	5

改革开放后琼侨企业资本投资领域情况

投资领域	房地产	制造业	社会服务业	农林牧副渔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	餐饮业	采掘业
家数	301	283	200	181	64	28	22	10
百分比 (%)	27	26	18	16	6	3	2	1

(转引自：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口：南方出版社，页110)

随着投资领域的广泛，资金注入的增多，故下表中投资额的统计单位从上表的人民币核算，改用美元，以便更直观的统计观察，如下：

1978年后琼人侨资在海南侨乡的发展情况<sup>241</sup>

市县	家数	投资额 (万美元)	投资领域	家数	百分比
海口市	522	108654	房地产	301	27
文昌市	22	14179	制造业	283	26

<sup>241</sup> 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页110。

琼海市	37	13275	社会服务业	200	18
万宁市	6	337	农林牧副渔	181	16
省直企事业单位	27	19085	建筑业	64	6
省华侨农场	2	1655	交通运输仓储	28	3
五指山市	2	572	餐饮业	22	2
儋州市	2	96.7			
综合技术服务	22	2			
三亚市	3	5970	采掘业	10	1
陵水市	3	56			

上表中，侨资在海南侨乡注入较多是海口市，投资户数和金额最多行业仍是房地产。这也佐证侨资注入侨乡的理性选择因素，因为投资就是买一个城市的未来，投资位于本省经济人口市中心海口，相较于上表中侨乡其他市县的前景更加客观。而选择投资房地产业，收益比较稳当，回报率相较于上表中其他产业更高。加之“华侨早有‘买田起厝’的习惯，他们在‘显祖耀宗’思想支配下，也乐于投资房地产”<sup>242</sup>。可见，琼人投资在侨乡市镇和产业结构上都有分析考量，是经过理性后的选择，更是一种趋利的跨国盈利实践行为。1988年海南建省，琼人在海南侨乡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侨资资金进一步大幅度增加，涉及旅游业、金融、矿业、贸易、通讯、商业等等。（有关侨资在矿业方面的历年投资情况，还可参照附录十五）其中海口市，在1988年—1996年间，实际引进侨资就有25.64亿美元。琼人侨资从投资—发展—扩大，不仅给自身带来盈利，也加速了侨乡商业的兴起，市政市容的改观。从海南侨乡民间歌谣里能看到，侨资助推海南侨乡

<sup>242</sup> 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广东的投资（1862—1949）〉，《暨南学报》，1988年第1期，页34。

发展景象，如下：

“不唱侨乡昔日苦，单唱今日喜事多。

冯昌沟上渡槽架，渠道两旁漾金波。

碾米工厂已落成，机声隆隆震山河。

大路四通又八达，汽车嘟嘟村前过。

海外赤子恋故土，投资建设赤家乡。

教学大楼新建成，适龄儿童全上学。”<sup>243</sup>

从这首唱诵海南侨乡交通运输、工厂建设、建筑等发展的歌谣中，明显看到侨资对侨乡现代化进程的建设有着显著的作用。琼人投资交通业，也是出于迫切希望改善侨乡的运输落后面貌，因为“路通”才能“财通”，其投资能帮助他们其他产业扩大路径和提高效率。而工业方面的侨资投资，与其他产业相比相对偏弱，海南侨乡的工业发展上百年来都发展缓慢。这是因为工业投资一般比较大，如与房地产平均每户的投资额相比是5:1，设备技术需不断更新换代，管理要求较高，风险较大，投资周期长，难以见效益。

除了上述提到投资产业外，农业也是琼人参与重点，譬如投资于橡胶业的成果。因为海南地理气候适合橡胶生产，能使产量逐年提高，琼人便把橡胶种子带回故土，琼人何麟书就曾被誉为中国橡胶种植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年，何麟书下南洋，在胶园当工人、学技术，日后他将巴西三叶品种橡胶种苗，带回海南侨乡种于定安县落河沟，虽仅250亩地，但产胶量富余，逐渐形成规模。加之，对新加坡橡胶产业市场的深入了解，他又把物美价廉的橡胶运往新加坡销售，创造了丰厚的盈利。<sup>244</sup>日后，琼人纷纷将优良橡胶品种引回海南侨乡，也把科学的种植技术一并带回，帮助侨乡当地技艺水平提高不少，促进侨乡橡胶产量大幅增产，加速了侨乡当地经济发展，也为自身创造了经济回报。前人成功后人效仿，再如民国四年（1915），新加坡琼人卢宏耀、卢修滋回乡开辟茂林胶园，发展种橡胶产业，成立茂林公司；1938年，旅居新加坡的蔡俊德、梁秀南等人合资开

<sup>243</sup> 王春煜〈侨乡今日喜事多〉，见《海南歌谣》（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页141。

<sup>244</sup> 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

辟胶园，在乐会县会山乡毛野园种植橡胶；1948年，黄开吉先生虽身在新加坡，但积极投资开发建设家乡，出资委托友人杨桐昌在海南琼海会山乡，建万和园胶园种植橡胶；1950年，从报纸上得知中国政府鼓励华侨回乡投资的政策后，侨居新加坡的黄开吉带领亲人开荒种植1.2万株橡胶，胶园地处海南会山乡南塘山，这些都是琼人投资偏好的印证。因琼人在居住国所从事的领域，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资源，又因熟悉海南的地理和区位优势，属高温多雨的热带季风气候，与新加坡的气候极为相似，所处地理位置不仅适于橡胶种植，相关的人力和物价成本也有利于盈利，故注入侨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琼人对海南侨乡经济作物的投资，领域不断增多，范围更深。如新加坡琼人潘家东与同乡合作，在乡投资荔枝100多亩；新加坡商人王兴春，在琼海投资100多万，创办长春农庄，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共占地300多亩；新加坡乡亲在文昌投资养鱼产业等等。最后一项投资，也是因海南海湾具有天然的海水养殖优势，许多琼人瞄准家乡的投资宝地，大力投资办养殖产业。为资本增收创造天时地利之利，有的琼人还从异国带回新的热带作物，试种成功后，便开始在侨乡大范围扩大种植。譬如，琼人引进咖啡苗，种于海南文昌、儋州那大、琼山、万宁等市县，形成种植生产规模后，远销东南亚；胡椒的引种，也是琼人为海南侨乡带来的新味觉，引进前海南岛并无此类调味品，琼人冲破侨居国禁令，将胡椒苗带回试种成功后，分布于文昌、万宁、琼海等市县广泛栽培，近几年，海南每亩平均产量100公斤左右。这些投资产业不仅帮助海南农业多元发展，新物种的出现也使琼人从侨乡这片“处女地”上增收获利。再譬如，烟叶、棉花的引进。虽然棉花是海南的重要出口物，但早期海南并不产棉，直到琼人引进优良棉种。海南人喜欢抽烟，但种植技术并不成熟。直至琼人开办的商业公司对其种植技术进行改良，产值和质量才所转好。<sup>245</sup>琼人在经济投资方面，除了引进新原料，向侨乡投入资金外，还有不少琼人采用两地间跨国合作投资。譬如海南侨乡澄迈县的华侨农场与新加坡南海油棕公司合作的“油棕”项目，“油棕”是热带本木油料作物，是公用油料和防腐剂的工业原料。跨国合作项目油棕，在海南侨乡农场共建一万多亩，不仅解决当地部分百姓的就业问题，产品的试种成功，也推动优良品种的发展。由于农业种植生产周期偏长，回报的利润丰厚，故

---

<sup>245</sup> 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

琼人在热带经济作物方面的投资尤为突出，使其经济投资达到双赢。

改革开放 1978 年以后，许多琼人用侨资投资建设的村庄不断显现。如文昌会文圩建侨属企业街，不少侨属企业进驻侨属新街。侨乡不少村庄的地理位置适合搞开放性种养，沙港的滩涂成为琼人养虾、蟹、鱼的基地，以此造活地方经济。侨资的投资还在新桥、潭牛、锦山、重兴、迈号等乡镇，投资养鸡基地、种植园、农场等。<sup>246</sup>琼人在海南侨乡的投资额，随政治政策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波动而影响。1919 年—1949 年间，琼人在海南侨乡的投资总额大约在三千万左右。<sup>247</sup>1988—1993 年，侨资在海南侨乡的合同投资额增值 63.8 亿美元，实际投资额 14 亿美元。这一时期也是东南亚的经济繁荣时期，琼人的经济实力也趋好；1994 年—1998 年，侨资投入海南的合同投资额 40 亿美元，实际投资额 30 亿美元。由于，1997 年 7 月，东南亚金融风暴，琼人在侨乡的投资从短期获利的投资行为，转为长期稳健的投资方向；<sup>248</sup>1999 年—2003 年，侨资投资金额达 42 亿美元；2004 年，侨资投入高达 80 多亿美元。<sup>249</sup>近年来，海南侨乡的各类琼籍跨国合作和投资更是不胜枚举。琼人与故土的跨国实践投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侨资投入增长额不断翻新，这也出于熟悉家乡环境精准投资避免损失，以及对自身资本的增值保值的需求。

总体而言，侨资在侨乡分布较广，在投资领域上表现出集中性，这与琼人的出洋职业经历和经济实力有关，也与海南侨乡无法比拟的自然环境优势相连。随着海南侨务政策和营商环境的改善，琼人在侨居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加之前人投资家乡的成功案例，琼人在故土的投资行业类型多样化，侨资投入更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琼人回乡投资的热情更是高涨。有的利用自家资金独自投资家乡建设，有的联络他籍侨商共同开发，各类资金回流落地海南，为海南的快速发展注入了资金支持和技术保证。同时，琼人将侨资资本投资于家乡的建设，而资本本身是用于增值的货币。所以在这一跨国实践行为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追求资本增值的价值取向，琼人也从中获取了丰厚利润回报，实现了跨国实践的双赢结

---

<sup>246</sup> 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志》，页 567。

<sup>247</sup> 林金枝、庄为玟《近代华侨投资》。

<sup>248</sup> 林海宁《我省侨资企业发展状况调查》（海口：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编印，2004），页 89—90。

<sup>249</sup> 陈永楠《第一次全省侨情调查报告》（出版社不详，2006），页 178。

果。可以说，“跨国网络”中的侨资投资，所蕴含的是祖籍地域归属认同；“跨国资本”所扩延的是国际资本资产融合；“跨国资源”所包含的是中西社会资源的可利用。资金、信息、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能影响琼商在侨乡当地的持续投资热情，也能造活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与生机。当然，在这些投资建设中，笔者也发现了不少给侨乡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这是由于地方政策体制、当地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节将详细论述）。无论如何，跨国网络中的侨资投资行为，都强化了琼人与故乡的联系。琼人既是家乡经济上的投资者，又是信息上的传递者，发挥着网络发展的重要功能需求。

### （三）侨资利用情况

从社会学角度看，“网络由行为体人或组织间的关系联系而成，网络成为移民经济跨国发展的重要概念。网络是一种组织逻辑，是经济行为体间的一种治理形式”<sup>250</sup>，网络主体成员提供点线面彼此接近，享受网络中的互惠性。在经济领域的跨国网络联结中，侨乡的政策、营商环境等多重路径与侨资利用具有关联性。从上节论述中看到，在海南侨乡发展历程中，吸引了一部分侨资回乡投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海南侨乡在建省以前，对琼人投资政策和投资环境不够重视，没有充分利用侨资资源，导致侨资注入活力不足，在侨资总量远远落后于中国沿海其他侨乡城市。所以，与中国“三大侨乡”中其他两大侨乡福建、广东相比，侨资利用方面远远低于二者，其投资数额和效率相差落后。据统计，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广东珠三角地区 80%来自于侨资，福建的企业也有 70%来源于侨资投资，但海南华侨的数量与侨资却不成比例。<sup>251</sup>当侨资形成一定规模时，又会吸引更多他籍华侨跟进投资，追求资源资本力量效益，对跨国网络主体两端的意义和作用不可小觑。基于侨资盈利性跨国实践的目的，如社会学家布劳所论，社会的吸引和交换过程，源于追求报酬的欲望，只有社会各主体遵循“互惠规范”的概念，社会关系才能持续交换。<sup>252</sup>这就需要侨乡做好侨情调查，保护好侨资开发政策，

<sup>250</sup> Walter W Powell and Lorel Smith-Dor, "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 *Journal of Economic Sociology* 4, no. 3 (2003): 368-402. doi:10.17323/1726-3247-2003-3-61-105. 368-402.

<sup>251</sup> 珠江三角洲范围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九个城市。

<sup>252</sup> 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创造投资软环境，利用好侨资资源提升发展效率。接下来，我们纵向来看，海南各时期在政治环境影响下的侨资特点，海南侨资从无到有，为海南侨乡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跨国经商的经验。但是，将海南侨乡与广东其他侨乡城市相比，侨资投资比例较低，如图：

广东各地区侨资投资占全省比例%

	广州	汕头	江门	佛山	海口
1902— 1919年	15%—20 %	30%—35 %	30%—3 5%	10%—13 %	5%—10 %
1919— 1927年	38%—40 %	15%—20 %	30%	5%—10 %	10%—13 %
1927— 1937年	48%—50 %	17%—20 %	23%—3 0%	5%	8%
1937— 1945年	20%	30%	32%	15%—18 %	2%
1945— 1949年	28%—30 %	30%	29%	4%	6%

(数据来源：根据林金枝、庄为玟《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6、49-50、55、60、63-64整理统计)

总的来看，海口的侨资投资比例基本处于各侨乡之末。其中，有受政治局势影响，导致投资主体缺乏积极性。海南地方政策缺乏长效机制，时局多变，缺乏稳定性，侨资流量的增减与当地政策的激励机制相关。当然，琼人在外的资本积累，自身经济实力也有直接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后，中共中央对海南开发建设制定出台战略思想，这使一直关注海南侨乡的琼人备受鼓舞，回乡投资创业的琼人不在少数。将这一时期分为四个时间段观察，1978—1987年，这时海南隶属广东省，侨资主要从事加工业和农业开发，处于起步阶段。1988—1993年，这期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但由于海南作为独立省还在建设起步阶段，当地营商环境还在完善中，故暴露出了不少投资问题，导致琼人资金亏损、产业单一、科技含量低、对政府不信任，以及损害侨乡的侨资利用和破坏投资环境形象等突

出问题。譬如：

#### 案例一

新加坡琼人韩氏，在这一时期投资建设文昌的华侨农场，动用 1600 万人民币购买农场房屋，原本想在廉价的屋价上开发旅游业和农产品，最终由于房屋没有产权，导致房屋变成“烂尾楼”，既不能专卖，又不能开发。虽已交土地定金，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将定金退还，土地再卖给其他公司，并且在退还资金的过程中拖延十几年之久。协调过程中，政府对于这样的征地纠纷呈现出回避态度，使韩氏损失惨重。<sup>253</sup>

从上述案例，琼人虽在海南侨乡购买土地开发建设，但投资环境不如人意。归根结底则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信用缺失。为了能快速获取资金，不把土地权限及时告知，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可想而知，最后的损失肯定影响了海南侨乡的投资信用，以及影响琼商回乡投资信心。

改革发展时期 1994—1998 年，由于海南投资结构的不合理，这是海南社会受泡沫经济破坏影响的严重时期。侨乡当地政府开始调控侨务政策，帮助侨资企业走出低谷。海南省政府更多关注和重视，之前不合情理、不合规定的投资领域，出台各种政策措施维护侨商的权益，设立法院涉侨纠纷调解办，防止纠纷重复发生。譬如：

#### 案例二

琼人邢氏回海南侨乡文昌，将一个牛场投资为高尔夫球场，但八年的时间里纠纷不断，最后文昌政府协调帮办，球场顺利开业，如今接待人数过万，成为文昌当地旅游的新名片，实现侨乡当地和琼人投资双赢的利好。之后，邢氏加大在海南侨乡的投资领域，积累更多的海外力量参与合资合作。<sup>254</sup>

足见，好的政策和政府作为，能助力和影响琼人在故土投资的效益，而投资成功的案例越多，越能激发更多的侨资力量注入，也大大增强琼商家乡投资置业的热情。最重要的是跨国企业频繁往来，不断扩展当地企业的国际空间，提升侨乡当地企业的营商文化认知，带来更多的跨国合作资本和资源。

<sup>253</sup> 林明仁《文昌华侨文化》（以下简称《华侨文化》），（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

<sup>254</sup> 林明仁《华侨文化》。

改革开放时期 1999 年至今，海南城市发展建设走向快车道，其侨资投资数字，随时间的推进急剧增多。据海口经济普查资料显示，1998 年—2006 年，海南省累计 9400 多家外资企业注册，实际投资 94 亿美元，其 2002 年，海口侨资企业 546 家，实际投资额 115350.5 万美元；2004 年，海口侨资企业达 9651 家，企业资产总额 3355.5 亿元人民币，营业创收 921 亿元人民币，解决就业人员 27.3 万人。<sup>255</sup> 这些时间年限和数据的变化，是海南当地营商文化改善的过程阶段，海南侨乡当地政府只有注重琼人跨国实践投资的互惠盈利，才能普惠当地经济的效益增长，好的政策措施和营商文化至关重要，只有将侨乡政策的不断升级优化，跨国资源的不断提升，才能给资本带来的信任 and 安全感。因此，海南多年来的侨资利用情况，招徕效率如下：一、投资引资作用，是否有充分发挥和调动侨资积极性，利用好侨资资源；二、侨务政策建立是否健全；三、侨乡的营商投资环境是否健康良好；四、琼人自身的经济状况也是决定投资与否的直接原因。只有将各类资源转化为海南侨乡社会资本，才能助力海南各个产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琼人外出打拼，靠省吃俭用积累资金，再将这些财富赡养家小，用于故土家庭食住改善，在琼人与海南侨乡的跨国网络连接通道中，又具有不同类型和规模。从琼人投资家乡的行为我们发现，琼人虽长期流居新加坡，但他们为故乡效劳，为故土经济发展出钱出力，为更好获得实际利益又增加连接两端的联系做出努力。从传统的汇款、劳动力网络中，开辟新通道——跨国投资，通过资本投入，资源引进，科技技术水平的提高，多渠道多形式投资家乡等举动展开，给海南侨乡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同时，琼人也把居住国新加坡的先进理念和生活方式带回到了海南。我们发现，行走在海南侨乡各乡镇，随处可感受到南洋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经济技术发展的借鉴。而从琼人与侨乡间的跨国网络，基于血缘、地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又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非功利性的侨汇资助；其二是功利性的侨资，利用地缘关系，使用同乡资源，工具性的投资侨乡。

本节，横向比较影响侨资活跃度的因素，对跨国网络中投资主体进行客观分析，全面认识利用侨资增减的情况。海南侨乡侨务政策环境的改善，是琼人跨国网络互动的必然结果，是外部刺激和动力的发展趋势，琼商在这中间起到桥梁作

---

<sup>255</sup> 刘阳《海南华侨文化》（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页 209-210。

用。无论是侨乡当地的企业管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向，还是企业成员的思想观念，技能操作都日渐受到影响。甚至还通过优化营商文化，扩张企业规模，扩大就业人数，引进先进技术，为侨乡当地发展铺设一条新路子。本节也通过纵向论述不同时期，琼人与海南侨乡间的跨国网络联结情况，从中我们还看到，家乡对于琼人来说，并非一个简单的地域观念，也是一种流动中关系和情感的联结，也更加强化了琼人对世界和故土的地方认知。透过详实的数据，直观侨汇的功能作用、数量变化，以及侨资投资分布的地区、行业结构、投资占比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等特征。而从横向比较琼人投资侨乡，与中国沿海其他移民投资侨乡的区别。侨务工作的重视情况，投资环境的优良，导致侨资利用给当地发展带来的差别。文中还列举了运用侨汇对侨眷生活和住房改善的典型案列，以及近代侨资投资侨乡的代表人物和企业。在琼人与侨乡间的多重互动关系网络中，是一种跨国界、跨社会网络的多层面网络关系，有作为道义的，也有趋利而为之的，不可否认，对侨乡的社会形态、乡土之情、投资发展、生活住房、社会问题等都带来了影响。琼人不仅是一种超越地理的跨国网络，也是一种跨国经济的实践行为，这一跨国实践行为始于向家乡侨汇，进而逐步涉及经济投资、家乡建设、文化领域等，这是一个从向家乡“输血”到“造血”的跨国网络，对海南侨乡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带来深远影响。

## 第二节 以侨为桥：跨国文化互动与公益建设

海南为什么可以建立跨国网络并开展活动联系？这是一条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关系，跨国移民成员的联结作用力。其行为主体之一的琼人，作为网络关系中的桥梁，通过嵌入或融入的形式，在侨乡乡土社会与居住国间跨国流动，频繁地交流、再造，推动形成海南侨乡特色景观，其涵盖文化重建、宗族信仰、社会公益、思想观念等。从陈达对侨乡的研究开始，移民链影响侨乡地方文化，以及公益事业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引发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侨”对地方的意义和作用。“侨”成为特殊的文化标记，侨乡被称为侨乡，不仅影响着当地的移民者数量，也是华侨对于故土的影响；不仅仅是移民与家庭关系，更多呈现以“侨”为氛围的当地人文景观和社会建设。本节通过讨论琼人跨国网络建立的功能，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文化互动，到以“地缘”支助的公益建设，再结合“侨”

所蕴含的灵活、开放和流动的特性之观察，展现琼人与侨乡间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网络之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海南侨乡在多重网络关系的叠加影响下，使侨乡文化和现代化建设在各节点的碰撞中发展演化，由此展示的具体形态之一为“侨乡文化”。“侨乡文化”是跨文化交流和结合的产物，既体现本土文化的特点，又有移民文化的特色，它受琼人跨国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影响，通过嵌入或融入的形式感染侨乡当地的文化形成。在这个以“侨”为桥梁的跨国互动中，另一形态是以“侨”资源为侨乡公益建设助力，除了具体表现为琼人的慈善行为，还推动了海南人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总的来看，跨国网络增加了多元民族文化间的渗透融合，推动社会资源和经济的流动，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反过来，社会和人又影响着跨国网络的发展进程。

### （一）跨国文化互动

海南侨乡文化的形成，从琼人百年前离开故土开始，将西洋文化风俗特点回流海南侨乡，使侨乡文化兼具古今中外的特点。文化通过语言不断传播和积淀，以跨国书信交流、寻根祭祖、探亲访友、商业合作交流等为桥梁，保持两地间的跨国文化交融，影响着海南侨乡当地的文化结构。反过来，琼人在新加坡延续着故土的生活习惯和伦理道德，深受海南本根文化基因的影响，譬如，琼人对根祖文化、宗族文化的共鸣。每逢重大节日琼人将前往祠堂庙宇，祭拜共同的信仰和祖先，这是他们身处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精神依靠；每当清明时节，他们组团回乡祭祖，这是他们内心深处割舍不断的思恋情节；海南每个宗族姓氏都有制作家族谱牒，哪怕身在他乡，也不忘“根”之所在，这是他们家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琼人在两地间的中西文化互动，多种文化相碰撞，体现出琼人的文化逻辑、认同形态与族群网络结构。根植于传统中的“家”、“根”、“祖先”认同，强化了他们的尊祖敬宗，同样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学会新的语言，容纳异文化，在传承中吸收，在多元文化中丰富。而在跨越国界地域、文化边缘的互动融合，都组成了海南侨乡特殊的跨国文化融合系统，生成包容交揉的当地侨乡文化特性。海南侨乡文化是经过了琼人世代积累和交融汇通的历史结晶，海南侨乡文化是中外文化结合的产物，是琼人移植和变异的过程。海南以本土文化

体系为基础，以琼人各自的文化生活习俗为媒介，以共同的乡根乡情为纽带，以各琼籍社会团体组织为载体，这些都是组成海南侨乡文化不可分割的因素，并且融入到海南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中。跨国文化的互动，提升、丰富了当地文化的综合性和多元性，使一些老旧习俗向现代文明转变，也让侨乡能更好地与国际文化交流，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推力。

### （1）继承传统宗族文化

由于海南特定的地理环境四面环海，海南人对海神的信仰崇拜较为普遍，并且延续至今。海南人在出海时巧遇节日庆典，都会祈求风调雨顺，一切平安，在海南侨乡每个村镇都有神庙，百姓的家中也都供奉着神灵。海南地方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天后庙几乎遍布海南沿海乡镇”<sup>256</sup>，“崖县有6座‘天后庙’”<sup>257</sup>，“儋县有4座‘天后庙’”<sup>258</sup>，足见海南民间对庙宇信仰祭拜的重视。在文化信仰方面，琼人一开始就将海南本土的文化传统带去异国，笔者在新加坡的各社团组织、会馆、神庙中见到同样的神灵，敬拜神祇的民间传统风俗与在海南侨乡一样，以作为团结的核心、奉祀和信仰所在。说明海南本地的民间信仰文化，跨越时空和地理空间阻隔，在新加坡引起琼人共鸣，形成独特的琼籍神庙民俗文化景观，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文化之命脉。

对于琼人来说，宗亲根祖的意识尤为重视，宗族制度更是维系族群的纽带和凝聚点。琼人有终老故园，叶落归根的愿望，但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琼人永居异国，无法魂归故里也是多数，但在他们的心中故乡始终念念不忘。所以，每当传统节日期间，琼人都会在新加坡海南社群举办祭祖、琼剧演出等，通过所操方言相同、来自同一地方、同一信仰，增强宗族间彼此的凝聚力，发挥互助共济的作用，这也是琼人对故土文化归属意识的体现。故只要宗族召集，琼人大多会积极响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琼人在新加坡世代兴旺传承感召力。直至今日，宗亲组织和家族制度在新加坡一直延续，表现出琼人与故土对千丝万缕的联结。

还值得关注的是，随着1980年以来，新加坡方言结构逐渐消退，有的琼籍

<sup>256</sup> （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

<sup>257</sup> （清）张勇等纂修《崖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sup>258</sup> 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儋县志》（海口：新华出版社，1996）。

后代并不熟悉他们的海南祖先和海南方言，这一现象是否是琼人“跨国文化”互动的缺失呢？笔者访问了新加坡海南商会陈学汉会长，如下：

问：“对于不熟悉自己祖先和方言的琼籍后代，意味着什么？”

答：是的，如您所说八十年代后，新加坡基本就很少用方言，部分琼人后代出现对自己“祖”文化的缺失现象。

问：在新加坡方面，咱们有做哪些努力呢？

答：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海南协会、新加坡海南商会等社会组织，努力弥补和创造与“海南”的交流互动机会。琼人希望后人不止用英语，还能多用华语。海南会馆开始教导孩子们一些传统文化，也有学习琼剧。从2000年开始，海南会馆开始教琼籍后代学习方言等等。

问：在海南方面，针对此现象有哪些反映？

答：海南方面，接近二十年前，海南外事外交办公室成立了——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世界海南青少年冬令营、夏令营，世界海南青年论坛。这些都是为了培植世界各地的琼籍后代，对家乡的乡根情怀。”<sup>259</sup>

从笔者和陈会长间的对答也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年轻一带琼人在新加坡出生、成长，和故乡的联系有些疏远，但是新加坡和海南方面都是尽力创造机会弥补。所以，在新加坡方面，组织琼人后代们回乡寻根问祖、夏令营、“乡”文化论坛等跨国交流活动。而为了配合新加坡海南社团的相关活动，海南方面也积极提供支持和回乡服务等，积极引导琼籍后代对故土的认识，加强“根”、“祖”文化的熏陶。更为关键的是，每个宗族都制作完善的谱牒，希望通过续修家谱，传承血脉，让后辈不忘“根”。据《万宁县志》记载，仅1991年，琼属社团组织万宁籍的196名琼人，回乡寻根问祖。而不通过政府记载、自行回乡祭祖的琼人探亲者，不计其数。琼人吴多禄在祖父母扫墓时，就曾言“家乡水最甜，多喝几口，家乡人亲，他要多回来”。<sup>260</sup>当然，这不仅让琼人有所依归，还不断地修复和完善海内外亲友联系的渠道，加强桥梁两端的情感。每年新加坡海南协会都

<sup>259</sup> 2009年9月，新加坡海南商会陈学汉会长于新加坡受访。

<sup>260</sup> 林红生、樊云芳《海南侨乡》，页132。

会组织琼籍青少年回海南寻根文化，文化寻根使琼人了解到自己生命之所由，根之所在，也是琼人和海南侨乡精神文化的既有、传承和发展。上百年来，琼人对根祖文化的敬重不曾断裂，这也是他们与侨乡跨国网络中不曾断裂的一个关键层。譬如，每当清明节时，琼籍后代纷纷回乡祭祀。笔者仅根据 2019 年清明节 4 月 2 日—4 日三天里，海口美兰机场的统计数据看出，出入境航班达 83 个，出入境旅客超 2.5 万人次，其中航班载回的大多是回乡扫墓的旅客。在清明节期间，海南侨乡的部分城镇会举办姓氏宗祠祭祖典礼，凝聚族人，深切表达不忘祖先、不忘父母的情感。2019 年 4 月在海南文昌举办的陈氏祭祖大典，在数十个国家上千名琼籍陈氏寻根谒祖。琼人更是教育子孙后代不能忘本，虽已加入居住国国籍并定居，但根一定不能忘。故每年宗亲大会、清明节期间，陪父辈、祖辈回乡祭祖的后人，也在深深的认祖情怀中，埋下对故土的认同。由此，“根”留住了琼人的根祖情怀，把失散的琼人亲情寻回；把故土亲人与琼人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把琼人和海南侨乡的延续联系起来，回乡祭祖更形成了血脉的文化基因。

民间传统和宗族的认同感情，弘扬了“族亲”与“乡土”的观念，家族谱系、民间传统仪式、乡俗文化，扮演和维系着海内外亲眷关系的重要角色。总而言之，延续传统宗族文化和寻根认祖是故乡凝聚琼人的纽带，也是琼人与故乡文化交流的节点，发挥着文化认同、维护族群权益的功能。反过来，宗族传统文化和乡土观念，也促进着地方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本节通过构建琼人与海南侨乡宗族文化方面的文化图景，通过扫墓上坟、叩拜祖先、寻根问祖感受到海南侨乡一大文化景观，感受到琼人的跨国流动与地方感知，理解了与“侨”有关所形成的侨乡历史和文化。

## （2） 其他文化的互动

### 饮食

饮食既是生活，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在陈勇长达十多年的研究《美国杂碎——美国中餐的故事》中，就运用食材对移民人口的流动和移民现象进行研究，从中看出伴随着饮食文化传统，移民在当地的融合过程，从中看出移民与当地社会

间的关系，填补了学术空白。<sup>261</sup>确实，民以食为天，吃什么？怎么吃？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做法和讲究。饮食文化会在移民与侨乡间建立起一种饮食文化纽带，它印证着传统饮食如何产生和演变。在新加坡饮食文化中，有一道菜品蕴藏着琼人“浓浓的家乡情”，就是有名的“海南鸡饭”。文昌鸡是海南文昌的名菜，海南文昌是琼人迁移数量较多的侨乡市县，在当地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所以无论过什么节，当地都会吃文昌鸡，是一家人团聚的食物标配。笔者品尝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发现，在对鸡肉的挑选上，两地都喜好肥而不腻、采用白切的鸡肉食法。从这道食物的名字来看，琼人虽身在异乡，但记忆中包含着家乡感受和品味，在口味喜好和制作工艺上大相径庭。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海南当地并没有“海南鸡饭”这道特有的菜品，它是移民为在新加坡适应新环境发明出来的一道快捷简餐，也是建构地域认同赢得消费市场的新产物。在新加坡人想象中，它是被大众化和具体化的海南饮食文化标志。“海南鸡饭”，一方面塑造和影响新加坡人的饮食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在改造着传统饮食的制作内容和食用方式。因此，文化融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它的本质上是移民的适应、扎根社会的过程见证。

如上，饮食文化揭示历史，它是文化“磨合”的有趣过程，其中，海南侨乡的日常饮食也受到了南洋饮食文化的影响。譬如，咖啡。在琼人引进咖啡种植成功前，海南人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随琼人将在新加坡喝咖啡的习惯带回家乡，并将早年在洋人家中学会的冲泡手法巧妙运用。日后，海南侨乡咖啡已经成为一种特色饮品，成为当地百姓休闲聚会、交友歇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地方民俗志中，我们可了解海南岛的饮食情况：

“而南洋一带之华侨，尤有饮咖啡之风，习俗所然，内地亦交相竞效，于是茶馆应运而生。市镇之所，茶肆少者三数间，多则十余间。当墟日，茶楼常做上客满，地无空隙，肩摩背接，熙熙攘攘。茶有：时茶、龙井、菊花……；有西茶，如：咖啡、牛乳、红茶、咯咕……；食物有大包、小包、鸡蛋粒……。”<sup>262</sup>

随着海南与南洋网络的连接，从饮咖啡、咖啡种植、咖啡生产、咖啡店在海南侨乡普及，并创造生产出中国一流的咖啡产业。直到今天，海南琼岛依旧充斥着“老爸茶坊”，成为当地聚友的茶饮地。再譬如，海南侨乡有一种小吃“豉”，

<sup>261</sup> 陈勇〈美国杂碎——美国中餐的故事〉，见《世界日报》（美国），2014年。

<sup>262</sup> 王兴瑞、岑家梧〈琼崖岛民俗志〉，见《民俗》，1936年第1期，页67。

茛与新加坡币“叻币”点谐音以及与文昌人下南洋的活动密切相关。家中有亲人下南洋，会送民间吉祥食物“茛”以保平安，祝事业有成；“番客”回乡归来，亲友会挑一担“茛”前往祝贺，寓意未来一切顺顺当当。海南吃“茛”时必须将茛叶层层剥开，所以也寓意着“解脱”、“宽松”之意。在海南侨乡赠送“茛”代表着无论出洋前琼人经济如何紧张，出洋后便会宽松好起来，解脱一切生活命运的困顿，有一种战胜困难的决心。还有在新加坡菜肴中的咖喱、西餐、糕点小吃等，也都融入到海南的饮食文化中，反映出饮食文化移植到侨乡当地，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也使它成为家乡与琼人间的味觉纽带。

饮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海外文化标志，如每年海南侨乡都举办“南洋美食节”，促进了海南与新加坡的美食文化交流。笔者参与2018年南洋美食节发现，琼人叶保山先生从新加坡带回的波波鱼丸深受侨乡食客欢迎。在笔者现场走访中，明显感受到饮食文化促进了跨国亲人间的互动，而将异域饮食文化带到侨乡，并成为侨乡南洋文化的一种标志。菜肴的国际背景和当地环境也都影响它的演变发展，同时，以满足海南侨乡对南洋饮食文化的社会期望，对海南侨乡的饮食习惯及文化生活起到塑造作用。

## 衣着

吸收南洋衣着文化元素，侨乡中西兼备的衣着特色，是侨乡本土文化的一种添加和建构。衣着文化观念代表着一种认知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族群的形象和身份，区分着社会等级和文化认同，琼人的服饰打扮足以证明。穿着背后所承载的跨国文化影响，也从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引领着侨乡社会的衣着潮流。譬如，民国初年以前，男性多穿绸布制作的唐装。但回乡的琼人会穿一身西服、领带、皮鞋，女性会穿时髦的花套裙，从中也展现出自己是留洋回来的。而那时期，这样的穿着打扮象征着时尚潮流，慢慢在侨乡也出现跟风的迹象，琼人回乡时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也会给家人捎带来自南洋的衣物。“海南岛气候温和，暑久寒暂，男女服饰亦无大异。唯有文化发达文昌、琼山等县，西服男子，时装女子，随处可见矣。”<sup>263</sup>所以，呈现在海南侨乡移民较集中的市县，衣着装扮与其他市县有所差别。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侨乡人的穿着款式和颜色比较单一，琼人回乡探亲，

---

<sup>263</sup> 陈植《海南岛新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页105。

也大多会带一些色彩斑斓、款式新颖的时尚服饰回乡。1918年，新加坡琼人何氏还在海南侨乡创办的精美公司，就以经营布匹百货为主，深受海南女性的光顾。中西衣着文化的碰撞，不仅影响着海南侨乡人的审美文化，花样翻新的衣物也彰显侨乡的着装融合风采。

## 语言

可以说，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标志，也是民族尊严的象征，并起到联结海外乡友的纽带作用。琼人在踏上新加坡那一刻，便将家乡的海南话等统统带到异国。同时，他们也把乡音“琼剧”一并在当地传承。笔者深入新加坡琼人社群的生活观察发现，百年多来，琼人间的交流依然使用海南方言进行沟通，运用最熟悉最亲切的方言，不仅更能确切表达语义，也是拉近乡友间距离的交际工具。而在海南侨乡的地方语言表达中，也有夹带外来语的特征，如出租车用英语表达为“taxi”，新加坡人说“德士”，海南人也取谐音为“的士”。这是吸纳外来语言文化因子，一个移植或变异的过程。不可否认，语言文化对跨国网络的产生有整合作用，从语言中也蕴含着跨文化的载体，它既是思想交流的工具，也是特定文化的有机组成元素。

海南侨乡文化的特点是琼人在跨国文化互动中再造过程的呈现，结合、吸收西方文化并反哺本土母体文化，形成新文化侨乡特质。从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一、琼人对传统宗族文化传统的重视，对“根”的意识，对“祖”文化的热衷，对家族传统和祭祖思想的支持；二、饮食、衣着、语言文化的互动融合，丰富了侨乡当地百姓的物质精神文明发展。这是一个吸收——融合——创新——再造的侨乡文化演进过程，并在异域生长发育、发扬光大。琼人带回各种跨国地域文化、外来文化，在海南侨乡的土地上碰撞、交融，进化形成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当然，通过一些方言或地缘群体文化活动，增进了琼人的群体意识和祖籍地认识，也通过文化交流辐射、扩大，增强了琼人的文化认同。同时，这一文化互动过程，间接达到使琼人对传统文化，维护、传承、保存的宗旨。琼人在海南侨乡与侨居国新加坡的文化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其达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跨国文化互动的结晶，体现在侨乡人的思维、行为、生活方式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形成别具一格的南洋风格。

## （二）增值效益：社会公益

在琼人与海南侨乡的跨国网络联结中，比较突出的表现还有琼人捐助海南地方建设。随着琼人在侨居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他们不仅仅关注家乡亲人的生计问题，也关注着海南侨乡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等，并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海南建省 1988 年以后，海外琼人的投资公益事业的额度不断增加，区域和领域不断扩展，我们对比 1979 年——2002 年海外琼籍人士的捐赠情况便可发现，如下：

1979 年——2002 年琼籍同胞捐助领域情况一览表

资金流向	教育	医疗卫生	交通	福利事业	生产	文化	科研	旅游	体育
资助额 (万元)	3106 1	7991	5686	3978	3461	2536	1241	406	109
百分比	55.4	14	10	7.1	6.2	4.5	2.3	0.4	0.18

1979 年——2002 年琼籍同胞捐助市县情况一览表

市县	海口市	文昌市	琼海市	省直单位	万宁市	省农垦系统	五指山市	乐东县	陵水县	三亚市
捐赠额 (万元)	22300	15985	6720	6794	3153	697	200	140	68	60

（上述资料数据均引自：张朔人、于苏光《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 年，页 180）

从以上两个表中，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琼人资助领域逐渐扩展，资金不断增加，投资于海南侨乡的资金捐赠于文教、卫生、公共福利、救灾等，为侨乡公益事业建设有目共睹。1979 年——2002 年底间，海南省是各市县和省直属单位，“共接收捐款总额 5.6 亿元，682 个重点公益项目。楼房建筑面积 669547

平方米，修建道路 1650 公里，修筑桥梁 758 米，设立教育基金 3143 万元。”<sup>264</sup>

“超越历史上各个时期总资助金额之和”，琼人在海南的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1978 年——1992 年间，海南省共接受海外琼籍人士，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 2.32 亿元，兴办 890 多所学校，1600 多幢图书馆和教学楼，捐赠建卫生院 12000 多平方米，赠予 500 多万元的医疗设施设备。”<sup>265</sup>琼人只要有能力，就积极为故土的教育领域捐资助力，故此领域相对其他资金数额较多。再看海口市琼人 1991 年—1996 年捐赠统计数据：

1991 年—1996 年海口市接受海外琼人捐赠统计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时间 （年）	捐赠款 折价总 计	捐赠款 折价其 中款项	公共福 利	文教	卫生	其他
1991	155.22	93.00	23.46	88.16	21.30	22.30
1992	392.00	4.00	91.00	120.00	45.00	136.00
1993	521.70	140.00	112.00	90.00	262.00	57.70
1994	210.50	108.50	108.50	30.00		72.00
1995	200.00	4.50	4.50		195.50	
1996	126.95	6.95	6.95	120.00		

（上述表格数据引自：海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市志》）

早期主要投资捐赠于海南侨乡，后期从一般侨乡扩展到海南所有乡镇，教育得到资助带动了海南侨乡文化事业的发展，汇入捐赠资金增多促进了海南侨乡的经济发展，从而影响了海南方方面面的蓬勃发展。

### （1）投资兴学办医

教育和医疗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环节，在海南侨乡的兴学办医过程中，琼人无论任何历史时期都不间断积极参与，留下深深的印记。可以说，琼人的跨

<sup>264</sup> 张朔人、于苏光著《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页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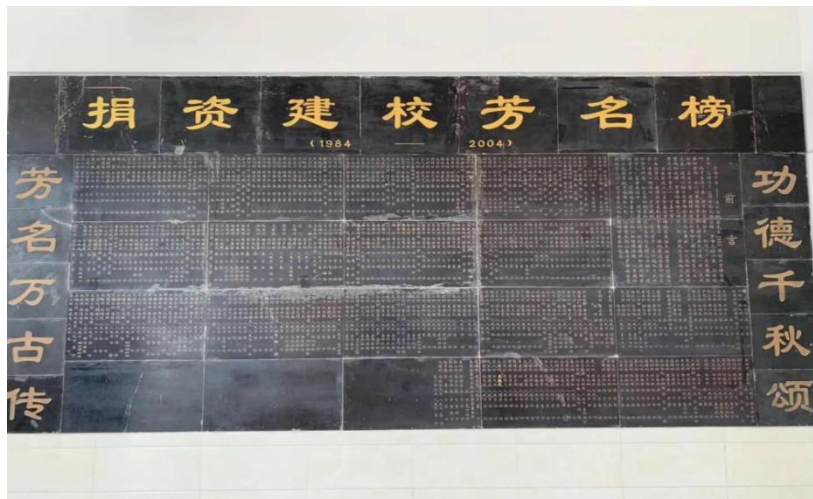
<sup>265</sup> 范基民、符和积《海外琼人专辑之一》（海口：海南出版公司，1999），页 77。

国善举为海南侨乡的公益事业不断开拓和推进，使跨国联结效应不断增值，是极其重要的力量。

## 推助教育发展

由于海南岛相对于中国内地的自然环境较封闭，故文明教化程度相对于内地有较大差距。要想提高当地教育基础设施和办学深度和广度，物质上的支持是重条件之一。而琼人对侨乡教育财力、物力上的支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海南侨乡的教育发展有巨大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前，海南成立的大部分学校，无不打上琼人资助的烙印，这是由于琼人普遍认知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琼人捐资办学从晚清开始。譬如，文昌保罗罗峰书院（即今罗峰中学），这所学校由地方人士和琼人侨胞共同捐资创办于 1884 年，从早期私塾向学校教育转型，开启海南学校教育的先河。1940 年日本侵略时期，罗峰中学停办 5 年，校舍遭到严重破坏，担心家乡学子长期缺学失教，琼人同胞纷纷捐资重建校园，之后海外琼人一直捐款至今。目前，这所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成为文昌名优学校。





（以上图片是笔者参与罗峰中学 135 年校庆时拍摄，摄于 2019 年 4 月）

创办于 1908 年的文昌中学，也是在琼人资助下完成。曾任该校校长的詹行焯三次赴南洋筹款办校，通过琼人侨资的资助，使该校的硬软件成为当时全海南岛之冠。“该校与华侨关系之切，人人皆知。其校有科学馆、礼堂、图书馆、学生和教师宿舍、食堂。全部建筑费几乎都来自琼人集腋成裘的结果。中学校址之宽大，建筑物志华丽齐备。”<sup>266</sup>

在海南政府和琼人的推动和支持下，海南侨乡各地新建、改建学堂蔚然成风，有的是琼人集资，有的是地方创办，琼人捐助或赞助。例如，海南重点学校——海南中学，就是在琼人的巨额款项资助下，率先在海南全省学校中安装发电机，解决了学校照明和校办工厂的用电问题。还捐资兴建游泳池和体育馆，侨资为学校的硬件设施改善起到关键作用。海南的另一所重点学校——华侨中学，早期是

<sup>266</sup> 何启拨〈琼崖华侨与琼崖社会〉，见《边政公论》，第 5 卷，第 1 期（年份不详）。

一所专门培养华侨子弟的学校，每当学校建设或者遭受台风破坏等情况时，琼人都会广集侨资资助重建，只为琼籍子女能踏实就读上学。

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难以支出加上呈几何式增长的教育经费，幸而有琼人的资助有力弥补了当地教育资金的不足。琼人对海南的教育发展，可谓慷慨解囊、关怀有加。即便在海南沦陷期间，琼人依然积极商讨救济，关注难童教育，或转送至海外，或迁至内地其他省份学校，或筹办难童教养院。在新中国建国伊始，琼人就主动担起回乡办教育的热潮。1957年，琼人捐助侨乡相关款项10万多人民币，1958年，继续增加100万元人民币兴办学校。<sup>267</sup>海南侨乡文昌的教育事业也一直在琼人侨资的资助下稳步发展。1951年，万宁也通过侨资筹办第一所中学。这些都是琼人长期不懈捐资办学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后，琼人为了改变家乡教育依旧落后的面貌，海南各侨乡琼人通过“比、学、赶、超”的形式，再次把捐资办学推向高潮，加强硬软件建设。1983-1986年期间，琼人捐款捐物3700万元人民币办学，改善教学校舍1400余幢，建筑面积142700平方米。文昌、琼海、琼山、万宁的教育事业都不同程度得到琼人捐助，极大改善当地教育水平。

琼人对海南侨乡教育事业的促进，不仅有小学、中学，还有专职和大学，结束了海南岛内无高等教育的零记录，其中，资助创办了私立海南大学。琼人参与力度积极高涨，有钱的出资，有力的献策，琼人将个人收集的大量宝贵藏书捐赠，解决学校书籍资料不足的难题，或独自捐赠2亿元经费建校，还有的琼人在海外积极号召募捐。其中，新加坡琼人白秀华女士，捐款100万元人民币，为海南大学建游泳馆。据统计，1948年，海大共收到捐款1045亿元人民币。琼人为海南大学的发展出谋献策、培养师资、合作办学、捐资金、捐硬件、设立奖励基金等等。在琼人的积极慷慨资助下，无论是侨乡的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得到跨越发展。譬如，职业院校——海南省华侨中等职业学校应运而生，多所乡村村学校不断发展等等。经过上百年的孕育，海南侨办教育形成幼、小、中、大的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侨资捐办的大量学校也成为当地教育的主体。

为什么对海南侨乡的教育事业如此重视？笔者走访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琼人早年艰难苦涩的生活，以及在新加坡靠教育闯出了名堂，使他们认为知书求识，

---

<sup>267</sup> 琼侨乡音编辑室《琼侨史略》，见冯子平《走向世界》，页184。

进取念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教育不仅是谋生的工具，也是生活的本体。所以，他们希望侨乡的孩子不要再重复自己的苦路，用知识充实自己的人生，唯有人才和知识才能改变侨乡的发展面貌。总之，在琼人的推动下，侨办教育成为当地教育的一种主要力量，起到了示范、组织和带头作用，为侨乡教育的推动发展和普及给予了较大影响。

从上述琼人与侨乡在教育联结，我们可以看到，“侨”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形式呈现出来，琼人通过教育扶持资助这件事，体现一个人与家乡人的联系内涵，给侨乡社会的教育发展带来深入而广泛的影响，进而影响当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总之，琼人不仅强调重视子女教育，还兼顾侨乡初、中、高级教育普及，推动教育网络结构完善。

### 海南侨乡医疗与琼人捐助

在海南侨乡，早年乡友对巫术能治病的信念比医学高，落后的疾病处理常识，直到琼人出洋后，接受更多西方医疗的影响，才慢慢得以修正“以巫为医”错误传统观念，侨乡百姓在患病后开始求助于医生和医院的治疗。

海南侨乡的医疗水平一直以来较为落后，再加上海南地理环境和气候湿热等因素，成为多种疾病流行的高发区。譬如，疟疾、钩颈虫病（寄生虫病）、鼠疫、霍乱、麻风病、胆结石、红莉等疾病。因为海南医疗缺少经费，缺乏医疗技术，无高端医疗设备，医疗卫生事业落后，致使很多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遇某些急病危病也只能束手待毙，故死亡率甚高。琼人想方设法帮助侨乡缓解医药供求问题，捐建院舍，筹集款项为医务之用。譬如，1926年，海口爆发瘟疫，琼人纷纷热情捐助，共筹光洋298300元。海口海南医院创办，其中11位董事，10位是琼人。<sup>268</sup>还有海口麻风病医院的扩建等等，琼人都积极捐款捐物，以此改善了家乡百姓的就医问题。琼人对海南侨乡的医疗事业发展依旧鼎力支持不曾间断，笔者作为媒体人曾连续追踪“风雨无阻：新加坡义诊团每年两次来琼义诊”的专题报道，记录从2009年来，琼人对海南侨乡医疗事业发展的支持，惠及海南侨乡贫困家庭唇腭裂患者的医疗诊疗，并坚持了8年时间，其中有国际顶级的理疗专家参与，譬如新加坡中央医院高级顾问李胜德教授等人。此义诊不仅帮助了重

---

<sup>268</sup> 温孟学等〈海口海南亿元创办纪实〉，见《海口文史资料》，1987年第4辑，页146-149。

度唇腭裂患者，也对当地的落后的医疗技术起到交流和促进作用。

医疗上，琼人推动了侨乡医疗设备和环境的稳步发展，用侨资资助困难乡友就医，体现了他对侨乡乡友深深的关切之情。从上案例，我们还看到，海南医疗经费来源多元化、医疗设备和医生构成多样化，琼人功不可没。

## （2） 救灾善举

琼人除了苦心经营、投资兴学办医外，还对海南侨乡的慈善公益事业具有推动和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琼人不仅造福侨乡社会教育医疗，改良乡村发展问题，在救灾济困方面，琼人依然援助善款。由于海南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季风气候致使，台风年年来袭，受灾频频发生，琼人的善举百年来从未间断。通过跨国网络中的亲人或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帮助侨乡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尽显赤子力量。如 1948 年 9 月 27 日，台风登陆海口，房屋、农作毁坏巨大，众多灾民等待救济，当时忙于内战的国民政府如何处理灾情，目前尚无资料说明。虽然南洋各国经济那时处于复苏期，琼人经济不宽裕，但依旧“问询即起，献物捐款，赈济灾民。”又 1950 年，正值丰收在望的秋季，一场强台风袭击造成灾荒，颗粒无收，闻讯侨乡受灾情况后，琼人筹集 1 亿 3300 余万元人民币解困。<sup>269</sup>1989 年，海南万宁、陵水、保亭等市县，十天内接连遭受台风袭击，损失惨重，琼人纷纷慷慨捐助，帮助灾民恢复生产。帮助侨乡救灾善举，重建家园，表现出对受灾群众的极大关注和同情。所以，琼人心系故土的心理因素，在跨国网络联结中的作用力较强，表现为积极捐助，帮助家乡渡过难关。

前文已述，琼人资助故乡各项社会事业，富不忘本，捐资赞助，心系家乡，情牵故土，拳拳爱乡之情。琼人无论身在何邦，都把对故乡的情怀化作真实有效的实际行动，捐资助学、捐资医疗、救灾等方面的善举，表现出琼人尽其所能支持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因为篇幅有限，本节笔者只举例罗列出部分捐赠案例，详细载录参照附录十六、十七、十八。）琼人对侨乡的鼎力支持热情不断高涨，给家乡带来崭新的面貌，乡亲们得到实惠，对海南侨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一份功劳，对侨乡的教学条件、医疗环境、改善民生、其他公共事业等都带来极大改

---

<sup>269</sup> 冯子航《走向世界》，页 182—184。

善。对比不同时代琼人的善举行为，笔者还注意到：第一代琼人大多是过客心理，他们的认同对象依然是祖籍地，他们关注和大力资助有关侨乡的一切。第二代琼人更多来源亲切感，他们时常与祖籍地相关的事宜跨国互动，譬如，回乡探亲、祭祖、旅游等等。所以，接济亲人、支援故土建设发展使他们具有使命感。不少第三代、第四代琼人出于功利观，增进与侨乡的联结，有利于利用地缘渠道回乡投资，出于现实情况他们需要关注和支持侨乡的建设发展。因此，琼人对于故土的教育、医疗、公益等都热心参与、热心捐款。从主观上，完成履行了孝行伦理的人生价值，满足了光耀门庭报效家庭、故土的需求；从客观上，推动了家乡教育、医疗、社会的发展，对海南侨乡走向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帮助海南侨乡“现代化”建设

琼人也是海南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者，对当地修桥建路、改善基础设施等都发挥巨大作用。琼人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力量使海南侨乡社会公益效益增值，逐渐超越地缘和血缘因素，成为侨乡共享的海外资源。他们把先进的文化、现代技术引进家乡，直接改善了道路、电力、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自身价值得以展示，获取了地方和宗族的社会声望，也维护了家乡社会的“公共面子”，为海南侨乡的先待会拓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 1978 年以后，海南的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实现通水、通电、通车，有的建起了西式庭院，有的通上了自来水，有的还建起文化娱乐场所，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我们以海南侨乡之一文昌，1978 年后，现代化村庄的建设情况观察，如下：

乡镇村	村庄公共设施建设情况
锦山镇南来村	乡侨出资 65 万为村庄架高压线；修整村里道路十条；砌筑村前石堤；修整吴氏祠堂。既改善村庄环境，又为村民用电、出行更加便利，还丰富村民文娱生活。
锦山镇南排田村	琼人黄宏萱出资 106 万美化村庄，开辟进村大道，建混凝土地面，修路灯挖湖塘，修筑凉亭、娱乐场所、房屋，该村成为锦山镇最美乡村。
文昌清澜	琼人陈明干，1980 年，回乡探亲，刚好遇到当地百姓艰难过河，为了日后方便百姓，立马出资建起一座文镜桥。

（资料来源：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昌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页 567）

旧时海南侨乡建设落后、民不聊生，房屋多为瓦房，街道窄又短，城镇多为土路，基础设施滞后。琼人积极参与侨乡的新农村建设，修桥、打井等公益项目随处可见。在地方公路与运输体系建设方面，琼人的影响是主要的。除了文昌外，海南侨乡之一的琼海乡村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琼海市长坡镇，在琼人新加坡侨领吴泽民、吴日晖的组织领导下，捐款 10 万余元，支持祖籍地建村牌、村门、环村路。亲自参与规划，花费很多心思。”<sup>270</sup> 侨乡当地人说“路通财通”，在琼人资本力量的促进下，侨乡当地的道路和桥梁设施得到很大改善，推动了乡、村、镇、市的联系，具有划时代的作用，为海南侨乡现代交通制度的演变增砖添瓦。新加坡海南协会会长陈学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做任何关于家乡建设的事情，都是出于一个游子对家乡人民的一份心。”所以，他积极组织新加坡琼人为侨乡村里修路，并且被当地政府列入“村村通”道路建设。作为会长的陈学汉在新加坡与海南侨乡间，乐此不疲的架起琼人的乡根情怀，助力新农村建设。

琼人对侨乡的捐款不断，贡献卓著，对其他新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也表现出热心。譬如，海南琼海的九曲九江属于典型的侨乡村落，大部分都是出洋琼人的故居，通过侨汇侨眷新建楼房 200 多间，修桥建路，整个乡镇在侨资的资助下，呈现硬化的道路、净化的环境、绿化的植被、亮化的村貌、优化的管理，深得百姓赞叹。琼人吸收侨居国的先进性和时代性，将资本和资源带回海南侨乡的新农村建设中，为家乡闭塞的通讯网络全覆盖，提高当地的供电能力和质量。琼人还积极为海南侨乡乡村捐资建造农村活动室、图书馆、文化宫，改善村民精神文明素质，提高乡村生活活动水平。譬如：

案例：

“琼人投资 70 多万园人民币在嘉积镇，占地 2080 平方米，为村民建电视厅、阅览室、展览室、灯光球场、体育活动室等。琼人莫海涛捐资 45 万元人民币，在故土博鳌汀州村，建水泥地板球场、硬化村道、文艺舞台、五个码头、一座桥梁、公测两个、垃圾池一个。”<sup>271</sup>

<sup>270</sup> 陈海燕〈海南侨务工作资料〉，见张朔人、于苏光著《华侨与海南社会》。

<sup>271</sup> 陈海燕〈海南侨务工作资料〉，见张朔人、于苏光著《华侨与海南社会》。

这种社会教育与文娱生活相互配合，提升了当地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业余文化生活，也使侨乡的社会环境更加稳定和谐。早期，海南侨乡很多村民，在露天冲凉、露天“蹲园”，让回乡探亲的琼人乡人望乡兴叹，难以接受。为了改善这一不雅村貌，琼人出资建公共卫生设施，改变家乡乡民不良落后陋习，琼人良好礼貌待人的风气，潜移默化也影响着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风貌。

新农村的建设也是海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海南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农村土地占全省百分之八十，省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占百分之三十三。<sup>272</sup>在海南省文昌使外事侨务办主任严联的侨务工作资料中，记录“文昌全市在琼人资助下，建自来水塔 45 座、大井 409 口、办电 250 多宗、造桥 201 座、修路 388 条、总长 708 公里。”<sup>273</sup>琼人的捐资义举，爱乡情怀，备受侨乡村民敬佩。这些不断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的设施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意义重大，让海南侨乡面貌大为改观，村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体现了琼人丰富的社会资源，宝贵的物质资源，热情真挚的亲情资源，科学技术的信息资源，也是海南侨乡赖以支撑的优势资源。

现代化是贫穷地区追求的目标和当务之急，琼人与海南侨乡的跨国网络结构，对侨乡交通、电力、新农村建设、商业等捐助支持，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海南侨乡社会的现代化形成发展。侨资投入的成倍增加，使海南侨乡逐渐从“消费型”到“生产型”，从“依赖型”到“自主型”跨越。利用琼人资本的注入，促进海南文教、经济和公益事业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海南侨乡城市的兴起，公共事业的发展，市政市容的改观，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文娱及服务业的夸大，商业的繁荣，从而加速了海南侨乡的现代化进程。从中感受到，在跨国网络“侨”的作用下，使组成网络节点的本身，有效激活社会资本效应，并不断嵌入整合，使其在特定时期产生效用，发挥网络功能。

本章，琼人与侨乡间的跨国网络，因琼人的迁移所产生，又因琼人的跨国实践互动而发展。海南侨乡的百姓生活、现代化建设、人文景观、教育医疗等，都

---

<sup>272</sup> 潘先敏〈关于利用外事侨务资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思考〉，见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编《2005年海南外事侨务工作调研论文集》（出版社不详，2006）。

<sup>273</sup> 唐若玲、王佳《文昌华侨之乡》（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因琼人的跨国流动发生着变化。当然，大部分影响是积极有力的，也有不少是破坏性的。琼人的跨国实践行为，从最初的外出打拼尽义务，赡养亲人，改善家人生存环境，尽义务、补偿性转变为交换、互惠的跨国实践关系。在侨乡投资盈利，资产保值也慢慢成为琼人与祖籍地联结的跨国实践原因。海南侨乡的产生与发展，反映出琼人与侨乡多元跨国互动关系，发挥着资金、智力、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在琼人全方面的跨国实践互动模式中，海南侨乡的文化、经济、社会不断升华与发展。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侨乡的海南本土文化及其乡土意义，影响着新加坡琼人在异国他乡的价值观、传统传承和生活习俗。总之，琼人作为海南侨乡经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以及侨乡发展的有力推动力量，海南从传统侨乡到今天的新侨乡，琼人与海南的跨国网络关系不断地演变、强化。从最初的道义、馈赠到整合资源、趋同趋利；从琼人单一向侨乡输血式，到实践互侨、利侨的共生共赢的跨国互动模式。

海南侨乡之所以被称为侨乡，正是出于在跨国网络的多层次互动中，使海南的人文景观和社会发展都烘托出“侨”的氛围。值得强调的是，“侨”的特殊标记形成，一方面，与琼人的个人情感与认同意识相关联，关系认同是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取决于琼人在新加坡的生活状况。网络只是作为一种渠道和载体，使主体增加接触的机会，能彼此传播、交流、融合、渗透和碰撞。在不断拓展的网络交往功能中，增进了琼人与侨乡亲人间的情感联系；网络空间中资本资源的整合，使彼此得到互惠，相互切磋，促进创造。因此，跨国网络的本质：一、它是一个交往平台，把移民与侨乡多人联系在一起，进而影响侨乡资源分配和生产方式；二、它是一个跨国经济模式，扩大联结的内涵；三、它是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空间，对乡友的精神丰富产生意义。在经济活动的基础上，由此展示资本经济、商品经济、劳动力经济等各种经济网络形态；在文化跨国互动的基础上，展示出衣、食、住、行中西文化渗透网络；在慈善公益资本上，展示出于认同、情谊、义务的社会公益关系网络。跨国网络在多重互动中巩固结构发展，跨国网络和“侨”的内涵不断丰富，不仅勾勒出一个按血缘、地缘、业缘为人际关系的网络，也建构一个因应环境变化，随机改变关系定位的网络运作。与此同时，移民建立的跨国地理国界，多重联结原籍地的关系进程，正是跨国主义所强调的重点，也是本章研究的意义所在。

## 第五章 结语

本文笔者选择用“跨国主义”的理论来剖析琼人族群，一是该理论能更全面客观地解释琼人所呈现的移民现象，二是该理论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笔者的研究正是运用文化人类学，以琼人作为流动、有机的研究个体，在跨国社会场景中，观察其在居住国和移出国间建构的跨国网络，以及摆脱地理疆域束缚，传递信息、观念、情感的跨国“通道”。用社会学走访调查，对研究群体诸现象全面考据，他们如何在跨国社会内部运转、维系和生存，以及作用于两地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的跨国主义实证研究。既体现了跨国主义带来的实际改观，对人际关系网络的生存依赖，也看到跨国琼人的关系维系，是一个不断抗争、不断解体、不断建立的过程。文中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琼人的跨国主义实践行为，讨论新加坡琼人在侨居国与祖籍地间建立的跨国网络、行为动机、观念转变、跨国联结等，用实证方式使该理论充分历史化。笔者认为，运用“跨国主义”理论研究新加坡琼人，不以移民”侨居国“论”侨居国“，也不以”侨乡“论”侨乡“，而是以“动”、“变”相结合的意识思维，跨越国界四海相通的宏观视野研究认识这一现象。从而，解释琼人社会的生活实态和移民情况，跨越国界把两个社会带入同一个社会场景，更能跨越界线观察琼人维系多重社会关系的桥梁作用，更能了解过去与当前移民的异同。当然，借用“跨国主义”理论研究，还因它与此项研究的对象群体有相融合之处。

文中我们看到了，琼人的产生是海南内部的历史原因，以及新加坡殖民发展的需求产物；跨国主义行动的动力，来自琼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寻求良好经济生存的发展所致；跨国网络的延伸，是琼人与海南的关系，由情感、责任、权益转化为互利“双赢”的过程，也是从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的历程演变。这一过程，正如文中 Nina Glick Schiller<sup>274</sup>等人对跨国主义特征所界定的一样，琼人从海南“侨乡某个城镇”跨越国界，跨越疆域，飘洋过海到异域谋生，延伸到“新加坡的家”。在整个跨国社会场景中，琼人与侨乡家庭思想互动，经济往来，依托同一宗教神佛文化，将“一个侨乡社会”延伸到“新加坡海南社群”。而琼人跨国

<sup>274</sup> Nina Glick Schiller, Linda Basch,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From Immigrant to Transmigrant: 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68, no. 1 (1995): 48-63. doi:10.2307/3317464.

主义的开启，又进一步源于：

一、从环境来看，早期琼人出洋，因故土政治局势不稳，民不聊生，处于惊慌害怕的社会环境中；灾害常年爆发，人口压力增大，农田严重不足，无法自给自足等原因。追求美好生活是人性之本，是琼人最初到新加坡的初衷，也是一个家庭的理性的生存策略法则。这一主客观因素的推动，形成海南侨乡民间跨国网络的开端，展现出民间社会生存智慧，以及海南侨乡跨国行为集聚形成的表现。

二、从背景上看，早期到新加坡的琼人，要么是被当作契约劳工或“猪仔”非自由移民而来；要么是奔着英殖民开发建设需要苦工，寻求机会的自由移民而来。“闯南洋”的孕育，开启琼人跨国主义的行为发展。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其中最显现的“跨国家庭”挑战，在跨国空间的侨乡与新加坡形成“两头家”现象，挑战着主流家庭形式。侨乡“留守新娘”独守空房，孩子拥有“名义父亲”，寡居侨眷熬成“留守阿婆”等现象比比皆是。

三、从自身因素看，早年很长一段时间，琼人在新加坡处境艰难，只能从事低贱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面对重要经济领域已被其他方言群占据、被他族排挤、不认同的局面，琼人强烈的求生欲，迫使他们奋力改变其处境。矢志打拼、寒窗苦读，以地缘、血缘、业缘位纽带，在社团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合作，共谋族群权益，改变松散、弱小、封闭的琼籍族群艰难处境。在居住国竞争激烈环境的倒逼机制下，琼人虽与祖籍地“分散”和“远离”，反呈现出一个不断延展的新加坡“海南社群”。在这里费斯特提出的移民逃脱地理束缚和国家领土制约，构建起的“共融”社会空间得以呈现，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编织以地缘为纽带的跨国迁移的“通道”，可理解为“移民链”；帮助“新客”安家找工作，为新来乍到的琼人解决“寄居饭食”的地方；修建同乡敬神拜佛、开展聚会的中心，为生老病死的琼人组建福利慈善机构，建立专属琼人的“小生境”；并共同维护本群在新加坡的权益，建立与新加坡沟通的桥梁。而作为一个拥有多重跨国联系群体的琼人，他们与故土保持着定期有序的跨国社会联系；而故土既有的生活习俗、语言习惯、价值观、为人处世等，都离不开连接海南与新加坡之间的社会场域。这些

也都契合牛津大学教授 Steven Vertovec 和著名人类学教授波斯特对跨国主义的泛指——移民跨国界联系的一种纽带和互动特点。<sup>275</sup>

四、在跨国交流互动中，发现琼人并不是“一去不复返”或“连根拔起”，而是在循环往复的跨国空间践行跨国实践行为。也用实证验证了 Pertse 的跨国主义观点，琼人虽然不住在祖籍地，不向祖籍地纳税，不受当地法律约束，但在跨国民族社会空间中，发表着自己的爱乡主义，通过侨汇赡养家庭、盖屋起楼；用侨资支持家乡文化、教育、医疗、现代化建设等，为海南侨乡社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智力支撑；透过亲情与实利的交织跨国互动，民族主义的认同感、家乡的认同感在跨国远距离中被塑造和抒发。如今，海南侨乡的方方面面取得成就，与琼人跨国互动实践的行为参与和支持密切相关，这是“功能性跨国社会空间”的呈现。而海南侨乡的建筑风格、饮食文化、服装潮流等均受到新加坡的影响。又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信息网络科技的发展，以及海南侨乡经济环境的提升，新加坡琼人与海南间的商业合作及投资交流变得频繁，并开始立跨国企业以促进跨国合作。基于此，也体现了琼人与故乡“线性跨国主义”。

本文还以“海南社群”为中心观察，琼人的跨国主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认同特征，以及双重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间的互动。这一移民特征和现象，佐证了学者 Linda Green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Gristina Szanton Blanc 等人运用跨国主义研究移民领域跨国流动现象的特点。<sup>276</sup>我们发现，随着琼人在居住国的融入，琼人国籍身份也逐渐转化，成为居住国的永久居民。琼人跨国身份认同的嬗变，在政治认同上趋向于新加坡，为新加坡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做出的贡献，也是跨国主义需要关注的重点。据统计，至 1996 年，琼人资金已达数百亿美元。<sup>277</sup>在科教文化领域捐资办学，为居住国培养了大量文化精英，担任高校教育专才等；在社会经济中，为居住国与海南侨乡建架起桥梁，对两地的经济合作交流做出贡献；在参政议政方面，琼人在居住国涌现不少政治人物，进

---

<sup>275</sup> Steven Vertovec, "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Mode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8, no. 3 (2006): 220. doi:10.1111/j.1747-7379.2004.tb00226.x. 220.

<sup>276</sup>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American Ethnologist* 22, no. 3 (1995): 238-248. doi:10.1525/ae.1995.22.3.02a00330. 238-248.

<sup>277</sup> 海南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海南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页 692。

入政府机构。因此，新加坡琼人的跨国主义不仅扩展了跨国场域，也使侨居国的经济在施展中受益，成为有形无形的资源，这也是运用跨国主义研究新加坡琼人的深层意义所在。

跨国主义的另一个核心——“跨国主义实践行为”。在侨乡家庭方面，最初琼人把侨眷留在故土，抱着“过客”、“衣锦还乡”的心理在新加坡打拼。侨乡家庭因缺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农田要么空置，要么雇人照料，无过多经济来源的侨乡家庭只能依靠侨汇；另一种，侨汇数量来源较多的家庭，呈现出炫耀性消费，也让侨乡变成一个消费型社会。所以侨乡家庭对侨汇的强烈依赖性，形成了“依赖型跨国主义”。在海南侨乡方面，当琼人跨国社会生活融入成功，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经济能力，与侨乡的互动展现出优势和直接作用，开启了与祖籍地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跨国互动网络。有捐献物资、热心慈善、造福桑梓；也有带回的西方先进经验、高科技技术、智囊团引智、大量资金注入侨乡，成为侨乡发展不可或缺的顶级资源；也使海南侨乡透过跨境互动锻造着自己的规矩，对故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笔者发现，琼人与海南侨乡的跨国主义互动关系演变，从最初的馈赠、道义、给予，到互助、互惠，趋利的跨国实践投资，其中也展现了跨国实践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王赓武就指出，华人出于爱国爱乡捐赠的慈善精神，在东南亚已转变为在全球化资本环境中投资时代。到今天，琼人的跨国实践行为，呈现出更多商业投资合作、文化互动融合、技术相互借鉴等全方面跨国主义实践联结。海南侨乡不断拓展新的跨国网络互动，开启“跨国民族社会空间”，这些又都是跨国主对侨乡人生活方式改善带来的重要意义。

不同时期，琼人与海南侨乡，在文化、经济、社会上的跨国联结，体现在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互动中。他们在新加坡与海南侨乡间，保持着各种各样具有频率、规模、深度的密切联系。在新加坡，琼人延续保持原有信仰，把与故土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一并带入。在海南侨乡，组织琼籍后代回乡观光活动，文化传承，不忘乡梓情。在琼人与海南侨乡的跨国实践行为中，充分体现着琼人与故土，割不断的血脉和命脉，加强了“根”的感受和联系。其中，跨国主义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身份认同不是对原有文化的剥离，也不是刻板不变，它是一个同化、整合、适应的过程。总之，琼人的跨国主义在跨国实践、

跨国认同、跨国空间中交流，随居住国和祖籍地的发展，以及一代代琼人的繁衍，琼人跨国主义还将呈现跨界、跨阶层，以及多点、多线、多面的复杂跨国场域。

综上，本文通过琼人的跨国关系网络、跨国实践行为、跨国社会场景等方面探讨了近代跨国琼人的跨国主义面貌，展示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内部运转机制，为研究近代华人的提供了一丝新视角。本文的研究既不完全把琼人从两国的场景中剥离，又融入整个新加坡华人社会中进行观察，可窥见各方言群间跨国行为的内部差异。可以说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突破，使得笔者在文中开头提出的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如下：

一、现象的证明。我们看到琼人因推拉力作用的影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出洋。早期琼人需承担起改善家庭生计的责任使命，还有帮带亲友出洋的义务。他们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又通过“排他性”和“重视教育”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空。文中在比较视野下研究琼人社群，既有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横向比较，也有基于历史的纵向分析，可观琼人在新加坡社会进程中的演变和特质。

二、理论的运用。将“跨国主义”理论引入华人跨国身份认同研究领域，看到琼人生存环境和身份认同的嬗变，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新加坡国家性质和国民身份的变化，从而又影响着琼人与海南跨国实践行为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的表现。在广阔的跨国场景中对琼人的实证研究进行对话，丰富了传统研究华人的理论框架和内涵，也使研究视角得以外延。

三、地理概念的新评估。本文以“跨国琼人”为载体，在实证化和理论化的推动上看到地理概念不是孤立、不变的，而是一种历史的进程。同时，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贯通中，呈现出跨国移民超越国家体制外的自主性，以及不受控于国家体制之内的制约性。从该理论下观察“国家”一词，不再只是僵化的地理边界、纵向垂直的权威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机器或防御壁垒。而是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一种流动的空间，一种互动交融的文明，是冲破地理结构的有机构成。

四、材料发掘与整理。本文在论证材料上的运用也算有新发掘，特别是海南民间歌谣和笔者作为媒体人的节目资料的运用，都是本文的一丝亮点。这些材料成为跨国琼人社会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原琼人在居住国和祖籍地的跨国行动中扮演的角色。看到跨国流动后，琼人“两头家”对跨国家庭和跨国婚姻带来的

挑战；琼人在不同时期的跨国实践以及目的嬗变都给侨乡带来了影响；琼人出洋的真实处境和生存实况等等。新材料的挖掘已达到对历史现象的立体性描述，并起到论述场景的互为补充印证。

总的来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确立跨国主义理论研究海外华人的潜在贡献，琼人的跨国移民运动的产生，通过跨国联结的紧密或减少的原因，将对跨国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当然，跨国主义也被视为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还有很多跨国表现形式是未来华人史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中文部分

#### 一、 档案史料、文献

- [1] 《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业刊·闽粤侨乡卷·林氏族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 [2]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3] 陈翰笙《琼侨出国史料调查汇编·第十辑》（海口：海南出版社，1985年）。
- [4] 陈永楠《第一次全省侨情调查报告》（出版社不详，2006年）。
- [5] 符国华〈海南人在新加坡的历史与现状〉，见《海南档案》，2001年第3期。
- [6] 符和积主编、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南文史资料》（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年）。
- [7] 《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1959年）。
- [8] 《革命侨务建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侨务委员会档案，全宗号二二，案卷号652）。
- [9] 耿素丽、章鑫尧《南洋史料》（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08年）。
- [10] 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贯彻侨务政策正确处理归侨中若干问题的通知》（广州：广东省档案馆藏，1961年），第4页。
- [11] 国家测绘局海南基地地理信息中心编制《海南省地图册》（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7年）。
- [12]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推广部《琼崖各县农业概况调查报告》（台北：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年）。
- [13] 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南年检2015》（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 [1] 海南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海南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 [14] 何海鸣主编《侨务旬刊》（北京：侨务通讯部发行，1921年）。

- [15]胡已任撰《外交部档·华工之略历及其被害之真相》（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16]李安斌、卢俊霖著《屯昌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17]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18]林海宁《我省侨资企业发展状况调查》（海口：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编印，2004年）。
- [19]《明宪宗实录》（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年份不详）。
- [20]《清圣祖实录选辑·台湾文献史料业刊（第四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印行，年份不详）。
- [21]（清）张崧等纂修《崖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 [22]（清）倚剑生撰《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第一之三》（广智报局，清光绪24年）。
- [23]王韬《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1000 弢园尺牋·第10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83年）。
- [24]吴华《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出版社，1999年）。
- [25]温孟学等〈海口海南亿元创办纪实〉，见《海口文史资料》，1987年第4辑。
- [26]（日）小叶田淳著、张迅斋译《海南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
- [27]新加坡琼州会馆秘书处/天后宫史略《新加坡琼州会馆庆祝成立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琼州会馆，1989年）。
- [28]杨德春著《海南岛古代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 [29]《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台北：国史馆史料处，1904年）。
- [30]中央侨务委员会《华侨所受不平等待遇》（南京：编者自印，1931年）。
- [31]张之洞〈致陵水冯督办琼州谦护道〉，见《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 [32]张之洞〈致琼州朱道徐守〉，见《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三十》，（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 [33]赵全鹏《海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34]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民国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35]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明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36]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37]朱荣基《光绪末期海口贩运华工出洋若干史实》，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 二、 方志、游记、报刊

- [1]白沙县地方志《白沙县概况》（白沙：白沙县地方编纂办公室，1987年）。
- [2]陈铭枢《民国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
- [3]陈铭枢总纂著《海南岛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 [4]法萨维纳《海南岛志》（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
- [5]海口海关志编纂委员会《海口海关志》（海口：海口海关编，1992年）。
- [6]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编纂委员会《海南洲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
- [7]海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南区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
- [8]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儋县志》（海口：新华出版社，1996年）。
- [9]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编《民国琼山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 [10]（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卷四十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
- [11]聂缉庆、张延主修《光绪临高县志·卷三》（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 [12]文昌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县志》（第十七编《侨务外事》）（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
- [13]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地方志集成·海南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 [14]陈勇〈美国杂碎——美国中餐的故事〉，见《世界日报》（美国），2014年。
- [15]华峰、彭萍、陈春燕〈海南航权开放又添新线〉，见《中国民航报》（北京），2006年3月22日。

- [16]李白静<琼侨抗战的贡献及启示>,见《海南日报》(海口),2015年9月8日,第014版:理论。
- [17]吕岩<“海南鸡饭”被新加坡抢了风头>,见《经济参考报》(北京),2004年8月30日。
- [18]吕岩<“海南鸡饭”——一块被洋化的牌子>,见《海南日报》(海口),2004年8月20日。
- [19]马日炳《康熙文昌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
- [20]南洋华侨杂志社《南洋华侨杂志》(北京: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
- [21]钱伟长<歌唱琼侨气象新>,见《海南日报》(海口),2006年6月3日。
- [22]吴棉、郑善<文昌:华侨港澳台同胞助建文明生态村>,见《海南日报》(海口),2006年7月4日。
- [23]吴仁辉<族谱折射琼侨变迁>,见《海南日报》(海口),2004年3月29日。
- [24]吴仁辉<世界海南人走向大联合>,见《海南日报》(海口),2004年3月29日。
- [25]吴仁辉、符光平<情系桑梓 热心公益>,见《海南日报》(海口),2004年3月23日。
- [26]吴钟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见《海南日报》(海口),2004年3月30日。
- [27]王兴瑞、岑家梧<琼崖岛民俗志>,见《民俗》,1936年第1期。
- [28]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外文昌人>,见《文昌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
- [29]许春媚、孙乐明<赤子丹心报琼崖>,见《海南日报》(海口),2005年8月29日。
- [30]星洲日报社编《星洲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66年影印再版)。
- [31]朱为潮《琼山县志·卷十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
- [32]作者不详<省博物馆赴新加坡征集海南华侨文物>,见《海南日报》(海口),2009年10月28日,第006版:评论。
- [33]作者不详<新加坡华侨率琼剧团回琼>,见《海南日报》(海口),2012年11月2日,第014版:体育新闻综合。

- [34]作者不详<钟声凝固琼侨故乡记忆>,见《海口日报》(海口),2016年5月25日,09版:尚游周刊。
- [35]作者不详<2015年琼侨歌谣传习班在海南琼海举办>,见《中国文化报》(北京),2015年8月20日,第2版:综合新闻。
- [36]作者不详<让全省人民铭记琼侨南侨历史功绩>,见《国际旅游岛商报》(海口),2013年1月19日,第A03版:岛事/要闻。
- [37]作者不详<民国琼侨艰辛“去番”路>,见《海南日报》(海口),2009年11月9日,第019版:史话。
- [38]作者不详<琼侨开拓之功不可没>,见《海南日报》(海口),2009年11月23日,第019版:史话。
- [39]作者不详《华侨杂志》(上海:华侨联合会,民国2年11月)。
- [40]作者不详<论华人出洋宜加审虑>,见《叻报》(新加坡),1888年4月2日。
- [41]作者不详<工匠斗殴>,见《叻报》(新加坡),1899年4月14日。
- [42]作者不详<无知被罚>,见《叻报》(新加坡),1896年6月2日。
- [43]作者不详<有闻必录>,见《叻报》(新加坡),1895年7月1日。
- [44]作者不详<法巫蛊惑>,见《叻报》(新加坡),1894年9月8日。

### 三、 辞典

- [1]陈泽汉、林明主编《海口辞典》(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
- [2]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法律条例政策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
- [3]姚楠主编《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 [4]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
- [5]周南京主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 [6]庄炎林、伍杰主编《华侨华人侨务大辞典》(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

#### 四、 中文专书

- [1]安焕然、吴华合著 《远观沧海阔》（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9年）。
- [2]安东吉·吉登斯、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南京：南京出版社，2000年）。
- [3]本社编《侨情综览 2009》（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 [4]彼德·布劳著、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 [5]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公司联合出版，1994年）。
- [6]程昭星、王新芒著《琼籍华侨与海南革命》（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
- [7]蔡德佳《万宁华侨华人史料·上》（万宁：政协万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002年）。
- [8]蔡葩、王少平、王月旺著《海南华侨与东南亚》（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
- [9]陈哲玮《殖民与移民》（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2015年）。
- [10]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
- [11]陈明《民国华侨名人传略》（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 [12]陈智勇著《海南海洋文化》（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年）。
- [13]陈永阶、林飞鸾主编《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研究史料》（海口：《琼岛星火》编辑部，1993年）。
- [14]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
- [15]陈烈甫《华侨学与华人学总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 [16]陈序经《珠崖篇》（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年）。
- [17]陈维龙《东南亚华裔闻人传略》（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77年）。
- [18]陈荆和、陈育松编著《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2年）。
- [19]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20]陈植《海南岛新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
- [21]陈正祥《广东地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

- [22]冯子平主编《海外琼人风云录》（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 [23]冯子平编著《走向世界的海南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19年）。
- [24]冯子平著《海外侨乡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
- [25]冯子平《海南侨乡》（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 [26]冯子平著《琼侨春秋》（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 [27]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
- [28]方雄普、许振礼编著《海外侨团寻踪》（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
- [29]符和积主编、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南文史资料·第4辑》（海口：三环出版社，1991年）。
- [30]符和积主编、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南文史资料·第8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
- [31]符国华、符丽娜、符平琼主编《琼岛丰姿 3》（广州：龙江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 [32]范基民、符和积主编、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南文史资料·第15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 [33]弗里德曼《新加坡华人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 [3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35]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侨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 [36]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年）。
- [37]何汉文《华侨概况》（上海：上海神州光国社，2000年）。
- [38]寒冬著《海南华侨华人史》（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
- [39]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 [40]海南大学、南方学院大学、海南文化研究中心《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

- [41]海南年鉴编辑委员会、海南年鉴社编《海南年鉴 2000 卷》（海口：海南年鉴社，2000 年）。
- [42]海南文化研究中心编辑《海南移民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 年）
- [43]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海南年鉴 2006·总第 18 卷》（海口：海南年鉴社，2006 年）。
- [44]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海南改革开放二十年纪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年）。
- [45]海南省教育厅编《海南教育年鉴 2006 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年）。
- [46]海南省教育厅编《海南教育年鉴 2005 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年）。
- [47]韩昕余编著《世界因你而精彩》（新加坡：新加坡海南文化研究中心，2013 年）。
- [48]韩纫丰主编《琼侨先驱十杰》（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 年）。
- [49]韩山元《新加坡海南人的心态与社会地位的演变》（海口：海口出版社，1993 年）。
- [50]黑格尔、贺麟等译《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 [51]黄宏荫主编《马来西亚海南会馆史料汇编（上）》（吉隆坡：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2011 年）。
- [52]黄定文《侨汇的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编印，1970 年）。
- [53]黄昆章、张应龙《华侨华人与中国侨乡的现代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
- [54]黄昌华、陈泽枢主编《绿叶对根的情意 海南华侨侨眷作品选 1》（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年）。
- [55]黄王奇主编《铁军侨魂》（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年）。
- [56]黄福銓编著《华侨与中国革命》（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3 年）。
- [57]黄行光主编《琼崖文史集粹》（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年）。
- [58]黄闻新编著《侨星》（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 年）。
- [59]柯木林《细腻阿婆华人通史》（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会，2015 年）。

- [60]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61]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 [62]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 [63]刘士木编《华侨参政权全集》（上海：华侨联合会，1913年）。
- [64]刘鹤编《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广州：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1年）。
- [65]刘宏《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66]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67]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 [68]刘阳《海南华侨文化》（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
- [69]廖逊等主编、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1996·上》（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
- [70]廖逊等主编、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1996·下》（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
- [71]廖逊著《天涯时评：1994》（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
- [72]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上海：独立出版社，1944年）。
- [73]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台北国史馆，1997年）。
- [74]李长傅《华侨》（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
- [75]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 [76]李明欢《跨国化视野：华人移民的圆梦之旅》（比利时：鲁汶大学出版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 [77]李文海、夏明芳、黄兴涛《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 [78]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 [79]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年)。
- [80]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
- [81]林孝胜《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等联合出版,1995年)。
- [82]林少川著《陈嘉庚与南桥机工》(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
- [83]林晓东主编《妈祖文化与华侨华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 [84]林纘春《琼崖农村》(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琼崖农业研究会,1935年)。
- [85]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雪兰莪: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
- [86]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级教育出版社,1991年)。
- [87]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 [88]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 [89]林明仁《文昌华侨文化》(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年)。
- [90]毛起雄、林晓东编著《中国侨务政策概述》(北京:中国侨务出版社,1993年)。
- [91]莫河主编《海南社会风貌》(新加坡: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出版室,2005年)。
- [92]麻国庆主编《山海之间 从华南到东南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 [93]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94]马丁·海德格尔、陈映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 [95]欧大雄著《海南人系列之一 海为龙世界》(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年)。
- [96]丘式如《华侨国际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

- [97]丘汉平撰述《华侨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
- [98]乔卫，波涛《中国侨乡侨情调查》（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
- [99]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
- [100]沈卫红《侨乡模式与中国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101]苏云峰著《海南历史论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
- [102]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出版，1993年）。
- [103]孙中山档案资料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
- [104]萨特著、陈宣良译《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 [105]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编纂委员会等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丛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 [106]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64年）。
- [107]唐玲玲、陈虹、周伟民编著《海南家谱——移民人口史料与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
- [108]唐若玲、王佳《文昌华侨之乡》（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
- [109]王俞春《海南移民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 [110]吴华《新加坡海南人物录》（新加坡：新加坡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海南作家作品出版室，2004年）。
- [111]吴华《马新海南族群史料汇编》（吉隆坡：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1999年）。
- [112]吴华著《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3册》（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77年）。
- [113]吴华著《新嘉坡华族会馆志·第2册》（新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75年）。
- [114]吴泽霖编《海外侨讯汇款》（广州：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民国25年）。
- [115]吴继岳著《六十年海外见闻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3年）。
- [116]吴凤斌《契约华工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17]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8]文人光著《海外琼属社团》（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
- [119]王佳著《故里情深》（海口：南方出版社，2000年）。
- [120]王家槐《海南近至》（台北：台湾日报出版，1993年）。
- [121]王垂芳，陆志濂主编《世界著名华侨华人企业家列传》（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 [122]王振春著《狮城老街故事》（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
- [123]王振春著《根的系列——话说海南人》（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
- [124]王赓武著《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 [125]王赓武著，姚楠编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上海：中华书局，1988年）。
- [126]王赓武著，张奕善译《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58年）。
- [127]王辛莉著《琼属海外知名人士》（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
- [128]薛典曾《保护侨民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 [129]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论文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
- [130]邢益森主编《海南乡情揽胜 宝岛风姿录 第5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
- [131]邢益森、韩启元、黄良俊著《琼侨沧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
- [132]云愉民《新加坡琼侨概况》（海口：海南书局，1931年）。
- [133]杨发金等主编《中国涉外知识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134]颜清湟《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 [135]中共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海口：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1986年）。
- [136]周伟民主编《海南学论丛·第一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
- [137]周伟民主编《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

- [138]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 [139]庄国土《东亚华人社会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和一体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 [140]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 [141]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142]庄国土《当代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起源、兴起与发展》（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
- [143]庄国土《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
- [144]庄国土《族谱和海外华人移民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2002）。
- [145]庄国土、清水纯、潘宏立等著《近30年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 [146]庄国土主编、康晓丽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47]张一平、程晓华著《海南抗日战争史稿》（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
- [148]张兴汉等主编《华侨华人大观》（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 [149]张朔人、于苏光著《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年）。
- [150]张朔人、于苏光《华侨资本与海南产业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
- [151]张希哲主编《五十年来的华侨与侨务》（台北：华侨协会总会，1997年）。
- [152]朱丽娜主编《侨情综览2010》（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53]朱敬先《华侨教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
- [154]朱杰勤《华侨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55]朱逸辉著《狮城纪实》（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
- [156]郑亦琰、吴伦霓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

[157]钟燕波编《万宁娇子:万宁籍外出人员英才录·第2卷》(万宁:万宁市地方志办公室,2006年)。

[158]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昱、刘健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 五、 中文期刊论文

[1]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

[2]本刊编辑部<情系桑梓·绿叶对根的情意琼侨与南洋文化>,见《泛旅 Fun Travel》,2012年2月。

[3]陈树人<两年来之侨务行政工作——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侨务委员会陈委员长树人在中央纪念周报告>,见《华侨青年》,第1卷,第1期,页64-65。

[4]陈春圃<侨民教育之回顾与前瞻>,见《革命文献》,1971年第55辑,页527-535。

[5]崔贵强<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见《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23-24。

[6]崔贵强<晚清官吏访问新加坡>,见《南洋学会》,页15-29。

[7]崔贵强<晚清的企业经营与星马华人>,见《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页17-20。

[8]蔡葩<内地文化对新加坡琼籍华侨的影响>,见《新东方》,2009年。

[9]陈刚父<海外华侨的救国运动>,见《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页130-132。

[10]陈启秀<对于华侨报纸的几项希望>,见《侨务月报》,廿5年7、8合刊号,页1-2。

[11]陈文<无私的奉献 闪光的丰碑——海南省琼海华侨图书馆建馆纪实>,见《图书馆论坛》,1993年3月,页72-73。

[12]陈期凡、史振卿<浅析琼侨的社会地位变迁>,见《企业导报》,2013年2月。

[13]陈期凡、史振卿<琼侨对国家的认同>,见《中外企业家》,2013年2月。

[14]陈青山<依靠琼崖人民建设南岛明珠——纪念琼纵诞生70周年>,见《广东党史》,1997年4月,页14-17。

[15]潮龙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见《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7年第3期。

- [16]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见《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12年第3期。
- [17]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见《华侨与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 [18]代婧<重洋难隔 赤子情牵——论华侨与琼崖抗战>，见《海南档案》，2017年2月，页27-30。
- [19]何舒敏<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日报——叻报（1881-1932）>，见《南洋学报》，第34卷，第1、2期，（1979年），页5。
- [20]胡汉民口述，张振之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1册，页23-24。
- [21]韩槐准<琼州南洋交通考>，见《琼州会馆联合会报》，第1卷，第1期（1948年1月）。
- [22]冯文<海南行政区华侨历史学会加强对琼侨历史研究>，见《华侨历史》，1986年3月。
- [23]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见《华侨史研究论集》，页333-347。
- [24]方雄普<晚清时期吸收华侨资本的措施>，见《华侨华人史研究集（一）》，页115。
- [25]方宝璋<略论海外华侨华人四缘组织>，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7月20日。
- [26]冯文<海南行政区华侨历史学会加强对琼侨历史研究>，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6年3月，页79。
- [27]傅乃昭<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
- [28]广东省政府<关于华侨协会琼崖分会征收归国琼侨特别捐案>，见《广东省政府周报》，1928年第28-29期。
- [29]何瑜<近代海南岛开发>，见《历史档案》，1992年2月。
- [30]何雁<依从“番”回打日本——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追记>，见《今日海南》，2005年8月。

- [30]黄剑隐〈侨民教育的民族意识问题〉, 见《侨务月报》, 民国22年11月30日第2期, 页11-12。
- [31]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领袖进阶模式的探讨(二)〉, 见《国史馆馆刊》, 1993年12月复刊15期, 页80。
- [32]寒民〈第一个女琼侨是谁?〉, 见《琼州乡音》, 1987年1月, 页64。
- [33]郝少波〈琼北民居近代“南洋风”的成因及衍变初探〉, 见《新建筑》, 2011年5月, 页102-104。
- [34]蒋永敬〈南洋华侨与辛亥革命〉, 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7编(上)》, 页693-701。
- [35]柯木林〈晚清海外笔记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 见《东南亚南亚研究》, 1986年。
- [36]凌弘〈从新加坡人学中文想起〉, 见《同舟共进》, 1996年2月, 页41-41。
- [37]林纘春〈对於琼侨集资开发琼崖实业有所献言〉, 见《琼农》, 1936年第25-27期。
- [38]林明亚著、陈序传摘译〈新加坡的海南人〉, 见《新加坡共和国琼人工商业志》, 1926年第2辑。
- [39]林日举、李琼〈外国资本主义侵琼及岛内人民的抗争〉, 见《琼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 [40]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广东的投资(1862-1949)〉, 见《暨南学报》, 1988年第1期。
- [41]龙剑平、朱小宁〈近代返琼华侨引入的新生活方式〉, 见《黑河学刊》, 2016年。
- [42]卢翔《琼崖华侨与海南抗战》, 见《智富时代》, 2015年12月, 页351。
- [43]凌绪柏、陈有海〈华侨对海南岛植胶业的贡献〉, 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88年。
- [44]裴行荣〈琼侨咖啡香满狮城〉, 见《琼州乡音》, 1992年1月, 页34-35。
- [45]皮永华〈东南亚琼商与琼商会馆〉, 见《中国商论》, 2017年10月, 页62-63。
- [46]琼音〈琼侨的科技文化地位和作用〉, 见《科技进步与对策》, 1988年3月。

- [47]单晓华<南洋琼侨背后：守望家乡的女人们>，见《天涯华文》，2014年3月，页10-15。
- [48]苏成耀<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新发展>，见《八桂侨刊》，1997年1月，页38-39。
- [49]王朝赞、陈永阶<琼籍华侨华人对家乡的贡献>，见《海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1月，页90-94。
- [50]王春<乡愁就是一碟海南鸡——新加坡华侨的创业故事>，见《中国-东盟博览》，2017年3月，页88-89。
- [51]王纯强 Ong Soon Keong. <重建通道：林文庆与海外华人“归国”的抉择>，见《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2021年。
- [52]王纯强 Ong Soon Keong. 2017. “约莫是华人：“华侨”与海外华人的边缘化”。《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2017年6月，页41-66。
- [53]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见《南洋资料译丛》，1986年第4期。
- [54]王琦、韩雪<华侨在琼投资权益保护状况研究>，见《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
- [55]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1期（2002.3），页13-22。
- [56]王翔<近代南洋琼侨的社团与生活>，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3期（2001.3），页27-38。
- [57]吴開進<新加坡華人黃培茂在海南>，见《今日中国》，1990年3月。
- [58]吴东炬<琼侨一支笔 椰海夕照红——韩启元的文墨人生>，见《海内与海外》，2016年6月。
- [59]谢成佳<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年会>，见《海内与海外》，1998年11月。
- [60]晓宁<琼州侨史>，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6年4月，页79。
- [61]叶祥松<海外华人和华人经济>，见《当代亚太》，1997年。
- [62]杨本科<新加坡华侨中学师生团到海南华侨中学访问>，见《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3年6月。

[63]周松<一曲华侨工作的赞歌——纪念冯白驹将军诞辰 100 周年>，见《今日海南》，2003 年 9 月。

[64]周晓红《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见《社会科学（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2008 年第 4 期。

[65]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见《世界历史》，2011 年 5 月。

[66]庄国土<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见《海外事情》，2009 年第 11 期。

[67]庄国土<中国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华侨华人>，见《南洋问题研究》，2011 年 4 月。

[68]庄国土<早期东亚华人社团形成的主要纽带>，见《南洋问题研究》，2010 年 3 月。

[69]庄国土<海外侨务资源与国家发展战略>，见《侨务工作研究》，2008 年 10 月。

[70]庄国土<航海与龙的传人——海外华侨的足迹>，上海海事大学等编《海洋：我们民族留下的记忆》，见《海洋出版社》，2008 年。

[71]庄国土<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基础及其发展趋势>，见《当代亚太》，2010 年 6 月。

[72]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见《厦门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

[73]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见《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 4 月 2 日。

[74]庄国土<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见《侨务工作研究》，2010 年 4 月。

[75]庄国土<新移民与第四次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大潮>，见《北大亚太论丛》，2008 年 5 月。

[76]张逢博<试论近代新马地区琼侨社团的建立及其职能>，见《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 12 月。

[77]张朔人<民国时期海南侨汇问题述论>，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 10 月。

- [78]张小欣<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见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
- [79]朱军舟、胡素萍<琼海关与近代海南社会的变迁>，见《新东方》，2011年6月。
- [80]曾玉薇<保护和弘扬海南华侨文化，发挥华侨文化的现实作用>，见《新教育》，2017年10月。
- [81]锤彪<琼侨之光>，见《传记文学》，1993年1月。
- [82]作者不详<国内侨讯一束>，见《南洋研究》，第3卷，第2期(民国19年6月1日)，页152-154。
- [83]作者不详<海外同胞之哀声>，见《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民国9年1月10日)，页126-129。
- [84]作者不详<华侨消息>，见《南洋研究》，第3卷，第1号，(民国19年1月1日)，页209-210。
- [85]作者不详<侨报论评选辑>，见《侨务月报》，第10卷，第11期合刊，(年份不详)，页5-7。
- [86]作者不详<侨务管理处三周年工作报告>，见《侨务月报》，第2卷，第5期，(民国24年5月)，页31-32。
- [87]作者不详<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工作报告>，见《侨务月报—侨务特刊》，第2卷，第5期，(民国24年5月)，页5-6。
- [88]作者不详<十年侨务特刊>，见《海外文化团体概况》，民国31年，页23-25，页51-53。
- [88]作者不详<教育部调查华侨学务专项>，见《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下册》，页846-854。
- [89]作者不详<侨民之保护>，见《十年侨务特刊》，页18-19。
- [90]作者不详<侨务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秘书处工作报告>，见《侨务月报特刊》，页9-51。

## 六、 华侨会馆、社团刊物

- [1]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新加坡琼侨咖啡酒餐商公会卅三周年纪念暨扩建会所落成开幕特刊》（1967年）。
- [2]新加坡琼州会馆编《新加坡琼州会馆一三五周年纪念刊》（1989年10月14日）。
- [3]新加坡海南商会《世界海商论坛》（2014年）。
- [4]新加坡海南商会《智者乐水》（2013年）。
- [5]新加坡海南协会《新加坡海南协会庆祝成立60春秋暨呈现大型琼剧文艺晚会特刊》，出版日期不详。
- [6]新加坡海南商会《五周年特刊》（出版日期不详）。
- [7]新加坡海南会馆《160周年纪念 25双庆特辑》（2014年）。
- [8]新加坡海南会馆《泉》（2016年）。
- [9]新加坡海南协会《新加坡海南协会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出版日期不详）。

## 七、 学位论文

- [1]曹云华《从文化适应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广州：暨南大学，2001年）。
- [2]李跃利《民国时期的琼海关研究》（海口：海南师范大学，2014年）。
- [3]李未醉《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的合作与冲突（1923-1999）》（广州：暨南大学，2004年）。
- [4]龙向阳《世界体系中的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一种历史的分析与反思》（广州：暨南大学，2003年）。
- [5]任健强《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年）。
- [6]孟晓吾《琼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研究》（海口：海南大学，2011年）。
- [7]孟庆梓《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建构与演化——以新加坡江兜王氏社群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2008年）。
- [8]王望波《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厦门：厦门大学，2004年）。
- [9]汪鲸《新加坡华人族群的生活世界与认同体系（1819-1912）》（广州：暨南大学，2011年）。

[10]肖文燕《华侨与侨乡社会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市个案研究》（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

[11]周自清《近代受南洋文化影响的琼北民居空间形态特征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

[12]张坚《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2-1928）》（厦门：厦门大学，2002年）。

## 八、 网站检索工具

[1]海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见 <http://www.hnszw.org.cn/index.php>

[2]海南省档案信息网，见 <http://archives.hainan.gov.cn/web/default/index.jsp>

[3]新加坡海南会馆，见 <http://hainan.org.sg/>

[4]中国国家图书馆，见 <http://www.nlc.cn/>

[5]全侨民主和平联盟，见 <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

[6]E-Newspapers，见 <http://libguides.nus.edu.sg/chineseresources/ch-e-newspapers>

[7]国家图书馆，见 <http://eresources.nlb.gov.sg/main/>

[8]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见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tuijian/>

[9]新加坡统计局，见 <https://www.singstat.gov.sg/find-data/>

[10]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报章胶片网，见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

[11]海南史志网，见 <http://www.hnszw.org.cn/>

[12]新加坡李显龙总理 2019 年新加坡国庆献词，可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cKXSGH94> （2019年8月20日）。

## Bibliography

## 九、 英文专书、论文、期刊

[1]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Chatterjee, Partha.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3] Chin Eng, Kiong. 1907.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 1907.
- [4] Chin, Kong, James. 1998. "Merchants and Other Sojourners : The Hokkiens Overseas", 1570-1760. doi:10.5353/th\_b4389405.
- [5] Chung, Ng Wing. 1987.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āng Structu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8 (1): 149-150. doi:10.1017/s002246340000134x.
- [6] Clifford, James. 1994.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3): 302-338. doi:10.1525/can.1994.9.3.02a00040.
- [7] Cohen, Paul A.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8] Cruikshank, Bruce, and Seyd Hussein Alatas. 1978.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the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3 (1): 258. doi:10.2307/1866085.
- [9] DeBernardi, Jean Elizabeth, Gregory Forth, and Sandra Niessen. 1995. *Managing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Montreal: Canadian Counci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0] Duara, Prasenjit. 1997.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4): 1030. doi:10.2307/2170628.
- [11] Dunlop, S, W.A. Pickering, V. Cousins, H. Hewetson, A. Knight, and A.P. Talbot. 2021.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Singapore, 1881*. Singapore: Straits Settlements Government Press.
- [12] Godley, Michael R. 1989.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 (1): 135-136. doi:10.1017/s0022463400020051.
- [13] Hirschman, Charles. 1986. "The Making of Race in Colonial Malaya: Political Economy and Racial Ideology". *Sociological Forum* 1 (2): 330-361. doi:10.1007/bf01115742.
- [14] Hsu, Madeleine. 2001.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Kuhn, Philip A. 2006. "Why China Historians Should Stud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Vice-Versa".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 (2): 163-172. doi:10.1353/jco.2006.0015.

- [16] Kuhn, Philip A. 2009. *Chinese Among Other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17] Lau Fong, Mak. 1986. *The Locality and Non-Locality Organizing Principles : A Technical Report on the Taxonomy of Chinese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Dep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18] Lee, Edwin. 1991. *The British as Ruler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19] Lin, Man-Houng. 2001. "Overseas Chinese Merchants and Multiple Nationality: A Means for Reducing Commercial Risk (1895-1935)". *Modern Asian Studies* 35 (4): 985-1009. doi:10.1017/s0026749x01004085.
- [20] Lockard, Craig A. 1991. Review of "Chinese Pioneers On The Sarawak Frontier 1841–1941 by Daniel Che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3): 730-731. doi:10.2307/2057634.
- [21] Ong, Soon Keong. 2013. "Chinese, but not Quite": Huaqiao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9 (1): 1-32. doi:10.1163/17932548-12341247.
- [22] Ong, Soon Keong. 2021. "Rebuilding Corridor, Preserving Prestige: Lim Boon Keng and Overseas Chinese-China Relations". *China and Asia: A Journal in Historical Studies*, no.2: 134-161.
- [23] Ong, Soon Keong. "To Save Minnan, To Save Ourselves: The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Fujianese Home Village Salvation Movement" in *On the Margins of China*, 243-266.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4] Ong, Soon Ke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5] Pan, Lynn. 2006.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2nd ed.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 [26] Purcell, Victor. 1980.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7] Ross, Heidi, and Kathleen L. Lodwick. 1996. "Educating the Women of Hainan: The Career of Margaret Moninger in China, 1915-1942".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6 (2): 196. doi:10.2307/369509.
- [28] Rutherford, Jonathan. 1998. *Identit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
- [29] Lew, See Fah. 1901. "Straits Chinese Youths".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5, , 1901.

- [30] Skinner, G. William. 1959.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 (1): 136-147. doi:10.1177/000271625932100115.
- [31] Skinner, G. William. 1976. "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gional Systems Analysis". *Regional Analysis*, 327-364. doi:10.1016/b978-0-12-652101-6.50020-6.
- [32] Szonyi, Michael. 2005. "Mothers, Sons And Lovers: Fidelity And Frugalit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Divided Family Before 194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 (1): 43-64. doi:10.1163/179325405788639319.
- [33] Skinner, G. William. 1959.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 243-243. doi:10.1017/s000305540023428x.
- [34] Wang, Gungwu. 2017.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Pacific*, 335-344. doi:10.4324/9781315240756-12.
- [35] Wang, L. Ling-chi. 1991. "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Daedalus* 120 (2): 181-20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0025379>.
- [36] Yen, Ching-Hwang. 1982.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Modern Asian Studies* 16 (3): 397-425. doi:10.1017/s0026749x00015249.
- [37] Zhang, Guotu. 2001. "How China Considers the Overseas Chinese". *Asian Affairs*, 1-16.
- [38] Zhang, Guotu. 2006. "Trends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 in East Asia: As Mirrored from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78".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4: 1-23.
- [39] Zhang, Guotu. 2008. "Forth Wave of Chinese Migration: As Mirrored in the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st 20 Years". *Journal Of Diaspora Studies*, 5-34.
- [40] Zhang, Guotu. 2010. "Migration and Trade: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Malaysia)*, 174-193.

附录一：

清代土田税额一览表

州县田税	原额田	田	地	塘	泥沟	年号	新垦升科税	连原额共计税	内除豁免荒税（或被水冲陷田地）	外实编征官民田地山塘等税	备注
琼州府	3833 5 顷 91 亩 9 分 9 厘	3467 0 顷 71 亩 6 分 3 厘	3526 顷 29 亩 9 分 8 厘	138 顷 90 亩 3 分 5 厘	42 座 车 池 10 座	康熙 元 年 至 嘉 庆 十 一 年	3112 顷 40 亩 8 分 3 厘 4 毫	41448 顷 32 亩 8 分 4 毫	11466 顷 5 亩 3 分 9 毫	2998 2 顷 27 亩 4 分 9 厘 5 毫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乾隆八年（1743年）豁免荒税
琼山县	6809 顷 45 亩 1 分 3 厘 2 毫		2154 顷 57 亩 1 分 7 厘 8 毫	75 顷 91 亩 4 厘 4 毫		康熙 二 年 至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388 顷 85 亩 5 厘	9439 顷 56 亩 2 分 6 毫	1685 顷 5 分 7 厘 8 毫	7754 顷 8 亩 6 分 2 厘 7 毫	乾隆六年（1741年）到乾隆八年（1743年）被水冲陷田地
澄迈县	3758 顷 43 亩 5 分 3 厘 7 毫		92 顷 94 亩 1 分 9 厘 6 毫	10 顷 67 亩 2 分 8 厘 5 毫		康熙 元 年 至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526 顷 24 亩 6 分 3 厘 1 毫	4388 顷 29 亩 6 分 4 厘 9 毫	1338 顷 56 亩 2 分 3 厘 9 毫	3049 顷 73 亩 4 分 零 9 毫	

定安县	3203 顷74 亩5 分7 厘6 毫		556 顷83 亩1 厘4 毫			康熙 元年 至三 十六 年	460 顷 95 亩4 分8 厘 8 毫	4221 顷53 亩7 厘 8 毫	2105 顷45 亩7 厘 1 毫	2116 顷8 亩6 毫	
文昌县	7086 顷33 亩6 分		81 顷 95 亩 3 分	1 顷 66 亩		康熙 二年 至嘉 庆十 一年	138 顷 47 亩6 分8 厘 1 毫	7309 顷41 亩3 分 2厘 5 毫	1089 顷26 亩1 分 1厘 8 毫	6220 顷15 亩2 分6 毫	
会同县	1258 顷30 亩1 分		7 顷 81 亩 3 分 3厘 1毫	1 顷 54 亩 3 分 1厘		康熙 二年 至乾 隆十 九年	59 顷 17 亩6 分5 厘 7 毫	1326 顷73 亩6 分 9毫	157 顷 9亩 3分 1厘 9毫	1169 顷64 亩2 分7 厘9 毫	
乐会县	1091 顷27 亩2 分2 厘6 毫		20 顷 36 亩 9 分	1 顷 43 亩 5 分 4厘 2毫		康熙 二年 至乾 隆十 七年	300 顷 59 亩3 分6 厘 1 毫	1413 顷67 亩2 厘 9毫	378 顷 49 亩9 分6 厘 4毫	1035 顷17 亩6 厘5 毫	
临高县	3236 顷12 亩9 分2 厘7		379 顷99 亩4 分5 厘	2 顷 48 亩 4 分 8厘 1毫		康熙 元年 至	635 顷 2亩 5分 9厘 7毫	4253 顷63 亩4 分 6厘 6毫	2455 顷18 亩1 分 4厘 6毫	1798 顷45 亩3 分1 厘7	康熙三 一年（ 1692 年） 无征 田税

	毫、					乾隆二十一年				毫	
儋州	3126 顷92 亩1 分7 厘5 毫		112 顷71 亩3 分8 厘9 毫	15顷 35亩 5厘 3毫		雍正七年至乾隆三十三年	43顷 76亩7 分1厘 7毫			3298 顷75 亩8 分1 厘1 毫	
昌化县	12顷 17厘 7分 9厘 6毫	官屯 田1 亩7 分4 厘2 毫， 民田 424 顷42 亩1 分6 厘8 毫	10亩 8分	5顷 91亩 6分		康熙二年至乾隆十七年	75顷 57亩7 分7厘 1毫	518顷 23亩3 毫	211顷 54亩7 分1厘 3毫	306 顷68 亩2 分8 厘8 毫	
万州	1162 顷37 亩9 分3 厘2 毫		3顷 81亩 7分 1厘 6毫	6顷 18亩 6分 3厘 4毫		康熙元年至乾隆四十年	250顷 80亩6 分7厘 2毫	1423 顷19 亩9分 2厘2 毫	653顷 55亩2 分9厘 6毫	769 顷64 亩6 分2 厘6 毫	
陵水县	1165 顷85 亩1 分1		72亩 2分 3厘 6毫	5顷 97亩 1分 2厘		康熙二年	58顷 12亩7 分7厘	1230 顷67 亩2分 4厘	671顷 92亩8 分8厘 1毫	558 顷74 亩3 分5	

	厘4 毫					至乾隆 四十二年				厘8 毫	
崖 州	2071 顷8 分7 厘8 毫		98顷 81亩 6厘 7毫	9顷 44亩 1分 6厘 8毫		康熙 二年 至乾 隆二 十六 年	70顷 47亩 3分 5毫	2249 顷8亩 6分1 厘8毫	628顷 8亩6 分1厘 8毫	1621 顷64 亩7分 9厘9 毫	
感 恩 县	264 顷36 亩9 分5 厘6 毫		3顷 86亩 4分 6厘	2顷 32亩 5分		康熙 元年 至乾 隆二 十七 年	104顷 33亩 1分2 厘7毫	374顷 89亩 4厘3 毫	91顷 41亩 3分5 厘1毫	283 顷47 亩6 分9 厘1 毫	

(资料来源：(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三下》(经政志六·志田)，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页599-605)

## 附录二：

清代科则一览表

	琼 山 县	澄 迈 县	定 安 县	文 昌 县	会 同 县	乐 会 县	临 高 县	儋 州	昌 化 县	万 州	陵 水 县	崖 州	感 恩 县
--	-------------	-------------	-------------	-------------	-------------	-------------	-------------	--------	-------------	--------	-------------	--------	-------------

分 则 情 况	官 民 田、 地、 塘 各 分 九 则	官 民 田、 地、 塘 各 分 五 则， 沟 池 止 分 民 米 二 则	官 民 田 各 分 三 则， 民 地 二 则	官 民 田、 塘 各 分 六 则， 民 地 一 则	官 民 田 各 分 三 则， 民 塘 二 则	官 田 二 则， 民 田、 地、 塘 七 则	官 民 田、 地、 塘 各 分 五 则	官 民 田、 地、 塘 各 分 五 则， 又 官 地 一 则	官 田、 地、 塘 分 三 则， 民 分 四 则	田、 地、 塘 分 五 则， 民 黎 分 六 则	官 田、 地、 塘 分 五 则， 民 地 一 则	官 民 田、 地、 塘 各 分 五 则	官 田、 地 分 四 则， 民 黎 田、 地、 塘 分 四 则
上 则 田 每 亩 科 官 米	殷 苗 二 合 七 勺 三 抄 九 撮 七 圭 一 粟	二 升 四 合 九 勺 八 抄 四 撮 六 圭 六 粟	三 合 四 升 三 抄 四 撮 一 圭 三 粟 四 粒	八 合 五 勺 七 抄 一 撮 零	一 合 一 勺 一 抄 七 撮 七 圭 四 粟	一 则 官 田， 二 斗 五 升 零 九 勺 一 抄 六 撮 七 圭	一 升 零 五 勺 九 抄 三 撮	一 升 一 零 勺 八 抄 八 撮 七 圭 六 粟 七 粒	上 则 官 田、 地、 塘、 二 斗 九 升 一 合 零 四 抄	官 田， 科 斗 六 合 一 勺	四 合 一 勺 二 抄 六 撮 八 圭 六 粟 五 粒	二 合 九 勺 五 抄 八 撮 三 圭 五 粟	半 京 民 田， 六 合 九 勺 二 抄 九 撮 九 圭
民 米	三 升 一 合 五 勺 二 零 圭 九 粟	一 升 五 合 二 勺 四 抄 七 撮 三 圭 四 粟	二 升 五 合 六 勺 六 抄 九 撮 八 圭 六 粟 六 粒	二 升 一 合 九 勺 二 抄 三 撮 零	一 升 八 合 五 勺 六 抄 五 撮 九 圭 八 粟		二 升 一 合 五 勺 七 零 撮	二 升 七 合 七 勺 九 抄 六 撮 二 圭 三 粟 三 粒	上 则 官 屯 田， 每 亩 科 官 米 二 斗 一 升 四 合		一 升 四 合 零 六 抄 三 撮 一 圭 口 粟 五 粒	二 升 二 合 一 勺 四 抄 一 撮 六 圭 五 粟	二 升 五 合 一 勺 七 抄 零 一 圭
中 则 田 每	殷 苗 二 合 七 勺 三 抄 九	二 升 零 五 勺 零 八 粟	二 合 六 勺 零 一 圭 三 粟 四	七 合 三 勺 六 抄 八 撮 零	九 勺 三 抄 一 撮 四 圭 九	民 田， 一 升 三 合 七 勺	八 合 五 勺 六 抄	八 合 六 勺 二 抄 一 零 三 粟		官 田， 科 斗 一 升 三	三 合 三 勺 九 抄 八 撮 五 圭	二 合 六 勺 零 四 撮 七 圭 六	民 田， 六 合 九 勺 二 抄

亩科官米	撮7圭1栗		粒		栗	2抄9撮7圭2栗				合1勺6抄5撮4圭	9栗5粒	栗	9撮9圭
民米	2升4合1抄零	1升2合5勺6抄9撮2圭1栗	1升8合6勺8抄5撮8寺6栗6粒	1升8合8勺4抄6撮零	1升5合4勺7抄1撮6圭5栗		1升6合零5抄	2升3合4勺7抄8撮9圭9栗	中则民田、地，每亩科民米 <sup>3</sup> 升 <sup>2</sup> 合 <sup>1</sup> 勺		1升1合5勺8抄1撮4圭零5粒	1升9合4勺9抄5撮2圭4栗	2升5合1勺7抄零1圭
下则田，每亩科官米	殷苗2合7勺3抄9撮7圭1栗	1升4合3勺5抄1撮1圭5栗	1合8勺9抄4撮1寺3栗4粒	4合8勺4抄2撮	4勺抄9撮9圭4粒	碱伤田，科伤米1升4合7勺7抄7撮1圭	5合5勺7抄9撮9圭4栗3粒	6合9勺2抄5撮5圭6栗	官田，科斗升合1勺	1合9勺6抄5撮2圭1栗2粒	1合8勺7零撮零7栗		
民米	2升4合1零抄零2圭9栗	8合7勺6抄8零圭4栗	1合8勺零2撮6栗5粒	1升2合3勺8抄5撮	9勺4抄1撮6圭4栗		1升9零9勺5抄2撮9圭4栗8粒	1升8合8勺6抄1撮4圭4栗	中则泉源田，一亩正科民米 <sup>4</sup> 升 <sup>2</sup> 合 <sup>8</sup> 勺	民田1则，科升合8勺	6合6勺9抄6撮8圭6栗2粒	1升3合5勺2抄4撮9圭3栗	

下则田, 每亩科官米				1 合 9 勺 9 抄 3 撮 零		学田, 科学 升 1 合 5 勺 4 零 8 撮 8 圭 8 粟 8							
民米				5 合 1 勺 零		民黎田, 科黎 米 1 斗 1 升 8 合 8 勺 1 零 1 撮				僧道田, 每亩科 升 5 合 3 勺 5			黎田, 每亩科黎 米 3 升 2 合 1 勺
下则地, 每亩科官米				4 合 8 勺 4 抄 2 撮		地亩 1 则, 科夏 米 2 升 6 合 9 勺 4 抄 9 撮 4 圭	地 1 则, 1 合 4 勺 1 抄 9 撮 零 1 粟 3 粒					地 1 则, 1 合 5 勺 3 抄 5 撮 7 圭 5 粟	官屯田, 每亩科官屯 耗米 3 斗
民米				1 升 2 合 3 勺 8 抄 5 撮			1 升 零 7 勺 4 抄 7 撮 9 圭 3 粟 6			黎田, 每亩科黎 米 3		1 升 1 合 4 勺 9 抄 4 撮 2 圭 5 粟	

							粒			升 2 合 1 勺			
地稅, 每 亩科夏 稅米					1 升 9 合 6 勺 8 抄 3 撮 7 圭 2 粟		又科夏 稅农桑 米 6 勺 3 抄 1 撮 7 圭 1 粟 5 粒			官地, 每 亩科 官米 斗 2 升 1 合 3 勺 2			
上 則黎 地, 每 亩科 夏稅 米								3 合 3 抄 6 撮 2 圭 6 粟		民地, 每 亩科 民米 升 4 合 2 勺 8			
棉 花地, 每 亩科 官米								7 合 零 9 抄 7 撮 9 圭 8 粟					
民 米													3 升 2 合 1 勺
塘 溪, 每 亩科 民					1 升 9 合 6 勺 8 抄 3 撮 7 圭								

米					2 栗								
苳麻地, 每亩科夏税米			2 合 零 4 抄 3 撮 7 圭										
淡灾伤苗, 每亩科官米	殷 苗 2 合 7 勺 3 抄 9 撮 7 圭 1 栗												
民米	1 升 7 合 6 勺 9 抄 7 撮 2 圭 9 栗												
碱伤苗, 每亩科官米	殷 苗 2 合 7 勺 3 抄 9 撮 7 圭 1 栗												
民米	1 升 7 合 6 勺 9 抄 7 撮 2 圭 9 栗												
林湾黎	殷 苗 2 合 7												

田苗, 每亩科官米	勺3 抄9 撮7 圭1 粟												
民米	1升 7合 6勺 9抄 7撮 2圭 9粟												
苗地, 每亩科官米	殷 苗2 合7 勺3 抄9 撮7 圭1 粟												
民米	5合 2勺 3抄 2零 圭9 粟												
蚕丝地, 每亩科官米	全仓夏税米合正 8							上则官桑丝地, 每亩科夏税米斗升合撮 2914				科农桑米升合勺抄撮圭粟粒 21857923	

粮地, 每亩科官米		1升 4合 3勺 5抄 1撮 1圭 5粟							中则民桑丝地, 每亩科夏税米 <sup>3</sup> 升 <sup>2</sup> 合 <sup>1</sup> 勺		1合 5勺 8抄 3撮 7圭 4粟 5粒		抛荒田, 2斗 1升 4合
民米		7合 3勺 4抄 7撮 3圭 3粟									5合 3勺 9抄 6撮 9圭 3粟 5粒		
塘一则, 每亩科官米	殷苗 <sup>2</sup> 合 <sup>7</sup> 勺 <sup>3</sup> 抄 <sup>9</sup> 撮 <sup>7</sup> 圭 <sup>1</sup> 粟	2升 3合 1勺 1抄 2撮		8合 5勺 7抄 1撮 零		塘苗, 科塘米 <sup>3</sup> 升 <sup>1</sup> 零勺 <sup>4</sup> 抄 <sup>6</sup> 撮 <sup>3</sup> 圭 <sup>5</sup> 粟	8合 5勺 6抄	塘苗, 6合 9勺 2抄 5撮 5圭 1粟		官塘, 每亩科官米 <sup>2</sup> 斗 <sup>3</sup> 升 <sup>7</sup> 合 <sup>1</sup> 勺	塘税, 2合 1勺 零撮 <sup>8</sup> 撮 <sup>1</sup> 圭	1合 8勺 7零 撮 零 <sup>7</sup> 粟	民塘, 5升
民米	1升 9合 7勺 3抄 2圭 9粟			2升 1合 9勺 2抄 3撮 零			1升 6合 5抄	1升 8合 零撮 <sup>6</sup> 抄 <sup>1</sup> 撮 <sup>4</sup> 圭 <sup>4</sup> 粟	中则民塘, 每亩科民米 <sup>5</sup> 升	民黎塘, 每亩科民黎米 <sup>5</sup> 升	7合 1勺 8抄 3撮 7圭 8粟	1升 3合 5勺 2抄 4撮 9圭 3粟	

泥沟, 每座苗米		1石 2斗											
车池, 每座科民米		1石 零5升											
桑地, 每亩科夏税米				1升 9合 2勺 2抄 7撮						夏 税 地, 每 亩 科 夏 米 4 升 2 合 8 勺	1升 5合 3勺 1抄 5撮 7圭		

(资料来源: (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三下》(经政志六·科则),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6年, 页617-624)

### 附录三:

海南各地杂税一览表

税额地区	琼州府经征	琼山县	澄迈县	定安县	文昌县	会同县	乐文县	临高县	儋州	昌化县	万州	陵水县	崖州	感恩县
牛税银	409 两6 钱6 分零 4毫		2 2 0 两零 2钱	264 两 2 钱 8 分 6	203 两 8 钱 2 分 6		88 两 8 钱 2 分 7	220 两 零 2 钱 3 分	237 两 8 钱 5 分 6		237 两 4 七 1 分 5	132 两 1 钱 4 分 4		

			3分7厘	厘	厘		厘	7厘	厘5毫		厘	厘2毫		
白沙田租铺税银 (系白沙居住商民办纳)	42两1钱2分8厘								田铺租税银45两3钱7		龙吟峒口并收租银2两5钱		花藤税银35两6钱9 (拨支本府福差凑支经费)	
新钦沙窑埠税银	5两													
商税银	290两			7钱9分7厘 (门摊)				门摊6两1钱6分1厘			万陵东奥商银35两	门摊1两2钱6分8厘5毫	门摊:7两7钱2分4厘2毫	

海口 地税 银	6两4 钱4 分7 厘		东水 港地 税银 30两	地租 银9 两	北门 官地 租银 9钱									
榔榔 税银		146 两1 钱7 分3 厘5 毫	19 两6 钱零 5厘 4毫	445 两4 钱7 分9 厘	256 两1 钱9 分1 厘8 毫	591 两4 钱8 分4 厘	308 两8 钱零 9厘 3毫	7 两6 钱零 8厘 9毫	10 两零 3钱 3分 6厘 8毫	2 两3 钱7 分5 厘6 毫	700 两零 5钱 4分 5厘	145 两1 钱8 分2 厘2 毫	44 两9 钱3 分6 厘5 毫	
牛税 银		22 两	22 两0 钱2 分3 厘	32 两	200 两3 两8 钱2 分3 厘6 毫	18 两		220 两2 钱3 分7 厘	237 两8 钱5 分6 厘5 毫				7 两7 钱2 分4 厘2 毫	
酒税 银		6 两	3 两	2 两5 钱	3 两			3 两	6 两			1 两5 钱	5 两	
李茂 没官 田租 银		9 两9 钱8 分5			31 两6 钱2 分6			王宗 没官 田租 银			李茂、 陈德 原没 官			

		厘			厘 3 毫			40 两 3 钱 3 分 3 厘 4 毫			田 租 银 25 两 6 钱 3 分 5 厘			
地 利、 窑 冶、 茶 课 银		2 两 2 钱 4 分 4 厘												
抽 收 官 地 租 银		8 两		9 两										
薪 税 补 饷 银		3 0 5 两 4 钱 1 分 3 厘 七 毫		127 两 3 钱 3 分 4 厘	372 两 3 钱 5 分 3 厘 4 毫		66 两 6 钱 6 分 6 厘 7 毫				247 两 零 5 分 9 厘			
税 契 原 额 征 银		5 0 两	5 0 两	50 两	50 两	10 两	11 两	50 两	50 两	10 两	50 两	10 两	50 两	8 两
又 征 科 场 银		1 6 两 6 钱 6 分	1 6 两 6 钱 6 分	16 两 6 钱 6 分 7	16 两 6 钱 6 分 6	3 两 3 钱 3 分 3	3 两 3 钱 3 分 3	16 两 6 钱 6 分 6		3 两 3 钱 3 分 3	16 两 6 钱 6 分 6	3 两 3 钱 3 分 3	16 两 6 钱 6 分 6	2 两 6 钱 6 分 6

		6 厘 7 毫	7 厘	厘	厘 7 毫	厘	厘 4 毫	厘 7 毫		厘	厘 7 毫	厘 4 毫	厘 7 毫	厘 7 毫
当户 每名 征饷 银		5 两	5 两 ， 7 门 共 银 3 5 两									2 名 ， 每 名 饷 解 5 两 共 银 10 两		
上税 银					110 两 （ 原 本 府 经 征 ）									
官地 租充 时宪 书价 银					1 两 5 钱 2 分 5 厘									
船税 银							21 两 8 钱 3 分 3 厘 3 毫	8 两				10 两		

以上共征税银	753 两2 钱3 分5 厘4 毫	6 1 6 两4 4 钱 8 分 2 厘 9 毫	3 7 4 两 5 钱 零 分 3 毫	948 两 零 6 钱 2 分 3 毫	104 6 两 8 分 6 厘 8 毫	622 两 8 钱 1 分 7 厘	431 两 4 钱 6 分 9 厘 7 毫	449 两 4 钱 5 分 5 厘 4 毫	374 两 7 钱 零 7 厘 3 毫	15 两 7 钱 零 8 厘 6 毫	130 9 两 8 钱 2 分 零 7 毫	329 两 1 钱 7 分 8 厘	157 两 9 钱 2 分 7 厘 4 毫	10 两 零 6 钱 6 厘 7 毫
以上各州县通共征杂税税契当饷等项银	7440 两零 1 钱 2 分 8 厘 6 毫													
备注	琼州府经征：内除海口地税银发修天后庙外，余收征解充饷			琼山县：雍正六年（1728年），奉文每契价1两税银3分，又征科场银2分；每税银1两征火耗银3分。此项银两尽征尽解。嘉庆二十四年（1819），奉文比较，琼属向无溢表，无可比较，仍照原额解司，各州县同						陵水县：议追修造营兵器械黎米银15两7钱5分				

（资料来源：（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四下》（经政志六·榷税），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页654-659）

## 附录四：

### 海南人口密度对比表（1835年和1928）

地区	1835年		1928年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全岛	125.2	37	219.5	65
琼山	20.7	69	38.6	129
定	8.7	32	19.3	71

安				
会同	8.2	84	9.7	100
临高	10.1	58	16.6	96
昌化	5.6	30	4.6	25
陵水	5.7	22	6.4	24
感恩	4.3	18	3.5	15
澄迈	14.7	24	17.8	89
文昌	13.8	47	44	148
乐会	5.4	21	11.9	20.8
儋州	11.1	33	20.8	62
万州	11.4	40	16.6	58
崖州	5.5	12	9.7	21

（资料来源：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人口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页20）

## 附录五：

1887年-1894年琼州口岸进口货物主要品种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1890年		1891年		1892年		1893年		1894年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棉织品																	
灰布料	件	1 2 7 1 3	20 99 9 2	11 92 2	20 14 9	11 97 3	10 12 9	10 12 9	18 16 0			92 17	16 05 4	10 18 1 0	19 53 0 7	6 6 2 7 2	1 4 1 2 2
白布料	件	3 0 6 6 0	70 53 3 7	19 54 7	57 09 0	17 03 2	39 96 1	24 46 7	57 77 4			26 16 5	59 04 3	25 29 0	62 49 2	1 4 2 7 2	4 3 4 0 8
染花布	件	1 2 0 4	27 12	10 59	22 22	98 4	20 41	10 97	21 94			86 4	21 32	86 5	22 36	8 6 9	2 9 9 1
毛巾	件	3 9 8 4	16 87	39 58	16 25	27 8	13 72	16 51	54 8			33 22	97 8	35 76	10 82	1 8 9 4	7 9 8
棉法兰绒	件			44	22 5											3 6 1	3 5 2
日本棉布	件	1 6 3 6 6	69 88	10 98 0	47 82	79 86	33 83	11 45 4	46 99			79 24	28 46	67 13	25 38	2 6 3 9	1 2 6 4
棉绒	担	8 3 3 3	29 55	98 7	34 43	64 50	24 96	95 59	42 67			14 8	50 33	13 1	48 26	8 3	3 9 6 0
毛织品																	
英羽毛缎	件	7 6 0	71 42	65 5	60 75	52 5	49 08	60 8	56 89			65 6	62 05	81 1	76 05	4 9 9	5 1 7 0
羽绫	件			52 7	43 74	28 8	23 99	35 1	28 41			33 0	27 36	40 4	34 56	1 8 9	1 7 8 3
宽毛料	件			20	68			15 0	42 06			27 34	11 91 9	32 00	14 45 7	1 5 3	7 5 9

																7	4
纹绒布	件			14 1	14 82							14 4	14 87	22 6	23 65	1 2 2	2 1 0 0
衣毛料	件			41	69 4	60	21 3					16 9	41 95	25 1	65 42	1 1 0	3 7 8 2
绒布	件	3 1	47 4	33 79	15 90 2			14 5	14 07			23 5	30 77	41 2	51 35	2 4 6	3 5 5 7
毛毯	对	9 3 6	23 77	25 7	72 9	19 9	50 9	54 3	11 61			32 1	98 9	36 9	96 7	7 2	2 1 2
意毛布	件																
五金类																	
铁钉条	担	2 0 8	35 2	20 73	42 82	19 28	38 84	96	23 5			15 98	30 94	14 17	28 80	1 6 0 6	3 4 6 8
铁丝	担	1 8 3 1	31 81									29	12 9	14 4	61	4 7	2 2 6
旧铁	担	2 5 2	43 5	38 6	48 9	25 9	45 5	42 2	82 4			35	85	23 9	57 6	4 6 4	1 0 7 5
铁钉	担	9 9	62 5	15 0	51 9	66	52 6	16 69	35 14			61	39 2	40 1	23 87	1 2 0	7 8 6
黄铁片	担	3 8	19 1			52	93 6	56	97 9			82	12 71	16 5	28 13	6 9	1 5 8 7
钢	担	1	14	18 4	57 3	15 1	50 1	21 8	80 6			21 5	84 2	23 9	90 2	1 5 5	6 9 6
水银	担	1 6	98 3	19	12 64	8	92 7	14	10 19			20	12 25	18	11 27	1 2	5 5

																	3
杂货类																	
豆类	担							3	13			25	37	23	39	3	3
									5			63	54	62	00	6	6
												3	2	4	8	1	6
																	1
																	1
槟榔	担			37	90	17	58							22	10	5	3
				2	4	6	3							20	43	5	6
															1	8	1
																	0
																	0
二级 燕窝	斤	3	24	3	23	2	20	1	16			25	34	13	17	9	1
			64		09		71		57			7	38	5	42	5	0
																	2
																	7
衣服 花边	盒	1	96	28	12	18	94	22	12			29	91	29	11	4	7
		8	74	19	31	58	43	80	20			37	18	52	53	5	1
		2		1	2	7		6	4			0		7	4	8	7
		7														4	1
		2														3	1
																	3
本地布	担											43	17	65	30	5	2
												5	75	4	47	0	0
													1		0	1	0
																	2
																	6
棉花	担	5	62	11	15			14	18			19	25	51	63	3	4
		9	30	4	63			9	60			72	70	46	27	5	9
		3											5		0	9	0
																1	3
																	4
带籽 棉布	担	7	26	41	13	78	25	11	58			19	67	12	43	9	3
		7	75	59	72	5	65	62	33			95	34	1	7	1	2
		6	8		0												6
		7															
染料	担				44				44				61		56		4
					96				79				53		65		3
																	2
																	7
面粉		5	11	58	12		27		19				26		34		8
		0	80	28	12		08		34				37		77		1
		8	1		0		9		8				3		2		9
		7															1

																	3
人参	斤			80	33 02 3	77	34 91 1	65	33 66 8			79 28	38 86 8	98 89	50 54 6	8 5 6 7	4 3 2 5 7
大麻	担	3 1 6 1	14 18	38 65	18 99							36 59	27 35 4	32 43	26 37 6	2 9 8 4	2 1 5 3 2
火柴	萝	1 5 8 2 0	57 91	38 28 4	87 82	48 96 0	10 49 2	83 06 8	19 43 4			17 86 20	21 68 24	19 53 88	35 39 9	1 9 9 5 5 0	3 7 5 3 5
西药				10 88	11 00								45 96 5		60 70 2		4 7 5 2 7
煤油	加 仑	2 1 3 3 0	28 52	60 39 0	90 60	41 93	12 65	49 15 40	80 03 0			55 88 90	86 92 8	38 16 40	49 29 6	3 9 0 3 0 5	5 1 8 1 3
大米	担	1 2 9 4 2 5	17 82 06	13 10 83	18 30 75	12 40 66	18 87 05	50 62 5	79 53 4			18 51	42 95	78 21 3	11 99 51	3 7 6 7 7 3	6 8 9 8 8 1
粉丝	担											86 31	49 32 3	76 39	46 44 4	6 8 3 3	4 4 9 3 7
白醋	担											63	33 70	91	69 30	8 6	5 7 2 6

(资料来源:海口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海关志》,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10月,

附录六:

1895 年-1902 年琼州口岸进口货物主要品种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895 年		1896 年		1897 年		1898 年		1899 年		1900 年		1901 年		1902 年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棉织品																	
灰布料	件	63 16	14 52 6	91 71	21 09 3	13 28 9	23 66 4	71 22	16 38 0	83 71	19 42 7	88 78	21 77 7	12 54 5	32 44 7	4 7 8 7	11 61 5
白布料	件	16 36 2	55 88 4	19 52 6	66 39 2	17 39 9	59 80 8	12 08 4	41 68 9	17 64 5	61 84 0	20 32 3	76 22 1	22 46 9	88 60 4	1 4 2 6 9	51 30 0
染花布	件	77 4	18 87	14 98	40 65	23 02	64 46	80 6	22 48	29 96	83 25	50 73	14 73 6	10 93 5	31 71 3	6 7 1 3	24 16 7
毛巾	件	93 0	35 2	84 0	28 2	58 8	18 1	45 0	15 4	48 6	31 0	38 3	23 8	92 6	46 5	8 0 4	32 4
棉法兰绒	件	30 3	31 4	71 5	83 0	31 9	41 2	55 2	85 4	20 90	39 94	23 78	65 49	40 47	65 64	2 1 6	88 0
日本棉布	件	26 6	12 2	81 0	42 8	13 28	73 6	38 1	24 5	15 14	81 8	76 90	41 58	69 19	45 84	2 9 5 0	20 41

棉绒	担	50	41 04	73	94 43	72	93 86	58	75 83	83	11 18 7	75	10 49 4	11 0	17 52 4	7 2	97 54
毛织品																	
英羽毛缎	件	33 0	45 55	40 4	65 76	26 4	36 96	10 9	15 50	38 9	55 77	38 3	58 77	32 5	46 43	3 6 0	31 11
羽绫	件	98	10 15	17 1	18 13	12 1	13 17	56	61 5	17 0	19 04	20 6	23 70	12 5	14 57	1 1 8	12 39
宽毛料	件	16 04	92 24	24 71	13 76 6	16 70	96 73	66 6	40 92	21 18	12 97 6	25 34	14 82 5	24 26	12 87 0	7 4	24 06
纹绒布	件	89	17 35	21 1	37 18	11 2	17 98	66	10 77	13 2	21 91	95	16 29	96	15 92	9 4	16 92
衣毛料	件	45	16 82	11 5	39 02	83	22 41	99	15 93	16 4	47 48	15 8	47 97	14 9	47 36	2 7	67 3
绒布	件	68	10 08	11 5	20 63	61	95 6	87	16 65	12 4	21 22	13 4	18 41	11 7	16 96	1 5 6	23 17
毛毯	对	71	22 0	20 4	65 3	10 3	33 0	12 6	41 5	92 5	30 14	47 0	16 80	37 3	13 75	3 3 6	12 59
意毛布	件							8	13 5	62	91 9	17 6	35 65	42 6	73 03	5 9 5	98 76
五金类																	
铁钉条	担	14 13	31 81	16 74	46 50	13 69	41 07	11 13	33 37	10 71	32 27	10 69	41 35	12 09	48 36	4 1 9	12 57
铁丝	担	72	36 0	83	41 7	55	27 6	64	32 0	17 4	87 0	21 9	13 12	29 0	20 31	1 0 3 9	31 17
旧铁	担	31 2	65 7	40 8	69 4	38 4	52 9	18 3	41 2	12 5	29 6	34 1	71 2	44 0	10 68	2 7 4	78 2
铁钉	担	22 9	14 96	24 6	16 82	24 6	16 88	25 0	17 78	25 0	18 05	26 2	19 67	31 6	25 79	2 3	16 40

																3	
黄铁片	担	76	16 65	91	20 01	55	12 13	51	11 31	52	11 49	40	95 9	63	16 80	7 1	22 11
钢	担	20 6	11 49	29 2	13 26	14 9	66 8	20 7	93 2	22 2	10 71	25 6	13 33	22 8	12 43	3 5 7	22 48
水银	担	14	70 1	15	88 1	15	91 5	11	63 4	10	61 9	15	11 07	61 6	12 91	8	83 0
杂货类																	
豆类	担	20 66 2	35 48 5	18 95 4	30 66 6	21 81 6	32 72 6	14 78 6	22 73 1	22 40 6	38 26 0	21 21 2	39 83 7	32 45 7	61 65 3	3 3 2	29 91
槟榔	担	33 06	12 58 5	21 11	78 08	54 1	21 96			10 6	52 8	51 3	25 65	89	44 5	7	60
二级燕窝	斤	45 7	17 99	91	10 47	14 5	14 06	53	63 6	49	61 2	97	13 58	53	74 2	3 4	61 2
衣服花边	盒	15 49 8	70 08	12 15 2	55 93	10 58 2	49 27	16 92	76 3	80 30	35 32	12 54 6	52 32	21 60 6	88 85	1 9 9 3 9	76 51
本地布	担	51 5	20 61 3	57 7	28 12 9	81 3	41 97 7	45 6	23 43 7	76 7	39 16 9	11 26	57 43 6	14 02	72 71 8	8 9 0	42 70 0
棉花	担	28 99	41 88	19 73	35 38 0	32 96	53 28 2	19 80	34 40 7	32 23	55 77 3	28 30	51 69 4	17 01	28 64 1	6 5 1	12 29
带籽棉布	担																
染料	担		46 04		51 27		51 78		36 47		71 76		11 96 4		17 79 7		15 66 1
面粉			61 57 6		62 98 6		44 32 7		44 47 2		75 56 0		77 70 3		88 05 2	3 8 4 3 6	12 31 37

人 参	斤	86 79	43 19 6	90 48	48 69 2	10 78 2	49 08 4	95 29	34 22 2	26 37 27	44 28 8	96 66	47 41 1	10 11 5	57 54 8	1 0 6 3 9	58 98 1
大 麻	担	28 67	21 48 9	31 32	23 49 2	26 84	20 35 2	29 25	21 93 8	35 16	26 37 1	26 89	21 14 7	34 76	28 55 8	2 0 1 3	21 90 0
火 柴	萝	20 25 10	39 69 4	23 38 00	44 70 4	23 83 80	45 82 2	25 01 40	47 99 7	27 44 76	53 25 0	22 02 18	47 98 8	22 07 01	56 05 6	2 3 8 7 3 1	63 98 1
西 药			45 19 0		52 25 2		58 92 5		51 03 2		56 18 8		58 20 2		61 81 5		77 47 6
煤 油	加 仑	53 73 10	71 47 2	63 46 90	95 24 2	92 00 10	13 93 32	94 57 90	14 19 34	10 04 70 0	15 77 51	11 80 24 0	20 04 54 0	14 88 58 0	25 40 03	1 0 5 0 5 7 0	17 18 38
大 米	担	93 73 0	17 54 43	65 56 1	12 90 77	19 37 1	42 34 0	19 67 55	51 05 56	10 42	91 86	77 2	69 49	13 64	12 27 7	5 0 9 3 3 5	15 43 72 8
粉 丝	担	52 90	36 78 3	73 67	53 09	67 00	48 36 5	49 80	35 55 4	61 94	53 03 0	83 76	75 38 4	10 38 6	93 47 7	8 8 2 3	74 10 7
白 醋	担	65 65	48 93	11 6	92 40	97	97 27	86	86 23	13 2	13 21 3	11 2	11 15 9	15 4	15 42 9	7 0	69 7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编《海口海关志》，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1992年，页229-241)

附录七:

1903年-1911年琼州口岸进口货物主要品种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棉织品																			
灰布料	件	74 64	20 82 4	74 64		62 16		82 54		52 89		8 4 7 9		7 3 4 5		5 6 8 4		6 1 1 8	
白布料	件	18 30 7	75 11 5	18 30 7		16 65 0		23 00 9		18 61 7		2 2 8 7 9		3 2 7 2 7		1 7 8 1 5		1 9 6 3 9	
染花布	件	36 9	19 65	76 3	38 42	67 5		14 86		95 3		6 2 8		1 2 0 5		1 2 2 7		1 4 8 8	
毛巾	件	71	60	37 6	27 2	29 20		37 98		11 64 4		1 1 7 2 7		8 5 2 3		1 6 9 5 1		2 2 8 0	
棉法兰绒	件					32 07		27 92										2 2 3	
日本棉布	件			56 34 3	30 94	29 15		78 00		74 31		8 3 1 7		1 0 3 9 3		5 7 6 0		2 4 0 0	
棉	担	38	12	78	14	19		20		17		1		1		1		1	

绒			189	83	99	041		041		855		6500		5270		3497		2633	
毛织品																			
英羽毛缎	件	365	5846	401	5940	330		46		335		985		628		280		233	
羽绫	件			116	58	137		30		359		206		116		87		35	
宽毛料	件	61	2693	1464	2222	41		16										25	
纹绒布	件	130	1437	214	2338														
衣毛料	件			31472	12294														
绒布	件	185	3549	34	2330														
毛毯	对	54	2348	4775	1877														
意毛布	件																		
五金类																			
铁钉条	担	181	652	121	378	146		263		99		60		152		60		4	
铁丝	担	78	525	1925	6042	193		341		1492		1683		112		117		325	
旧铁	担	22	118																
铁钉	担	340	1971	487	1903														
黄铁片	担	64	1971	64	2090	18				30		60		69		47		67	

钢担	21 1	12 83	25	13 4	14 7		19 4		11 8		1 2 1		1 6 7		1 1 1		1 1 5
水银担	10	11 30															
杂货类																	
豆类担	29 49 9	86 02 7	25 27 9	49 65 8	28 64 0		25 72 4		23 87 3		3 3 7 0 3		4 3 0 7 6		3 5 9 3 6		2 9 2 1 1
槟榔担	19	16 4	5	38													
二级燕窝斤	67	13 81	54	10 32													
衣服花边盒		64 89	87	11 76 8	92		12 1		10 4		1 2 4		1 1 1		4 4		3 3
本地布担	84 5	42 24 1	11 13	49 18 2	10 40		86 5		44 0		3 1 2		4 5 4		2 7 1		1 9 3
棉花担	12 18	22 25 4	16 84	20 28 2	18 03		22 99										4 8 3
带籽棉布担																	
染料担				12 43 7		12 04 8		19 67 5		16 51 8		1 6 8 1 8		1 6 9 0 3		1 2 0 5 4	8 6 5 1
面粉			28 87 7	93 82 9	16 23 5		66 64 6		42 53 0		3 3 4 4 7		2 9 2 6 1		3 0 5 6 0		
人参斤	99 5	16 45	75 69	40 76													4 0

					7														
大麻	担	62 89	69 17 6	27 86	27 08 7														
火柴	萝	22 43 3	74 80 2	24 55 93	74 30 7	28 30 34		91 56 35		31 97 16		3 5 5 2 8 6		3 4 1 0 1 3		3 5 9 2 3 8		3 1 4 0 2 7	
西药			73 50 8		66 77 0		76 93 2		98 34 9		88 87 1		1 0 6 8 0 8		1 2 1 7 8 2		1 1 9 5 1 3		1 1 5 3 9 6
煤油	加仑	11 40 37 1	24 62 25	13 19 24 1	24 05 04	84 73 40		18 03 47 0		11 72 02 5		1 6 2 0 3 9 5		1 6 7 2 9 2 0		2 1 8 3 5 5 0		1 2 3 8 2 0 0	
大米	担	10 88 55	37 86 93	87 59 5	23 52 18	62 35 2		11 96 97		19 28 55		3 0 3 3 5		2 8 2 9 4 3		3 3 1 8 3 1		2 5 4 8 2 1	
粉丝	担	85 64	78 65 8		86 2	95 67		11 73 5		11 00		1 4 1		1 3 5 1 5		1 3 5 2 2		1 0 2 9 4	
白醋	担	17 3	11 27 7	11 3	60 08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编《海口海关志》, 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 1992年, 页 229-241)

附录八：

1886年-1893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886年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1890年		1891年		1892年		1893年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槟榔	担	82 31		83 74	706 80	8 3 4 2	61 99 9	10 88 7		10 40 1	54 36 2	10 33 5		90 44	57 26 0	6 0 7 1	49 44 2
鱿鱼	担			11 94	237 0	1 4 2 6	98 40	12 88	10 34 8	12 13	95 84			12 17	10 02 8	1 5 4 0	13 77 8
鲜蛋	只			98 85 20 0	246 70	1 0 7 0 6 0 0	26 79 8	69 99 65 0	77 66 9	70 88 00 0	18 56 9			13 71 48 00	33 44 2	2 0 9 0 3 6 2 0	41 40 7
咸鱼	担			22 2	135 0	4 6 2	28 30	38 2	22 87	41 8	25 02			30 3	19 99	5 9 5	49 62
良姜	担	15 48 1		95 99	750 0	5 3 1 4	36 97	10 81 5	80 52	10 10 4	95 85	80 74		16 37 6	18 83 5	1 6 5 5	20 99 8
牛胶	担	25 79		33 80	188 70	3 2 4 5	20 04 1	24 17	15 21 6	36 85	20 98 6	39 56		41 48	26 55 5	3 4 3 6	21 65 4
上等	担	64 1		24 1	189 50	2 7	20 75	29 6	22 11	20 7	17 96	18 2		23 4	20 91	3 4	33 31

土布						9	4		7		0				8	9	4
花生饼	担	52 48 0		33 34 5	416 87	2 1 8 5 6	28 82 1	17 54 8	24 71 1	16 24 2	24 18 3	20 21 0		20 14 4	29 46 0	1 6 0 7 2	23 35 2
大麻	担	15 84		75 4	195 28	7 7 6	21 43 6	98 4	26 49 0	13 93	34 23 2	17 74		21 92	46 62 6	2 0 1 1	45 94 1
牛皮	担	16 30		23 27	236 48	5 9 8	62 80	33 7	23 29	29 6	23 08	81 7		15 69	13 30 3	2 4 5 3	20 01 3
皮革	担	31 24				3 0 0 3	43 43 2	35 83	54 88 3			38 69		34 87	45 80 4	3 8 9 8	57 56 6
龙眼肉	担			28 23	241 70	1 2 4 5	14 66 6	24 6	27 33	37 12	28 08 5			13 41	13 49 1	2 5 2 9	24 09 7
烟叶	担	66 9		19 59		3 3 5 4	14 80 5	45 76	22 42 7	58 71	27 39 0	42 87		47 75	22 93 0	2 1 7 2	10 72 6
中药材				16 90	181 67		25 01 6		11 47		27 89 6				25 61 2		19 66 9
生猪	头	67 58 9		85 08 2	553 85	7 7 2 0 9	46 22 51	50 06 3	30 01 96	27 94 3	17 15 73	41 83 3		47 23 2	78 31 87	5 8 2 7 2	34 96 32
家禽	只			89 28	111 0									32 26 23	32 04 8	4 1 3 9 3	34 01 5
芝麻	担	23 86 0		17 21 5	585 18	2 2 1	74 96 2	12 65 6	50 65 2	19 39 7	77 80 0	16 60 5		10 90 6	47 54 9	8 2 0	32 44 6

						0 7										6	
蚕丝	担	15 5		13 7	148 56	2 0 8	23 45 4	16 7	17 97 5	11 2	11 29 2	17 2		16 0	16 60 6	2 1 0	21 16 5
红糖	担	10 40 41		11 01 98	230 169	7 6 9 0 1	18 00 25	91 58 1	19 75 86	64 12 7	13 34 12	83 95 8		80 52 9	15 88 39	9 3 2 2 4	32 13 22
白糖	担	29 95 8		20 61 6	626 32	1 0 3 8 0	35 19 4	22 83 0	76 23 4	97 57	31 67 0	73 49		72 6	24 67 9	7 8 6 1	33 07 4
动物脂	担	13 96		11 13	649 9	1 3 1 2	78 14	12 50	78 86	17 20	12 13 7	15 56		13 68	96 04	1 1 3 1	77 52

(资料来源:海口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海关志》,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10月)

## 附录九:

### 1894年-1901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894年		1895年		1896年		1897年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1901年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槟榔	担	58 62	40 90 8	48 42	46 54 9	72 28	62 49 3	97 30	80 75 9	10 85 7	89 57 6	11 03 0	92 68 8	1 1 8 5 5	100 774	8 9 0 4	756 80
鱿鱼	担	13 27	15 86 9	10 84	18 01 0	85 6	14 84 9	96 9	13 56 5	96 5	13 81 4	21 54	31 23 6	1 2 5	189 58	1 3 2	211 8

														2		3	
鲜蛋	只	10 87 88 00	27 19 6	90 14 80 0	23 38 3	16 20 03 60	56 17 7	19 95 96 00	65 77 5	16 59 12 00	55 30 4	18 77 76 00	62 88 8	2 1 5 7 0 0 0 0	703 43	5 2 7 3 7 1 6 0	869 94
咸鱼	担	10 25	62 71	21 31	13 31 9	12 15	75 29	13 24	82 17	21 00	13 19 2	30 01	18 60 4	4 6 5 8	288 83	3 1 6 8	190 08
良姜	担	20 37 7	22 53 8	17 23 2	20 67 6	22 30	37 94 4	39 02 4	66 33 7	19 11 7	32 49 7	51 51 0	29 93 0	1 0 8 9 9	196 17	2 1 4 3 8	497 33
牛胶	担	40 80	23 49 6	41 76	24 16 1	42 65	21 32 3	42 81	21 40 4	66 06	33 02 9	62 21	33 73 0	4 6 1 3	253 70	3 5 5 3	187 45
上等土布	担	50 6	55 68 9	36 4	52 84 4	62 3	90 36 5	83 1	12 07 25	84 7	12 29 30	67 8	98 50 3	1 0 9 3	160 673	9 4 2	141 285
花生饼	担	19 15 9	28 73 8	19 91 4	31 88 2	22 36 3	35 78 2	23 12 3	36 82 8	12 46 6	70 67 0	11 27 7	21 51 8	6 0 6	127 27	4 3 2 7	951 9
大麻	担	15 12	39 32 1	15 21	39 53 2	16 55	48 70 1	17 84	53 54 0	19 59	58 77 0	52 87	15 86 04	2 3 9 5	718 51	3 4 9 3	104 789
牛皮	担	39 74	28 69 5	29 42	22 35 4	14 88	15 89 8	15 69	16 47 7	74 76	75 12 1	10 35 5	10 35 43	3 3 6 0	350 61	1 1 5	124 5
皮革	担	40 64	63 76 7	36 17	65 03 2	27 97	49 60 3	33 82	59 40 5	52 86	93 62 5	75 79	13 93 26	5 9 0 6	114 254	4 4 0 3	894 40
龙	担	13	15	56	62	73	88	15	18	19	24	42	55	1	133	2	304

眼肉		6	49	8	50	8	53	10	12	59	76	93	81	0	10	2	19
									2		5		0	2		5	
														4		3	
烟叶	担	10	85	11	96	65	55	17	14	39	33	25	21	6	536	1	857
		05	38	37	68	1	30	8	12	0	16	2	42	3		0	
																2	
中药材			17		14		22		32		25		35		269		356
			95		76		74		46		36		04		15		71
			4		3		8		1		6		4				
生猪	头	59	35	43	27	56	33	77		66	39	76	45	6	397	8	493
		34	60	23	14	59	95	94		35	81	04	62	6	758	2	218
		5	70	7	22	2	52	6		6	36	5	70	2		2	
														9		0	
														3		3	
家禽	只	32	24	34	33	42	37	58	43	53	52	58	58	4	433	4	485
		27	20	09	33	71	72	55	18	01	17	33	33	3	04	8	4
		21	1	46	5	14	3	34	2	50	0	80	8	3		5	
														0		1	
														4		4	
																0	
芝麻	担	89	37	11	47	15	67	20	91	12	40	13	71	4	259	9	505
		36	71	03	63	91	73	38	75	72	38	66	77	6	80	0	52
			1	4	8	6	5	8	7		7	2	3	3		2	
														9		6	
蚕丝	担	17	19	21	75	15	16	99	99	21	21	19	19	1	115	1	119
		0	35	9	08	4	00		08	9	94	8	76	2	41	0	08
			8		3		6				6		8	8		8	
红糖	担	10	32	60	17	64	19	13	39	90	26	12	42	9	331	1	519
		49	26	22	35	69	63	22	03	61	67	48	80	4	982	6	452
		22	97	4	93	8	59	49	1	9	60	51	85	3		1	
														2		9	
																1	
																2	
白糖	担	16	63	87	43	10	45	22	10	10	45	21	10	1	688	3	162
		23	16	94	70	32	39	73	22	21	96	44	47	3	6	1	844
		4	8		4	3	9	2	95	5	9	3	30	7		3	
														7		1	
																6	
动物脂	担	15	11	19	14	20	15	29	23	30	24	22	18	1	111	8	709
		25	05	53	15	83	46	20	36	92	73	92	33	2	38	2	2
			3		4		1		0		3		2	7		4	
														0			

(资料来源:海口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海关志》,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10月)

附录十:

1902年-1909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重量	价值 (海关两)
槟榔	担	63 23	70 48 9	95 46	10 26 40	11 76 9	11 93 90	12 78 6		15 86 4		15 25 9		1 4 8 0 0		1 5 9 0 8	
鱿鱼	担	15 38	26 81 8	11 95	17 25 3	12 77	34 92 7	40 0		98 1		52 9		3 2 6		3 3 6	
鲜蛋	只	17 70 39 40	39 31 3	13 22 91 00	62 61 9	82 96 20 0	44 80 7	13 28 92 40		11 93 30 36		72 43 26 0		1 3 1 4 3 9 0 0		1 1 3 1 6 2 2 0	
咸鱼	担	22 24	13 27 5	29 37	14 23 5	39 17	18 68 4										
良姜	担	16 49 2	28 39 1	26 49 3	34 58 3	17 28 9	29 73 6	11 01 9		14 19 3		15 38 7		7 8 6 0 9		1 6 7 2 5	
牛胶	担	23 87	15 37 0	33 86	25 29 0	33 74	24 19 3	35 96		38 13		42 93		4 5 6 5		5 3 3 0	
上等	担	79 8	11 40	68 1	80 58	15	99 5	80 8		70 3		80 1		9 5		1 2	

土布			10		7								4		7			
花生饼	担	27 16	63 24	98 4	25 58	69 87	18 30 7	58 71		11 03 2		90 25		9 5 7 0		7 3 7 4		
大麻	担	28 72	72 77 6	41 06	10 42 68	38 31	12 56 36	38 46		47 52		43 65		4 1 0 7		2 8 4 7		
牛皮	担	49 3	49 16	15 87	14 84 8	19 57	24 26 8	11 59		21 79		20 73		1 6 2 7		1 8 7 9		
皮革	担	32 05	61 62 2	43 25	86 11 4	44 06	77 98 5											
龙眼肉	担	25 26	29 72 0	15 63	17 61 0	17 24	41 56 8	20 45		32 2		52 62		3 8 7 5		1 3 0 6		
烟叶	担			39 6	38 24	24 3	24 3											
中药材			61 95 9		45 68 5		53 03 5			64 94 5		96 93 8		389 21		323 91		528 26
生猪	头	75 31 9	45 19 14	71 52 7	73 27 63	65 30 6	88 16 31	75 10 7		73 13 1		69 06 5		8 0 2 8 8		8 2 3 8 3		
家禽	只	36 72 30	36 54 3	25 63 60	25 63 6	24 68 72	26 66 9	25 50 00		46 07 90		18 02 30		1 7 6 8 5 8		9 0 0 4 0		
芝麻	担	85 38	44 75 3	35 89	22 90 7	43 66	28 90 5	24 98		77 85		14 46 3		1 1 9 9 7		6 8 6 3		
蚕	担	10	10	59	62	87	10	64		35		48		3		1		

丝		3	16 3		99		47 3							3		5	
红糖	担	24 74 85	77 88 17	10 93 96	30 75 31	12 94 16	45 55 45	24 27 22		97 11 4		63 86 4		1 0 8 1 9 8		5 6 0 9 2	
白糖	担	22 69 3	10 36 30	52 7	21 77	93 67	50 95 7	29 86 3		21 60		10 96		7 7 4 5		4 5 2	
动物脂	担	12 58	10 97 5	98 9	83 71	96 3	10 59 3	11 41		69 6		48 0		9 1 4		4 4 5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编《海口海关志》，海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1992年，页226-228）

## 附录十一：

### 1910年-1912年琼州口岸出口货物统计表

货品	量别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重量	价值（海关两）	重量	价值（海关两）	重量	价值（海关两）
槟榔	担	12686		13394		8734	
鱿鱼	担	296		408		689	
鲜蛋	只	4679610		7491680		5796920	
咸鱼	担						
良姜	担	10887		11353		16196	
牛胶	担	4069		3332		3774	
上等土布	担	808		1001		1152	
花生饼	担	1189		2807		5239	
大麻	担	3669		3328		3472	
牛皮	担	927		948		3643	
皮革	担						
龙眼肉	担	1414		4209		1601	
烟叶	担						
中药材			33611		26311		11316

生猪	头	64478		48119		6551 4	
家禽		31440		54207		1015 60	
芝麻	担	4379		11598		9251	
蚕丝	担	20		22		27	
红糖	担	128665		44402		1103 08	
白糖	担	1102		813		88	
动物脂	担	163		980		997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编《海口海关志》, 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 1992年)

## 附录十二:

### 海南岛北部地区鼠疫流行统计表

县名称	流行年代	流行年次	死亡人数	发病地区
儋县	1882、1904、1905、1910、 1912、1913、1915	7	19030	遍及全县境内, 南滩乡、 新坊村、新英、白马井、 中和
海口市	1888、1891、1894、1895、 1896、1899、1900、1901、 1918、1932、1934	11	12084	其中以盐灶、海甸、人和 坊、义兴街流行较为严重
琼山县	1885、1891、1894、1895、 1896、1899、1900、1901、 1918、1932、1934	11	1220	府城、甲子区上昌村、大 昌村、美北村、谭文区、 东山区、雅德乡
屯昌县	1919——1933	15	5500	西昌、岭门、新兴、大同、 南闾乌坡风木
临高县	1900、1901、1904、1905、 1907、1915、1919、1927	8	420	新兴、调楼、大兴、县城、 宫苑等村
澄迈县	1904——1928	25	330	白莲、中兴、加乐、瑞溪、 文仔、金江、石浮
文昌县	1928	1	8	文城、蓬莱两地
定安县	1894、1927、1928、1929、 1930、1931、1932、1933、 1936	9	830	定城、居丁、龙汀、龙塘、 山椒、黄竹等
8个县	共54年	88次	39422人	55个城镇、街坊、乡村

(资料来源: 海南岛热带病防治研究所《海南岛的疟疾流行情况及流行因素》, 出版社不详, 1862, 页1-2)

### 附录十三：

#### 《文氏族谱》

文氏潮港派三十六都是 19 世纪初叶出生，其大量向外移民如下：
大英长子振荣，生道光五年乙酉（1825 年）十一月十八日卯时，往番卒。
大英三子振华，生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 年）九月初四丑时，客番卒。
大选四子振浩，生道光十六年丁酉（1836 年）二月初九酉时，往番卒。
大行子振声，生道光二年壬午（1822 年）十月十五日己时，往番。
大儒子振绪，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年）八月二十日丑时，往番卒。
大德子振义，生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年）七月初三时亥时，往番卒。
大纲子振焜，生咸丰七年丁巳（1857 年）四月二十四子时，往番。
四房六合派三十五世：
宗祖次子大俊，生道光三年癸未（1823 年）三月二十日子时，往番卒。
宗祖三子大杰，生道光十三年癸巳（1823 年）三月二十九日己时，客洋卒。
四房波仔派三十六世：
学清次子坚真，生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年）十月十五日未时，往番。
四房潮港派三十六世：
大雅长子振幅，生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年）九月二十九日亥时，往番。
大典次子振焜，生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年）八月初一子时，往番。

（数据来源：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文昌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年，页 436）

### 附录十四：

#### 1950-1995 年文昌、琼海侨汇收入一览表

（单位：人民币，元）

年份 地区	文昌	琼海	年份 地区	文昌	琼海
1950		144.1	1973	635.0	421.5
1951	1177.6	482.2	1974	525.0	460.7

1952	907.0	497.6	1975	566.6	370.8
1953	718.6	397.6	1976	530.0	323
1954	672.9	299.4	1977	639.2	366
1955	650.2	343.1	1978	720.2	417
1956	704.7	356.2	1979	744.1	485
1957	655.6	310.3	1980	851.2	611
1958	530.4	270.9	1981	932.0	673
1959	329.5	184.9	1982	1066.1	744
1960	86.2	153.9	1983	1206.2	913
1961	223.0	124.3	1984	1068.9	660
1962	218.1	115.96	1985	770.8	443
1963	368.3	209.5	1986	815.7	422
1964	468.0	274.3	1987	485.3	341
1965	528.5	315.7	1988	258.3	243
1966	443.6	222.2	1989	358.0	125
1967	466.3	239.2	1990	445.0	281
1968	464.6	225.6	1991	1052.0	
1969	486.7	225.8	1992	2106.0	
1970	473.2	236.6	1993	1540	
1971	459.6	243.2	1994	3049.0	
1972	520.2	277.7	1995	4053.0	

（转引自：琼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琼海县志》，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页407）

## 附录十五：

### 文昌、琼海、儋县三县投资农矿业各时期统计表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段	投资户数	每户平均投资额	每年平均投资额	该段占全部投资的%
1862-1919年	21	2943500	51640	39.00
1919-1927年	12	3069198	383649	41.06
1927-1937年	47	1301594	130159	17.33
1937-1945年	23	114660	14332	1.52
1945-1949年	18	82220	20555	1.09
合计	121	7511172	600335	100

备注：(1)本表中显示为民国时期，侨资企业对海南开发主要围绕农业（橡胶、咖啡）、矿业为主。(2)这一时期海南隶属广东，所以矿业包括儋县、广中、中山、梅县、开平等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79-280)

## 附录十六：

### 文昌市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1978——2007 年捐赠款额统计表

单位：万元

受赠单位	投资总额	其中			捐赠人数 (人次)
		教育事业	卫生事业	其他公益事业	
全市受赠合计	38103.41	22642.8	2046.02	13414.59	15703
铺前镇	2294	1351	180	763	434
锦山镇	4936.07	2076.24	208	2651.83	1419
湖山办事处	1264.71	863.6	106	295.11	411
抱罗镇	1007.97	719.92	38.5	249.55	943
冯坡镇	996.7	616.5	51	329.2	466
翁田镇	1403.87	1142.5	194.5	66.87	232
龙马办事处	461.46	232.18	114.64	114.64	261
东阁镇	339.46	147.7	45.5	146.26	108

宝芳办事处	3290.94	370.61	144.2	2776.13	1340
文教镇	4965.27	4609.6	146.6	209.07	343
东郊镇	1358.265	1204.547	133.718	20	273
龙楼镇	422.4971	338.2471	48.8	35.45	222
昌洒镇	996.677	854.617	140.66	1.4	716
公坡镇	2363.06	955.43	88.05	1319.58	73
迈号办事处	425.67	271.69	24.21	129.77	1062
清澜办事处	549.09	205.6		343.49	408
文城镇	1319	231		1088	2140
潭牛镇	317.96	269.79	19	29.17	319
南阳镇	478.5369	292.1205	38.6645	147.7519	436
蓬莱镇	50.889	50.589		0.3	53
新桥办事处	274.2	205.7	2	66.5	322
东路镇	627.6	300.2		327.4	135
文昌侨中	1148.9793	1148.9793			302
文昌中学	2224.63	2224.63			535
文昌公安局	126.87			126.87	52
文昌庆龄妇 幼保健院	41.7196		41.7196		53
文昌人民医 院	115.63		115.63		47
文昌青少年 活动中心	101	101			16
文昌敬老院	63.36			63.36	25
文昌民政局	1062.09			1062.09	35
文昌海外交 流协会	8.5			8.5	18
文昌市幼儿 园	12.。5			12.5	3
文昌市侨联	82.1			82.1	313
文昌市中医 院	18.883			18.883	17
田家炳中学	250	250			1
重兴镇	320.129	283.219	19.0839	17.71	297
会文镇	1809.06	979.232	126.66	703.168	1379

（转引自：文昌市外事侨务办公室编《文昌市海外乡亲捐赠芳名录》，出版社不详，2008年）

## 附录十七

1979——2002 年底琼籍侨胞、港澳同胞捐赠情况一览表

市县分布	海口市	文昌市	琼海市	省直单位	万宁市	省农垦系统	五指山市	乐东县	陵水县	三亚市
捐赠额 (万元)	22300	15985	6720	6794	3153	697	200	140	68	60

1979——2002 年底琼籍侨胞、港澳同胞捐赠资金流向金额和占比情况

资金流向	教育	医疗卫生	交通	福利事业	生产	文化	科研	旅游	体育
资助额 (万元)	31061	7991	5686	3978	3461	2536	1241	406	109
百分比 (%)	55.4	14	10	7.1	6.2	4.5	2.3	0.4	0.18

(数据来源: 转引自张朔人、于荣光,《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年,页180;陈永楠《第一次全省侨情调查报告》,出版社不详,2006年,根据179页相关数据制作)

附录十八：

文昌县乡（镇）海外乡亲、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统计表  
（金额：人民币，万元；面积，平方米；楼房，幢）

接收单位名称	捐赠总额	办学				医疗				打井		办电			修路			建桥		其他福利金额
		金额	面积	楼房	教育基金	金额	面积	楼房	保健基金	金额	口数	金额	村数	户数	金额	条数	公里	金额	座数	
铺前	758.43	410.677	12637	22	37				48	28	34	97	730	19	58	105	28	20	218.7	
罗豆	559.75	263.05	7102	15	80	110	18	48	27.2	36	37	94	621	25	10	14.6			128	
锦山	1564	676.10	1683	23	149.5	2260	12		115	156	228	161	436	104	66	166	62	9	230	
湖山	838.29	632.67	852	22	120.59	1350	23		567	21	462	39	806	47	8	23.5	5.43	7	50.68	
抱罗	828.8	496.52	1018	68	463.0	1350	1		185	25	205	136	200	8.5	3	12	85	5	45.8	
冯坡	34	197	97		44	90	1		25	4	16	11	48	15	4	12	8.	3	45.48	

	2	5	3			.	0			.		.		0	.			7		
	.	.	1			3	8			7		2			4			8		
	1	9				8				4		8			8					
	1	7																		
翁田	3	1	5	1	1	1	1	3		5	1	6	1	6	7	4	1	2	3	12.
	8	9	2	4	0	0	6			.		1	9	4	.		7	.		9
	4	3	7			0	3			5		.		4	6			6		
	.	.	2				6					8								
	3	9																		
	2	2																		
	2	2																		
龙马	3	8	3	1	1	1	1	3	1	0	1	7	3	9	5	3	8	0	1	58.
	3	1	3	9	1	1	9		4	.		7	0	8	.		.			31
	9	.	0		.	4	3		.	2		.		3	7		9			
	.	9	6		6	.	8		7	5		5			8					
	3	4				6	4		8			4								
	6					4														
公坡	7	4	9	3	4	2	7	1		2	2	1	9	2	5	8	1	8	13	111
	6	2	4	7	0	9	1			8	4	1	6	7	3	6	0	.		.3
	8	5	0				3					2		3	.		9	9		
	.	.	9											0	8		.			
	7	7															5			
	7	7																		
昌酒	5	2	5	4	1	1	1	1	1	1	8	5	3	9	1	1	1	2	3	68.
	1	4	8	2	9	1	0		5	9		0	5	1	9	1	5			94
	8	4	3		.	3	0			.		.		2	.					
	.	.	8		2	0				1		9			8					
	6	7			5					2		8			6					
	2	2																		
	2	2																		
龙楼	3	1	7	1	2	7	1	2		4	4	0	1	5	6	3	8	5	1	65.
	2	6	7	7	5	6	0			.		.		0	.			.		09
	4	6	2		.		5			5		3		0	6			2		
	.	.	8		3		1					6						9		
	8	9																		
	3	9																		
	3	9																		
东郊	9	6	7	3	2	1	2	2		3	2	3	2	3	1	2	4	0	1	186
	9	1	4	6	9	4	2			.		3		9	1		.	.		.23
	7	9	5		.	3	5			3		.		5			5	5		
	.	.	6		9	.	8					8								
	6	6			3	2														
	4	1																		
	4	1																		
文教	5	1	4	1	1	2	2	3		2	2	2	2	1	1	5	1			90
	5	9	9	2	0	0	7			0		7	0	0	5	5				
	2	9	4			0	0					.		0						
	.	.	7				7					7		0						
	5	8					7							0						

	7	7																		
东阁	2	1	5	1	1	4	1	2		1	6	3	2	4	3	7	1			32
	2	2	4	3	8	5	2			9		.	5	9	.		0			
	6	2	3		.	.	3			.		2		2	6					
	.	.	6		5	5	4			7					5					
	7	6			8					5										
	2	2																		
宝芳	6	3	8	3	5	1	1	4	3	9	2	1	6	1	4	2	4	1	6	21.6
	5	0	0	0	0	1	7					3		1	0	1	6	5		
	7	8	6			3	0							6				2		
	.		2				6											.	7	
	3																			
头苑	2	2	7	2	1					0	8	5	5	8	3	3	3	9	3	35.57
	9	4	0	6	4					.		.		2	.		.	.		
	5	0	5		.					9		4		6	8		5	7		
	.	.	3		3					6		7						6		
	9	4																		
	6																			
重兴	3	1	5	1	2	1	3	1		1	8	4	2	6	3	6	1			75.66
	2	8	5	7	.	7	4			5		.		0	0		1			
	7	2	8		7	.	0			.		6			.		.	8		
	.	.	7		5	6				8					8		9			
	3	9			7															
	7	6																		
会文	4	3	1	5	3	1	1	1		2	1	1	1	1	2	2	3	3	4	27.63
	7	9	6	2	7	.	0			.	2	9	4	1	9	3	8	.		
	5	0	2		.	9	0			4		.		0	.			7		
	.	.	3		0	7				8		9		7	1			3		
	4	5	2		7							7			0					
	3	5																		
迈号	3	2	4	1	3	1	3	1		6	4	1	2	7	6	7	1	1	9	86.6
	7	4	9	9	5	6	0			.		.		9	.		1	0		
	1	5	7		.		0			3		4			0	.				
	.	.	2		7					8		5			2		1			
	8	4																		
	5																			
清澜	4	2	5	2	2	4				5	9	1	1	5	5	1	2	1	4	168.07
	2	2	9	4	7					.		9	0	1		3	1	.		
	5	2	4		.					4				0				6		
	.	.	5		6															
	6	5																		
	3	6																		
蓬	3	3	6	3	1										0	1	2			

莱	5	5	0		2														
	.		0											.		.			
	1													1		8			
文	1	5	2	9					2	1	8	2	5	9	1	1	7	4	65.
城	4	1	9						.	0	.	2	8	.	1	2	.		2
	4	.	7						9		3		0	6			7		
	.	1	2											6					
	8																		
	6																		
南	2	1	4	9	8				1	1	1	2	3	3	7	9			32
阳	1	4	8		.				.	2	2	1	8	0					
	5	0	3		6				8				8	.					
	.		7		6									1					
	9																		

(数据来源: 转引自张朔人、于荣光, 《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8年, 页174)